玻利维亚简史

〔美〕罗伯特·巴顿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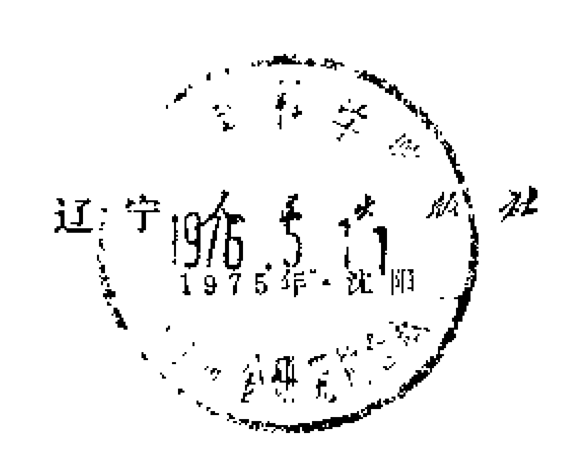
139

玻利维亚简史

〔美〕罗伯特·巴顿著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5年·沈阳

ROBERT BARTON

A Short History of

BOLIVIA

EDITORIAL "LOS AMIGOS DEL LIBRO"
La Paz-Cochabamba 1968
根据拉巴斯—科恰班巴书友公司1968年版译出

玻利维亚简史

〔美〕罗伯特·巴顿著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翻译组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7\frac{3}{4}$ 插页：10
字数：240,000 印数：1—16,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21 定价：1.50元

（内部读物）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罗伯特·巴顿 (Robert Barton) 是美国的外交官，曾在美国鲍德温学院主修历史；毕业后即开始其写作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进入外交界，曾被派往乌拉圭、阿根廷、西班牙、多米尼加和玻利维亚等西班牙语系的国家担任外交职务。1957—1964年间，他曾任美国国际教育学院美洲国家系的主任，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过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还写了一些有关美国教育和国际问题的文章。

作者在本书中，对蒂亚瓦纳科的文化，印加帝国的概况，西班牙殖民者对玻利维亚的掠夺与侵略，玻利维亚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玻利维亚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情况等都作了概括的叙述。作者对西班牙殖民者作了一定的揭露，对印第安人和玻利维亚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示了一定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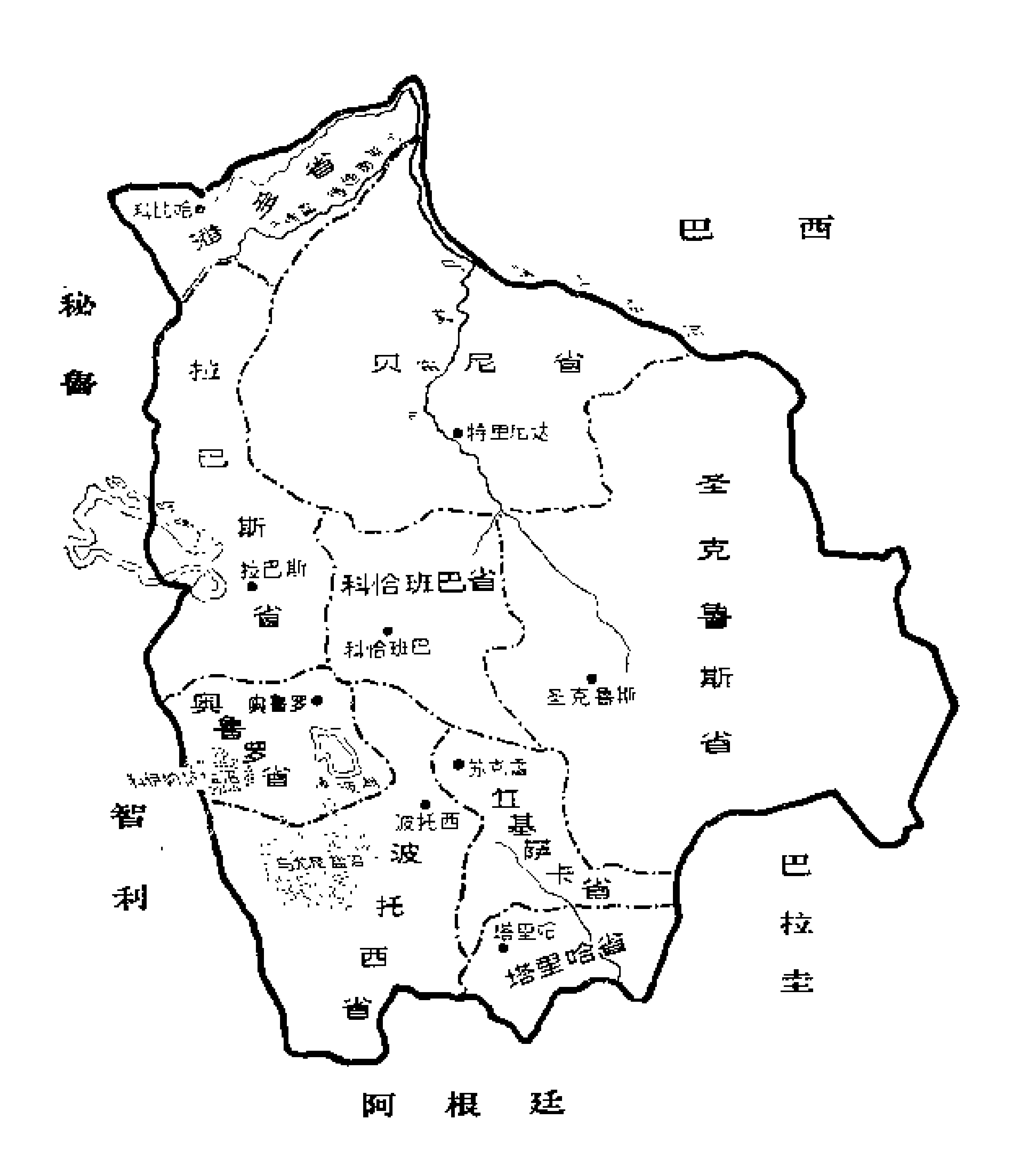
3. 166

情。本书对我们研究玻利维亚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

但是，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本书不仅未能揭示出玻利维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还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对玻利维亚的侵略。这些，在阅读本书时，应该注意批判。

原书是1968年出版的。中译本系根据1968年在玻利维亚印刷的第二版本译出。原书在单字拼写、地名、人名等方面有不少错误，凡已发现的，在中译本中都已作了改正或加注说明。

1975年8月



巴西
秘鲁
拉巴斯省
拉巴斯
贝尼省
特里尼达
圣克鲁斯省
圣克鲁斯
科恰班巴省
科恰班巴
奥鲁罗省
奥鲁罗
波托西省
波托西
丘基萨卡省
苏克雷
塔里哈省
塔里哈
智利
巴拉圭
阿根廷

玻利维亚分省图

本书献给美国驻玻利维亚的公使和大使们* ——一百多年来他们曾亲自表达了美国对它的姊妹共和国玻利维亚的爱慕和钦佩。

* 有关人名请参阅附录五

前　言

玻利维亚高原地带的稀薄空气，使人们对它那奇特不凡的景色产生错觉。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只羊驼(llama)几乎象一座山那样高大。

与此相同，玻利维亚的历史学家们，也都患有错视症，很少例外。在回顾我们的历史时，常常存在着歪曲。

罗伯特·巴顿没有患错视症。他不是玻利维亚人，然而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尊重，读者是会一目了然的。他以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那种值得赞许的超然态度，对待我们的历史。在这本书里，没有阿格达斯式的或托因比式的哲学评论，而是以简单明了的字句写出了事实。

这本玻利维亚史，文体简洁、内容丰富、风趣易读，对于说英语的来访者和对玻利维亚的地理和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是有用的。

读者在这本书里将看到作者毫无偏见地对政治和经济形势作了细心的研究，而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读者还可以看到，作者是熟悉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这本书应当译成西班牙文，以供玻利维亚人阅读。

罗伯特·巴顿是美国的外交官。他在玻利维亚的年月里，以他那洞察事物的能力和老练世故的本领，默默地对我们有了了解。他专心致志从事刻苦的研究工作，并且慷慨地贡献出此书，用以促进玻美两国的了解。

文化情报旅游部次长 劳尔·马里亚卡

序

在蒂亚瓦纳科文化初成时期，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托斯正著书立说描写地中海古代的地理和雅典社会的起源。他写的历史涉及的是社会的自然状况及其对事物的影响。

这本《玻利维亚简史》，更多地效法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苏西底德斯。他论述的是政治和战争，而这本平凡空洞的简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它不是有关历史哲学的论著，只是直率地记述了玻利维亚地区有史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访问玻利维亚的客人和玻利维亚操英语的社会人士，都想知道这个迷人的国度的重大事件和显要人物。这本书的宗旨就是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参考材料。

我写这本历史时，曾荣幸地拜读了玻利维亚过去的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给我这部习作增添了风趣。阿斯卡伦斯在他

的《玻利维亚名人传》中对于一些个别英雄人物的研究对我十分有用。路易斯·佩尼亚洛萨、米格尔·博尼法斯以及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三人着重研究经济问题的著作都是很有价值的。

恩里克·菲诺特的《玻利维亚新史》是以罕见的客观态度从社会学的观点编写历史的范例。他这本书和何塞·梅萨、特雷莎·梅萨、温贝托·巴斯克斯·马奇卡多合著的《玻利维亚历史手册》是我写这本书的指路标石。

巴伦西亚·维加的《宪法手册》和路易斯·帕斯的《玻利维亚的最高法院》适合我的研究课题，因为我这本书主要是一部政治性的历史。在浏览群书的过程中，对于米格尔·德洛斯·桑托斯·塔沃尔加从神学观点解释历史，对于加夫列尔·雷内·莫雷诺着重从社会学角度叙述历史，我也很感兴趣；不过后者有些贵族气，他在《上秘鲁殖民地的后期》一书中极为明显地表现了对待印第安人的优越感。玻利维亚历史学会的创始人、民俗学家里戈维托·帕雷德斯，在他的《玻利维亚的迷信神话和民间遗风》一书中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动人的奇闻轶事。1967年末和1968年，《日报》刊登

了一些参加过查科战争的人彼此兴致勃勃交换的通讯。我在写查科战争那一章时，从这些文章以及丹尼尔·萨拉曼卡著的《查科战争文献》和罗伯托·克雷哈苏著的《马沙马克雷伊》两部书里引用了不少材料。

本书后面附有参考书目。其中许多书的作者是我应当感谢的，因为在某些章节里我曾直接引用过他们的话，在另外某些章节里我采用了他们书里的一些事实。在正文里引用这些材料时，我力求少用脚注、斜体字和其他妨碍读者通畅阅读的东西。在参考书目中，我标明了值得参阅的页码。看到这些书目，读者可以知道我在此地任职期间，曾全力以赴地埋头于钻研玻利维亚历史。我住在拉巴斯，这不仅使我能获得无限的原始材料，同时使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在我从史前期到近代史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们始终给我指导和建议。在这些朋友中，我特别感激劳尔·马里亚卡，瓦尔特·蒙特内格罗，特雷莎·希斯维特·德·梅萨，贡纳尔·门多萨，豪尔赫·穆尼奥斯·雷耶斯，卡洛斯·罗梅罗，卡洛斯·庞塞和安娜·玛丽亚·坎佩罗。当然，书中存在着的任何差错，全部是我本

人的。

11 居住此地数年，使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这个国家，从潘多省的科比哈到南方的塔里哈，从波托西到圣克鲁斯和特里尼达。有了这样的机会，我才能熟悉这个国家的地理和气候，才能直接提出问题借以澄清一些矛盾的印象，才能对玻利维亚作家们所提供的材料作出我自己的补充描述。没有这样的条件，我是不敢冒昧写这部历史的。我竭力遵循萨穆埃尔·埃里奥特·莫里松在《历史的远景》一书中提出的忠告。他说：

> 一个历史学家应当献身于他所研究的课题，埋头于他选择的那个地区和时期，同时也应当常常站到他的课题以外，以便清醒头脑。正如一个航海家那样，当他在异邦的海岸测量了水深后，退而细心地研读他的海洋图，然后再发布必要的命令，安全地继续航行。

这本书可供消遣，亦可作教学之用。仅有一次，我用斜体字写出了西班牙文，但同时又把它们

列入了词汇注释，以便那些想知道其确切意义的读者查考。脚注用得少，便于流畅地阅读。附录归纳了这个国家的较难较复杂的几个历史阶段、史前期的文化、各个印加领袖统治的时间以及历届总统任期。玻利维亚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玻利维亚共和国的节日也都列入附录。最后还附有人名、地名和大事的索引，以便查找个别人物或日期。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同我一道对玻利维亚的发展有较多的了解，对它的人民和文化更为赏识。

罗伯特·巴顿 1968年于拉巴斯

目　录

第　一　章

蒂亚瓦纳科文化和上古时期

印第安人是玻利维亚的基本人种。

——弗兰斯·塔马约：《国民教育的建立》(1910年)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人类起源的问题是大家经常遇到的。对于玻利维亚人，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更为频繁，因为他们的早期历史在考古学上始终是个大谜。蒂亚瓦纳科的奥秘，在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还没有解决。直到今天，尽管有了现代考古工具放射性碳—14，这个奥秘依然存在。史前期对玻利维亚人还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玻利维亚居民，按人种来划分，很大一部分是印第安人。有些国家通过移民和杂婚，把原来的种族征服和同化了。而玻利维亚今天仍然有65%的人是印第安人，20%—30%是混

血人(乔洛人),其余是欧洲人。大约有一百万说克丘亚语和七十万说艾马拉语的印第安人,组成了玻利维亚土著居民的绝大多数。说其他语种或方16言的只有十五万人。

不久以前,大多数人承认这样的事实,说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他的配偶夏娃是在伊甸园出现的。因此,关于第一个美洲人的来历问题便产生类似圣经的解释法,大意是说美洲大陆上最原始的居民是诺亚的儿子——史姆的后裔。在十七世纪,安东尼奥·德·莱昂·皮内洛对这个课题提出另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他是西班牙人,那时就住在现今的玻利维亚。他在《新世界的天堂》里声称,圣经创世纪里所叙述的有关造人的事,实际上发生在查尔卡斯稍偏东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苏克雷。一百年后,埃梅特里奥·比利亚米尔·德·拉达在他写的《亚当的传说》一书中发展了这个说法。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认为在伊廉普山脚下的索拉塔就是原先的伊甸园。在这本书中他还写道:艾马拉语是人类最早的语言,其他语种都是从它衍化来的。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圣经一直是人的最大灵感,也几乎是人的唯一的书本。就在这段时

期，著名的“印第安人的使徒”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甫对这个谜提出了一个新的解答。根据他的说法，美洲大陆上第一批人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十个部落的成员；在纪元前722年，萨冈侵占萨马里亚以后，把他们劫持走了。他们从亚述人那里逃到了美洲大陆。1830年，约瑟夫·史密斯在他的《摩门经》中重复了这种观点。他写道：以色列人大约在纪元前600年由酋长洛伊领着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到达美洲后分为两个民族：艾弗梯人是白种人，他们发展了伟大的文明，在金板上记载自己的历史；拉马尼梯人是黑皮肤的游牧民族。据同书所述，大约在公元420年，拉马尼梯人消灭了艾弗梯人。他们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

究竟最早的人怎样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了美洲，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人做出满意的回答。但是有好几种理论来解释这个难题。有些科学家，也许是受上一世纪新生的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土著说”或者叫“本土说”。他们认为本半球上的人是孤立地、分别地演化到全盛阶段的。那位最后定居在拉巴斯的奥国考古学家阿瑟·波斯南斯基所持的观点与这种说法略有不同。他反对游牧民族从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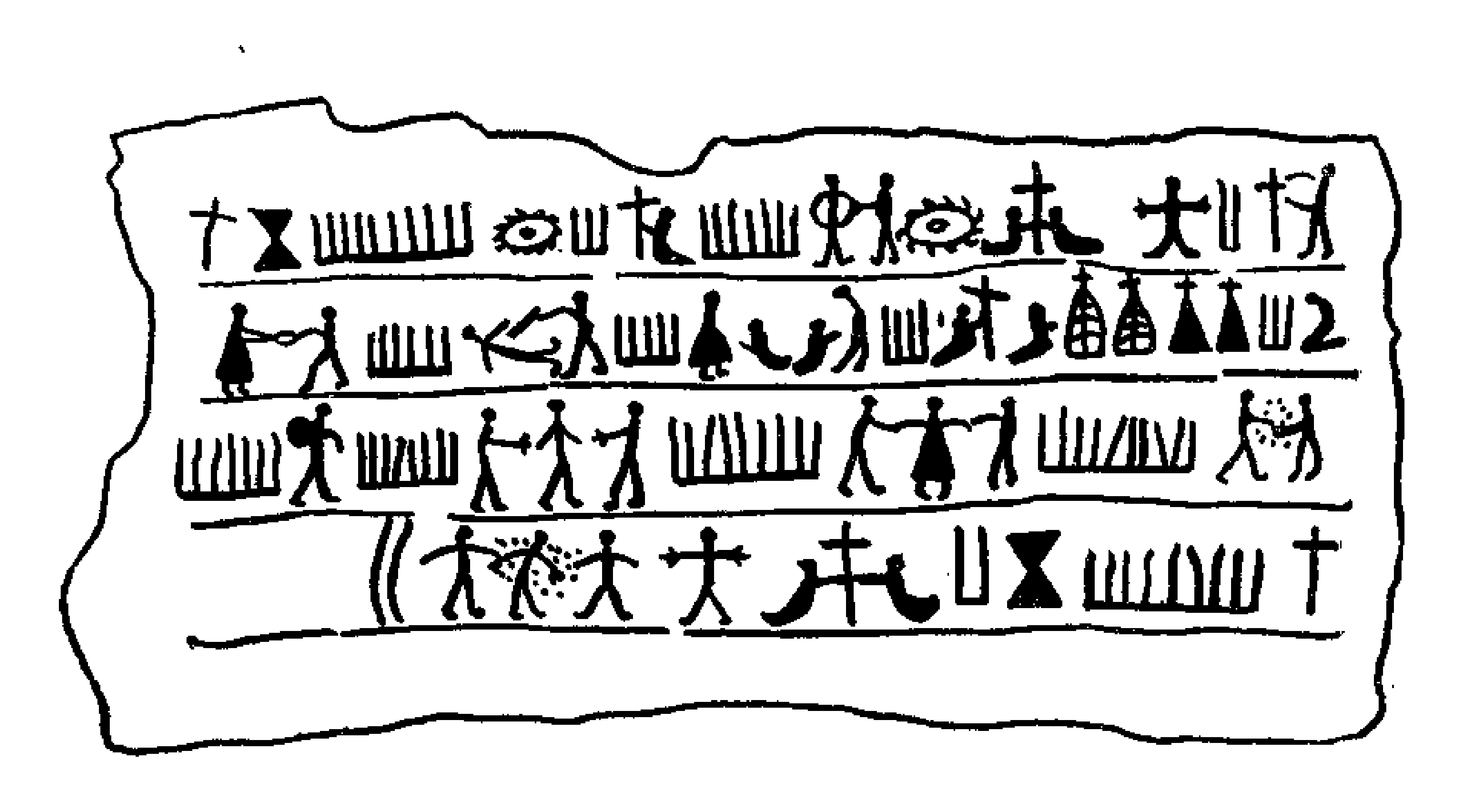
洲渡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的说法。他的理由是：当亚洲还有大片无人居住的辽阔土地时，那些游牧民族为什么偏要跨渡浮冰忍受阿拉斯加的艰苦呢？再说，原来那些移居的民族经过长途跋涉活下来的寥寥无几，他们怎么能在西班牙人初次踏上美洲海岸时估计就已经增长到四千万之多呢？所以，波斯南斯基主张，人类可能发源于南北两极地带。宇宙进化形成地球以后，南北两极首先冷却，因此那里可能是最早有了生态条件的地方，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通过这种设想，他认为今天大家知道的史前人种，如海德堡人、北京人、尼安德特人、南方古猿人、肯尼亚猿人和克鲁马农人之所以分布广阔，同期发展，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近代考古学家把这种理论同“消失了的十支族”①、“消失的阿特兰提斯岛”② 或玛雅文明发源于柬埔寨的说法划归一类。二十世纪的研究成果断定：有一次、很可能有两次的民族迁徙，把

---

① 据传，希伯莱人原来居住在圣地巴勒斯坦北部，后来失踪，不知去向。这支失踪的民族曾引起各种猜测。——译者

② 据神话故事，阿特兰提斯岛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大岛，后因地震而沉入海底。——译者



大约二百年前艾马拉族印第安人抄写的十诫。原件现存科恰班巴博物馆

史前期人或冰河期人从旧世界带到了本半球来，那时这里大部分地区还是为冰川所覆盖。

现在，最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在文化摇篮——美索不达米亚盆地，有一种持续的推动力，迫使那些类似蒙古人的部落从南亚向东北迁徙。在三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之间的后冰河期，他们缓慢地横越亚洲到达白令海峡。一直到两千年前，还不断有其他民族接踵而至。由于这些民族迁徙的推动以及为了追踪冰河期动物，他们在公元前7000—3000年之间到达了美洲的最南端。

几千年后，一些金色头发、白色皮肤的人，横穿亚洲来到了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以后，他们同黑皮肤的人混血了。有一种仍在争辩未决的理论认为：当这些人在太平洋岛屿安定下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漂流很远一直到了美洲大陆的西海岸。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认为，用筏子或独木舟横渡海洋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些人说：正因为同太平洋岛屿有接触（尽管这种接触可能很少），原来亚洲人的血统混杂了。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安第斯山区、亚马孙盆地、墨西哥、美国北部大平原和阿拉斯加等地所看到的印第安各部落各不相同。

最早的美洲文化，就现在已经发现的来说，要追溯到一万五千年之前，或者更早一些。在新墨西哥的克洛维斯和桑迪亚洞出土的凿磨过的石矛尖和其他人工制品，都是早期石器时代文明的文物见证。粗糙的石头工具中，夹杂着用已绝迹了的哺乳动物、马、骆驼、獭和其他动物骨头做成的箭头。

另一个可以鉴别的文化，经用放射性碳鉴定证明，已有八千到一万三千年的历史，这就是福尔索姆文化。它的位置也几乎都在新墨西哥和附近的各平原地带。在第三编年时代，也就是尤马碎片时代，已有比较复杂的人工制品埋积在墨西哥，其中有磨石、锥子、斧头刃和其他工具。这些文物说明，这个时期的文明更多地是依靠农业而不是狩猎。这个时期可能是在公元前7000—5000年之间。

兰宁和帕特森二人在近至1966年进行的发掘工作说明：一万四千年前，在后冰河期的初期，南美洲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在秘鲁的奇隆山谷和塞罗—奇瓦特罗斯地区所发现的文物见证是石英岩制成的双面的工具。把那个地区干旱和湿润交替 20 的周期变化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变化相比较；再把从不同的土层里发掘出来的植物花粉加以分

析，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整个阶段显然是属于后冰河期，而它的开始一定是远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从这些工具的记载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人工制品显然是用来制造木头或骨头器具的。……这就说明：冰河期的人们并不重视用长矛打猎，也不重视搞些兽皮和肉食之类的事。…… 估计这些人是成群结伙地生活。大概每伙不超过几户。他们的经济，一定是依靠采收可食的植物，可能还有可食的海物。就象大多数的食物采集者那样，他们可能按照季节，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内，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以适应各种可食植物成熟期不同的特点。

猎人们可能在与此大约相同的时期到达秘鲁和与它毗邻的玻利维亚高原。但是，一个灿烂文明的最早遗迹，始于公元前3000年。在秘鲁北部海岸奇卡马地区的瓦卡—普里埃塔，发现了地下房屋。附近的遗物证明，当时的居民除以鱼类为主要食

物外，还有豆类和植物根茎作补充。他们虽然不种谷物，可是培植棉花。1954年，阿根廷考古学家、科恰班巴城圣西蒙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迪克·埃德加·伊瓦拉·格拉索在高原地带锡卡西卡附近的维斯卡查尼发现了旧石器时期猎人们的遗迹。这种“维斯卡查尼人”(Viscachanense)，利用带石尖的长矛和标枪猎捕小动物，挖掘植物根茎和摘取浆果。伊瓦拉·格拉索用放射性碳已经证明，他们生活在高原地带的时间同大平原上的福尔索姆猎人一样早。大约在同一时期，桑迪亚洞的穴居者也正处于用石头凿制矛头尖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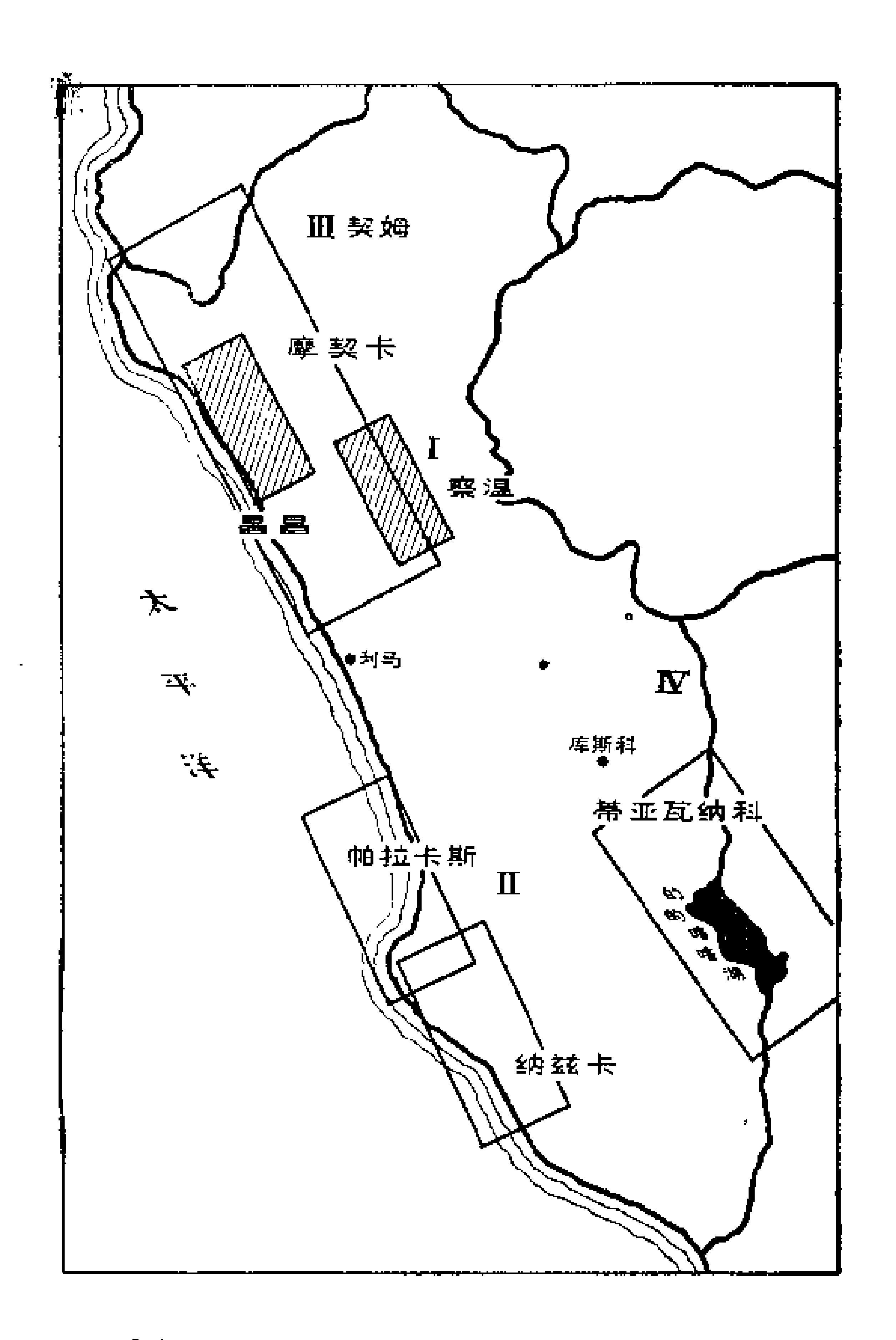
伊瓦拉·格拉索说，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21 又有一批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人[①] 居住在今天的玻利维亚。在这个时期，他们已经使用弓箭猎捕乳齿象之类的大洪水前期的哺乳动物。这种动物的遗体在塔里哈盆地已经发现。这一支迁徙的人，现在被命名为阿亚姆比丹人(Ayampitinense)，是根据雷克斯·冈萨雷斯博士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附近发现他们遗迹的地点而起的名称。

在此以后，迁徙的一批人，多数为渔民。他们

① 参看附录一：安第斯和秘鲁文化编年表。

是乌罗人(Uro)，定居在奥鲁罗以南的波波湖附近。他们种小谷物、捕鱼、造船，并且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普基纳语，有时也叫乌罗乌罗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在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都仍然是很原始的。所以不管是科拉人或印加人都未能成功地同化他们。另一方面，奇帕耶人却是一个较为开化的部落。他们发展了一种图腾宗教，一种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一种圆形房屋的特殊建筑。他们居住在卡兰加斯附近，可能就是昌戈和阿塔卡马的渔民部落的祖先。

最早的秘鲁文化通常称为察温文化（Chavin culture），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延续到公元前400年。它那精雕细饰的建筑物、金工品、纺织、陶器和农业，比瓦卡—普里埃塔海岸居民要进步得多，因此，至今很少有人看出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秘鲁北部高原的察温—德万塔尔或许就是这个文明的宗教中心，至少是在这里已经发现了属于这个时期的最精致的庙宇和雕刻。这个地方还有大的平台，装饰着石雕头像和猫形怪物的浅浮雕。大的祭祀场附设着走廊、厅室和其他显示建筑技巧的东西，这些都是海岸地区所不知道的，因为在海岸地



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的安第斯文化和海岸文化

区较早期的居民住在地下房子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察温陶器同察温的雄伟建筑物相比较，就显得逊色一筹了。譬如，卡斯提略大厦有四十五呎高，从它的外面看去就象一座大碉堡。其内部则间隔重叠，有若干走廊、楼梯、通风烟囱和无窗房间。在外墙的上部边缘上，可以看到雕刻的猫形图案，其下面是一排镶在墙里边刻成人头形和动物头形的承溜石。在这座建筑附近发现的陶器，多半是单一颜色的。已发现的黑色和棕色的碎片上装饰着几何图案，图案是在潮湿陶坯加火之前在上面用钻眼、打印或抠刮等办法做成的。这些器皿大部分是厚缘带嘴的浅碗。许多器皿有镫形嘴，用两个拱形管在顶端接合，形成一个出水口，这样便使坛子看起来很象一个双手插腰的墩实的家庭主妇。

另外一些器皿，造形似豹，都是用石头制成的。正如石雕是鉴定察温文明的一个方面一样，那种传统的猫形图案是察温文明的另一方面的特征。这种图案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装饰一再出现，不仅在石雕和陶器方面，而且在纺织和金

工品方面也屡见不鲜。因为从墨西哥往南各地区都发现了这种猫神（Cat-God）形象，所以这种标志一定是同一种流传很广的宗教崇拜有关联。

在高原地带，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温德尔·贝内特在蒂亚瓦纳科北部十五哩的奇里帕镇，发现了一个同样古老独特的文化。经用放射性碳—14对那些由土坯房屋的遗迹、层层灰烬和陶器残片所堆积起来的土丘和坟墓（túmulos）鉴定，证明这个文化是在公元前600—1000年之间。贝内特把它命名为奇里帕文化。它有两项稀奇的特征，即双层墙壁的房屋和祭祀用的管子。两层墙壁相隔三十二吋，显然是为了既可隔避高原的风寒，又可储放谷物。当然，两层墙壁隔距这样宽是无法嵌进窗户的。

在奇里帕出土的管子都是些断残碎片。这些管子的管头凹入部分是烧黑的，它们同在普诺和科恰班巴出土的完整管子有相似之处。据此，伊瓦拉·格拉索推断古代人有吸烟的事。在阿根廷发现的类似的管子多半是用石头做的，有些长达两呎，而奇里帕的碎片多半是用泥土烧成的。它们很多有十字花纹，另外一些有猫形图案，同在 24

最古老的库斯科遗迹中发现的一模一样。在奇里帕发现的陶锅，表面呈红色，绘有黑、黄、黄褐、红各种颜色的几何图案，有的也涂白色。这表明这些陶器大约是在察温文化即将消亡的时候设计制造的。

海岸文化的第二阶段，可以叫做“后形成期”或“实验期”（Experimental Period）。它从公元前400年延续到公元后400年，历时八个世纪。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发明和革新的阶段。农业上，采用引水灌溉，引进了新的植物品种。建筑上，使用了新的材料和工具。冶炼技术，如铸造、焊接、镀金都是新的发明。银、金也和黄铜一样，都使用起来。从海岸到高原地带所用的砖坯，出现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形状。房屋不仅盖成长方形，也有的盖成圆锥形、钟形、半壳形和圆柱形。陶器制造因利用涂绘和氧化烧法而得到改进。迄今发现的第二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中心，一是秘鲁北海岸的萨利纳尔文化，一是南海岸的帕拉卡斯文化。这两种文化各自创造并发展自己的图案，很少共同之处，只是在陶器制造上两种风格是以同一装饰技巧为基础的。然而各种发明从一个中心传播到另一个

中心，形成了文明的统一，这同以前察温文明一样，是可以得到见证的。到公元第四世纪末，从秘鲁北部到南部，大部分地区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改良的手工艺技巧。

在实验期的形成阶段，蒂亚瓦纳科文化在秘鲁奠定了它最初期的基础。玻利维亚造诣最深的考古学家之一卡洛斯·庞塞·桑西内斯通过放射性碳鉴定，确定了他称为蒂亚瓦纳科文化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年代。他认为这两种文化存在于公元前460—140年之间。在公元前的各世纪里，各种地方文化肯定是交错重叠地发展着，不过它们主要还是土著性质的。例如最早期的蒂亚瓦纳科文 25 化水平表现在能应用陶器、金和银，这同在海岸地区所发现的实验期的水平是一样的。在农业中，使用了石锄和石犁。马铃薯干成为长期储存的食物。引水灌田和羊驼粪(taquia)的使用，都说明当时农业技术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

蒂亚瓦纳科文化是在的的喀喀湖岸发展起来的，最后传播到秘鲁和智利北部所有的居民区。就象其他早期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许多方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前辈的考古学家们，如波

斯南斯基，推断艾马拉人可能是安第斯高原开化最早的人种。许多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证明，这种推断是不大对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根据是，今天的艾马拉人同蒂亚瓦纳科文化丝毫无关。谢萨·德·莱昂在1548年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个离奇莫测的蒂亚瓦纳科遗迹。艾马拉人曾对他解释说，那些大建筑物是过去由一些巨人或神在一夜之间搭起来的。艾马拉历史对这个地方并无其他记载，因此，没有什么理由把蒂亚瓦纳科文化归功于他们。果真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就筑起了那样庞大的建筑物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他们一定是大大地退化了，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是极不可能的事。显然，关于克丘亚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玻利维亚人和秘鲁人都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一方主张艾马拉人的历史比克丘亚人要古老些，而另一方的主张则恰恰相反。玻利维亚人为维护他们的主张曾指出：艾马拉（Aymara）这个字是由阿亚姆（ayam）和阿鲁（aru）两个字拼合起来的，意思是“古老的语言”。谢萨·德·莱昂记述过，印加贵族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王家的语

言。据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祖先用过的。其他民族用克丘亚语，这种语言是印加人强加给他们征服的各个部落的，只有在科廖地区的部落例外。豪尔赫·穆尼奥斯·雷耶斯写道：印加人打破了他们让被征服的民族都学克丘亚语的严峻不变的法律，允许的的喀喀湖岸的居民说艾马拉语。因为他们认为该地区是“帝国的摇篮”。直到今天，这 26 个省仍然是这种“古老的语言”艾马拉语唯一占优势的地方。当然，在另外一些零星的地方，这种语言也可以听到。那是根据一种名为“移民法”的制度，印加人把说艾马拉语的人迁移到那些属地去了。

几个世纪以来，说克丘亚语和说艾马拉语的印第安人都保持着他们彼此在体力、脑力和语言上的差别。事实上，他们双方的种族特性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没有理由使人相信他们是来源于共同的祖先。虽然约有60%的克丘亚语是从艾马拉语的字根衍化而来，但是没有一方能懂得另一方所说的话。克丘亚语其余的40%好象是来源于阿鲁瓦科语，这种语言的创始者是一些住在玻利维亚最北部的热带地区的部落。两种语言都是胶着语，

而克丘亚语的音调比较和谐。它们各有独特的语法和句法。克丘亚人似乎较为外向和活跃。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曾经是征服过别人的民族，而现在又是占优势的一方。当他们和艾马拉人住得邻近时，他们便学艾马拉语，而艾马拉人则很少这样做。

考古学上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论点：说这一个部落出现在玻利维亚高原的时间早于另一个部落；或者说两个部落都受到外来的侵略，因而改变了发展的进程。同样，相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部落对蒂亚瓦纳科的建成有过贡献也是毫无理由的。

如此说来，安第斯高原上这些最伟大的宗教和礼仪中心是由谁建成的呢？马克斯·乌莱和A·斯图贝尔二人在1892年的早期著作《蒂亚瓦纳科的遗迹》一书中，为揭开这个秘密做了卓越的初步尝试。然而乌莱的对手、业余考古学家阿瑟·波斯南斯基从1904年初到四十年代的中期，一直使他黯然失色。关于蒂亚瓦纳科文化，波斯南斯基有一套煞费苦心推敲出来的假想。对这套假想，严肃认真的考古学家们，就象对他的人种起源两极论

一样，认为几乎完全不可相信。在他那异想天开的理论之中有这样的提法：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年代可以回溯到远至一万三千年；它是建立在一个巨 27 大的甜水湖岸上，湖水来自融化了的冰河期的冰川；两个主要民族，科拉族和阿拉瓦族，建起了秘鲁史前期的伟大城市，科拉族的地位是主人，阿拉瓦族则是驯顺的奴仆；太阳门确实是个石头日历；在石雕上经常看到的十字花纹，对印第安人也是一种宗教象征，它从蒂亚瓦纳科传播到了整个大陆。他还认为是一次火山爆发或其他自然的突变灾祸，毁灭了这个城市和它的文明。

鉴于这一地区始终没有发现过火山熔岩，这个湖畔文明的衰亡，非常可能是由于旱灾和自然蒸发造成湖面渐次缩小所致。即便在今天，水分蒸发现象仍然是说明湖面保持相对稳定水平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从科迪勒拉山脉流入的水量要比经由德萨瓜德罗河排泄出的水量多得多。这片废墟坐落在海拔一万二千三百九十呎的一个小山上。很显然，当初这里就是的的喀喀湖里的一个小岛。毫无疑问，湖面是降低了，有人说几乎降低了一百五十呎，湖岸从这个宗教中心退远了约有两哩。在

随着这个自然灾祸而来的经济和社会骚乱中，这个文明退化了。活下来的居民，后来大部分移住到湖里的其他岛上。约在公元500年，一个氏族离开了这些岛，迁徙到秘鲁的图库尔索附近。传说这批人是由芒科·卡帕克和他的妹妻[①] 玛玛·奥柳率领的。故事还说，他们的后代终于又以征服者的身份回到这里，成为那个生气勃勃的印加文明的祖先。

对蒂亚瓦纳科文化的研究，温德尔·贝内特采用层积发掘法而没有用放射性碳。他认为蒂亚瓦纳科的最早年代是在公元300—700年，他称为蒂亚瓦纳科原始期(Tiahuanaco Primitive)。庞塞·桑西内斯通过碳—14鉴定，认为蒂亚瓦纳科原始期的年代是在公元0—300年。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断定这新文化是当地发展起来的，还是由外部侵略者带来的。但是它的陶器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秘鲁北海岸的雷库艾文化。

28 雷库艾文化属于贝内特的海岸文化编年表里的第三期。这个时期从公元400—1000年延续了六

① 关于"妹妻"一词的来历，可参看第59页。——译者

个世纪。由于它的美术造诣和技术成就，一般称之为古典期。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的秘鲁陶器、纺织和金属制品中，最精致的带有美学风格的选品都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今天，在三个中安第斯山脉国家的博物馆里存有这些陈列品可供研究和鉴赏。当时农民已经驯养、培植今天在该地区还可以见到的几乎所有的土生动植物了。梯田、灌溉渠道和肥料被广泛地利用。用石头和土坯建筑起来的巨型庙宇和高大的金字塔，都说明当时在建筑上的显著进步。商业也开始了；原料，甚至包括开采的石料和粘土，都可随意地从一地运往另外一地。

然而地方主义还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每一个主要的文化分区，诸如雷库艾、摩契卡、纳兹卡、帕拉卡斯古墓以及古典蒂亚瓦纳科等文化地区，在器皿造型和使用原料方面都各自发展了独特的风格。例如，雷库艾文化是以它的多层建筑物和石雕而著名的。它的建筑物都有好几个房间，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石雕像、动物浮雕和彩绘陶器是这个文明的另一部分遗物，这些都是经受过北部高原严酷

气候的考验保存下来的。

摩契卡陶器，从其造型和红、白彩绘的特征是极易识别的。在新世界里它表现了最完美的雕塑形式。鸟、兽、植物和领袖们的头像，塑造得维妙维肖。一些陶器上描绘着渔民、武士、僧侣们的日常活动。另外一些则显然是属于春宫画一类的东西。所有这些，再加上那些优质的纺织品、镶嵌木雕和精巧的金工制品，呈现出早期美洲人生活的一幅图画，其明晰的程度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任何其他文化所不能及的。摩契卡建筑不能同其陶器相媲美，但是在秘鲁的特鲁希略附近的太阳殿金字塔，同埃及法老① 的金字塔一样，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塔的底座七百五十呎长，四百五十呎宽，高耸天空六十呎，共用了一亿三千万块干坯。但是，制成这么多的干坯并把它们堆砌成形，曾用过多少人工，则是永远无法知道的。

当摩契卡文化和雷库艾文化在秘鲁北部海岸的山谷里形成的时候，帕拉卡斯和纳兹卡文化在南方海岸出现了。古典时期的帕拉卡斯文化可由

① 法老是古埃及君王称号。——译者

它的古墓来鉴别。在实验期有一种较早的文化盛行，经鉴定是帕拉卡斯—卡维尔纳斯文化。卡维尔纳斯的墓都是十到十二呎长的深拱建筑，里面有典型的第二时期的陶器。帕拉卡斯古墓则因其中有刺绣品和用小羊驼毛、羊驼毛、甚至人发所制的纺织品而更为闻名。古墓的地下墓室中有许多木乃伊，用精致的有传统风格的斗篷和裙子包裹着。温德尔·贝内特认为："在成千上万的大幅帕拉卡斯纺织品里，把其中任何一幅加以纺、染、织、绣"需要多少年月，几乎是无法估计的。这些纺织品中没有什么穿用破旧了的，纺织水平也特别高超。这些事实说明：在那干旱狭小南方山谷里居住的人们，一定是把大部分空闲时间用在设计那些精致细巧的刺绣，并为他们自己或亲属织做寿衣。贝内特写道："毫不奇怪，这样一个民族是不会关心建筑宏大的庙宇，或苦心研究政治制度的。"

纳兹卡文化和摩契卡文化一样，可由它那多色陶器鉴别出来。但是它又和摩契卡文化有所不同。它的陶器过分地因袭着传统风格。因此，单从陶器上装饰着的那些人和兽的立体图形，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是不能知道多少的。从纳兹卡

的墓中出土的带柄杯、高脚杯、花瓶和碗，涂釉竟达八至十次之多。这些陶器上屡次出现猫神像，因此，敬猫神和祭祖先一定都是纳兹卡宗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0　贝内特把蒂亚瓦纳科原始期的文化归在他分类的第一时期。但是，如前所述，庞塞用放射性碳试验证明在它之前还有两个更早的文化。他认为老蒂亚瓦纳科文化应在纪元头三个世纪，修建宏大的石墙、雕磨的石柱以及塑造人形神像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庞塞和伊瓦拉·格拉索把蒂亚瓦纳科第四时期叫做蒂亚瓦纳科古典期。经用放射性碳鉴定，它的年代是从第三世纪末叶到第八世纪中叶，相当于贝内特划定的秘鲁文化的第三时期。这个第三时期也被命名为“古典期”，下文将还要提到。就蒂亚瓦纳科而论，它的文明在这个时期是全美洲最灿烂辉煌的。它那建筑物的宏伟气派至今仍动人心魄。庞大的宫殿、庙宇和金字塔，四周排列着当年石工和农民居住的大片坯房。

贝内特认为，蒂亚瓦纳科从来没有发展到完善的地步；或者说，它确实一向就是一个永久性

的自治区。贝内特的理论是，它或许曾经是一个宗教圣地麦加，朝圣的人们跋山涉水到那里去对偶像做朝拜仪式。他还说，朝拜仪式或许包括采运石料用以修建金字塔和庙宇的墙壁。估计这需要两万六千多人的庞大队伍才可能办到。有些石块竟重达四百吨。在当时没有带轮运输工具的条件下，把这些石块拖曳到指定地点，每吨至少要六十五个人和几哩长的羊驼皮绳。解决这样一支大军的住宿问题，肯定非有一个庞大的城市不可。

在这个时期，蒂亚瓦纳科① 仍然是个城邦，而不是它后来形成的那样一个帝国。当时它的名称或许是 Taypicala。这个字在艾马拉语的意思是“中心之石”，或者也可以引喻为“创世中心”。这个字也可能解释为方尖塔。方尖塔是在许多文化里曾经有过的阳物崇拜的象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神通过一次两性交媾创造了宇宙。蒂亚瓦纳科作为 31

① 蒂亚瓦纳科这个字，几乎是有多少研究它的作者就有多少种拼写法。乌莱和贝内特用 Tiahuanaco，波斯南斯基省去第一个“a”，并以“u”结尾。庞塞的写法是Tiwanacu。其他作者也有省去第一个“a”的，还有少数人把“h”换成“j”或“g”。公认的英文写法为 Tiahuanaco。

一个地名出现，只是在当地人开始说克丘亚语的时候。

所以蒂亚瓦纳科这个名称的产生，可能是克丘亚语对“Taypicala”这个字的讹读。但是加西拉索·德拉维加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第四个印加皇帝梅塔·卡帕克征服了这个地区。正当他认识到这个文明先驱的国度比他自己的更为先进，惊讶地凝视着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徒步信使远从首都库斯科匆匆赶来。梅塔·卡帕克对这个信使的速度极为欣喜中意，对他说：“坐下，羊驼！”（Tiay-huanacu）这是因为信使到达得非常迅速，所以把他比作了快速的羊驼。这个故事现在仍然辗转传诵着。有一种解释，说此字或许来自西班牙语Tierra Huaca，意即“陵园之地”。这种解释似欠妥当，因为西班牙语传到这个地区时，它早已定名了。

后代的人们很可能认为：蒂亚瓦纳科的动人心魄的建筑物同纳兹卡文化一样，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也是为了供奉祖先的。非常明显，纳兹卡文化至少在宗教艺术方面给了蒂亚瓦纳科居民以极大的影响。蒂亚瓦纳科的建筑所用的大石块，方方正正，精细匀平，是中安第斯山区最好的建筑之

一。它的建筑方法是首先按等距的间隔树立起石柱，然后以较小的石块或土坯填充其间。由于后来建筑者的取用，石块和土坯已经散失净尽，土坯或者是因为腐蚀而坍塌无余。早期修建所用的石料都是软质砂岩，后期用了硬质火山岩。重达百吨或百吨以上的巨大石方都经过凿镌，以便砌配一起紧密无间，并且利用铜铁和扣链使它们稳定不动。

有些建筑物① 修筑成金字塔形，占地达数英亩。阿卡帕纳金字塔有方形台座和台阶。从这里，32 一条大道往北直通卡拉萨萨亚，把这个城市隔成两部分。阿卡帕纳金字塔一度有过石砌表面，一定是用于神事的。塔的顶部有一座大型的四方庙堂，在殖民地时期被抢劫财宝的西班牙人破坏了。直到今天，它仍然非常象一座碉堡，可能曾经当作碉堡使用过。在离地五十呎的高处，有一个大水池，可能是为庙堂设置的，必要时，卫士们也可以利用。

在阿卡帕纳西北，沿着以前的一条宽阔的大

① 关于蒂亚瓦纳科遗迹的分布情况可参看本章末页的地图。——译者

道，有一长方形的大建筑物地基，名叫卡拉萨萨亚，由于它的石柱著名也可以叫做“耸立石林”。雕凿过的火山岩和砂岩石柱竖立在锥形的柱脚上，呈现出一个建筑物的轮廓，如前所述，可能在这些石柱中间曾充填过石块或坯砖。考古学家们，如伊瓦拉·格拉索，认为这些石柱可能支撑过一个大的独石屋顶。贝内特说，它们可能围绕着一个平台，平台有楼梯可通向地下宫殿。

在此地的东北角，竖立着驰名于世的“太阳门”。就象这片地基里的其他门道、塑像和圆柱一样，这座门上雕刻着图案，其独特的风格与其他美洲的艺术图案截然不同。这座门在发现时已经残碎。人们推测，它当年曾是用一块巨大的独石雕镌成的。1908年经过修整，它已恢复旧观，放置在今天看到的基地上，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原来究竟建筑在什么地点。伊瓦拉·格拉索认为，它可能是阿卡帕纳金字塔顶上庙堂的一部分。因为作为一个凯旋门，或一个庙堂的外大门，它似嫌过于矮小。它高仅十呎，长宽各十三呎；门道高六呎四吋，宽刚过三呎。门楣上的装饰是一个人形神像，双手各持金刚鞭或者也许是护杖，其头部放射出很多光

线，其间夹杂有蛇像。在他的两旁，平列着三排花纹错综复杂的方形图案。每个方形图案基本上都相类似，其中有插翅的勇士，还有美洲豹和其他猫类的正面像。波斯南斯基工程师认为，太阳门是一种太阳历。它很可能是太阳历的一部分。几乎所有 33 的人都认为，太阳门是建筑在古典时期的末尾，当时南美洲天文学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用日晷推算出六月份的夏至和十二月份的冬至就是在这个时期。然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太阳门是某个神庙的一部分，可能是通向“至圣殿”的内门。

穿过太阳门就是石棺庙。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大部分在地下。如果我们考虑到四百吨重的方形独石可用作地下庙宇或房屋的屋顶，那么蒂亚瓦纳科秘密的一半就迎刃而解了。其余一半依然存在。在没有驮重牲畜和带轮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人们如何能拖曳这样重的大块石头到那里呢？许多人认为，当初是用平底驳船从科帕卡瓦纳附近的采石坑运送到那里的。果真如此，那么他们用的驳船一定要比在几世纪后到那里的西班牙人用的船只还要大很多倍。

在卡拉萨萨亚东西两旁较小的遗迹里，发现

了另外的巨石。南美洲最大的石柱就是在这里一个小型遗迹里发现的。其他石雕，其造型姿势同著名的复活节岛的雕像一样，具有安第斯山区在这个历史时期罕见的写实主义的风格。这类文物大部分已从原地出土，现在只有在蒂亚瓦纳科博物馆或拉巴斯的博物馆才能看到。

距蒂亚瓦纳科主要的宗教中心不远，有一个较小的金字塔，周围是一片遗迹，名为普马—朋库，其损坏变质情况非常严重。它们是由更大的砂石板和玄武岩石块所组成。石块上凿有舌槽榫。在砌垒一起以后，用青铜钉和铗加以固定。整个建筑没有使用灰浆。从采石、砌垒到装饰，都是使用石切削工具和青铜切削工具。在的的喀喀湖的太阳岛上也发现了金字塔和建筑物，其外形同在蒂亚瓦纳科发现的相类似。夸蒂岛的遗迹模仿蒂亚瓦纳科文化更为逼真，它们可能属于这同一时期，那时候在印加人之前就存在的那个陌生的不知名称的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后来占据拉巴斯、科恰班巴和波托西等地，并且最后从秘鲁的摩契卡地区扩张到了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

下一个可以辨识的蒂亚瓦纳科的历史阶段是

在第八到第十二世纪，被命名为扩张时期或蒂亚瓦纳科第五时期。在这个时期，高原上文化的发展超越了其他一切文化。一个崭新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秩序带着它自己的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陶器图案、配色方法、纺织花样传遍了安第斯中部地区，然而能赶上蒂亚瓦纳科在古典时期所获得的成就和它在扩张时期继续创造的成就的城市是不多的。

尽管这种文化传播很广，但它并没能包罗了所有的地区，也没有能得到统一。整个地区羡慕它的成就，并且尽力去模仿，然而并不是全部达到了同样至善至美的程度。现在没有人知道当时这种文化侵略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但是在三个世纪里，它一直是威名赫赫，表现出充沛的力量。

就象这个时期的名称喻义的那样，它所崇尚的是武功和极权主义宗教，而不是艺术。因此，在一种意义上它是扩张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衰落的。诚然，陶器和骨刻的精致作品仍然出现，但是根据考古发掘来看，越在浅层的出土文物，其艺术技巧和设计越显衰退。新的几何图案和自然图形尽管也有，但大部分样式和主题是因袭蒂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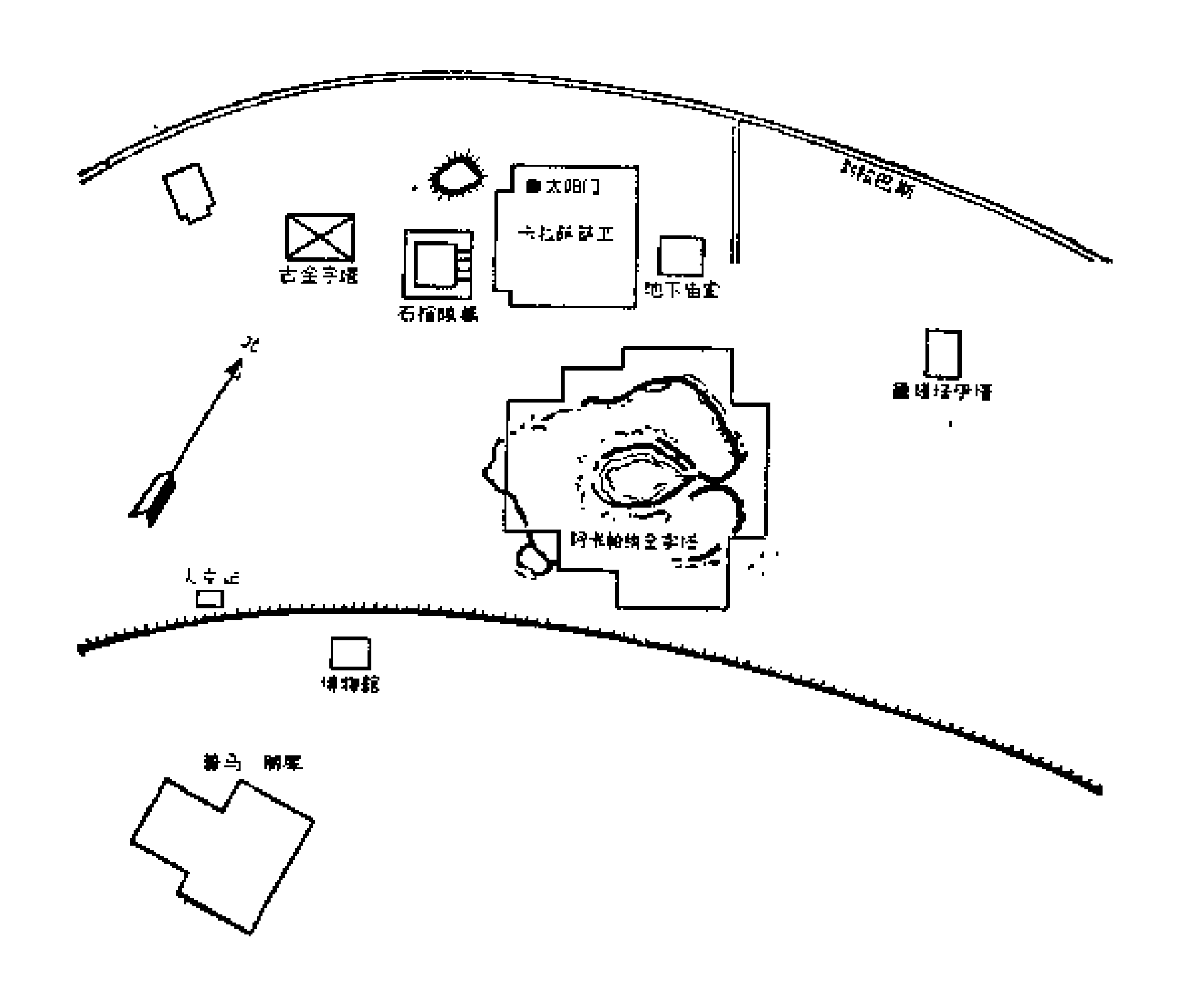
瓦纳科古典时期的老样。新出现的那些又常常都是出于同一种构思；大的S形或Z形的线条是唯一的装饰。在这个时期的初期，深浅不同的黑、白、黄褐和红等颜色是常见的。但是接近末期，在赤土陶器上，黑色成了惯用的底色。

当蒂亚瓦纳科正经历着它的扩张或衰退阶段时，[35]秘鲁海岸地区吸收了它的许多图样。对秘鲁来说，这是它的考古历史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的第四时期。当时的图样包括带传统风格的豹、秃鹰、Z形阶梯和几何图案，装饰在喇叭形杯、挂毡和壶上，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然而本地文化的特征仍然有所表露。镫形碗，涂绘成头颅形的坛罐，未经打磨的粗糙的石屋，都说明本地文化只是在休眠状态而并没有绝迹。

秘鲁的第五时期延续了不到一个半世纪（公元1300—1438年）。这是一个巩固时期。地区性的文化重新出现。由良好的政治机构管理的较大的城市开始兴起，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契姆文化建立起来的。它的昌昌园地面积八平方多哩，其中有金字塔、喷泉、花园和一排又一排的住宅。许多住宅的墙上都画着图画，或在灰泥上雕刻着图案。用金

子做成的家庭、宗教和个人用的装饰品也是契姆文化的标志。其余在艺术上比较次要的，在这个时期还有伊卡文化和昌卡伊文化，分别坐落在秘鲁南部海岸和中部海岸地区。

很显然，外来的侵略经常威胁着整个地区，因为碉堡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各个战略山路隘口，并且都有卫士们日夜巡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谁是侵略者。但是印加人在秘鲁的第六时期开始之前两百年间一直是处于就要兴起的状态。贝内特把第六时期订自公元1438—1532年，亦即从印加人扩张开始到西班牙人来到美洲为止。当印加人的小部落从库斯科向外扩张成为拥有六百万印第安人的帝国统治者时，契姆帝国是最后一个抵抗印加侵略的。西班牙人到达美洲时，印加帝国的版图从现在的厄瓜多尔纵伸到智利，从太平洋海岸横延到巴拉圭。



蒂亚瓦纳科废墟地图

(承蒙蒂亚瓦纳科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卡洛斯·庞塞·桑西内斯供稿)

39

第 二 章

印加——太阳的帝国

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印加皇帝一定是个聪明、谨慎、干练的人。他的名字意味着善良和富裕。他非常了解他的各族人民的纯朴。他机智、精明地编造了这个关于太阳的寓言，为的是使人民服从他，并走自然发展的道路。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

《关于印加人的皇家评论》

从蒂亚瓦纳科扩张时期衰落起，直到印加王朝开始的1438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只有神话和传说可以稽考。多数历史学家同意这样的说法：艾马拉语族在蒂亚瓦纳科帝国衰亡之后还维持着貌似文明的状态。有些人认为，艾马拉语族的一些部落曾北上移居到库斯科。几个世纪以后，他们又作为克丘亚语族的征服者重新

出现。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不足为信。理由有两个：第一，库斯科作为一个小部落的首都，时间是在十一世纪；第二，在秘鲁说克丘亚语的印第安人侵占的的喀喀湖，似乎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到1315年就控制了今天玻利维亚的整个地区。

40　关于公元1200年—1438年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十七世纪早期的耶稣会历史学家费尔南多·蒙特西诺斯神甫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写道：有一个皮鲁阿(Pirua)王朝在高原上统治过很多世纪，但是最后被一些来自巴西和查科的侵略高原的野蛮人所推翻。皮鲁阿人只在阿普里马克河谷保留下一个小据点。就在这里，经过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出现了新的印加帝国。

现在的玻利维亚历史学家何塞·德·梅萨和特雷莎·希斯维特·德·梅萨，参照以前的编年史学家们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稍欠生动但较为准确的说法。他们声称，在蒂亚瓦纳科帝国末期，说艾马拉语的一些民族成了统治势力。他们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强加给高原上的查尔卡斯、乌罗、塔帕卡里和卡兰加斯等部落。他们的政治机构称为科拉苏约(Collasuyo)，统辖着现在的拉巴斯、科恰

班巴、普诺、阿雷基帕和奥鲁罗几个省。

最早定居在的的喀喀湖周围的艾马拉人，从未形成为国家，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氏族基础之上的。这种扩大了的家庭关系叫做艾柳(ayllu)。艾柳还不能成为巩固王朝政权的强有力的基础。在艾柳巩固起来之后所形成的村镇叫做玛尔卡(marca)。他们居住在高原，或称科拉(Colla)。经过一段时间，最早的那位叫做马尔库斯·阿普·维尔卡斯的科拉国王可能把各个玛尔卡联合起来，成了一个新王国的基础。很明显，他是蒂亚瓦纳科最后一个统治者的后裔；那位最后统治者过于软弱无能，以致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事迹。马尔库斯·阿普·维尔卡斯，同以后继承他的那些早期国王们一样，与其说是统治者，倒不如说是传教士。蒂亚瓦纳科是他的首都，对他的人民来说很可能也是宗教上的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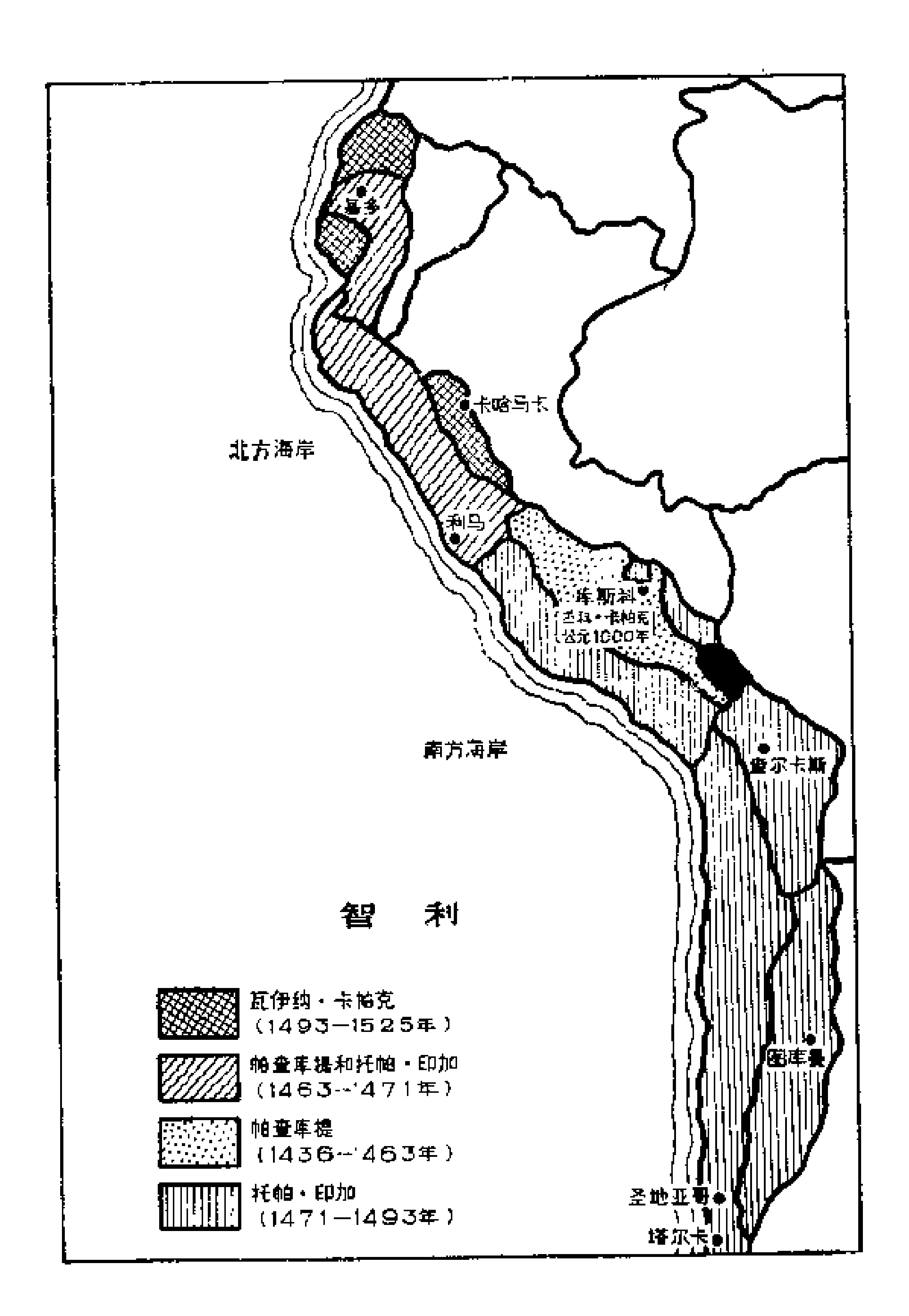
马尔库·卡卡·帕拉王朝征服了马尔库斯·阿普·维尔卡斯的后裔，并且将其土地夺为已有。他们的名字的含义是“金发人”。关于白皮肤金头发人的传说，就是从这支血统的国王们那里流传来的。这种传说在许多印加神话里可以见到。在

41

马尔库·卡卡·帕拉王朝时期，没有修建大的建筑奇迹或金字塔。它的国王们似乎是忙于修建堡垒(pucará)以保卫他们已经占据的土地。在这类建筑物上以及在他们为接力信使修盖的驿站房屋(tampus)上，他们抄袭蒂亚瓦纳科的装饰花样和艺术主题。

在此以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氏族是伊拉斯。这一氏族的第一个国王把首都从蒂亚瓦纳科迁到卡拉科托，这是德萨瓜德罗河岸的一个小城镇，位于的的喀喀湖南面大约二十五哩。据说，第二个国王(可能叫基普伊拉)是结绳记事的发明者，这种记事法称为“基普”(quipu)。后来，印加人用这种办法记账、统计人口，甚至记载他们的历史传说。这一家族里最了不起的人物名叫豪伊拉（有时叫塔库伊拉)，但是在他戎马生活的晚年，这个帝国已经衰落。他死后，一个艾马拉族的部落起来反抗伊拉斯族，弄得他们的文明支离破碎，衰败不堪。

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出现新的领袖。后来一旦出现，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卡帕斯王室。这个王室最著名的国王，在马尔库·卡帕克之前是马库里。他们的传奇英雄是芒科·卡帕克，就是这个人


基多
卡哈马卡
北方海岸
利马
库斯科
公元1000年
南方海岸
查尔卡斯
智 利
图库曼
圣地亚哥
塔尔卡
瓦伊纳·卡帕克
(1493—1525年)
帕查库提和托帕·印加
(1463—1471年)
帕查库提
(1436—1463年)
托帕·印加
(1471—1493年)

印加帝国

注定要成为印加帝国的创业鼻祖。

印加有这样一个传说：太阳神怜悯从的的喀喀湖来的移民，吩咐他的儿子芒科·卡帕克和女儿玛玛·奥柳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神仙和凡人来往接触的题材，在南美洲的神话里是很普遍的，而且占很大的份量。在印加时期，这样的神话常常把宗教教义同历史传统联结在一起。借着太阳神的传说，印加人也可以宣扬他们自己的神圣来历。

根据他们的传说，比拉科查创造了天和地。他用岩石雕刻了许多巨人，这样，大地便有了人口。但是他不喜欢那个种族，于是，又把他们变成岩石。他用泥土捏制了一个新的种族，让他们住在山洞里或湖旁，同时还教他们学农业和艺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太阳神的儿女就是来自山洞里的人。他们遵照神旨，带着一根金杖，一直往前走，走到哪里金杖钻入地下不见了，就在那里停下来。这个奇迹发生在库斯科附近，他们也就在这里定居了。芒科·卡帕克教随行的男人学农事；玛玛·奥柳教妇女学纺织。

关于印加人的来历，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许多

早期的西班牙编年史学家曾经记述过，不过只是彼此重复而已。普雷斯科特在其《秘鲁的征服》一书中简要地提到："从的的喀喀湖岸来了一些白色皮肤、满脸胡须的人(可能指马尔库·卡卡·帕拉王室)，他们在土著人中取得优势，并赐给他们文明和幸福。"普雷斯科特在书里还提醒读者注意，这个传说同阿兹台克传说有相似之处。后者说，奎查尔柯脱尔也是个善良的神，它完成了同样的使命。普雷斯科特指出：两个传说如此相似特别令人注目，因为在两个帝国之间并没有过来往接触。

印加人力图让那些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相信：芒科·卡帕克和他的妹妻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出现在高原上的。就象普雷斯科特所写的那样：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同他们以后的历史显然不相符合了。"没有任何记载说明，在西班牙征服以前，印加王朝的王子曾经多于十三代。如果说前后有十三个国王，那只能把这个王国的建立时间提早两个半世纪。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年代建国，并不是不可信的；并且还应该指出，这个年代是在阿兹台克人在墨西哥建都后五十年之内的年代。

在此以后的六个国王的史料，除了那位善于

把印加人浪漫化的著名作家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留下的一些记载外，确实是寥寥无几的。他在1539年生于库斯科，是一个印加公主和一个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他在离开秘鲁多年以后，写了一本关于印加人的书。其中用事实穿插着传说，成为一本脍炙人口的故事书。下面的引证是从他写的《关于印加人的皇家评论》中摘录的，但是我不能担保其准确性，因为他离开秘鲁时仅二十一岁，直到他年近七十时才发表了他这部历史书的第一部分。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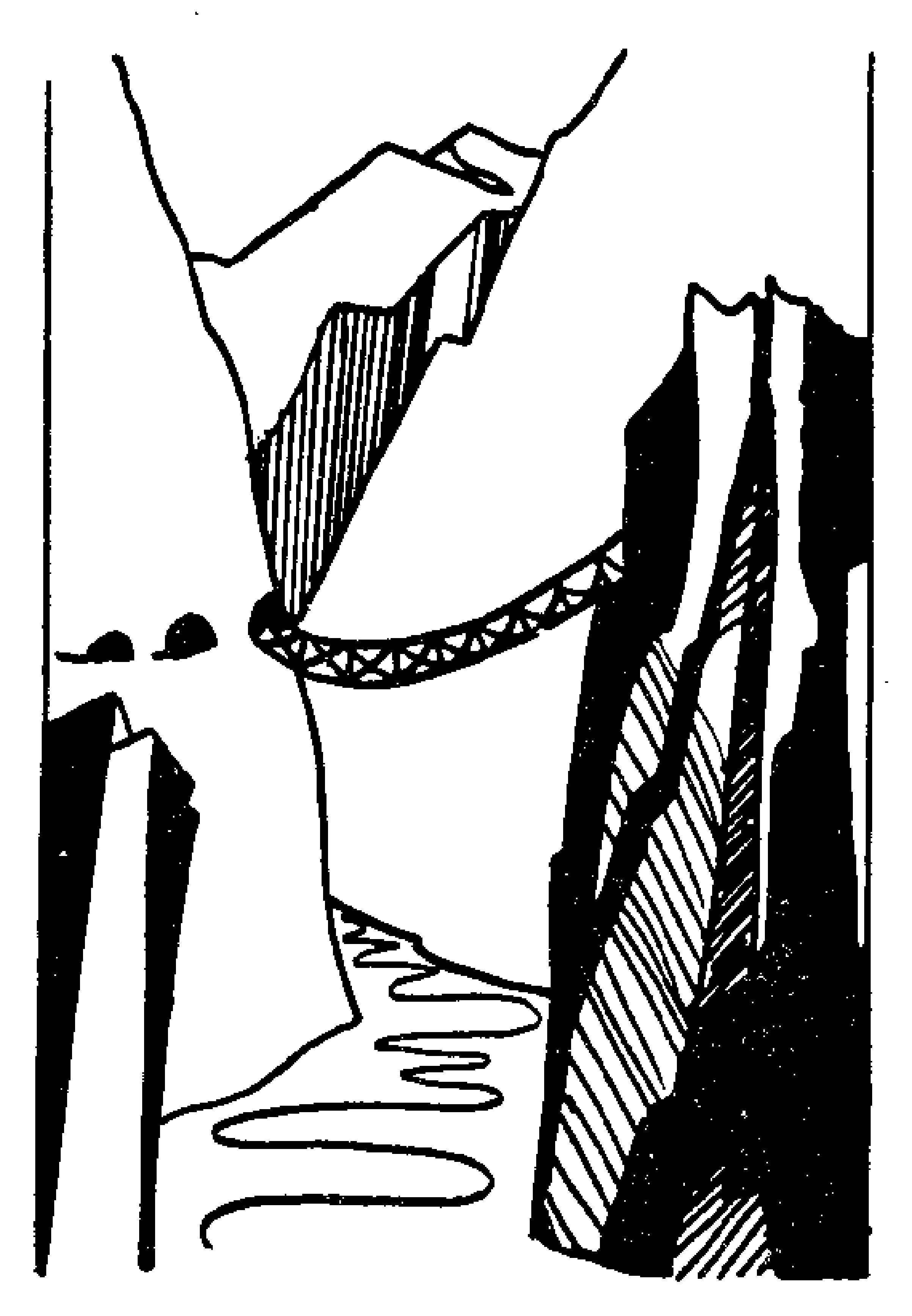
芒科·卡帕克让他妹妻生的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辛奇·罗卡王子的名字意思是"勇敢的人"。"他确实在一切事情上表现得都很勇敢，只是他没有参加过战争，因为他从来没有必要去同别人打仗。……印加帝国没动一次干戈，便把他的边疆扩张到了丘卡拉村，距芒科·卡帕克所到之处还远出二十里格[①]。在整个新的疆域里，印第安人都誓言效忠新的礼法，放弃偶像崇拜和其他弊习"。

之后，他的嫡子印加·略克·尤潘基继承王位。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左手人"。他"为了在那些

① 西班牙1里格约等于3.5哩或6092码。

不听从规劝降服的民族里扩张帝国的领土”，招募了一支七千人的大军。

第四个印加国王是梅塔·卡帕克。他募集了一万二千名武士进犯科拉人的国土。根据加西拉索的记载，当时科拉人声称他们的祖先起源于伟大的的的喀喀湖，他们把这个大湖看作是自已的母亲。当梅塔·卡帕克到达湖岸时，“他下令做了许多筏子，于是军队得以横渡。在他们初到的那些村庄，人们不战而降。因此，蒂亚瓦纳科城就成了他们帝国的一部分”。印加大军继续前进，利用围困村镇山寨，宽赦归顺者的策略，征服了邻近的各个部落。就这样，他夺取并平定了德萨瓜德罗河附近的大部分地方。后来，库斯科西南一带肥沃富饶的土地使他垂涎，但是要到达那边，需要跨渡阿普里马克河。因此他下令士卒在河上架设缆桥。这些印第安人用龙舌兰纤维编绳，首先把三股拧成一根绳，然后用这样的绳三根拧成一根，之后再三合为一，最后结成二十七股的粗缆，直径超过十七吋。用这样的粗缆，他们机巧地架起第一座缆桥，长度超过二百三十呎。这样的缆桥在连续不停的河谷风中摇摇晃晃，其惊险是可以想象的。桥的维修工



阿普里马克河上的缆桥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写道："徒步走过犹令人担心，骑马通行势必更甚。然而我曾见到西班牙人策马扬鞭，飞驰而过。"

作，由“居住在附近的、也就是使用这座桥较多的人家”来负责。由于他们对这项重任的忠诚热心，这座桥使用了四百多年，直到独立战争的年代。根据加西拉索的记载，桥有二呎宽，看来“徒步走过，犹令人担心，骑马通行势必更甚。然而我曾见到西班牙人策马扬鞭，飞驰而过……印加人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这类发明，取得了威望，借助他们的威望，才有了他们的帝国。后来对于西班牙人，情况也是如此，印第安人之所以把他们看成是神兵天将，就是因为他们有马匹和火枪”。

印加·梅塔·卡帕克在科罗帕纳地方越过科迪勒拉山脉，最后到达阿雷基帕(Arequipa)山谷。由于米斯提火山爆发不久，他发现该地几乎是一片荒芜。然而，土地还是肥沃宜人的，因此他让三千户人家从高原地带移居到这里。从该地的命名可以看出，在移民当中，既有克丘亚人，又有艾马拉人。阿雷(Ari)在艾马拉语中意为“山峰”，基帕(quipa)在克丘亚语中意为“在后”，所以阿雷基帕(Arequipa)一词的意思是“山峰之后”。

印加·梅塔·卡帕克的继承人是他的长子卡帕克·尤潘基。尤潘基继续扩张帝国的版图。他又架

起了另一座更长的吊桥，并决定去侵略查尔卡斯地区。他还在德萨瓜德罗河上修起另一种形式的桥梁，这是用香蒲草和藤棕做成的，能浮在水面。不过约计半年时间，这种桥便需要整个重修。因为它浸在水中六个月便湿透不能再用。印加人也常用巴尔萨筏作为渡水工具。在另外的地方，他们"用网装满大葫芦，挤紧捆牢，使其形成平面"。这47种筏子由一个人肩上系轭在水里牵拉着渡河。"印第安人也利用香蒲草捆，搭制成船。每捆象牛那样粗大，相互绑紧，搭成前部高突、后部宽而低矮、一个人就可以操纵的船只。沿秘鲁整个海岸，渔民捕鱼都乘用这类草艇。如果风平浪静，他们往往不顾风险，远离海岸四、五里格(合十五到二十哩)"。

这类船只和筏子大部分体积过小，不能载运印加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但是尤潘基在一次北征途中却利用大型筏子渡过了阿普里马克河。他能够幸运地兵不血刃就征服了大部分部落，是由于他兵稠势重，也由于他行军捷速。在他执政的太平年代里，他修造了不少公用建筑物以美化库斯科城，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修建了新的桥梁、运河和道路，同时"合法和不合法地生养了八十或一百个

孩子，甚至是二百到三百个孩子”。

他合法生的一个儿子，印加·罗卡，在十四世纪初期继承了他的王位。因为“私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觊觎王室宝座的，如果没有合法的儿子，王冠应传让给王族中血缘最近的男性亲属。这就是私生子阿塔瓦尔帕把王室里所有印加人都杀掉的原因，他惟恐王室亲属可能夺去他已篡取的王位”。虽然加西拉索在记载印加·罗卡的历史时，极其错误地把事情提前了一代或两代，但是他记述昌卡部落同克丘亚人的仇恨对峙情节却是相当准确的。当时克丘亚人和印加人是联盟。昌卡人打败了克丘亚人，并经常横越大平原威胁库斯科。若不是印加·罗卡为他的臣民们留下不少建设遗产，在他以后的印加皇帝势必还要为帝国的安全采取必要的保卫措施。他在位约五十年，对印加人的习俗和法律，做了大量革新和改进。他为贵族的子弟开设学校，教他们学习天文和地理，也学“军事技术和行政管理”。一般平民的子女就只能满足于学些他们父辈的行业；男孩子被强制为其父辈干活，直到二十五岁生日那天，他们才进入社会为国家效劳。 48

印加·罗卡死后，耶瓦尔·瓦卡克承继他的衣钵，穿上了印加领袖的衣着——大红袍。他“专心致志治理国事，表现公正、热忱和温良。……由于他不愿意让当代人把他看成胆小怯懦，也不愿被说成与征服者的传统——他家系的骄傲——不相称，他最后决定组织一次战役。可是他怕担风险，没有亲自指挥”。他把军队交给了他兄弟阿普梅塔统率。阿普梅塔越过群山，“长驱直入地征服了从阿雷基帕到塔卡马的全部海岸地区，就是现在秘鲁的边界。这个地带过于狭长，同时人烟稀少，因此阿普梅塔穿越这个地带所用的时间比征服它所用的时间还多”。

耶瓦尔·瓦卡克在库斯科还有另一件使他焦虑心烦的事。他的长子继承人，性格暴戾。他欺凌童年的友伴。尽管还是个青年人，他就表现出凶悍野蛮的品质，无论进行多少家庭教育都无济于事。因此，耶瓦尔·瓦卡克便把他驱逐到离库斯科大约五哩的一个地方去放羊。三年后的一天，这位王子突然出现在宫廷，迫不及待地要求向群众讲话。这使他父亲非常惊讶，但最后还是迁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王子叙述了他做的一个生动的梦，梦见一

个装束奇特的人，脸上还留着胡须（印加人几乎都是秃光无发的），手牵一只秘鲁人没有见过的异兽。这个陌生人告诉王子说，他是太阳的儿子，是印加族的创始人芒科·卡帕克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叫比拉科查·印加，他来通知他兄弟耶瓦尔·瓦卡克：这个帝国的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他们很快就要来到，想把库斯科这座帝京摧毁。皇帝认为这个王子疯了，便又把他送回了他放羊的地方。从那以后，这位王子便得了比拉科查这个名字。三个月以后，消息传来，钦查苏约地区发生起义。无数土著居民，参加了起义大军。由于耶瓦尔·瓦卡克没有听取儿子的警告，他毫无平息内乱的准备，决定放弃库斯科，逃迁到尚忠于皇室的科拉苏约去。比拉科查闻讯他父亲弃城逃走，痛心万状，于是召集了一些身边的勇士追赶国王。见面后，他斥责他父亲怯懦可耻，并"以悲痛而庄严的声音说：'凡愿随我去的人，挺身而出吧！我要领导他们去光荣就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免受耻辱。'"四千士兵跟随他回到库斯科。在那里他又募集了所有留下来的公民一同保卫城市。耶瓦尔·瓦卡克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加西拉索对这件事以后的记载便不足信了。

以后的历史学家们说，当年挺身捍卫库斯科的不是比拉科查，而是他的儿子。同样，约翰·豪兰·罗认为，耶瓦尔·瓦卡克所起的作用要比加西拉索给他的评价大。面临着昌卡人的威胁和他的盟军克丘亚人的崩溃，他同安第斯人结成了新的联盟（“安第斯人”一词是印第安语，意思是铜。“安第斯山”这个词就是从它衍化来的）。

比拉科查（约1400—1438年）是这个王朝的第八代国王。他用诈术而不是用武功征服了科拉苏约，并以此而名噪一时。科拉苏约（以后章节还要提到）虽然在当时由于内部纠纷和国力衰退已是四分五裂，但在那个地区仍然处于统治地位。在科拉王朝的第四代期间，由于争论王位继承问题，造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最著名的是卡里和萨帕纳两人之间的争执。这次争执导致了这个帝国的灭亡。卡里是卢帕卡部落的酋长；萨帕纳是科拉苏约的首领。卡里向比拉科查求援去打萨帕纳。萨帕纳在盛怒之下，趁印加援军未赶到之前，仓促出兵抗击卡里。由于他没有时间做充分准备，他和他的大部分将领在保卡尔科拉的血战中都阵亡了。战

役结束后不久，比拉科查赶到。因为来得太晚，未能及时地给盟邦援助，于是他提议把他的女儿嫁给卡里。卡里谢绝了这项王室联姻，但是印加人和科拉人还是作为朋友分手的。比拉科查同科拉苏约订立了和平条约后，回到库斯科。条约规定，印加人在下一个印加国王在位期间，可以吸收他们作庶民。

比拉科查的儿子尤潘基（1438—1471年），曾帮助打败昌卡人挽救了库斯科，比拉科查把王位禅让给了他。尤潘基自此被称为帕查库提（洪水），享有盛名，是历代能征惯战的征服者之一。在克莱门特·马卡姆先生写的秘鲁历史中称他为“美洲土著民族中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他在1438年的加冕典礼是印加历史中有据可查的最早日期。它标志着塔瓦廷苏约（即印加帝国）大扩张的开始。

他的第一个大胜利是战败科拉苏约帝国。这个帝国在卡里在位时期和退位以后，从阿塔卡马大沙漠几乎扩张到库斯科。帕查库提认为卡里的艾马拉王位继承人库奇—卡帕克是他的致命威胁，便乘其不备率领军队开到科拉苏约首都。库

奇一卡帕克相信他父亲和比拉科查签定的条约依然有效，准备以朋友的礼遇接待帕查库提。然而印加人向他提出了两条可以选择的道路：或是举国投降，或是为他的王国战斗。库奇一卡帕克选择了唯一的光荣道路，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部署军队进行防卫，经过一整天的血战，失去了他的帝国江山。帕查库提在首都哈通一科拉登上王位，接受以往库奇一卡帕克统治的那些部落对他的臣拜。有一个凶悍的边疆氏族部落对新统治者表示反抗，帕查库提就大肆屠杀直到最后一人。他就这样保障了他的宗主权。不久，他又按着那个做法把51 库奇一卡帕克斩首。印加人统治科拉人长达一个半世纪，也就是说，直到西班牙人把统治权从印加人手里抢走时为止。

在兼并了艾马拉、乌马苏约、科塔帕姆帕和奇尔克各地区以后，帕查库提派遣他兄弟北征，并明确指示他不要越过某一地点。这位将军在战胜艾马拉人和南方其他各族人以后，得意洋洋忘记了或者是忽视了他哥哥的命令，一直向前推进。就在这时，一队昌卡士兵开了小差，逃亡到乌安科以北的丛林中去了。帕查库提以违反王室谕令致使昌

卡士兵逃跑的罪名处决了他的兄弟。自此以后，帕查库提亲自统率三军，并在的的喀喀湖盆地征服了强盛的卢帕卡部落。1468年，他的儿子图帕克王子统揽军权，继续他父亲首创的战绩。

帕查库提在行政、立法方面的功劳和他的武力征讨的战功一样，使他显赫于世。他的行政改革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改革巩固了他自己和以前印加人对外侵略取得的成果。他根据他的国情采用了在被征服的许许多多王国里见到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并进行了新的整顿。这样他就在家长专制和国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帝国政府。国教实际上是崇拜一些自然神，这些神受他们的创造者所控制，而印加人可以直接向这些神的创造者祈求和平、安全和幸福。

帕查库提又是一个伟大的市政建设计划者。他的首府库斯科，在历代印加帝王两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是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坐落在海拔一万一千四百呎的山谷里，缺少足够的发展余地。人们推测，帕查库提是库斯科的街道、公园和公共建筑物全盘规划的建筑师。他的规划不象西班牙人设计的城市那样规规整整横竖均

52 平。它的街道狭窄弯曲，但最后的效果却叫人感觉格外富于画意。库斯科大广场是印加神圣广场的一部分，各种精心筹备的仪典都是在神圣广场举行。库斯科的建筑物大部分是用凿镌的石头盖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矗立在那里成为对他的充沛精力和艺术才能的颂辞。

因为库斯科缺乏可耕土地，帕查库提命令人们在山坡上修建牢固得惊人的石砌平台。印第安的老百姓从河床和山脚下挑运肥土，把平台填平，这和几个世纪以后在永加斯为种植古柯所采用的办法是一样的。结构精致的灌溉渠道，有些是在天然岩石上钻凿而成，有些是洞穿了山坡，这些灌溉渠道保证了丰收。在山顶上，竖起了太阳历，便于附近农业集中地区的农民计算播种和收割的最适当时间。

帕查库提，就象他父亲让位给他那样，在位三十三年以后，把王位禅让给了他的儿子。人们常把帕查库提比做马其顿的菲利普①；同样，图帕克·

① 指古代欧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其子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伐，远至亚洲、埃及，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就衰弱以致瓦解了。——译者

印加(1471—1493年)就象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当他还是王子时，他第一次远征是到基多以北，继而进入了契姆帝国的领土。契姆帝国建立在公元1000年左右，是秘鲁海岸地带最强大的国家，并且至少是同印加人一样古老。它是摩契卡文明的继承者。1476年印加人进攻它的时候，正是它最繁荣昌盛的年代。它的首都昌昌，即现在秘鲁的特鲁希略城的所在地，面积八平方哩，有很多大型的阶梯金字塔和水浇花园装饰点缀着这个地方。为了防范敌人围攻，还修筑了高大的护城墙和石砌的大型储水池。契姆人从昌昌管辖着六百哩的海岸，也就是从现在的利马直到赤道。他们还兴修道路，建立信使交通系统，同印加人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把政治联盟伸展到安第斯山区域，作为保护他们用水来源的一种措施。

在沿南方海岸进行的第二次战役里，图帕克·印加控制了从纳兹卡到利马的一片地区。即位之后，他进军北征，到达马德雷—德迪奥斯雨林地带。但因的的喀喀湖附近一些部落乘其远征在外的机会揭竿而起，他不得不立即班师南回，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当时造反的科拉和卢帕卡部落，在普

卡拉修筑了工事，但还是被图帕克击败。图帕克于是乘胜横扫今天玻利维亚所属的整个高原地带，并南下智利，直到毛莱河畔，就是现在康塞普西翁所在的地方。此后，他又东征，席卷阿根廷西北部山脚下大片地区。在他结束这次战役时，他的帝国权力所及之地相当于从纽约到马德里。在他退位时，印加帝国的疆域几乎四倍于埃及人的王朝极盛时期。

就在哥伦布从西班牙扬帆东航的这一年，图帕克·印加把红袍脱给了他的儿子瓦伊纳·卡帕克。瓦伊纳·卡帕克是第十一代印加国王(1492—1527年)，大约在1450年生于库斯科。在他四十年的生活里，大部分时间是随他父亲转战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们在那些年代通常所做的一样，他拥揽军权以后，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扩张帝国的领土。他企图征服北部厄瓜多尔丛林蛮族，但连续遭到失败。最后他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现在的边界地带划定了帝国最北部的疆界。在南方，在阿根廷的图库曼附近，他同凶悍的奇里瓜诺人第一次交锋失败了，但后来终于慑服了他们。由于基多人和其他北方部落群起造反，他闻讯后不得不率

兵折回库斯科。奇里瓜诺人始终未能认败言和，在他晚年又来进犯东部边境格兰查科。正当他出兵抵御的时候，消息传来：另一股陌生的侵略者正在抢劫印加村镇。白种人来到了美洲。

1524年，四个葡萄牙人从巴西圣多斯出发，横贯大陆西行，直到上巴拉那河。之后，顺流而下，到达巴拉圭境内。同行者中有阿莱霍·加西亚，能说瓜拉尼语，他为这四个葡萄牙人在奇里瓜诺人和瓜拉约斯部落中结识了一些朋友。当时，这两个部落一直是联合反抗印加人的。四个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一起想要在高原地带寻找金银。但是印加国王瓦伊纳·卡帕克早已用堡垒在边境层层设防，同时还派遣了一个心腹军官去增援边防。他设法把奇里瓜诺人赶回了格兰查科，在那里他们的影响至今依然很大。从印加人捉到的俘虏口供中得知，敌方队伍里有装备新奇的白种人；人们报告给年迈的瓦伊纳·卡帕克的就是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这四个葡萄牙人好不容易从印加人那里逃脱出去，但是没有幸运地回到巴西。他们中途在巴拉圭某地遭到野蛮民族的袭击而丧命。就我们所知，他们是最早到过印加帝国的白种人。

54

三年以后，1527年，瓦伊纳·卡帕克在基多忽患时疫，卧床不起。临死前，他听到白种人发动了又一次侵略的消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已到印加帝国最北端的通贝斯，并且向土著居民显示帆船、钢刀、滑膛枪、马匹等近代奇物，用以博得他们的欢心。

皮萨罗和他的随行人员要去摧毁的这个印加文化，已经发展到迷人的地步，那是它所接替的任何前代文化所没有达到的。就象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一样，印加人的进取性横扫了它面前的一切，包括他们前辈人的很大一部分文化在内。虽然那些古代文化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000年，但各种文化一直是单独地发展着，很少受外界的影响。印加人统一了各个不同部落的文化，同化了他们，并且及时形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独有的文化。和罗马人一样，与其说他们是土著文化的创始人，毋宁说他们是一个悠久文化发展的继承者。

海勒姆·宾厄姆在《消失的印加城市》一书中告诉读者说，“印加”这个词，最初指的只是公元55 1200年起源于库斯科附近的那个部落的酋长。今天这个词是指发展了那个伟大文化的整个民族，

它原先的含意是皇帝，也就是指那个自称是太阳后裔的至上君王。因为他是神圣的，所以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印加皇帝不仅掌握立法、行政和统治大权，他还是军队的总指挥，也是首席祭司长。除了他的妻子和姐妹们以外，没有人敢对他正面而视，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穿着鞋进门。

最早的印加人娶妻是选他们邻近部落的女子，以利于巩固他们所占有的一切。但是到了图帕克·印加时代，他们习惯娶自己的姐妹，因为只有姐妹才属同等地位。皇室、贵族和高级僧侣，实行一夫多妻制，但一般市民则不行，他们也许是根本负担不起。指定由哪一个印加作继承人要听取议事会的建议并得到它的许可；继承人都是正房夫人即皇后（Coya）生的男儿当中最精明强干的。在印加国王之下，世袭贵族们享受继承特权，所有重要行政职务都由他们充任。

这个帝国的名称叫塔瓦廷苏约（Tahuantinsuyo），词义是世界的四方，因为这个帝国以库斯科为中心，分成四个区域，每区叫做一个苏约（Suyo）。钦查苏约（Chinchasuyo）包括北部秘鲁和厄瓜多尔。安蒂苏约（Antisuyo）伸展到科迪勒拉山区。

孔蒂苏约（Contisuyo）包括海岸地带。科拉苏约(Collasuyo)统辖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北部一狭条地带和秘鲁的其余部分。耶瓦尔·瓦卡克在十四世纪避难就是这个地区。每个苏约下分若干省(Wamani)，每省再分为若干艾柳。艾柳就是老的艾马拉部落或氏族的社会结构，它是以居住在同一地方并供奉同一祠堂（huaca）的一些家族为基础的。

在原来的祠堂崇拜之上印加皇帝们又订立了国教。帕查库提创建了僧侣修道院，管理该修道院56的祭司长由近血缘的亲属担任。他又创建了尼姑修道院，设在太阳庙附近。尼姑们都是处女，最小的八岁。她们织制华丽的礼袍供国王、皇后和祭祀典礼穿用。崇拜太阳和太阳神族的后裔是这种宗教的主要教义，然而它也是多神主义的，因为它是由各个被征服氏族的不同信仰而形成的一个包罗万象的国教。

印加人的创新是把太阳当做最高的崇拜对象，也当作皇家世系的祖先。其他自然神，诸如月神、地母神、雷神虽然为国教所取代，但仍继续受到很大的重视。比拉科查（Viracocha）是至尊无上

的神，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是大地的主宰。所以人们对地母的称呼当然就是帕查玛玛（Pachamama)。印加人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常把比拉科查表现为凡人的形状，认为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接受印加人的祈祷，慈祥地调解人间俗事。

举行仪典和庆祝节日，经常同农业上的主要季节重合在一起。在节日里，印加人可以排遣厌倦和减轻辛劳。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有三个十天的长周，但为了适应一年的天数，每年有一个五天的短周。最大的节日是十二月份的卡帕一拉伊米(Kapaj Raymi)，在这个节日，人们祈祷暴风雨神求他不要阻挠春雨普降，也不要使暴洪横溢，冲坏禾田幼苗。在这同一盛节，凡是已经成年的印加贵族子弟，都要接受短裤布和耳饰物。印加人用这种令人瞩目的耳饰抻长了他们的耳垂，因此西班牙人把印加贵族称为大耳朵（Orejones)。

在印加王朝初期，青年人常被用作祭祀太阳神比拉科查和虎豹的献祭品。虎豹是从蒂亚瓦纳科文化继承来的一种宗教象征。以后，一般都用羊驼、水果和饮料作为献祭品，但皇帝死后献祭仍用活人。甚至后来在1527年瓦伊纳·卡帕克死时，还

57 以他的妻室和奴仆们为他献祭和殉葬，为数竟达二百人之多。

印加国王个人的意愿就是法律，但是这种意愿很少是随心所欲的一时妄想。大体上说来，如果不是陷于战争之中，他们治理国事是英明有道的。即便是对待新的藩属百姓，他们也尊重当地久行惯用的习俗。他们把神圣权威的原则同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从而使新的臣属们对他们尽忠效命。

例如，印加人维持着已有的艾柳，同时也建立新的。特别在皇室内部，每个获得王位的印加，都建立一个新艾柳，这个新的艾柳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他个人的王朝。新皇帝只能继承治国大权，不能继承他父亲的任何产业，因为他父亲的财产还要传给他自己的艾柳，使它能继续存在。

四个苏约的长官以及无数较小地区的管理人员，就象队伍中的军官那样，按其地位划分等级。基层单位由十个人（也就是十个纳税的或能服兵役的印第安人）组成。根据当时的计算，每一万个印第安人就有一千三百个官员管理。印第安人不仅有纳税进贡的义务，而且要被迫为僧侣或为政府和军队里的高级官吏们做终生的劳役。印加皇

帝全赖有奴隶或农奴，才能修建起官宅贵邸和那个巨型的太阳神庙。西班牙人认为那个太阳神庙是新世界里最庄严宏伟的建筑物。

普雷斯科特对此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 兴修这项巨大的建筑，据说曾动用了两万人，历时五十年。不管怎样，在这项工程上我们看到了暴君专政的作用和表现。它把臣民们的生命和财产都放在它的绝对控制之下，任它摆布。虽然这种专政在一般情况下是和善的，但当它使用臣民们的时候，却把他们看得如同牲畜一样微不足道。

加西拉索说过，臣民们给印加国王服四种劳[58]役，以换取他们从国家得到的利益。他们为他耕地，纺线织衣，做鞋，并为他的军队制造武器。加西拉索还说：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要献出一件象征性的礼物：一个装着虱子的管子。“因为这样做，这些饥寒交迫的人才能摆脱掉这种害虫，否则他们在极端贫困的处境中可能由于这种寄生物而丧命”。

使印加人在事业上成功的那种社会组织，是建立在他们的经济制度这个基础之上的。虽然在帝国范围内肥沃田地很少，但印加人设法增加农业生产达到绰有余裕的地步。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实行了帕查库提所创立的移民法（mitimae）。用这种移民法，他就能把一个新征服的部落迁移到需要更多人口的新地方去。他对当地的风俗不加干涉，但新的俘虏必须向帝国和太阳神发誓效忠。这样移民常常牵涉到成千上万的人，这有利于普及克丘亚语，减少造反的机会，还能调匀人口的分布。当时强制采用一种新语言和新宗教是成功的。这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克丘亚语今天仍在广泛地使用；完全征服了象科拉人和基多人这样复杂不同的部落；被征服的各部落所曾用过的其他语种实质上都已绝迹。正如海勒姆·宾厄姆所指出，印加皇帝坚持采用克丘亚语为国语，这几乎使历史学家们确信印加皇帝们自己原来就是说克丘亚语的民族。

图帕克·印加·尤潘基在十五世纪末增加了移民数目，当然他总是适当地考虑到人们习惯了的气候和被俘部落的职业。譬如，没有一个集体或

一种民族被重新安排在他们所不习惯的地势高的地区。渔民们也不必迁离海岸。这样不仅减少造反 59 的可能性,它也意味着可以榨取更多的贡税。

移民一旦安定下来，政府的监督官就同艾柳的头目一起计划修建梯田和灌溉系统以及安排种植等工作。即使是种籽也可以按需要由上级供给。每一个村社的土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作向太阳神进贡；一部分用作向皇帝和政府纳税；一部分则留给老百姓。实际做法是：在征收贡税以前，村社先要受到照顾，甚至皇家的仓库也可动用去解救旱涝灾荒。留给太阳神的那一部分土地收益，用作维持僧侣的生活，或用作活跃印第安人生活的许多节日开支。为皇家留出的那第三部分，用以养活贵族、军队、政府官员以及年老、休残和遭难的人。

对印第安人的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减缓了米达徭役制(mita)的强制性劳动。上层阶级的生活所需就是依靠这种制度得到供给的，公共事业也是通过这种制度建立的。这是一种根据合同每年在一段固定时期内服劳役的制度。印第安人不论是修建一座庙宇、一条道路，或是在皇室的田地里

耕作，或是他的妻子、女儿们作皇后的婢仆，他的监督人总是同他处于同等地位，很少责骂虐待。后来，西班牙人为开发银矿和发展南美大陆的农业而采用这种制度的时候，情况则大不相同了。

绝大多数的人是自给自足的。贫困的家庭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男耕女织，就同今天一样。风俗习惯依然如故，就象玻利维亚历史学家恩里克·菲诺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风俗习惯几乎没有例外地永久沿袭下来了。它意味着印第安人是消耗很少或没有消耗的人，因此延缓了经济演变的进程。”这种判断可能过分粗鲁苛刻，奥斯本在他所写的关于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那本书中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只要是宗教仪典、传统和友谊彼此协调，印第安人是以劳动为乐的。他写道：印第安人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懒惰成性的。但是他们过去用偷懒的办法作为一种手段，消极地抵制他们认为是外来的、不公正的要求，抵制他们认为是破坏了他们的传统而毫无代价可言的要求。

衣着都由妇女编织，男人则下地耕作。耕具是一种带石尖或金属尖的弯曲木杆。操作时脚踏杆

上凹槽，使尖头深插土内。这种曲柄农具一直沿用到今天。利用杠杆作用翻起的土块，由妇女们用木柄石锤打碎。男人的衣着叫做丘斯马（Chusma），是一种双边缝合到腋窝的变相长袍。而长袍则是以后由西班牙人引进到那里的。在这种类似长袍的衣着上，再披上一件羊驼毛制的披巾。骆马细绒织品是贵族穿用的，因为骆马驯养数量不多。妇女的衣着是一种长达踝骨的束腰外衣，外披一件利克拉（lliclla）——一种典型的印加女人披巾。男女平日赤足，但在田间劳作时则常常需要穿凉鞋。按照习惯，同一艾柳的居民要一起在田间劳作。男人按照地垄横排着并肩前进，妇女则尾随其后打碎土块，同时所有男女都齐声引吭高歌。

他们的吃食也同衣着一样，并不充足。高原上本地出产的基诺亚（quinoa）和马铃薯是主要食物。羊驼肉干（Charqui）也是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他们喂养豚鼠和鸭子，大约每周能够享受一次这类鲜肉的美味。通常是每日两餐，虽然够不上甚么奢华昂贵，但也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印加人知道奶乳的价值，最初他们只把它当作药品用。他们也知道酒（Chicha）给人的乐趣。他们的酒是用苞米

或基诺亚做的，经过发酵使它含有不同度数的酒精。古柯(Coca)是一种麻醉品，也是一种兴奋剂，61 在印加王朝以前就使用了。他们尽力限制它的用途，使之仅用于贵族和宗教仪典特别是占卜和献祭。然而嚼嚼古柯的习惯在西班牙人中非常普遍，以致限制办法不能严格地执行。据加西拉索说："印加人把烟草叫做萨里（Sari），烟草对他们有很多用途，其中一种就是用作鼻烟来清醒头脑。"他又说：他们对于药品的概念主要是服用有疗效的草药。舒尔茨写道："西班牙人对印加人土产药品的医疗效果印象很深，以致他们在利马大学开设了印第安医学讲座。……除古柯之外，印第安人对现代医学的贡献还有金鸡纳(Cinchona)、吐根、秘鲁香膏、番木鳖等等。在外科方面，对医治脑病所用的穿颅法，印加人有高明的技术，那是有据可考的。"

据加西拉索说，第一个印加皇帝芒科·卡帕克，为他的新建村社制订了基本的道德法。"为了他们能和平相处，协调与共，彼此不发生忿怒龃龉的事情，他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可能是加西拉索把他在西班牙学

到的圣经箴言同印加祖先们的告诫相混淆了，但是第一批西班牙人也确实看到印加人执行道德法是颇为认真的。暗杀、盗窃、奸淫、甚至说谎，实际上都不存在。印加人认为西班牙人锁门是怕袭击，他们从来没想到锁门是怕偷盗。懒惰会受到严厉惩罚，特别是当印第安人在服米达劳役时，那更是严惩不贷的。即便是贵族和僧侣也都是勤劳肯干，并在完成他们的职责时表现得很自觉。在这个帝国历代约三百年当中，印加人从来没有蜕化堕落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

计划是印加人的一项伟大特长。在城市规划方面，帕查库提的才干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安第斯山地区的各民族中，印加人是第一个使用青铜制造工具的，虽然早期也曾用金属制作过首饰和碟 62 盘。印加人利用青铜工具和高度发展的工程技巧，建立起坚固的堡垒、庄严宏伟的宫殿和范围广阔的城镇。雕凿成多边形的石方，是他们建筑物的一种独特标志。不论是普通体积的或是特别巨大的建筑物，他们一定是给建筑大师们摆下了一幅智巧分合图，借以考验他们的智慧才能。

城市建筑一般设计成棋盘式。库斯科是个例

外，那是因为它地处窄狭的山谷，受到地形的局限。和西班牙人的设计一样，他们在市中心开辟一个大的广场，环绕在四周的是公共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常常就是印加人的皇家宫殿、仓库、太阳庙、旅社和公共大食堂。不过，正如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在他著的《秘鲁年鉴》里所写的那样，这些建筑物往往“只有气魄而不美观，只是宽敞而不舒适”。宽阔的大道和狭窄的小街从大广场通往其他卫星公园和邻近地区。水由山上经渠道引到主要街道的中心，然后均匀地分配到全城各地。

奥斯本指出，这种有条不紊的城建规划比当时欧洲提出来的要先进得多。同时，这也说明城市的生活远比乡村要先走一步。在乡村里，住宅、马棚、猪圈都挤在一起。爱斯基摩式的泥土房和石头砌成的小平房是草顶、泥地，这样的房屋是所有农民的一般住宅。它既无窗户又无家具；进屋有一个小门，但要匍匐爬行才能穿过。编织的草席和羊驼皮张作为睡具就满好了。考虑到他们如果在屋里做饭，该是多么不卫生，因此很有可能，他们的炊事大半是在屋外进行，就象今天那样。

印加人的优良组织和技术使他们能把交通驿

站和接力信使组成一套良好的体系。印加人承受了前代文明的许多部分，他们的长途信使（chas-qui）传递口讯和结绳文字所利用的道路，很可能63也是印加王朝以前的各族人民开辟的。两条公路顺着帝国的疆土长度伸展开来。一条沿着海岸；另一条修在高原，是由石块铺成的，并在陡峭的坡地上砌起了石阶。隔一定距离就有大道或便道从公路干线分支出来。每隔几哩，设置一个驿站。信使带着皇帝的讯息在统一的驿递系统内，从一个驿站跑到另一个驿站；这样一个传递体系可能要比现在偏远地区的邮政工作还迅速一些。当年瓦伊纳·卡帕克听说基多发生叛乱，曾下令从库斯科修通一条皇家公路，几乎要在一夜完成。他这个命令一定是使他的部队和建筑工程师们无法忍受了。在劫难逃，基多就成了他的注定丧命之地。他死的那天，正巧就是第一批西班牙人到达通贝斯的日子，路已经修成一万多哩，路基高低悬殊很大，从海平面到达海拔一万七千呎。

他们修筑的道路，和以前的罗马人修筑的一样，首先是为军队用的，特别是在帝国扩张而把战争当作国家政策的时期。从帝国的初期起，战争每

天总在发生。开始它可能仅为部落间的战争；抢劫为的是夺取牲畜以供应肉食，或是为了劫持俘虏作为奴隶以及为活人献祭。在帕查库提之后，战争多半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扩大版图。早先，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永远征服一个种族和兼并他们的领土。不过在帕查库提之后，为了对付那些未驯服的野蛮民族的叛乱和入侵，在国土的边远地区战争还继续发生。

所有的男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据统计，现役和预备役的士兵共达二十万。或者由于结绳记事以十进位计算最为方便，他们入伍后的编制是每十人为一班，百人为一连，一万人为一师。士兵都训练有素，装备齐全，并都能做到召之即来。他们头戴羽饰毛盔，身穿衣衫，外披毛絮背心，以防御箭穿或标枪刺伤。大部分武器是木制的；矛、箭和斧则用石头或金属镶尖裹刃。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很容易做到，这不仅由于有良好的公路系统，也是因为仓库分布合理，便于发放口粮和接济武器。从各个印加皇帝在战争中的行为来看，只要认为可行他们便随时使用心理战术。比拉科查战胜科拉苏约是通过诈术。图帕克·印加征服契姆主要是

由于印加的密探渗入了昌昌，宣扬印加军队虽是全能常胜之师，但对不抗而降的俘虏一律宽待。

严格的控制和盲目的服从，使印加军队成为一个精锐的战斗集体，这是中世纪欧洲任何军队所不及的。这样的绝对权威是需要的。但同时它也挫伤了个人的主动性，这是今天在玻利维亚高原上仍然存在的一种不幸。

威廉·利特尔·舒尔茨总结了这种情况及其对帝国的影响：

> 不管拉斯·卡萨斯所绘出的图画如何，在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战争是一种瘟疫。不论是出于什么动机——追求战斗的刺激，掠夺财物或女人，争夺猎地，争取更大的武士荣誉，为贪婪的战神擒获祭祀的俘虏（如阿兹台克人的习俗），为吃人者的菜谱准备人肉，或者象印加人那样出于扩展帝国的狂欲——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总是互相残杀的。西班牙人没有破坏任何田园诗般的和平；他们作为外来的、不合旧俗的敌人，仅仅是把新武器和新战术输入到了

好战的印第安人经常使用的战场中来。

征服印第安人，并不象一些牧师史学家们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西班牙战争保护神——圣地亚哥——的斡旋而获得的奇迹，也不仅仅是由于一支常胜无敌的军队的武功。如果最后印第安各族人民大部分被这些新来的人所征服，那不单是因为战斗素质的差别，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交织并合的情节有利于侵略者。

65

这些情节，特别是关于继承瓦伊纳·卡帕克王位的残酷斗争以及这个帝国分裂成为若干战乱派别的事情，将在下一章加以探讨。就象舒尔茨所说，没有这些情节，西班牙人决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征服这样一个辽阔的文明帝国。

第 三 章

67

西班牙的征服

朋友们，同志们！

在那边是苦役，饥饿，赤身裸体，倾盆如注的暴雨，荒芜和死亡：在这边是安逸和欢乐。那里是秘鲁和它的财宝；这里是巴拿马和它的穷困。选择吧，诸位，什么是最适合一个勇敢的卡斯提人去做的。要我说，我上南方去。

——皮萨罗1527年在加罗岛对士兵们的讲话（据普雷斯科特引录）

美洲的发现对西班牙人来说，就同美国向太平洋发展一样，都是“交了红运”。然而1492年欧洲最重要的大事并不是新半球的发现，而是从伊比利亚半岛最后赶走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七百多年来，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那些小的基督教独

立公国一直是反抗阿拉伯人的骨干力量，它们进行着驱逐侵略者收复失地的斗争。当年佩戴十字和长剑进行了长期征战的十字军，给西班牙人的性格留下了烙印。骄傲好斗的西班牙人在确保国家不再遭受侵略之后，很自然地要寻找新的世界去征服。

68 美洲的发现不是偶然的事，并不象传说使人们相信的那样。约在十四世纪末期，葡萄牙就已经发现了大西洋里的三组岛屿：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不久，一些有成就的葡萄牙航海家，绕非洲海岸航行，并且开始同传奇式的远东地区印度人（Indias Orientales）进行厚利的交易。西班牙一旦解脱了穆斯林的威胁，并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合执政下统一之后[①]，他们便会全力以赴地追赶葡萄牙。当葡萄牙国王约翰拒绝资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时，他们的竞争心理促使他们委任科隆（西班牙人这样称呼哥伦布）

① 伊莎贝拉是西班牙中部的卡斯提王国的女王，1469年与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结婚。后来卡斯提和阿拉贡两王国合并，斐迪南成了西班牙统一（1479年）后的第一个国王。——译者

去探索一条到印度群岛的近道。

那时没有人能设想到科隆的几次航行对世界将有什么影响。可是它们在短期内就毁灭了阿兹台克和印加这两个先进文化。它们也促成了欧洲的现代化。显而易见，新世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这些资源对现代欧洲国家的形成，对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西方化，给予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刺激。

科隆和其他先驱探险者们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无需在此赘述。罗盘和星盘的发明，改良船只的建造，新的地理知识，所有这些再加上科隆贪而无厌的野心，给西班牙的国王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确实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同样是野心勃勃贪婪成性的。欧洲的经济正向资本主义发展，拥有过剩资金的人们，有时不惜对冒险远征作孤注一掷的投资。要使西班牙宫廷心喜，要使伊莎贝拉的卡斯提王国和斐迪南的阿拉贡王国不稳定的联合得以巩固，看来也有必要从新的胜利中获得荣誉，并使王国的领土更加扩大。

1498年8月1日，科隆第一次到达了奥里诺科河附近的南美海岸，那是他的第三次航行。在第

69

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航行中，他在巴拿马登陆，当时他命名该地为贝拉瓜，并建立了圣玛丽亚—德贝伦城。征服秘鲁就是从那里出发的。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所驱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险家成群结队地追踪科隆扬帆而来。虽然这些无所畏惧的冒险家从事探险和掠夺，大多数是为了个人私利。但他们通常还得到国王的准许和教会的祝福。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美洲的征服是以黄金、荣誉和福音的名义而获得的。

1503年，科隆建立了圣玛丽亚这个短命的城市。十年以后，1513年，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1475—1517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冒险进军，跨过地峡，到达“南方之海”。在这十年间，巴拿马发生了一系列的封赐田地的事。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约1475—1541年），这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随同巴尔沃亚的探险队来到太平洋，也接受了一份封田。当时他年近四十。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特鲁希略，几年前，曾随同另一个探险队到过哥伦比亚。由于贫困不能自己组织探险队，他便在跟随巴尔沃亚进行探险之后，定居在巴拿马。在那里他开发森林，垦殖一些虫害严重、雨

冲贫瘠的田地，度过了十年的岁月。然而他从未打消以往同巴尔沃亚眺望太平洋时所蕴育于心的梦想。他相信另外一些旅行者曾告诉过巴尔沃亚的话，说在南方有大量的而且容易得到的财宝。1522年，当帕斯库亚尔·德·安达戈雅从秘鲁回到巴拿马来，讲述有关印加人财富的神奇的故事时，皮萨罗决心要去找到那个地方。他同另外一个目不识丁的冒险者迭戈·德·阿尔马格罗（约1470—1538年）以及传教士费尔南多·德·卢克神甫一起，去寻求他们的红运。1524年皮萨罗卖了他的田产，卢克去劝说巴拿马市长加斯帕尔·德·埃斯皮诺萨支持这伙寻求红运的人。但筹募的资金仅够装配两只漏船，其中较大的一只还是原先巴尔沃亚为了同一目的修造的。巴尔沃亚发现南方之海（直到1520年才由麦哲伦改称为太平洋），惹起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又名佩德拉里亚斯）的忌妒和仇恨。佩德拉里亚斯是西班牙国王任命的巴拿马都督。1517年他使用奸计逮捕了巴尔沃亚，并把他叛了罪、砍了头。 70

他们三个人出发时，巴尔沃亚的帆船因为停泊在码头七年多，已经朽烂漏水了。他们的装备不

好也不够齐全，最重要的是在启程时他们没有注意到那时已是雨季，海风多向北吹。不久，他们全体返回，两只船更加破烂。尽管当时他们口粮用尽，船员违命，但他们还是到达了现在的哥伦比亚布韦那文图拉附近的圣胡安河口。

他们第一次出航损失很大。因为他们逆风顺海岸挣扎南进，两只船很快分开。皮萨罗在靠岸的地方都留下了标记，表示他曾在那里加水备粮。凶猛的土著居民对他的船只投掷标枪和利箭。随后，当阿尔马格罗的小船在同一地点抛锚时，土著居民对他的攻击，准备得更为充分。他受到如此接待，极为忿怒，于是把一个不关紧要的穷陋村庄抢劫一空，然后一把火把它烧尽。那个地方现名克马多港。那真是一次以惨重牺牲为代价而换取的胜利。他的头部为标枪刺伤，后受感染以致一目失明。他虽受此折磨，但坚持追赶皮萨罗，一直到北纬4°左右的圣胡安河，皮萨罗已经转航北去，无疑双方是在一夜间交叉错过了。这时阿尔马格罗对继续同野人和风浪斗争也感厌倦，于是转舵回航，最后在巴拿马东南一个潮湿而且瘟疫流行的小海湾上，赶上了皮萨罗。他们二人经过强取豪夺

已是金宝盈囊，证明了继续南行确有富裕的王国存在。他们虽然受了不少折磨艰苦，但再试之心有增无已。1525年，阿尔马格罗返回巴拿马，为再一次冒险筹备新的资金。

71

卢克神甫又一次从市长那里得到资助，足够添买五匹马，装备两只船，并且引诱了一百六十人参加航行。他们在1526年启程，又为逆风所阻，不得不两次派船回港要求援助。第二次出征历时两年。经历了将近一年时间的艰苦航行，才到了秘鲁海岸的通贝斯。灾难接连着不幸，然而通贝斯这个地方重新激起了久怀叛离之心的士兵们的热情。通贝斯是一个建设得很好的城市，坐落在从安第斯山麓到太平洋之间这块广阔的平原上，生长着相当繁茂的果树和蔬菜。当皮萨罗的大船到岸时，全城已逃亡一空。但不久居民又都返回，惊惧地看着停泊在海港里的那艘大船。这时，在城里有一个很受当地大部分土著居民尊敬的长老，是个印加贵族。皮萨罗邀请他上船看了一遍，还赠送给他酒和一把铁斧头。当时南美洲同墨西哥一样，对铁还是一无所知的。这位印加人问到皮萨罗的来意，皮萨罗回答说他代表全世界最伟大最强盛的国王，

他是那位国王的忠实臣仆，这次他来是要为他的国王在他所发现的地区取得宗主权；此外，他还要拯救他遇到的一切野蛮人，使他们从下地狱的命运中解脱出来，教导他们信仰真神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这个印加人或许明白或许并不明白皮萨罗直率的答话，他保持慎重的沉默，并邀请这些西班牙人到市里去访问。

通贝斯是印加人最珍视的一个海滨游览胜地。那里的庙宇装饰着灿烂绚丽的花毡，四壁悬挂着金片。皮萨罗克制着他的贪婪欲望。他力量单薄，不能下手征服，只好把这次航行当作一次侦察。他用一些不值钱的礼物向当地人换到了羊驼（或称秘鲁之羊），甚至还换到了金子。于是他继续前进。

72 由此往南，探险家们再也没有遇到象通贝斯那样辉煌美丽的居民区，但是本地人都说在山里住着一个伟大强盛的领君。从四周围的一切可以明显地看得出高度文明的迹象。葱绿一片的田地通过渡槽输水得到灌溉。建筑物也表现了先进的建筑技巧。非凡的公路沿着海岸蜿蜒而去。他们深信这里蕴藏着他们要寻求的财宝。但是皮萨罗感

到他们的力量薄弱，不足以进行抢劫，只好返回巴拿马充实力量。回程路上，他们又在通贝斯靠岸，皮萨罗留下两个船员，为的是让他们学习克丘亚语，并进一步了解印加人。作为交换，他带走了两个秘鲁人，等他们再来时这两个人就能充当翻译。其中一位名叫费利皮略，后来在西班牙人征服这个帝国时，他起了极大作用。

十八个月以后，他们回到巴拿马。朋友们以为他们早已丧命海外，因此对他们热烈祝贺。不过他们带回的黄金、“小骆驼”和秘鲁人都不能说服当地投资者对远征再做一次冒险的投资。皮萨罗感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神话般的帝国确实存在，从而去获得皇家的支持。尽管他诚心诚意，能言善辩，他还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从查理五世皇帝那里获得远征特权和微薄的资助。在著名的1529年7月26日的议定书中，查理五世封赐皮萨罗为新卡斯提（人们当时这样叫秘鲁）的总督和督军，并授权让这位新总督修建碉堡和执行大授田制度。

大授田制度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殖民地对忠于王室的士兵早已广泛地实行了。这种制度就是

封授包括整个印第安人的村庄在内的大片封建领地。居住在封地上的印第安人实质上就成为封地所有者的奴隶，要为他的家庭、田地或矿山服劳役。根据议定书的条款，卢克神甫被任命为通贝斯的主教，印第安人的保护神甫，并得到很高的薪俸，这当然是要从被征服的土地收益中提取的。阿尔马格罗则受封为贵族绅士，并被任命为将来要修建的通贝斯城堡的司令。

关于在秘鲁发财致富的事，尽管有不少美好的传说，皮萨罗却难以招募到他同国王签订的议定书规定的人数。预料不到的危险和事先讲明的众所周知的艰苦，足以令人沮丧气馁。只有最勇敢无畏的人才可能应征。在这些人当中，有皮萨罗的三个异母兄弟：埃尔南多、胡安和贡萨洛。埃尔南多为人浮躁骄傲，是西班牙军官贡萨洛·皮萨罗的唯一嫡子。他同弗朗西斯科年龄几乎一样，没有人能说准他俩谁是哥哥。他残暴恣肆，集中了卡斯提人的许多劣根性格。他的坏影响渗透在他们兄弟二人以后十年共同做出来的决定之中，并且使他兄弟的不少正确领导未能生效。其余两个兄弟都年轻二十岁。胡安大约生于1500年，贡萨洛更晚

生五、六年。

皮萨罗在罗塔未能招到足够的志愿人员，于1530年的一个夜晚拔锚启程离开西班牙，因为他听说皇家的巡察员已从马德里出发追查议定书的条款不能履行的原因。清爽的贸易风把他很快地带回巴拿马。一到那里，他便着手对他的伙伴们进行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工作，说明为什么他接受了皇家赐予的各项头衔和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大部分收益，还接受了一笔比阿尔马格罗的薪俸要大一倍多的收入（肯定是从将来的总收益中支付）。同时他还和卢克神甫向阿尔马格罗恳求说，他们三个人的结伙决不应遭到破坏。他俩的恳求终于使阿尔马格罗和他的随从们又回到他们的集团里来。但是两个头目之间的猜忌形成了裂痕，而埃尔南多·皮萨罗的轻蔑傲慢态度把裂痕更加扩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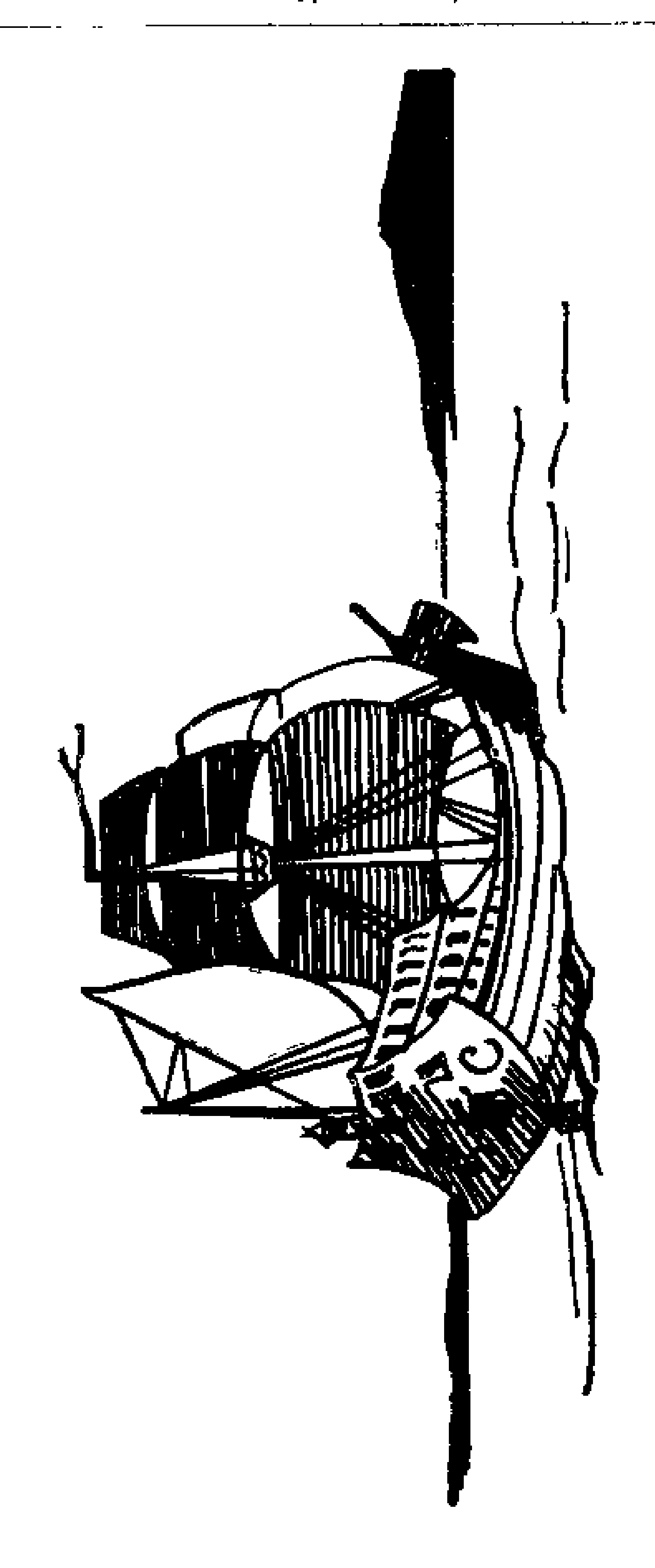
在几个头目之间暂时相安无事的情况下，皮萨罗找到了三只小船代替那不得不留在巴拿马地峡大西洋岸边的几只船。他要招募更多的人员，以便把他这个班子搞得更有力量。但是在巴拿马殖民者当中很少有人甘愿撇下家园去忍受艰苦，因此皮萨罗把阿尔马格罗留下招兵买马补充力量，74

他本人于1531年1月带领二十七匹马和一百零八个人，分驾三只小船出发了。

皮萨罗头两次出航在对待土著居民上表现了克制态度。但是由于害怕船员叛变，急于偿还债务并且渴望引诱其他巴拿马人接踵而来，他便大胆地让船员在赤道北登岸，然后齐驱南下。不久，他们来到了科阿克村。他们手握长剑，意外地找到了黄金、白银和绿宝石。他立即把国王应得的五分之一的份额火速运回巴拿马。皮萨罗的判断是准确的，运送财宝到巴拿马的那只船果然带回了新的援军。与此同时，皮萨罗继续在大陆上前进。但是现在他遇到的不是友好的接待，而是逃避一空的村庄和深怀敌意的野蛮人。他们早已把所有的金子携走，更重要的是携走了所有的粮食。不久，皮萨罗的队伍便处于饥饿的边缘。或许由于行军筋疲力竭的关系，时疫发生了，士兵又在叛变。为了使他们得到安慰和休息，皮萨罗便在瓜亚基尔海湾的普纳岛上安营扎寨了。多亏他三年前带回西班牙去的那两个秘鲁翻译，使皮萨罗能以察觉到岛上土人对他的暗谋。岛上的印第安人由于最近被印加人征服，对大陆上的土人毫无好感。不然的

话，他们就可能联合进攻，足以把皮萨罗这一小撮人马消灭干净。实际上，皮萨罗战战兢兢地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直到最后又有两艘来船出现在海面上，才解了围。这两只船又带来了百名援兵、一些骑兵的马匹和那位后来发现了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旅行家埃尔南多·德·索托。在增援到达的同时，传来了印加帝国发生内战的消息。于是皮萨罗离开驻扎的岛屿，继续他在大陆上的征伐。 75

瓦伊纳·卡帕克破坏了印加人的传统，这样便不知不觉地给外来的征服者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1527年，他在临终之前，把他的疆土分给两个儿子，瓦斯卡尔和阿塔瓦尔帕。瓦斯卡尔是他妹妻生的嫡子，分到帝国的南部。阿塔瓦尔帕是他征服基多以后，收纳基多皇后为妾所生的儿子，分到了帝国的北部，包括基多。瓦斯卡尔是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瓦斯卡尔的继承人芒科二世后来对这个帝国的命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瓦伊纳·卡帕克最宠爱的是阿塔瓦尔帕。他把这个宠儿抚养长大，在战争中让他随军睡在帐幕里。这个孩子的清秀的容貌很得他的欢心。他通知大臣们说，他要打破惯例，把国土平分给瓦斯卡尔和阿塔瓦尔帕。他死



运送财宝到巴拿马并载回新的补充人员的小帆船

后五年间，这个帝国没有因为他失策地破坏了传统而受到大的危害。两兄弟各自治理着自己的地区，没有发生敌对的事情。但是瓦斯卡尔对他的处境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的国境南边被智利沙漠所阻限，东边隔绝于海，西边有密林屏障，北边毗邻其兄弟的王国疆土。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保持帝国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他具有坚持不懈的积极进行战争的愿望，以扩张领土。同时他又害怕阿塔瓦尔帕向北部扩张，那样阿塔瓦尔帕势必更为强大。为防范于万一，他向阿塔瓦尔帕提出一项要求，叫他立誓保证要作正统的印加皇帝的忠实臣仆，决不向北扩张他的帝国版图。阿塔瓦尔帕佯装顺从，但暗中调集三万左右的精锐士兵，化为小股开赴库斯科。沿途的印加官员见到如此众多的士兵直趋库斯科，极为震惊，便将其疑虑上报瓦斯卡尔。瓦斯卡尔匆忙中从科拉苏约调集所有后备力量来应急。但这批士兵同数量多、经验丰富的阿塔瓦尔帕的军队相比，并非敌手。瓦斯卡尔和 77 他的许多将士都被擒获。其余的或在混乱之中阵亡，或因不忍目睹印加皇帝受辱而自刎。阿塔瓦尔帕杀尽了他所找到的王室的其他成员。关于此

事，加西拉索写道，卑鄙无耻的阿塔瓦尔帕立即看出他不得不杀尽“所有那些有权继承王位的嫡系印加人，而且还得杀绝那些可能试图效法他的非嫡系的孩子们，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已为他们的野心开辟了道路”。

阿塔瓦尔帕的军队继续干着侵略者特有的那些越轨的事。瓦斯卡尔的忠臣们在恐惧和复仇交错的心情下颤栗不安。就在这个有利的时刻，皮萨罗离开了普纳岛。首先他把船开到往南仅有几哩的通贝斯。他发现那里已被普纳岛的印第安人所破坏。也就是这伙印第安人在过去几个月里曾给他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他过去留下准备当翻译的两个西班牙人已不知去向，同时他上次来时所见到的装饰这座城市的大量金子也都无影无踪了。

面对这种情况，皮萨罗这个临机应变的军人，决定在附近皮乌拉河上一个设防的新村，建立营地。这个新村被命名为圣米格尔。随后他到科迪勒拉山区侦察阿塔瓦尔帕下一步的行动。1532年夏，他派遣一个印第安人作信使到新印加皇帝那里，说他很愿进行一次拜访。在等候回答期间，他把已经聚敛来的黄金做了分配，用五分之一去偿付

巴拿马债主，因为他仍然还得从他们那里求得接济。他留下足够的数量去满足他的扈从，特别是要把皮乌拉河谷的肥沃土地分配给他们。分赐土地的制度叫做大授田制（encomienda）。分配印第安人在这些土地上服劳役叫做劳役分配制（repartimiento）。在劳役分配制下，实际上印第安人已成为新的奴隶。西班牙国王要求殖民者做的，只是向他们的新奴隶传授真正的信仰。皮乌拉河上的圣米格尔是南美大陆上第一个建立起大授田制 78 和劳役分配制的地方。

正在修建堡垒的时候，皮萨罗的信使返回来了。他说克派帕大战已不可挽救地分裂了印加帝国。于是皮萨罗在1532年9月24日带领一百七十七个人、六十七匹马出发到卡哈马卡。阿塔瓦尔帕曾表示过要在那里欢迎他们。皮萨罗留下约计五十个人保卫圣米格尔。即使他把这几十个人都带走，他那小小的队伍也不是阿塔瓦尔帕的对手。他也只能这样设想：他能用诈骗的手腕胜利地征服印第安人，并偷走他们的黄金。

这些西班牙人攀越了迂回曲折的安第斯山，在11月15日到达距皮乌拉河约二百哩的卡哈马

卡。一路上，由于头盔、衣甲和长筒枪的重荷，他们一定是很艰苦的，但是皮萨罗命令他兄弟埃尔南多和一班骑兵飞跑着穿过田野，直奔印加皇帝的幕帐。印第安人惊讶万状地瞪目凝视着这些冲上来的骑兵。他们带着招展的旌旗，吹着呜呜的喇叭，披着闪光的盔甲，以前所未见的速度猛冲而来。

然而，阿塔瓦尔帕这位至高无上的印加皇帝，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不屑于看这些白人。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君王，他对皮萨罗所申说的友谊表示漠不关心。他打破了沉默，仅仅解释说他正在斋戒，明天他将做礼节性的回访。同时他让这些外国人在广场附近的一所大石房里安顿休息。

皇家的招待是冷淡的，也是虚实难测的。成千上万的训练有素的印第安人露宿在印加皇帝的四周。眼看就要同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较量胜负，皮萨罗这一小伙人中有不少人意气沮丧了。但是皮萨罗不能让他们动摇，他把军官们召集在一起，重讲了科尔特斯在马德里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他提醒人们，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只不过用了扣留阿兹台克皇帝作为人质这样一个简单的骗术。他

们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做到，甚至在阿塔瓦尔帕的整个军队面前也能办成。他并且解释说，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合适办法。撤退只能说明软弱无能，而且阿塔瓦尔帕的军队会很快地把他们切断，全部消灭。如果无所作为，只能让印第安人熟悉他们的凡人的弱点。而由于他们的武器、马匹和白色皮肤所赋予的半魔术性的神秘也会失去意义。最后一个办法，是在印第安人自己的土地上公开同他们打仗，这就更加不利，只能是自杀。军官们因为提不出更好的计划，便接受了他的诡计。

第二天，1532年11月16日，是南美洲历史上最不吉利的一天。早晨皮萨罗很早便把他的士兵们呼唤起来，并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广场三面的几所房子里。虽然印加皇帝不允许动用这些房子，但是当时无人阻止他们。更严重的是，似乎没有人把这件事汇报给印加皇帝。他的幕帐没有丝毫动静。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信使，匆匆忙忙跑到广场，说印加皇帝当天下午要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到这里来，就象皮萨罗的兄弟和埃尔南多·德·索托前一天到达时那样。皮萨罗提出抗议，认为那样做不是友好和信任的表示，特别是因为印加军队还

在大门外包围着他们。

那天下午在令人悬虑不安的紧张气氛中度过。谁也不能断言，印加皇帝将把他们当作朋友还是当作敌人。最后，在傍晚时刻，阿塔瓦尔帕坐着金轿子进来了。他的包头布（borda）紧遮着前额，冷淡、威严，显出了同头一天一样的神气。随后五千名精锐士兵拥进这个小广场，围绕在他身旁。当广场再也不能容纳更多人的时候，他勉强地环顾了一下，问道"那些外来人在哪里？"

这时，多米尼加修士维森特·德·巴尔维德手持圣经走向王座，解释基督教义的神圣威力。他从讲述造物主开始，随后长篇大论地说到耶稣，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崇高的牺牲。最后他要求阿塔瓦尔帕放弃自己的异教信仰，承认查理五世皇帝的宗主权。这样，查理五世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就会保护他，就象耶稣在来世会保护他一样。

80

尽管秘鲁的译员把维森特修士的话翻译得很好，阿塔瓦尔帕可能仅懂得这段形而上学的说教的一小部分。他当然没有受到感动。他说，"我比地球上任何君主都伟大。至于你们的上帝，已经被他创造出来的那些人处决了。然而我的上

帝”，他用手指着正要落山的又大又红的太阳说，“我的上帝是永恒的，他保护他的子孙。你凭什么权威说这些话?”

维森特用手指了指他的圣经，阿塔瓦尔帕伸手拿过来查看。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印刷品，也就没有被它的神秘性所打动，同时对维森特的提议十分忿怒，他猛地把那本圣经摔在地上，然后重又表现出他那冷淡轻蔑的神态。这个多米尼加人拣起那本神圣福音，片刻也没停留，便急忙跑回去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向皮萨罗报告。另外他还补充说，这个城的墙垛上已围满印第安人。据普雷斯科特引录，他当时说：“马上进攻，我宣告你无罪。”

皮萨罗发出了进攻信号：他把一块白色围巾举起又放下。于是白人们高喊着圣地亚哥（西班牙人在战争中的护卫圣徒）的名字，从他们埋伏的地点跳了出来。不管是印加贵族还是粗野的印第安人，都遭到骑兵践踏倒在地上。步兵们看管着其余的人。秘鲁人有的因伤痛弄得头昏目眩不知所措，有的被滑膛枪的烟和声响弄得混乱一团，一齐冲向大门。片刻之间，饮弹而亡或惊慌拥挤而丧命的印第安人尸体堵塞了每个出口。他们在

极端悲惨的不幸之中，凭人多力大，把一段环城坯墙推倒了。另外许多人则为了最后向皇帝表示效忠而牺牲了生命。他们面对西班牙人挺身而出，阻止西班牙人接近皇帝，但都被砍倒在地。没有一个人能做出真心的抵抗，因为阿塔瓦尔帕是赤手空拳进城的。唯一受伤的西班牙人是皮萨罗本人，81 他因用胳膊拦挡砍向印加皇帝的一刀而受伤。他想要活捉这个印加皇帝，留作人质。

就皮萨罗得到的报酬而言，他的伤是无所谓的。阿塔瓦尔帕的士兵看到他们皇帝的全能威力突然失效，都逃跑了。阿塔瓦尔帕被囚禁后不久便认识到，西班牙人对黄金的喜爱超过他们对神圣的弥撒经和查理五世的信仰。他提出建议说，如果获释，他可以献出大量的黄金，其数量足以把囚禁他的那座庙宇改为黄金铺地。皮萨罗在考虑这个提议，而他的军官们对提供这样大数量的黄金不敢置信，以笑嗤之。皮萨罗认识到：从卡哈马卡开到库斯科有六百五十哩，他这班人马要泰然无患地走完这段路程是不可能的。他不得不把印加皇帝随身带走，看看就在印加皇帝的这条公路系统内有没有他的军队试图来营救他。此外，他

如果迟迟不前，只能使所有的野人把财宝藏起来然后跑掉。当他考虑这些问题时，阿塔瓦尔帕以为他的沉默和军官们的大笑是轻蔑的表示。于是阿塔瓦尔帕把他的赎价又提高一步，说是愿意把他现在住的这间房屋装上黄金，他的手能伸多高，黄金就堆多高，此外还要把隔壁小屋装上两倍多的银子。如果把他释放，他可以在两个月内做到这一切。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建议。那个房间长二十二呎，宽十七呎，高九呎，合计三千三百六十六立方呎。要从这个辽阔帝国的四面八方拿来黄金饰物和珠宝去把它装满，谈何容易。

历史学家们曾推测过，为什么阿塔瓦尔帕起先接见了这些西班牙人。许多人判断，如果他不接见，怕他们要站在他异母兄弟那边。当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城作了西班牙人的阶下囚时，瓦斯卡尔在库斯科附近的胡亚哈已是阿塔瓦尔帕的俘虏。瓦斯卡尔设法向皮萨罗暗中递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如果皮萨罗肯把阿塔瓦尔帕转交给他，他愿立即拿出两倍于阿塔瓦尔帕答应给的黄金。阿塔瓦尔帕闻讯后，决定不再抱任何幻想。他设法 82
递讯给那些看守瓦斯卡尔并效忠于他的士兵们，

让他们把瓦斯卡尔处死。以后，瓦斯卡尔被溺死在安达马尔卡河里。死前他大喊大叫地要求白种人替他报此弑君之仇。

皮萨罗派遣他兄弟埃尔南多到库斯科去调查杀害瓦斯卡尔的情况，同时了解在这个帝国首都的存金数量。埃尔南多走后，消息传来，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已从巴拿马回来。他的船正在皮乌拉河的圣米格尔卸下新的供应物资。自从皮萨罗得到查理五世的重赏之后，阿尔马格罗和皮萨罗的相互妒忌几乎接近表面化。虽然如此，阿尔马格罗还是同意在卡哈马卡参加皮萨罗的队伍。

这两个卡斯提人再次联合起来，彼此热情地祝贺一番，但是埃尔南多从库斯科回来后见到阿尔马格罗却不太高兴。与此同时，一件更有爆炸性、决定性的事情发生了。阿塔瓦尔帕交的赎金即将达到规定的数量。现在摆在皮萨罗面前的，是如何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一件费人心思的事。他的三帮伙伴对他们自己在这次远征中所做的贡献都各有看法。一帮是同整个印加军队正面交锋的先锋队；另一帮是因为患病受伤而不得不留守后方警卫圣米格尔的人员；还有一帮是经历了令人



如果阿塔瓦尔帕放弃他的异教信仰，皮萨罗答应对他处以痛苦较轻的死刑

厌烦而危险的航行多次返回巴拿马的阿尔马格罗的士兵。他们都认为自己应得到最大的部分。争吵、忌妒和对抗对南美殖民化是最麻烦的事。这在如何分配阿塔瓦尔帕的大笔赎金的问题上第一次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当价值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的黄金正在熔化改铸金锭时，阿塔瓦尔帕吵闹着要求释放。皮萨罗再一次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释放他，他不会重整人马夺回他的财宝吗？如果把他作为俘虏继续拘留，又需要占用多少打仗的士兵来看守？传说有三万印加军队已从基多出发要促成阿塔瓦尔帕的释放，情况是否属实？现在他的西班牙士兵都已抢劫致富，尽管有十拿九稳的红运，他们还肯象几周以前那样欣然接受吗？

士兵们极想把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杀掉。最后皮萨罗给他定了十二条罪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曾篡夺王位，杀害了他兄弟。阿塔瓦尔帕提醒西班牙人注意，他曾把他们当朋友接待，而且在赎回他个人自由的这次交易中，他已经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是对蓄意杀人者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阿塔瓦尔帕被宣判为异教徒和罪犯，应

84

受火刑。

在这位印加皇帝被囚期间，维森特修士一直向他宣讲教义。在行刑的柴堆前，他再次要求这位皇帝放弃他的异教信仰。阿塔瓦尔帕问道，如果他皈依新教可否将火刑改为痛苦较轻的死刑。皮萨罗答应予以宽大待遇。于是阿塔瓦尔帕接受了基督命名，叫做胡安·德·阿塔瓦尔帕。这是根据浸礼会教徒约翰的名字起的，他也是死在8月29日。就在1533年的这一天，阿塔瓦尔帕被绞死了。然后举行了一个带有弥撒和仪典的基督教葬礼。从这一天起，加上在授田制度上对印第安人多方面的虐待，便产生了关于西班牙人虐待秘鲁土著人的一个黑传说。这个黑传说迄今对许多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仍然是很不愉快的。

这位全能的领袖死了以后，印加帝国边远地带的印第安酋长们想要重新获得独立。皮萨罗看到这个帝国的分裂危机，授命阿塔瓦尔帕的弟弟托帕尔卡继承王位。托帕尔卡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利，但是接受了这个不光彩的职务。于是，皮萨罗和他的士兵决定带着他一起到库斯科去，希望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的黄金。他们一路上遭到伏击，遍

受阻挠。更糟糕的是托帕尔卡被一些恨他叛国的印第安人毒死了。瓦斯卡尔的兄弟芒科二世，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权利，他找皮萨罗提出了要求。皮萨罗认为他或者可能比阿塔瓦尔帕在基多的继承人要易于驾御，便邀他一同去库斯科。

库斯科在1533年11月陷落。那里并不是个85“黄金之国”，但是对于不是最贪得无厌的人来说，还是有足够的东西可供抢夺的。然而，西班牙的冒险家在短时间内便把他们分到的大部分财物挥霍净尽或是赌博输光。他们需要和渴望得到更多的财宝。埃尔南多·皮萨罗护送国王应得的五分之一掳获品回到马德里时，许多西班牙人听到秘鲁有发财机会，也都想到秘鲁去。

一个典型的投机者是唐·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他曾随同科尔特斯到墨西哥当过兵，但是仍然贪图更多的战利品。他早已打听到阿塔瓦尔帕的根据地基多尚未攻陷。他推想，如果库斯科是个有钱的地方，基多应当有更多的黄金作为它的装潢。1534年3月，他带着五百人从危地马拉启程向南航行，刚过赤道即行登陆。他的人马侵入到根据西班牙皇家议定书给予皮萨罗的领地，

并从这湿潮的热带森林一直向东推进，到达科迪勒拉山区。不久，他和他的士兵爬到了他们从来没有攀登过的那样高的山上，在山上迷了路。高山上的冰雪和寒风给这些因长期住在危地马拉血液变得稀薄的人以无情的惩罚。最后，阿尔瓦拉多终于到了高原地带，人马损失惨重。当他看到小道上有很多马蹄痕迹时，他非常懊恼。只有西班牙人才有马匹；谁能在他前面呢？

圣米格尔驻军司令贝拉卡萨尔，也独自推想出象阿尔瓦拉多那样的一个结论。他没有通知皮萨罗，就从圣米格尔的驻军中抽调出一小股军队，向北进军到达基多。他的路线比阿尔瓦拉多的路线，容易通行得多。但他也很失望，因为印第安人预料到西班牙人要来，早已把城里的东西搬了个精光。就象普雷斯科特写的那样，“他们找到的是无珠空蚌”。

虽然他们两个人同样懊丧，但阿尔瓦拉多的处境更糟一些。由于他侵入到皮萨罗的领地，他面临的危险是被查理五世处决，或被妒忌成性的皮萨罗兄弟所暗害。因此，他决定安排一个同皮萨罗和解的办法，那就是把他的船只、军需品和 86

储备物资卖给皮萨罗，然后他永远离开那里，就此了事。普雷斯科特写道："他这次到秘鲁的探险充分表现了这个人的特征。这次探险是以不义为基础，以鲁莽为指针，以灾难而告终的。"他的行径，对于许多尾随他的冒险家来说，也是典型的。

皮萨罗现在解脱了这个预料之外的威胁，并且通过他的傀儡印加皇帝统治着整个帝国。于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去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根据地。库斯科远在内地，对于需要由海运增援和补给的军队，距离似嫌太远。贝拉卡萨尔驻守的圣米格尔和基多，对于控制整个帝国的主要部分也过于偏北。遍寻各地，皮萨罗选中了由里马克河灌溉的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在1535年的主显节，他决定在那里建设一座新城，命名为"君王之城"。不久，人们称之为利马，这是西班牙人讹读印第安语里马克(Rimac)一字的变音。

弗朗西斯科把他的异母兄弟们留在库斯科，而他去经营利马。埃尔南多从马德里回来也到了那里，传述国王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并把以前赐予的一切权利重新确认了一次。同时他还传述了一个较为扫兴的消息，说国王已将秘鲁以南二

百里格以内的全部土地都赐给了阿尔马格罗。阿尔马格罗的奖赏是值得的，但是这件事惹起了这两个伙伴之间新的仇恨，最后落得个凶祸和死亡的结局。

阿尔马格罗得到皇家新的赏赐后，几乎是马上就动身去开发那块新土地即现在的智利。为此，他把他手下的两个头目所统率的有限人马分散开来，并让芒科二世去攻打库斯科。这个傀儡皇帝的反叛是人们未曾预料到的。皮萨罗对待土著居民，按照当时的一般标准来说，是够好的。然而庙宇还是被亵渎，常被用作马棚；皇宫被军队占用；妇女遭到士兵们淫欲的折磨。对此，秘鲁人极为憎恨，皮萨罗却并未察觉。此外，芒科二世对于西班牙人 87 一再拖延不给他治国大权也日益不满。

当弗朗西斯科正修建他在利马的住宅区时，他让他的兄弟埃尔南多掌握库斯科。这时芒科二世再也不能控制他压抑着的怒火，决心要逃跑。他答应把他父亲原身大的黄金铸像送给埃尔南多。据他说，铸像藏在安第斯山附近一个洞里。后来他没有及时回来，埃尔南多便打发他弟弟胡安跟踪寻找。胡安发现整个乡村都逃亡一空。等他一过河

去，忽然看到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在那里严阵以待。胡安仅带着六十名骑兵，但是他以特有的方式向对方冲锋。印第安人能固守阵地、顽强战斗，并且运用了战术，这还是第一次。优越的武器和马匹使西班牙人有足够的作战勇气，因此他们能坚持战斗两天之久。印第安人最后撤退到一个峡道里，企图在那里伏击西班牙人。这时候，从库斯科传来了命令，要胡安返回，因为那里也受到了袭击。

胡安于是转身回师，印第安人以为他们撤退，对他们大肆辱骂，他们只得充耳不闻。在库斯科附近，他们看到整个田地里都是印加部队，集合在一起准备进攻，镶上铜尖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发亮。西班牙人集中了队伍，强行挤了过去。印第安人未加阻挠。他们知道，城里的西班牙人越多，他们看到围城的成效就越快。

围城持续数月，西班牙人损失惨重。为饥饿所迫，他们常闯出城去进行抢劫，以搜寻吃食。皮萨罗四兄弟中最高尚的胡安·皮萨罗，就是为这样一次差事失去了性命。火箭落到小房草顶上，房子和给养都一齐烧光。在城外经营农庄的殖民者们遭到杀害。他们的头颅都被隔墙抛掷到城里，成为

心理战的初步行动。弗朗西斯科仍在利马，不能到库斯科来支援，因为那边的新住宅区也遭到秘鲁人的袭击，即使把他们击退赶走，他们退守山区隘道，还会扑杀增援库斯科的军队。 88

五个月后，芒科皇帝主动解除了围困。他让士兵们回去春播。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庄稼，将来会有比西班牙人更坏的浩劫等待着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几乎在此同时，阿尔马格罗失望地从智利巡视回来。皇帝已答应赐给他通贝斯城堡司令的头衔。但是当皮萨罗到达通贝斯时，这座城早已被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交战的军队摧毁。阿尔马格罗在南方得到的新地盘，应当可以使他解除因皮萨罗得到比他更多的报酬所产生的妒忌。然而相反，他们之间的仇恨更加深化了。阿尔马格罗的士兵吃尽苦头，攀登了一万四千呎高山狭路到达科拉苏约。在那里的帕里亚，他们建立了一个基地，这是玻利维亚最古老的殖民地区。但是，玻利维亚并没有向西班牙人提供发暴财或享安逸的条件。阿尔马格罗留下一些人守卫帕里亚，他本人通过可怕的阿塔卡马沙漠继续向南进军。在走了两千哩贫瘠荒地之后，他唯一的希望是回到库斯科，把它据

为已有。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对库斯科的权利是同皮萨罗兄弟们一样的。因为他估计，根据查理五世所划定的行政范围，这个城是在他的管辖之内。他在地理上的计算是不准确的。可能有法律上的理由，使他相信库斯科应当属于他。无论如何，芒科二世解除了围城只不过是给皮萨罗兄弟们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阿尔马格罗一回来，便迅速地占据了库斯科，并把皮萨罗兄弟们拘禁起来。

他的扈从们劝他把皮萨罗兄弟就地处决，然而也许是念及他和弗朗西斯科有同乡战友的情谊，阿尔马格罗未肯下手。他赦免了别人，却毁灭了自己。作为同弗朗西斯科谈判的先决条件，他释放了埃尔南多和贡萨洛。但是他们一被释放，就立89即试图在阿尔马格罗去同他们的哥哥谈判的途中对他伏击。他暂时得免一死。当皮萨罗兄弟在库斯科城外拉斯萨利纳斯袭击他的时候，他的身体正感不适。他以前为了建立新港已经把兵力分散，因此在这次遭遇战中他远非对方的敌手。经过一番可怕的撕杀，他终于被擒。1538年7月8日，他被绞死并枭首，时年六十三岁。

他的那些被称为"智利老汉"的士兵所抢得的

一切都被剥夺精光。他们心怀不满，蓄意报仇，都愿在阿尔马格罗的儿子领导下，向弗朗西斯科雪恨。埃尔南多深知他这批同乡的情况，并警告过他的哥哥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多本人还得要去一趟西班牙，以献给皇帝五分之一的掠夺品。他的弟弟贡萨洛在1539年被任命为基多地区的长官，但是这时候在他哥哥的授意之下，已经率领一个多灾多难的探险队到厄瓜多尔西部森林去寻找肉桂去了。因此当阿尔马格罗的儿子攻打利马时，弗朗西斯科仅有的真正可以信赖的两个同盟者——他的两个兄弟都不在身边。此外，他沉湎于新的荣华富贵，变得沾沾自喜，轻率不羁。他自封为皮萨罗侯爵，在利马过着骄奢豪华的家庭生活，对他弟弟的警告置若罔闻。1541年6月26日夜里，就在利马，约有二十多个被剥夺得穷困潦倒的阿尔马格罗的伙伴把他暗杀了。

皮萨罗兄弟只剩下两个人活着。因为胡安早已被芒科的印第安人在库斯科城外杀死。弗朗西斯科被暗杀的同年，埃尔南多到达马德里。他发觉查理五世皇帝对他带去的大量财宝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表示感激。查理五世为了镇压新教革命和

抵抗奥托曼土耳其新的入侵，花费极大。他指望着殖民地的黄金去支付军队的开支，因此对殖民地区发生的妒忌不和的事感到恼怒。他谴责埃尔南多篡夺了皇家的特权和杀害了阿尔马格罗。由于这些罪状，埃尔南多在梅迪纳—德耳—坎波要塞的城楼里被囚禁了二十一年。然而他在那里并不是孤独一人。他有瓦伊纳·卡帕克的孙女作伴，并让她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1562年，他被释放后，收回了他的大部分财产，并且买到了一个"征服者侯爵"的头衔，因此这就讥讽地强调了他自己说的一句著名格言："金钱就是高贵的天才"。埃尔南多在四兄弟中是最不令人赏识的，然而在他们的秘鲁探险中，他混得最好。

1542年，贡萨洛从亚马孙盆地挣扎着回来了。这时他才知道不仅埃尔南多坐了牢、弗朗西斯科被杀害，而且国王还派了一个总督到利马调查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闹对立的事。他还了解到新总督巴卡·德·卡斯特罗已经替弗朗西斯科报了仇，因此他无需继续为此操心。于是他退隐在查尔卡斯附近的一个庄园里。他手下的印第安人通过辛勤的劳动，使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繁荣。

巴卡·德·卡斯特罗调查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被害的经过以后，认识到他决不能指望阿尔马格罗的"智利老汉"们对皇家尽忠效命。他得到一个老兵的帮助，这个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德·卡瓦哈尔。他刚强勇猛，当兵达四十年之久。他第一次到秘鲁是帮助皮萨罗攻打芒科。他身体肥胖，说话喜欢冷嘲热讽，是个弗洛斯塔夫[1]式的人物，也是个优秀的士兵。1542年9月，他在丘帕斯战场上与阿尔马格罗的儿子遭遇交锋。经过残酷的流血撕杀，彻底歼灭了对方的军队，把小阿尔马格罗和他的大将都一齐处死了。

当西班牙人自相讨伐的时候，芒科二世并未偷闲度懒。他发觉由于原来那些征服者对待印第安人极为野蛮残暴，他招募新的印第安士兵并不困难。此外，征服者们的随从人员已经习惯于依靠大授田制因袭下来的奴隶过活。后来当了恰帕斯主教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甫发现西

---

① 约翰·弗洛斯塔夫(John Falstaff)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Merry Wives of Windsor)和《亨利四世》(Henry Ⅳ)中的人物。弗洛斯塔夫是一个身体肥胖、精神愉快、幽默滑稽和放荡不羁的人。——译者

班牙人的行径十分恶劣，回到马德里便控告了在新西班牙盛行的虐待印第安人的现象。印度事务部根据他的介绍做出了反应。他们颁布了“新法”(New Laws)，规定继承人都不能把印第安人作为世袭的奴隶。新法激怒了殖民者，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抵制。新的凌辱虐待有增无已，从而激励了更多的印第安人拥护芒科二世。在西班牙人由于混乱和分歧不能采取联合行动的情况下，芒科在高原上占据了一个可以不断袭扰西班牙人的战略地点。西班牙人被迫后退，以便在丘基萨卡(即现在玻利维亚)的一个地方去征服印第安人。1538年，西班牙人在那里建立起一块殖民地，命名为拉普拉塔，但是按照当地印第安人的叫法是查尔卡斯。一直到1839年，它才改为现在的名称苏克雷。这是为了纪念玻利维亚第一任总统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将军而命名的。

原来贡萨洛·皮萨罗在查尔卡斯附近经营农业。当他听到已领受皇家敕令执行新法的布拉斯科·德·努涅斯·德·贝拉要在1544年接替巴卡·德·卡斯特罗时，他便举起了造反大旗。他同大多数殖民者一样，认为实行新法不仅要丧失以西班牙的

名义合法赢得的收益，同时也要结束秘鲁的殖民事业。没有一个西班牙人认为他在新大陆不用奴隶的劳动就能进行垦殖，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他的军队开到库斯科，一举攻克该城，于是他宣布自己是新的总检察长（Procurador general），并停止执行新法。努涅斯·德·贝拉对新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从西班牙带去了一船成年的西班牙姑娘帮助进行殖民工作。他却没有意识到所有殖民者都支持贡萨洛。他们不拥护皇室，反而反对皇家的总督，并把他囚禁起来。贡萨洛继续进军，到达利马后就宣布他是当地的行政长官。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释放努涅斯·德·贝拉，并用最先启程的船把他送回西班牙去。然而，努涅斯却在巴拿马下了船，招募了一些士兵，又回到基多，旨在实现一个崇高的计划，那就是为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夺回秘鲁。对付老练的征服者，他并不是对手，因此在厄瓜多尔首都附近的安亚基多被贡萨洛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一个士兵在战斗 92 的激情之下，砍了努涅斯·德·贝拉的头。贡萨洛对这一罪行非常震惊。在战争胜利后，他立刻把那个士兵处决了。

虽然努涅斯被害并非出于贡萨洛的本意，但这位总督之死却使他于1546年1月18日成为全秘鲁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在西班牙内讧时期，芒科二世由于自然原因死去。失去领袖的印第安人不再有引起任何惊慌不安的可能。努涅斯的舰队统统落到贡萨洛手里。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巴拿马不再成为威胁。在这个时期，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条财富的巨流，殖民者们对此都感到兴高采烈。

1545年4月，一个名叫瓦尔帕的印第安人，在波托西的塞罗里科[1]发现了白银。据传说，瓦伊纳·卡帕克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一个世纪，就知道"波托西的富饶山岗"有大量宝藏。但当他的印加人进行开采时，上天用克丘亚语发出命令："不要从这山开采白银，那是注定要给别人的。"瓦尔帕的主人迭戈·森特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警告。他急于取得这项发现的合法权利，因此曾拥护总督努涅斯·德·贝拉，反对篡权者贡萨洛。贡萨洛在战败努涅斯以后，马上派他那位肥胖的将军弗朗西斯科·德·卡瓦哈尔去见迭戈·森特诺，

① 塞罗里科(Cerro Rico)意即富饶的山岗。——译者

指出他与努涅斯的联盟是如何错误。此后不久，卡瓦哈尔就把波托西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在利马的贡萨洛了。

查理五世并不知道努涅斯的命运。但是，对于这位办事迟钝的总督会落个什么结局，他很不放心。他于是又派遣前西班牙调查委员会成员佩德罗·德·拉加斯卡主教去替换努涅斯。这位主教并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巧言善辩的人。他有足够的资产不会去接受贿赂，他有足够的机智不会为不可避免的死亡而焦虑不安。他领受皇家的全权，带着一个侍从，从西班牙启程了。他在1546年抵达巴拿马后不久，便开始在整个新西班牙产生影响。他试图通过密使同贡萨洛达成和解，同时开始招募军队。贡萨洛这时正陶醉在有权有势的狂想之中，怀着自封为印加秘鲁（即半西班牙半印第安）国王的念头，傲慢地打发走了拉加斯卡的使者。与此同时，拉加斯卡诱劝了在努涅斯死后倒向贡萨洛的海军归顺国王。这样，他就有了数以千计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可以开赴秘鲁。一个纵队被派往通贝斯，登陆后，发现贡萨洛为阻止拉加斯卡前进，采用了焦土政策，已把该城重又烧得精光。拉 93

加斯卡派了另外一营的兵力沿着安第斯山脉取道印加皇家公路节节前进。贡萨洛知道利马难于固守，便把军队撤到库斯科。不料拉加斯卡的另一纵队由迭戈·森特诺率领，由南方开到了高原，因为森特诺仍然指望收复他的塞罗里科。贡萨洛在的的喀喀湖附近阻截他前进，并在瓦里纳把他打得一败涂地。这是贡萨洛最后的一次胜利。

拉加斯卡调动另外一支纵队从北方开到阿普里马克河。皮萨罗预料到他要来此地，早已把桥上的纤维巨缆砍断。拉加斯卡召集了一些祖祖辈辈编结缆绳的印第安人，又做成了粗如人体、长达二百码的新缆，在贡萨洛另派军队阻击之前，就把新缆横架河面。如此一来，贡萨洛既不能破坏拉加斯卡修复吊桥，也不能把他赶出桥头阵地。贡萨洛和卡瓦哈尔背向沼泽，处势不利，面对着拥有十八门大炮的优势武器的敌军，遭到了第一次溃败。

他们的士兵，目睹拉加斯卡军队的优势，全部缴械投降。最后，贡萨洛不得不同拉加斯卡议和。而卡瓦哈尔则企图逃跑，但不久他那匹老马陷入泥沼，他便被擒。许多在长期内战中受尽他折磨的保皇军士兵，要把他分肢解体，但迭戈·森特诺并

不同意。这个肥头胖耳喜嘲善讽的卡瓦哈尔，仍然以粗鄙的轻蔑态度询问这位意外的救命恩人尊姓大名。他竟然不知道多年来他在安第斯山遍地追逐的敌手的姓名，对此森特诺感到惊讶。据普雷斯科特讲，卡瓦哈尔说了这样的话，"我恳请阁下原谅。不见阁下逃窜时骑的那条毛驴为时已久，阁下的尊容，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94

即使在临刑砍头之前，卡瓦哈尔一直没有放弃他那冷酷的玩世作风。1548年4月10日，他那五马分尸的尸体，被钉在库斯科的四个城门上。当时他大约已八十四岁，而贡萨洛被砍头时年纪仅有他的一半。普雷斯科特写道："人们把他的头送到利马高悬在笼子里，并捣毁了他在库斯科的家，在四周围的土地上撒了盐[①]。在这个人的处决问题上，拉加斯卡表现了了不起的人道情感。他说，'我的将军们都坚持把他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但是出于对他的哥哥已故侯爵的敬意，我反对这样做。'"

---

① 在欧洲，盐被视为纯洁的象征，按迷信的讲法，盐能超度亡魂，能驱魔避邪。——译者

对拉加斯卡的伎俩的真正考验，仍然摆在他的面前。他尽力酬谢保皇派的人们，赏赐他们新的劳役分配制和大授田制的权益。但是他们得寸进尺，要求的还要多些。关于印第安人的权利问题，皇家的规定不得人心。强制的劳役一旦不再用强迫方法执行，矿山和农田的生产势必下降。正当殖民地的不满情绪日益增涨的时候，拉加斯卡辞了职，其遗缺由安东尼奥·德·门多萨受命接任。

另外还有个门多萨，是阿隆索·德·门多萨上尉。他生于西班牙，从1538年起就参加了皮萨罗同阿尔马格罗之间的战争。在贡萨洛战败之前，他先任市长，后被封为包括波托西在内的丘基萨卡的都督。皮萨罗被处决后，他决心在一个叫作丘基阿布的地方建立另一个居民区。这个地区坐落在由拉巴斯河所截断的狭长山谷里，正是在波托西和利马之间接近中心的地方。因此，对于从高于山谷一千多呎的贫瘠高原吹来的酷寒和烈风，它可以为羊驼队提供一些防护。1548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在秘鲁新近恢复的和平，他命名这个新居民区为拉巴斯圣母新镇（Nuestra Señora de La 95 Paz）。由于这个峡谷的山特别陡峭，城市不能按

照西班牙的习惯建设成棋盘式，因此广场设置在有新鲜流水的一个山旁。

拉加斯卡回马德里以前，为了酬谢森特诺，他把森特诺对波托西矿产的权利又重新确认了一次。可是森特诺不久便死去了，可能是被他的敌对者毒死的。

在波托西，虽然已经搭起了一些矿山用的木棚和茅屋，但当时它几乎还不配称为城市。1546年，查理五世签发了一项皇家谕令，命名该地为“波托西帝国之镇”。这是西班牙人在本半球无数次勘查探险中想要找到的唯一“黄金之国”。但是利用当时的原始采矿技术，能够容易并且获利地加以开发的，只有塞罗里科。因此，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努力去寻找另外一个可以利用库斯科现有财力去掠夺的印第安城市。

波托西的富藏也带来了问题。一个“白银热”出现了。因此，在塞罗里科被发现后的三十年内，它的人口就达到十二万，成为当时新世界最大的城市。这个新城市的气氛，使得在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时代所孕育的阴谋和诈骗成熟起来。

与暴富相纠合的野心，蕴育着叛乱和暴力。为

反对印第安人而维持着的统一战线一旦不复需要，这种叛乱和暴力便成了征服者们的典型行径。这伙行为残暴、对权力和财富贪得无厌的家伙，一贯反对要剥夺他们的财产或取消他们自治的任何形式的政府。1554年，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希龙在库斯科领导了一次反对西班牙当局的重大叛乱，反对皇家要废除用印第安人作私人劳役的谕令。他的叛乱遭到镇压，但是这种法律也没有再执行。不管西班牙殖民当局多么道德或正确，他们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向是遵照征服者的意图行事，从来没有设法根除自私和猜忌的病毒。一些研究拉丁美洲历史的学者认为，这种并发症是在西班牙征服后由迅速的种族混合所引起的。另外一种理论说，是由于土著民族长期生活在印加王朝统治之下，他们变得容易受统治和剥削。可能这个答案要从这个国家富饶的资源中去找。它的富饶资源有着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那些最贪婪的冒险家把这种病毒永久地保持下来。

第 四 章

国土及其潜力

我是富饶的波托西、世界的宝库、国王们的垂涎之地。

——查理五世首次颁赐的纹章上的箴言

殖民政府在玻利维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561年建立了查尔卡斯王室法庭。丘基萨卡① 虽然原则上是在遥居远方的秘鲁总督控制之下，实际上是自治的。它发展成为一个庄严堂皇、富于画趣的城镇。它象玻利维亚大部分地区一样，是同历史的主流隔离而孤立的。根据查尔斯·阿纳德的记载，“在西班牙殖民地中，没有其他城市比丘基萨卡更为骄傲自负的了”，但是拉普拉塔（那时西

① 丘基萨卡是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所在地。印第安人叫该地为查尔卡斯，西班牙人叫它为拉普拉塔。详见第112页。——译者

班牙人也这样叫丘基萨卡）实际上是为富裕的矿主居住的波托西服务的。丘基萨卡的气候温暖如春，牲畜和各种谷物生长良好。它们为波托西这个新兴矿业城市提供牛肉以及高寒地带所不能生长的蔬菜。

这两个殖民居住区，一个象座花园，另一个则是荒凉酷寒的山村。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玻利维亚地理的极端差异典型化了。雷蒙德·E·克里斯特说，玻利维亚是"许多根本不同的地区的大杂烩，缺乏内部凝聚力。"它的四十二万四千一百六十三平方哩的土地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它们在地势高度、气候和植物生长方面，以及在民族习性和人口密度方面都大不相同。

玻利维亚的地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玻利维亚的悲剧。它的地理状况说明了它的早期殖民者们为什么把这块崎岖不平的地域看作是可以不付任何代价榨取财富的封建采邑。它也解释了这个国家在两次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地理的障碍使得那些小居民区不但彼此分离孤立，同时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以致影响了内部的团结。在玻利维亚历史上，对于高原上的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几乎

从来没有存在过。而太平洋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对它的吸引却形成一种离心力，使这个共和国逐渐衰弱了。

在拉丁美洲各国中，玻利维亚的可耕地与其总面积的比例是最小的(0.3%)，平均每人仅有耕地五分之一英亩。同哥伦比亚一样，玻利维亚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山区，三分之二是低地。它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高山平原上，因此四面被陆地包围的玻利维亚，通常被认为是“南美洲的西藏”。从其四邻来看，北部和东部是巴西，东南是巴拉圭，南有阿根廷，西部和西南则与秘鲁、智利为邻。

在南美洲，它是第五个大国，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个州。按人口它居第八位，不到四百万人。它比哥伦比亚虽然仅小一万五千平方哩，人口却仅为哥伦比亚的五分之一。它的面积是厄瓜多尔的四倍，人口却比厄瓜多尔少一百万。它不仅是南美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每平方哩有八点七人），而且在国内三个不同地区，人口分布也不均匀。仅占全国总面积16%的高原(Altiplano)，却有75%的人口。永加斯（Yungas）占全国土地的14%，人口则为10%。下余的70%的土地

99

和15%的人口都在低地(Llanos)。

玻利维亚人口最稠密的安第斯高原也分为三部分：西科迪勒拉（Cordillera Occidental）、东科迪勒拉（Cordillera Oriental）和这两个山脉之间的高山平原，即高原（altiplano）。这两个科迪勒拉山是安第斯山的两个平行并列的支脉，从共和国的西北绵亘到它的东南。两个山脉之间的高原长达五百多哩，在玻利维亚境内宽达四百哩。这个高原的75%是在玻利维亚现在的边界之内，面积仅稍小于俄亥俄州。

西科迪勒拉是玻利维亚同智利的分界线，高达一万六千五百呎。它是从秘鲁的阿雷基帕北部开始的火山地带的伸延部分。沿着它的山脊，有无数冒烟的但是静止的火山。有几条小河从北边的火山地带流向高原。智利为了灌溉它的田地，曾计划修坝截挡其中一条名叫劳卡的河；这件事在1962年引起两国之间的外交摩擦，以致美洲国家组织(OAS)曾不得不为此进行仲裁。由于西科迪勒拉地区的干旱和地势高度，它的人口在高地区域是最少的。它的河流仅能灌溉几条能生长马铃薯和大麦的狭窄地带。由此往南，连这一类农作物

也不能生长，仅有放羊和放羊驼的人可以勉强过活。

玻利维亚高地区域的第二部分，即高原，是人口颇为稠密的地区。在的的喀喀湖四周，生活不象山里那样艰苦。高原是平阔的，足能在一万二千五百零七呎的高地上容纳三千平方哩的的的喀喀湖。由于湖水很深，湖岸四周的温度受水调节，平均稳定在华氏50°。湖水最深处为七百呎，水温终年保持在华氏55°。因此，不管是夜晚的低温或冬季的寒冷，都不能对农作物造成象在同样高度但距湖较远的地区那样的破坏。 100

玻利维亚最早的居民就住在的的喀喀湖的四周。在蒂亚瓦纳科早期的宗教和市场中心附近，很有可能，人们首先培植的是马铃薯。马铃薯和另外一种根茎植物——奥卡(oca)，现在仍然是玻利维亚人的主要食物。另外，在山坡的梯田上，在十二月到二月这个短暂的雨季里，也种植矮棵谷物大麦，和另外一种安第斯土生谷物基诺亚。印第安人偶尔也用羊驼肉干和鱼调节他们单调的饮食。这样的饭食热量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常在早饭和晚饭之间，咀嚼永加斯地区出产的古柯叶代替午餐，

以减缓饥饿的痛苦。满山遍野的伊楚草(ichu)，是一种粗劣的丛生野草，可以作羊驼饲料，也可以用来苫房。树胶草（tola）和亚雷塔（yareta）是多胶脂的灌木，可用作燃料。香蒲（totora）是一种生长在的的喀喀湖边的芦苇，能编织席子或作苫房的材料。它最大的用途是做轻便渔船，做法是首先捆结成束，然后扎连成船。印第安人把这种船叫做巴尔萨(balsa)。

印加皇室的后裔克丘亚人虽然曾从库斯科向外扩张征服艾马拉人，但这个地区现在仍然是艾马拉人居住着。印加人没有能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艾马拉人，然而，他们和后来的西班牙人却强迫艾马拉人去服劳役，最初在农田，继之修筑道路和公共建筑物，最后是在银矿。艾马拉人现在仍然以相当的密度居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那条人为划定的两国边界线穿过的地区。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NR)的土地改革法实施以前，大多数艾马拉人是世袭佃农(colonos)，或者向在外地的地主[101]缴纳钱粮，以便在部落公社的基础上取得土地的租佃权。几乎没有人采用西班牙人的办法，并且，由于他们是完全自给自足，很难说他们是哪一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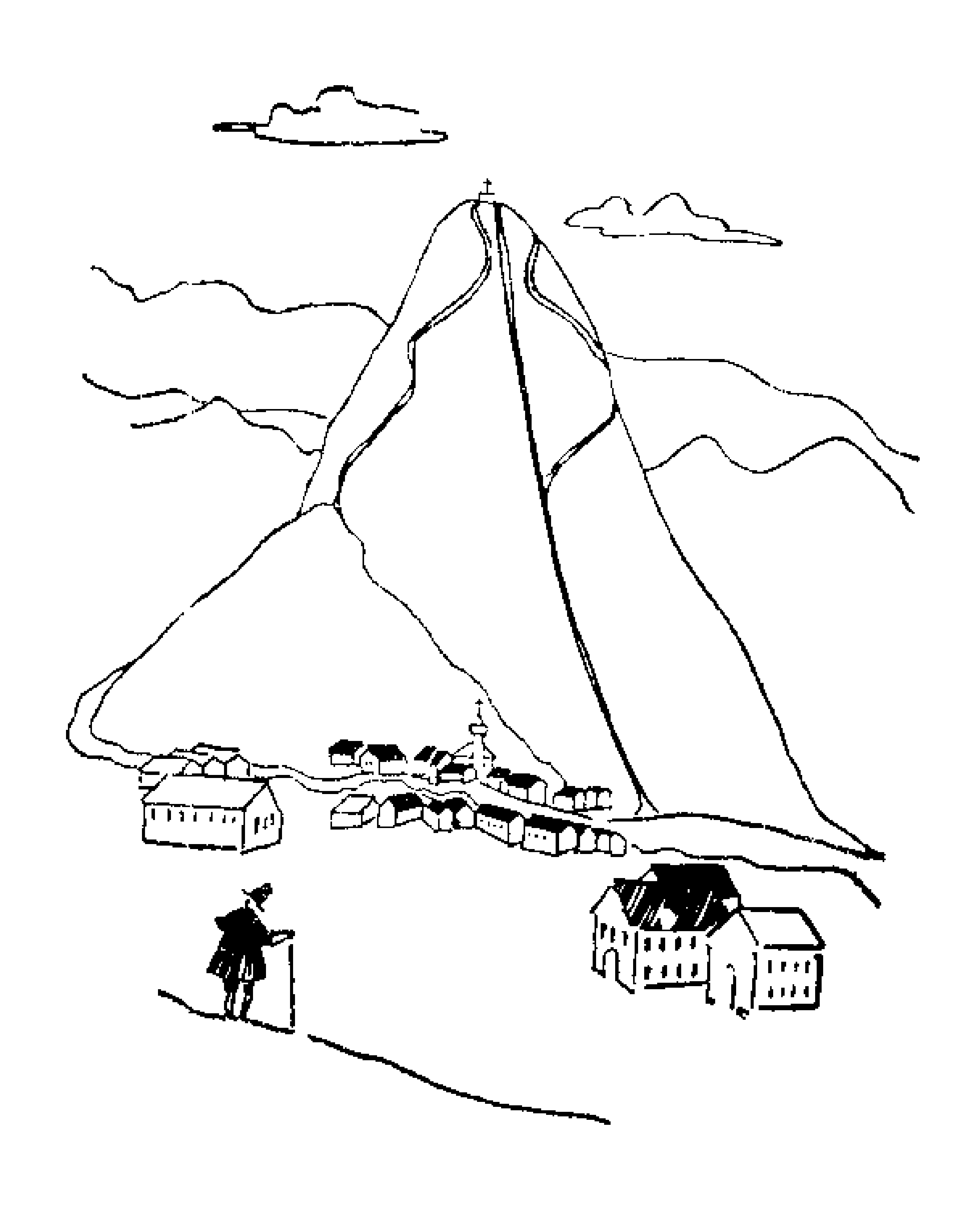
的公民。大多数的公社成员（comunarios）在生活中无需进行货币交换。他们同自己的村庄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一个外村男人娶的新娘必须迁到男方的村庄去，因为女方的家里决不能让她丈夫得到她家里的土地。

德萨瓜德罗河的弯曲低浅的河床排泄着的的喀喀湖的湖水。这个河床地区每平方哩能养活十至二十五个印第安人。虽然的的喀喀湖水只稍带咸味，但由德萨瓜德罗河供给水源的波波湖却盐分很大。波波湖水的盐分部分地是由流经盐沼地带的河水带来的。但是就象大多数浅水湖那样，过大的盐分主要是由于天空无云，湖面水分蒸发造成的。波波湖大约仅有十呎深，因此它对周围的生物生长和气候影响很小。每到汛期，湖水迅速上涨，它由拉卡哈维拉河横溢到附近的科伊帕萨盐沼。在这个盐沼稍南，面积较大的乌尤尼盐沼则经常是干的。虽然两者都含有固体盐层，但是都还没有以商业的规模进行开发。处在一万二千呎高度的科伊帕萨盐沼是高原上最低的地点。在这盐沼以南，高原被一排一万九千呎高的山峰把它同在智利和阿根廷境内相似的盆地隔断

了。

在德萨瓜德罗河稍微偏东的地方，有两个在殖民地时期以前建立起来的矿业居民区。最古老的一个是科罗科罗，它坐落在从拉巴斯到阿里卡的铁路和这条河的交叉点附近。科罗科罗出产无需熔炼的纯铜，曾为古印加文化和该地的早期居民供应过这种原料。直到今天，玻利维亚全国产铜量约有90%是这里出产的。高原的另一个重要矿业中心是奥鲁罗。这是一个凄凉的城市，坐落在比高原一般高度还超出约一千二百呎的一排山里。102 它建立于1601年，是重要的白银产地。但到十九世纪，银产量就下降了。由于这个地区太高太干，不能维持农业生产，矿工们找不到其他工作，人口骤然下降。锡矿的重建以及奥鲁罗的战略地位（它处于从拉巴斯分别通往科恰班巴和波托西的公路上），使它现在还保持着八万人口。

波托西位于奥鲁罗东南，两地相距一百六十哩，其间道路曲折，起伏不平。它比奥鲁罗早建半个多世纪。它的矿藏资源使玻利维亚得以闻名于世。1545年在塞罗里科发现银矿后不久，开始挖掘第一个矿井的时候，这个城市就正式修建了。它坐



波托西的富饶山岗

瓦伊纳·卡帕克听见上天命令他说："不要从这山上开采白银，那是注定给别人的。"

落在一万三千多呎高的地方，在世界上同样规模的城市中，它是最高的了。1621年，西班牙人修建了人工湖体系，有了这些湖水，才使银矿提炼有可能利用水力作为动力。十七世纪中叶，波托西的人口增加到十五万以上，成为当时美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两个世纪后，银矿逐渐枯竭，人口随之缩减，到今天仅有五万五千左右。

从开辟第一个矿区到银矿砂枯竭，总共开凿了拥有两千多个矿井的三百个矿区。矿砂生产每年价值五百万美元以上。1562年皇家造币厂（Casa de la Moneda）成立，按照今天的价值，其成本为一百万美元。这个厂不仅保证了献给国王的五分之一财宝能按时送交马德里，同时也化验了矿砂的成色，铸造出在这个总督辖区中最早流通的硬币。在西班牙人管理下，波托西矿生产了总值约为十亿美元的白银，但留存在玻利维亚的，则几乎没有。西班牙人对神奇的塞罗里科所盛产的铅、锡，甚至铁都毫无兴趣。因此，随着银矿完全枯竭，这座城市也就衰落了。虽然现在波托西作为产锡的中心还是个重要城市，但这种衰落的景象依然明显地存在。

早在青铜时期(纪元前1000年)，人们就从锡矿石里提炼锡，用它作铜的合金制造青铜。在全世界每年大约十二万吨的产量中，利亚利亚瓜、波托西和奥鲁罗三地的各矿业联合企业可提供大约二万五千吨。锡是玻利维亚的主要出口产品，最高能达到总出口额的80%。1966年，它的产值达到九千三百万美元，相当于玻利维亚当年外汇收入的75%。锑和铅在玻利维亚换取外汇的出口物资中，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能给国家分别赚得五百九十万和五百七十万美元。银、铜、钨、锌和少量的铋都已开采和出口。

波托西的白银是建立拉巴斯城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的的喀喀湖最南端的东南约五十哩的地方，高原骤然下沉，形成一个狭窄的深深的断层，被拉巴斯河所切断。正如前章所述，就在此地，西班牙人于1548年建立了名为拉巴斯圣母新镇的城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825年。那一年，为了纪念1824年为玻利维亚的自由而进行的决定性战役，把这个城市改名为阿亚库乔—拉巴斯。严格说来，拉巴斯是在高原的里面，而不是在它的上面。尽管它是坐落在一千四百呎的深渊里，其地势仍

然高出海面一万二千呎。离开高原三哩的地方，耸立着东科迪勒拉（或称皇家科迪勒拉）的峭壁。这座庄严崔巍的山墙上面还隆起三个雪顶的山峰：伊廉普峰（二万一千二百七十五呎），伊利马尼峰（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五呎），瓦伊纳波托西峰（二万零五百呎）。它们耸拔的高度形成了气象上的障碍。因此，它的东坡经常是霖雨湿润的，而面向太平洋的高原则遭受着长期的干旱。

105　由于暴雨冲刷东科迪勒拉山的东坡，河道溃蚀，因而形成了拉巴斯所在的这个奇特峡谷。拉巴斯河水流入贝尼河，最后泻入亚马孙河。它的源流只不过是在一条山脉的雪线上汇成的一股山水，那条山脉就在城北大约二十哩的地方。经过千万年，这条河冲开高原的松土，穿过一千五百呎的大沟（即拉巴斯的所在地），又在顺流而下不远的地方，穿过了一万一千五百呎高的峭壁。就在这狭窄的悬崖峭壁之间，河水垂泻而下，注入一个沫花四溅的河道，使人难以逾越。

作为国家的政治、商业、工业和铁路中心，没有比它更缺乏发展前途的地方了。但是西班牙人选中了它，这是因为它可以在波托西银矿和利马

港口之间提供一个中途落脚的地方。在这峡谷中可以躲避高原的冷风和冰雹。即使在今天，从这个首都出来的公路干线就是顺着断层深渊的边缘修筑的。从奥鲁罗和波托西去普诺和利马的旅客只要稍稍绕点路，走几个U字形的弯道盘旋而下，就能进到这个城里。为峭立的群山所局限，拉巴斯的发展受到阻碍。高原的严酷恶劣气候和稀薄的空气使非印第安人难于在这里生活下去。由于呼吸短促引起的头痛叫做高山病，但是印第安人有发育宽阔的胸肺，弥补了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尽管拉巴斯地势高，气候不好，但作为玻利维亚的实际首都，它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重要性。这种情况说明了在东科迪勒拉山那一边的山谷城镇和山这边的高原接触是不容易的。

在东科迪勒拉那边的城镇统称谷地（Valle），是高地区域的第三部分。在山的东坡下冲积而成的温暖山谷里，有三座大城市。它们在平均高度大约为九千呎的平坦盆地上，占据着宽敞的地面。其中最大的是科恰班巴，人口约有十万，建立于1570 106 年，是玻利维亚的第二大城市。该城海拔八千三百九十二呎，气候宜人，在最冷的七月份，平均温度

为华氏57°，而在拉巴斯同一个月份则为华氏43°。在其五百平方哩左右的平坦的土地上，可以生长多种农作物。格兰德河的小支流灌溉着这里的田地。这条河在盆地里也造就了不少良田。因为克丘亚人对土地的依赖不象艾马拉人那样，土地比较容易买到。直到共和国时期，农业经济主要还是以小块田地（minifundio）为基础，而不是大的农场（finca）。不管是有土地的农民还是农场的工人，都在孤立的小村庄（ranchería）里一起生活，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同化。这使得科恰班巴地区的居民对近年来政治上的农民运动很容易接受。

苏克雷坐落在一个较小的盆地里，离科恰班巴约一百五十哩，在它的东南面。这也是一个农民居住相当稠密的地方。早在初建时期，当它叫做查尔卡斯、丘基萨卡或拉普拉塔的时候，就是国家的法定首都。现在，它除了有伟大的历史传统之外，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

塔里哈在东科迪勒拉山东麓更低的地区，也是在一个肥沃的冲积盆地里。那里生长着茂盛的葡萄、苹果、橄榄、梨和桃。不过，从那里到高原很不方便。被高山之间的峡谷切割的崎岖起伏的地

形，给交通造成了困难。这个谷地的城镇都渴望政府对他们当地的工程计划予以支持，但是他们的议会代表却认识不到需要协同努力来帮助这个地区。普雷斯顿·詹姆斯概述了这种情况：

要为这些分散的城镇设置一个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要把东科迪勒拉山区的产品集中在一个地方，其数值足以支付修筑铁路或公路的巨大开支，是存在着实际困难的。即使有外界的经济援助，问题也不容易解决。

107

玻利维亚的第二个主要地区叫做永加斯。这是一个印第安字，指的是高原东北坡上的雨林区。永加斯就是从哥伦比亚顺东安第斯山脉一直不断地伸延到圣克鲁斯的这个雨林地区的南端部分。这片雨林地区在秘鲁和厄瓜多尔境内是湿润而林木茂密的，通常被称为"东方"（Oriente），到圣克鲁斯和阿根廷境内森林就比较稀疏了。永加斯地区约占玻利维亚总面积的14%。许多小山谷和由陡斜的山坡溃蚀形成的深的隘道，是这个地区的

特色。从拉巴斯到永加斯的公路要爬上一万五千多呎高的山口，然后在五十哩的距离内又下降一万四千呎到贝尼低地。充沛的雨量和悬崖般的地势提供了很大的水力势位差，发电足够供应全玻利维亚。但是现在它只用于供应拉巴斯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陡峭的坡地上建成一条铁路，或修筑一条令人满意的公路系统，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如此，永加斯的充足雨水和温和气候还是使它成了一个富饶的农业区。它离拉巴斯不远，因此是拉巴斯蔬菜、水果和鲜花的主要供应地。它的牛肉制品是由一些勇敢的飞行员、掠过东科迪勒拉山的隘口空运到拉巴斯的。咖啡、古柯和糖也在这里由几个大地主经营种植，虽然运输和销售费用都很大，但主要由于有印第安人的廉价劳动力，仍然有利可图。制造奎宁的金鸡纳树皮和橡胶曾一度开发过，也很赚钱，但还是由于内部运输问题，加上“东方”地区一些更有实力的种植园的竞争，永加斯作为这些物资的世界供应者，几乎被淘汰了。古柯，这种提炼古柯碱的原料，同时也是高原上印第安人消耗量最大的农作物，现在仍然是永加斯经济的主要支柱。

玻利维亚下余的70%的土地是大片的低地平 108
原，叫做低地。这大片原野从海拔二百呎逐渐升高到海拔两千呎，并同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接界。它的大部分是在属于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共有的格兰查科草原上。这个地区的一个人口密集的中心是圣克鲁斯，该城坐落在被称为普纳的这个急斜坡东边二十哩的地方。到那里地势坡度已较平缓，又有很好的灌溉条件，气候温和，它很可以成为玻利维亚的农业中心。然而直到今天，它仍然处于隔离状态，因此它的大米、糖、玉米和牛，卖给阿根廷和巴西的比卖给高原的还要多。

在圣克鲁斯南部发现了三座油田，油田的发现赋予了这个地区新的生命。卡兰达油田的产量约为玻利维亚石油总产量的75%。现在已安装了十二吋的油管，从圣克鲁斯一直通到高原上的锡卡西卡，全长四百五十哩。从锡卡西卡，油被灌入口径较小的油管输送到阿里卡港。这条油管长二百一十哩，属于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YPFB)所有。

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每天产量约为三万五千桶。油管系统建设中的困



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

难，代表了玻利维亚一切陆路运输工程的困难。在低地，茂密的丛林、雨水和弯弯曲曲水浅流缓的河流，使拖拉机和推土机无法工作。油管从起点刚过三十哩就开始上坡，在每二哩的距离内就要爬高半哩，这样最后到达一万四千八百三十四呎的高度。硬石地、崎岖的地形、稀薄的空气，使修建工作同在洪水泛滥的低地泥泞里操作同样困难。技术问题也得解决。在设计油泵引擎和空气压缩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高原空气稀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科迪勒拉山边到阿里卡四十五哩长的管道中，地势下降一万二千呎，每天的输油量为二万五千桶，对油管这样大的垂压不能不设法补救。据玻利维亚海湾石油公司的工程师计算，"从这些山往下到阿里卡港口终点，地势陡然下降形成每平方吋四千九百磅的位差静态压力。"因为八吋管能容许的工作压力每平方吋仅为一千七百五十三磅，所以必须装备一些减压站以免油管破裂。 110

修建公路遇到的困难也是一样。由于山被深沟宽壑切断，从高原到永加斯地区和圣克鲁斯地区的交通，或是需要修建漫长的U字形弯路，或是需要修筑造价太高难以兴修的桥梁。一旦遇到弯

曲的河流、沼泽或砂地，还得深挖地基。在这两个地区，暴雨往往冲毁道路。这样，交通就一连几天中断。然而，1963年在圣克鲁斯和科恰班巴之间，经过起伏的山脊和峡谷，还是修成了一条汽车公路。还有一条公路，从圣克鲁斯往北再往西经过瓦尔内斯、蒙特罗和布埃纳比斯塔，已经修到了亚帕卡尼河，将来要与科恰班巴直接连接起来。玻利维亚政府的公路发展计划，主要强调改进拉巴斯、奥鲁罗、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四大城市同矿区、工业区和农业区的联系干线。为了促进移民工作，正在优先修建深入内地的和从农场到市场的道路。

自从发现波托西矿藏之后，发展一条令人满意的交通系统已是众所关心的事。当西班牙人征服上秘鲁的时候，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羊驼(llama)主要作驮载牲畜使用。本地人对马一无所知，而羊驼可以驯养，因此这种牲畜作为运输工具，价值是巨大的。羊驼这种有蹄动物，是野原驼(guanaco)经过驯养后的两个亚种之一。另外一个亚种是小羊驼（alpaca）。原驼经过选种配育已成为家畜，小羊驼就是从这个品种里发展出来的。作为驮

111 畜，小羊驼的躯体太小，因此饲养小羊驼只是为了

剪毛。稀见的骆马(vicuña)捕捉后不能繁育，但是它的毛非常珍贵，现在已经猎捕得几乎绝了种。

雄羊驼站着时，从脚至颈高约四呎，毛色有白、棕、黑三种，或者是这三色的杂配色。西班牙人就象使用印第安人那样使用羊驼。不久，便出现了一长串一长串的羊驼队，驮载着矿砂或金银锭，由几个当地赶驼人引领着来往在山区矿地和太平洋口岸之间。一只羊驼平均能驮七十五磅，驮到一百二十磅的就很少见了。就是驮运这样的重量，它每天也只能走出十二哩左右。如果超重，除了踢跳之外，雄羊驼还用相当的力量喷吐它不断咀嚼的反刍食物，其中夹杂着大量的酸性唾液。由于它吃带刺的伊楚草和尖矛般的奇利瓦草(Chilliwa)就能过活，同时它能稳妥可靠地踏着松散的碎石山路翻山越岭，因此，直到十九世纪末修建铁路以前，它的使用价值是不可计量的。较为强健的雄羊驼，一般是用于运货。躯体较小的雌羊驼则用于取奶和作肉食。羊驼毛不如小羊驼毛质量好，但仍可供纺织。它的皮可以制革，干粪可作燃料，奶则是高原居民食物的主要补充品。

从殖民初期以来，人们沿用着四条主要的运

输道路。其中有三条分别连接矿山同太平洋岸的莫廉多港(马塔腊尼)、阿里卡港和安托法加斯塔港。第四条是连接玻利维亚同阿根廷的。这些都是羊驼踏成的小道，现在都铺上了铁轨。整个铁路系统约有一千五百哩，都是国际轨幅的单轨线。铁路线总共有九条，其中七条都铺设在高原上或从高原往外铺设。另外两条起点都是圣克鲁斯；一条连接塔里哈省南部的亚奎巴和阿根廷铁路的东部终点，另一条则东去直达巴拉圭河上的巴西河港科仑巴。

112

穿过安第斯山的第一条铁路是从莫廉多到的的喀喀湖东端[①] 的秘鲁港普诺，它修建于1874年。其后不久，有五艘汽艇拆卸成零件越过山区运到了的的喀喀湖，然后再装配起来。这五艘汽艇连接了普诺和玻利维亚的瓜基港。到了1902年，这条线路已使拉巴斯和太平洋之间有了相当迅速的交通运输。因此，为时不久，通过骡子和羊驼走的老路往阿里卡附近的塔克纳运送的货物就减缩到微不足道的数量了。

第二条铁路是1889年修建的，它联通了智利

① 此处应该是的的喀喀湖西端，原文有误。——译者

的安托法加斯塔和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尽管五年前玻利维亚就把那个海港割让给了智利，并没有影响铁路的修建。这条铁路在一万三千呎高的地方越过西科迪勒拉山。人们担心智利可能利用这条铁路入侵玻利维亚，但还是在1892年把它伸延到了奥鲁罗，1910年又伸延到了拉巴斯。现在玻利维亚南部的矿砂，大部分都是通过这条铁路运到太平洋口岸的。

第三条铁路修在阿里卡和拉巴斯之间。它比其他铁路都短，不过它在一万四千呎高度的地方翻过安第斯山需要利用齿轨爬越那个陡坡。现在阿里卡是玻利维亚可以使用的国际自由港，那里设有玻利维亚的海关。它重新成为一个主要港口，恢复了早先人们从拉巴斯和奥鲁罗利用骡队运输时的重要性。

连接乌尤尼和阿根廷的胡胡伊的铁路，由于地形造成的困难和通过它运输的货物稀少，在经济上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以圣克鲁斯为起点通往科仑巴和亚奎巴的两条铁路是分别由巴西和阿根廷投资修建的。它们都以此换得了开发和分配石油的特许权。1967年，玻利维亚还清了阿根廷

为修建这条铁路所给的长期贷款，从而取得了这条铁路的所有权。同时阿根廷又给玻利维亚七百万美元的新贷款，还保证对延长这条铁路给予技术援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以前基本上无人知晓的地带修建了铁路，从而鼓励了移民，并且发展了那里的经济，所以圣克鲁斯感到它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吸引力。

113

如果能设计出一个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就可以指望在许多方面增加生产。玻利维亚同其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它的交通事业是由牛车直接发展到飞机的。然而，它的航空站和起落场，除了在三个最大城市的以外，质量都不够好。国家航空公司（玻利维亚罗意德航空公司）正在努力改进经营管理，以便帮助把这个零散的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要把乡村的微薄的产品运到城镇市场去，卡车跑的几乎是不能辨识的道路。甚至泛美公路，也只有几哩长的砾石路面。它是把从德萨瓜德罗到塔里哈、再到贝尔梅霍和阿根廷的那条历史上的小道改修而成的。玻利维亚城镇之间的公路不到二千五百哩，其中只有大约六百哩是沥青路

或砾石路。但是通过卡车运到城里去的土特产品正日益增多。印第安人挤得紧紧地站在卡车里，呆呆地、耐心地等待着在大城市的新世界里考验他们自己。随着这些道路的改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满足农民自己生活需要的那种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将会发展成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

联合国的调查断定，玻利维亚用它尚未利用的广阔的可耕地，能够养活它的四百万人口，而且还有大量的剩余可供出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玻利维亚实际上垦殖了的土地只占0.5%，21%是牧畜草原，37%是山地或不毛荒地，41%是森林地带。虽然有四分之三的劳动人民从事农业，但农业生产仅占国民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现象，有三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当这个国家把出口矿业产品作为它的国外收入来源时，较为强壮的劳动力都到了矿山。运输矿石到太平洋口岸的火车，不得不装运回头货物，于是大量的小麦、大米、糖、油和奶制品便源源进口，这样一来，对当地产品的需要就减少了。此外，铁路从来没有铺修支线到较小的村庄去，因此那里的农产品无法运往城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产品就只好供自己消 114

费了。第三种原因，就是在1952年革命前一直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虽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制度的流弊，但是，在把土产品运送到市场去或改进生产技术方面，没能做多少工作。它的价格控制政策，对刺激农民改进技术，或施用新的肥料改良土壤，改善灌溉方法和机器，都起了相反的作用。

《美国陆军玻利维亚地区手册》指出，在六十年代提出和执行的补救办法有以下几点：

> 改变价格控制政策，实行自由化；改变关税制度；改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改进和发展运输系统；利用技术援助；发展圣克鲁斯地区，从人口稠密的高原和山谷地带向人口稀少的低地移民。

这部手册随后说明，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是不平衡的。

> 关税更具有保护性，但是就象以前的制度那样，现在的关税制度对大规模的走

私活动起了鼓励作用，而对供应市场的农产品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刺激。职业教育有些进展，但是在更多地培养人材方面缺乏适当的鼓励，以致未能达到革命后十年间的预期效果。

外国的技术援助在一些农业地区取得了显著成绩。另外一些地区，正在根据已有的经验，设法使这种援助更有效地适用于当地情况。 115

现在政府关于农村的发展目标是：提高农田收入；用增加农产品的出口和减缩进口的办法，来改善玻利维亚的外汇处境；促进城镇自力更生的进取精神，特别是通过合作社、信贷联社和共同使用农业机械等办法。

人们并不期待玉米或小麦的生产能够立即满足国家的需要，而是指望更广泛地种植高原的基诺亚，以作为含热量较高的面食品之一。如果不在灌溉、化肥等方面进行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高原的农业增产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如运输补给系统能得到发展，那么，谷地、永加斯和低地就能够供

应大量的牲畜、咖啡、可可、棉花、橡胶、糖和木材(如杉木和硬红木)。

玻利维亚有五千五百八十哩能通航的河流，大部分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它们先汇集到马代腊河，然后流入亚马孙河。但巴拉圭河和皮科马约河则泻入拉普拉塔河，如果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四国联合利用资源，这几条河可能发展成为令人满意的成本低廉的出口航道。在贝尼地区，内河航路有可能起较大作用，但是由于河流水位忽高忽低极不稳定，只有印第安人的巴尔萨才能畅通无阻地顺流而下。政府正在研究一项计划，一旦公路修成，就去开通马莫雷河系统，使马莫雷河的上游和下游都能通航。

虽然有水力发电和最近发现的石油作为能源，但缺乏廉价燃料还是妨碍了这个国家制造工业的发展。现有的工业都在拉巴斯和科恰班巴地区，而且都局限于轻工业，如纺织、酿造、面粉厂和类似的企业。印第安人的农村工业则向城市提供116鲜艳多彩的斗篷、朴素的陶器和惹人注目的银器。为了增加乡村的收入，对工艺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都通过技术援助给以鼓励。同样，为了发展重工

业和开发其他矿产(如锌和钨)，政府重订了私人投资法，以进一步鼓励国外的投资。作为发展工业的辅助措施，政府在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协助下，正在制定计划以改善拉巴斯、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等地的发电和电力输送网。政府投资修建适合中等收入家庭的简易住宅。在国际机构的协助下，政府对各种储蓄机构给予种子贷款；这些储蓄机构再转向私人企业贷款以兴建新的工业和新的工程项目。如果现在着手进行的各种合作计划能够顺利地实现，玻利维亚就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对工业制品的需要，同时对日益增多的流入城市的农民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 五 章

从被征服到独立

禁止一切烦扰人的行径，要和善地、慈爱地对待他们（印第安人），同他们保持密切来往，给他们一切你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皇帝陛下谕令作为礼物装上这个舰队的各种物品，都要分送给他们。最后，要以惩戒的方式严办所有对当地居民稍有骚扰的人。

——伊莎贝拉女王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前对他的训谕

大片的土地，象一笔意外的横财，幸运地落到葡萄牙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手里。这是献给他们的巨量财富，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十足的麻烦。在理论上，西班牙人对他们统治的殖民地可能要发生的任何事，都准备好了对策。但实际上，他们新近获得的土地是那样遥远，而交通又是那样缓慢，

这就使得他们难以控制，直到最后简直无法控制。

根据1493年教皇关于划界的训谕，只有国王们本人才拥有对这些新发现的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他们有权把任何土地按照自己愿意赐赏给手下的征服者。以后，他们把控制权扩大到所有来到殖民地的侨民身上。只要有黄金作为诱饵，小商船队就会远涉重洋频繁来往，而向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富饶地区移民的工作，也就随之迅速地进行着。为了占有这两个黄金中心之间的空白地带，伊比利亚半岛的国王们在十六世纪初期对老百姓提出了鼓励移民的措施：凡是迁往新世界定居的善良教徒，免收船费，不缴赋税，对购买耕畜和农具给予经济援助。此外，还有别的鼓励办法。 118

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西印度群岛早期的政治设施比现在人们一般所了解的要更加明智，也更有成效。就象处理移民事务那样，卡斯提的国王们，对每个问题的思考，要比当时大多数其他君王更细心、更慎重。此外，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保住他们新征服的土地，这是西班牙国王在重新征服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六百年当中，不断地从比利牛斯山脉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学来的。在新世界

里设置的所有政治机构，几乎在卡斯提都有相似的机关为其基础。西班牙最后失去了对新世界的控制，这不应该责怪他们的政治控制无能，而应归咎于重商主义那种自私的无远见的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曾兴旺一时，当时需要大量的税收来支付宗教战争和商业战争的费用。为了这个目的，贵重金属是经常需要的。由于欧洲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对外贸易，因此对外贸易要比国内商业受到更多重视，就象制造工业被认为比农业更为重要一样。除了金银锭以外，各种原料也非常需要。政府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对这些东西都征收进口税。此外，欧洲各国还通过各个贸易公司控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在西班牙，则是通过它的印度事务部进行控制。

119 王室最高印度事务部在1493年创始于塞维利亚。这是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出发前不久的事。但是，直到1511年，斐迪南国王才把它组织成为统治殖民地的最高机构。之后，国王卡洛斯五世又把它加以改进，因此到了1524年，这个机构对西班牙所属美洲的每个省份就都有了司法权。它制订法律，

选定新的统治人物。经过一段时期后，在行政职权之外它又增加了司法和立法性质的权力，成为处理印第安人案件的最高法院，也是解决殖民者之间或殖民者与国家之间的许多法律争端的最高法庭。到1680年，它把有关管理殖民地的一些规章制度编写成了《西印度法》。现在历史学家们认为：这部法典灵敏地反映了殖民者们的需要，同时，总的来说，对于印第安人是人道的，虽然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有些偏重于惩罚。

不过，印度事务部的主要任务，还是把殖民地作为一项商业投资来管理。为此，在1503年建立了"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ón)"，以监督新世界的商业和经济生活。它的首要意图是要垄断塞维利亚[①] 和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其具体办法，不仅是密切监督所有船只的往来，同时也改善航海技术。它为领航员们开办了一所学校，为长途航行进一步搞出了发明，并为船长们绘制了更精密的地图，以便到达美洲海岸后使用。

---

① 塞维利亚在西班牙南部，是西班牙的古都和工商业、文化中心。——译者

国王赐给远征队的首领们以极大的权力。在早期的殖民者当中经常发生滥用和篡夺这些权力的事。例如在秘鲁，这类事就曾导致皮萨罗兄弟同阿尔马格罗小集团发生内战。为了防范这样毁灭性的互相残杀再度发生，印度事务部便把已经占领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区域，并任命西班牙的贵族去管理。在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总督（viceroy）。他们管理得怎么样，取决于他们本人的才智，也要看国王的臣民们对印度事务部强加给他们的各种法律抱什么态度。

120

总督府在西班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在地中海拥有领地的阿拉贡，更为人们所熟悉。因为总督们时常擅自揽取非分的权力，印度事务部于是在西班牙王国境内遍设王室法庭（audiencia）去限制他们。这些法庭一般地都下设两院，一院经管刑事案件，另一院受理民事诉讼。每个法庭管辖一个区域。第一个法庭于1511年在圣多明各建立。虽然总督不能参加审判，但每个辖区中最重要的案件要由他主持监管。总督们开始只是利用王室法庭制订法律并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日久，这些法庭便成了每一个总督辖区里的基本管理机构。

总督府的建立带来了大的气派和威望，同时也埋下了毁灭它自己的种子。早期的总督是从王室近血缘的西班牙人当中极为慎重地选拔出来的，同时他们也是国王本人和印度事务部所了解的。他们通过明智地行使他们所代表的权力，想方设法监督皇家对殖民地的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控制情况。作为法庭的一个主管长官，一个好的总督还可以影响立法程序和法律的执行。无限的权力和高薪厚禄起着瓦解分裂的作用。由于野心和贪婪代替了司法上的公正和政治上的机智，以至后期的一些总督有的被他们的臣民们驱逐出境，更糟的，甚至被暗杀了。

秘鲁的情况就是如此。那里总督的薪俸在各殖民地是最高的。我们已经知道，布拉斯科·努涅斯·德·贝拉如何在公开的交战中被贡萨洛·皮萨罗杀死。国王任命佩德罗·德·拉加斯卡代替了他。这是个狡猾的牧师。他用巧妙的手段和富于权谋的政治策略把支持皮萨罗的人争取到他这边来，最后在战场上制胜了对方。处决皮萨罗之后，拉加斯卡返回西班牙。查理五世任命安东尼奥· 121 德·门多萨为秘鲁的第二任总督。在他受任新职

时，他是新西班牙的总督，管辖着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州往南至巴拿马的整个地区。但是他在利马只住了两年(1551—1552年）便与世长辞了。第三任总督安德烈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任职五年后于1561年死在利马。第四任总督迭戈·洛佩斯—苏尼加被背叛他的人暗杀了。

在门多萨做第二任总督的短促任期内，印度事务部认为有必要成立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印度事务部制订的制衡制度规定，法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召开检审会议（residencia）。这样的会议是对一个总督任职期间的工作做彻底检查的审问会，由王室法庭主持。凡是对在职的总督本人或他的行为有意见的人，都可在会上提出控诉。检审会议还限制总督们的动议权，因为背离了事务部的法律条文就会给王室法庭招致麻烦。即使是那位精明强干的卡斯提贵族、令人尊敬的门多萨，也曾被国王的臣佐们暗中调查过（特别是关于他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他也不得不忍受检审会议对他的羞辱。对于不如他那样诚实的许多官员，更是如此。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行贿，就能逃脱由于不诚实和不效忠所应受的检审。贪污腐化盛行一时，最后

导致了这个体系的瓦解。的确，他们统治的土地非常辽阔，马德里与各殖民地首府之间距离十分遥远，考虑到这些情况，西班牙从1511年到1811年这三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应轻视的。

西班牙国王们坚持主张，在其领地中的陆、海、空权和矿产的开发权完全属于他们自己，这便助长了在殖民地生产中的偏废现象。当然，他们也确实认识到，在进贡的物资中，农产品和矿产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异，因此他们鼓励殖民者建设农田。事务部往往公开出售土地，但是更为经常 122 的是皇家在分红的基础上赏赐土地。在殖民者使用土地四年以后，便授给他完全所有权。擅自占据公地的人也是经常有的。然而，许多西班牙人感到饲养牲畜比经营农业要容易些。此外，本地市场太小，不能提供巨大财富，而由于海洋运输缓慢，又不能向国外出口，因此，从事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更重要的是国王们实际上更热衷于开发美洲的地下资源。

西班牙人在到达之后，从事的第一项艰苦工作就是开发矿山。甚至在他们还没有把库斯科和蒙蒂祖玛王宫墙壁上的金片剥落干净，士兵们便

已开始攀山越岭寻找金银矿脉。事务部采用多种办法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黄金和白银埋藏在地下对西班牙是毫无价值的。

矿主们应当向国王交纳他们总收益的五分之一，但是事务部实际做起来常常是缩减为十分之一，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和发展的初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数字还再加缩减。事务部在最初的几年，还开始对矿主们实行变相的授田制，以便他们能够驱使所有的印第安村庄的居民到矿上工作。他们让当地居民分组服米达徭役。但是当这种徭役制在矿山实行时，它便成了印第安人的严酷灾难，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同时对这种徭役制本身也造成了麻烦的后果。

事务部为保护印第安人制订了法律，规定要向印第安人传授基督教义，并给他们以人道的待遇。如果不是有教会的话，虐待土著居民的行径就会更加严重。印第安人的使徒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教会里第一个觉察到这种虐待的人。他经常致力于改善土著居民的工作条件。在皮肤上烙火印是一种较轻的凌辱。拉斯·卡萨斯认为最不能容忍的是，通过实行大授田制和劳役分

配制的办法，实质上把许多部落置于被征服的地位。他最初提议用进口黑人来代替印第安人——123 这是他后来也很懊悔的一个动议，因为黑人们在高原的严寒里死亡得更快。以后他又敦促通过1542年的新法，而新法促成了在秘鲁的西班牙人反对巴卡·德·卡斯特罗和他们的第一任总督努涅斯的那些早期叛乱。殖民者们都说，剥夺了他们使用印第安人的权利，就等于杀死他们的驮载牲畜。

进行宗教信仰上的征服，是以伊莎贝拉女王强烈的传教动机为基础的。在哥伦布第二次远征时，女王在训谕中，勉励他尽一切努力使她的新百姓转变信仰，接受洗礼，“让他们皈依神圣天主教”。她还派遣了十二名传教士随同哥伦布出航，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拉斯·卡萨斯，“为的是拯救可怜的异教土著居民的灵魂。”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这两个天主教徒，从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第二个博尔查）① 那里取得了极为可观的特权。1501年，这位教皇已把征收什

①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原系西班牙红衣主教，名叫罗德里戈·博尔查。——译者

一税的权利让给西班牙王室，其收入要“用于支持这种宗教信仰并在土著居民中传播这种信仰。”他的继承人教皇胡利安二世授权他们可以任命所有圣职人员，并监督这些人员的活动，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将罗马教皇的训谕传达到新世界去。在此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象当时在西印度群岛那样，有过这么多高于教会的世俗权力。然而这些西班牙的君主们，也是以坚定而不妥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责任的。他们把宗教制度介绍到各殖民地，协助修建男女修道院，在各个市镇和村庄、特别是在人口最集中的矿区附近修盖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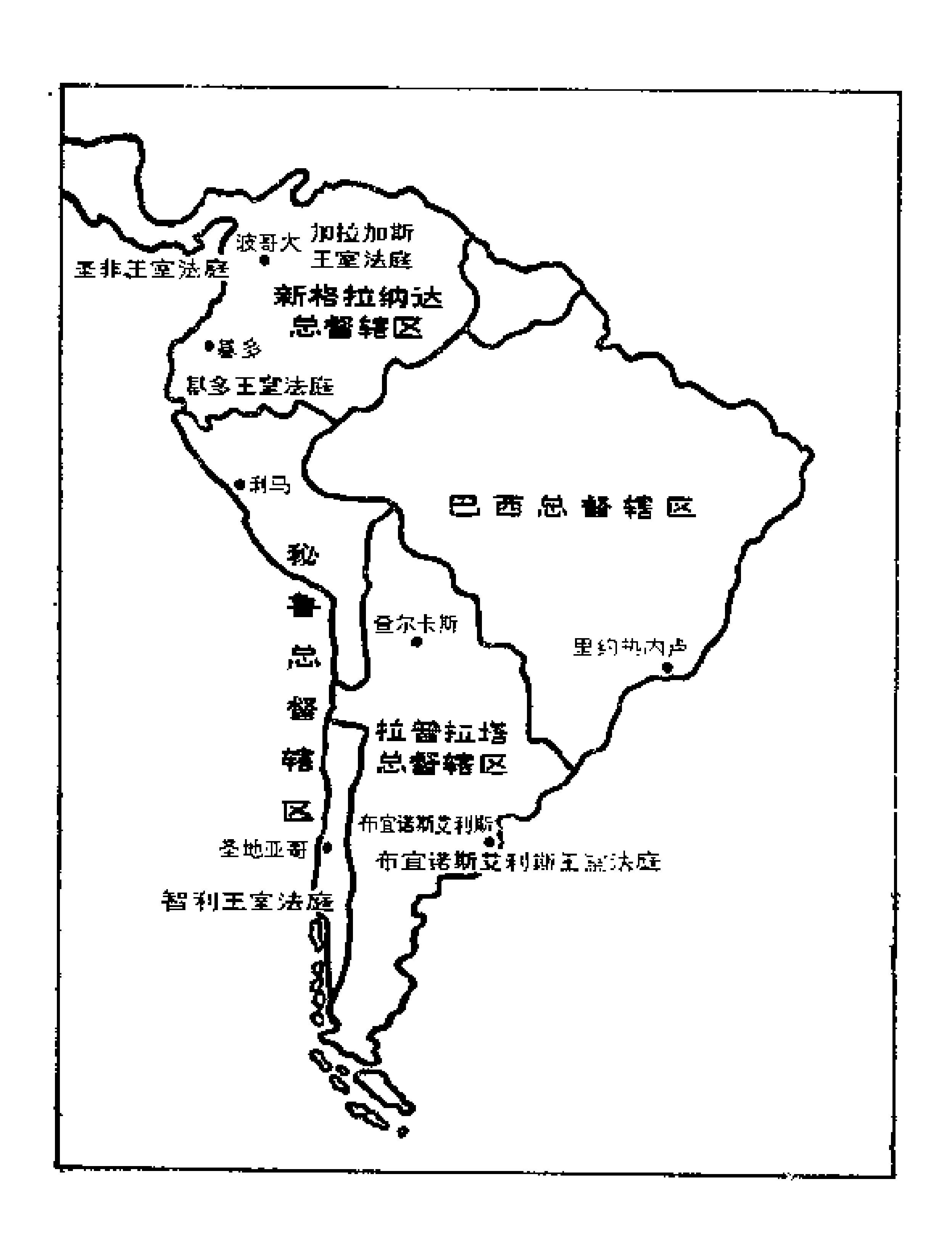
教皇亚历山大和胡利安情愿让出这样的特权，可能是他们自己处于困难时期的一种反映，也可能是他们对西班牙的辽阔版图的意义不够了解。这两位教皇当时最关心的大事，一个是新教改革最初的宣言，另一个是意大利的教皇政府需要归属于教会。他俩看到西班牙国王们的虔诚，感到有了保证，便把改变美洲土著居民信仰的责任交给了他们。

但是，使当地居民基督教化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消极抵制，对圣三位一体和自我牺牲的

上帝这一类牵强附会的概念不能理解，语言的不同，以及流传很广的各种异教信仰，这一切都是西班牙传教士们所遇到的困难。此外，西班牙人不能肯定当地的印第安人究竟属于什么人种。利瓦伊一斯特劳斯写道：一个又一个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研究过他们的特征，以便确定，他们是被放逐的以色列十支族的后裔，还是骑着象来到这里的蒙古人的后裔；他们是异教徒，还是在几世纪以前受过洗礼后来脱离了教会的天主教叛教者。

传教士遍及各地。他们在工作中最基本的错误之一是，除了圣克鲁斯地区以外，他们没能让印第安人学会西班牙语。相反地，他们自己却学习了艾马拉语、克丘亚语和低地的许多种方言。对于后代人了解欣赏那个时代的民俗和历史来说，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样一来，便使玻利维亚注定成为一个多语言的国家了。

他们传教的结果，是成败兼备的。他们想劝诱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但是当他们煞费苦心地说来说去，比比划划，企图解释圣经上的神秘的时候，有些印第安人一定会认为他们是神经错乱了。传教士把文化介绍到本大陆最偏僻的角落，他们在



南美洲的总督辖区及王室法庭

这方面所做的，比宣传宗教更为成功。他们传授的东西至多不过是一点皮毛。异教徒们如果不是真正居住在归化区(reducciones)，他们就又恢复了对家庭供神的偶像崇拜。归化区也就是传教区，在那里，异教徒们被引导去信奉据说是他们祖先所信过的宗教。当然，这项任务是庞大而艰巨的。许多传教士采取简便省心的办法来应付，是不足为 126 怪的。他们一开始便着眼于争取大量的人转变信仰，而不是设法使土著居民理解基督教义。在实践中，许多人故意说，在他们自己的信仰和野蛮人的迷信观念之间有类似之处。这两种信念迄今仍混淆不清的原因就在于此。另外，时间一久，新派到殖民地来的传教士的水平也降低了。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天主教也进行了许多涉及到教士的改革。但是，特兰托会议在1563年制定的新规章制度大多数都被西班牙国王们忽视了。路途的遥远，也阻碍了把特兰托会议关于现代化改革的决议传播到殖民地来。例如，1569年，总督托莱多写给国王腓力二世的信中说，"各级牧师、修士、主教和教长是处理所有事务(包括神的和世俗的)的绝对权威。这种情况使陛下破费巨大，因为他们来到

这里时，声称为改变印第安人的信仰，花钱和坐船都由陛下承担，然而离开时却大发横财，仍然牺牲陛下和印第安人的利益。”

西班牙国王们坚决主张只让正统派的教民移居到新的属地去。外籍人、犹太人、摩尔人和其他“不合需要的分子”是不准渡海到美洲去的。这不仅减少了移民，同时，不幸的是，也使正教变得顽固和偏狭了。最后，对外籍人的限制放松了，许多改教的和由于害怕宗教法庭审讯从西班牙逃出的“新基督教徒”，也一定是到上秘鲁[1] 找出路去了，因为塞法迪特这样的姓今天在玻利维亚仍然屡见不鲜。

根据利瓦伊—斯特劳斯的记载，斐迪南国王在1512年批准输送白人妇女到西印度群岛作奴隶，“目的是阻止西班牙人娶那些‘远非理性人类’的土著妇女。”然而，种族的混杂，特别是不经过结婚方式的混杂是普遍的。之后，由于卡洛斯五世谕令不得限制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通婚，更加速了种族的混杂，这是他对一个道德问题的解决办法，

127

① 就是指现在的玻利维亚。——译者

其中倒是没有种族的偏见。由于西班牙妇女人数不多，因此大量的通过这样结合而生养的梅斯蒂索儿童，就用上了西班牙的姓氏。

在殖民地时期，社会上产生了五个截然不同的阶层。殖民地贵族都是原征服者的后裔，或称二等人，他们都是次子或幼子，不能继承官衔或财产，因此获得了这样的名称。比他们高一些的社会阶层是西班牙贵族，或称半岛人(peninsulare)。他们占据了最高的统治地位，如总督或督军。第三阶层是由上等的克里奥尔人（criollo）所组成，他们是在殖民地出生的纯血统的西班牙人后裔。第四阶层由梅斯蒂索人（mestizo）组成，在玻利维亚叫做乔洛人（cholo）。他们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结合的成果，多半是非婚生子女。这些人构成都市人口的最大部分。第五社会阶层就是印第安人，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

乔洛人在殖民地社会中的地位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压力。索洛萨诺·佩雷拉在他的《印第安人的政治》一书中写道，“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是经过通奸或其他非婚姻结合和非法的交配而生的，又因为很少有高尚体面的西班牙人愿同印第安人结

婚”，所以这些人是生活在法律和社会之外的。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满意的教育。他们的父亲常常遗弃了家庭。他们长大成人后缺乏道德，没有伦理标准。日久“乔洛”这个词便有了粗野和狡猾这样的轻蔑含义。很少有梅斯蒂索人得到受信任的职位。就是从这一类人中，出现了职业乞丐，拙劣的力工，穷庄稼汉和小商贩。克里奥尔人在政府中则占有一些次要的职位。其实，他们在经济地位128上比梅斯蒂索人并不强多少。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印第安人，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仆从地位或者完全是奴隶的地位，虽然西班牙国王最初也曾试图改善他们的处境。

在征服查尔卡斯的战争结束时，玻利维亚的大片土地仍未得到开发，野蛮民族仍然存在。只是在最近时期，他们才有了文明。所以，征服的时期，正确地说，应延续到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成立以后。实际上，八年以后，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才在那一百里格的地区里开始行使职权。这个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后来从马德里发来越来越多的皇家敕书（cedula），它的司法管辖区大大向外伸展，以致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边界在哪里。这就不可

避免地造成了玻利维亚同邻邦之间多年来的边界争执。

为巩固对玻利维亚的征服，建立了一些人口集中、彼此可以支援的据点。查尔卡斯是在丘基萨卡那块被征服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拉巴斯曾一度是丘基阿布印第安人的家乡。波托西是为了拉巴斯和丘基萨卡而建立的，它几乎不能称之为一个城市，而只是为冒险家和矿工偶然设置的一个宿营地。

只有山区的圣克鲁斯不是按照高原地带的规律诞生的[①]。在印加帝国时期，查内斯印第安人就已经统治了低地。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外交手段抵制印加人入侵，在必要的地方则使用武力。正象高原的统治者都被称为“印加”那样，查内斯的统治者被称为“格里多塔”(Gritotá)。当西班牙人在1548年第一次来到查科时，瓜拉尼印第安人对这个地区行使着宗主权，但是当时这个地区仍叫做格里多塔平原。

① 圣克鲁斯是低地的城市。从本段开始至第171页讲述的都是该城的建立过程。——译者

西班牙人从圣玛丽亚—德耳—布恩艾雷（这是佩德罗·德·门多萨在1536年建立的）往北推进。他们的目的同以前皮萨罗横越安第斯山一样，是为了寻找白银和黄金。他们希望能在巴拉圭河129和巴拉那河汇流后的地区发现丰富宝藏，因此把这条汇流的河命名为白银河（拉普拉塔河）。1537年胡安·德·阿约拉斯首先冒险北上，随后又向西越过北查科。就在那一年，他在今天的亚松森地方建立起一个碉堡。十年后，拉普拉塔王室法庭庭长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就利用了这个小小的村庄作为向西进军的根据地。伊拉拉派了一个出生在山区的圣克鲁斯的西班牙人，沿皮科马约河逆流而上去寻找白银山。这个西班牙队长努夫洛·德·查维斯，带领着六十个西班牙人和一百个瓜拉尼印第安人，不久便被迫下船步行。之后，经过一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拓荒远征，于1548年11月24日到达利马。一路上他们经常遭到奇里瓜诺人或其他印第安人的阻挠，再加上爬越崎岖不平的普纳陡坡和东科迪勒拉山，查维斯被折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当那位接替了不幸的努涅斯·德·贝拉的诡计多端的佩德罗·拉加斯

卡拒绝了他的要求的时候，查维斯简直想要杀害他。拉加斯卡不仅拒绝了他，而且还命令伊拉拉永远不得再侵犯利马总督辖区。查维斯只得回到伊拉拉那里汇报这个坏消息。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回到原地。由于他的忠诚，伊拉拉让他在以后几年内继续开发巴拉那河的上游地区。在他开发该地的第二个十年中，他被伊塔廷部落的人打伤，并多次患疟疾和痢疾。就在那个阶段的中期，他的朋友和保护人伊拉拉与世长辞。但是伊拉拉的继承人贡萨洛·德·门多萨，继续把征伐印第安人的事业托付给他。

1559年，他再次出征，穿过奇基托人的干涸草原和丛林，并于8月1日在格兰德河建立起一个前哨阵地，命名为新亚松森。使他烦恼的是在三个月后，即十月份，他发现在这条河的对岸有另一队西班牙人。利马当局派了安德烈斯·曼索去开发并占据那同一地区。激烈的对抗自然地爆发了。但是当查维斯回利马去澄清这个情况时，他把指挥权让给了曼索。总督卡涅特听完他的汇报颇表同情，还任命了他为莫克索人的新省省长。1560年7月查维斯已回到曼索那里告诉他这个提升的消息。 130

曼索在盛怒和懊悔之下离开了。他跨过格兰德河建立了巴拉卡城。努夫洛·德·查维斯也离开新亚松森赴任，以便继续他的开发事业，并争取印第安人。1561年2月26日，他建立了一个新村，用他在西班牙诞生地的名称，把它命名为山区的圣克鲁斯。这个村落原来建立在现在的圣克鲁斯和科仑巴的中间，距奇基托人的圣何塞正好二哩。努夫洛·德·查维斯生前没有看到他建立的村落的遭遇，这对他或许是件幸运的事。在以后的六十年中，这个村落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1568年，查维斯被伊塔廷人杀害，犹如四年前曼索死于莫克索人之手一样。1590年，圣克鲁斯的领导者们把这个城迁到了格兰德河畔的巴拉卡旧址，并命名它为国境上的圣洛伦索。一年后，许多居民又迁移到科托卡的一个较好的地方。再过四年，又有大部分住户移动。1621年，圣洛伦索和圣克鲁斯两城决定在格兰德河以东几哩的地方合并。这个地点距拉巴斯比努夫洛原来建村的地点要近得多。因为圣洛伦索是先在这个地方建立的，联合后的城市便采用了它的名称。但是名称不断改变，最初改为山区的圣洛伦索，最后又改叫山区

的圣克鲁斯。这个名字一直自豪地沿用到今天。

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是奥罗佩萨的伯爵。他于1570年派遣他的部将赫罗尼莫·德·奥索里奥在科恰班巴盆地建立了奥罗佩萨镇。四年以后，他委任塞瓦斯蒂安·巴尔瓦·德·帕迪利亚去建立科恰班巴城。不久，总督曼索·德·贝拉斯科对该城作了这样 131 的描述："这个城里住着很多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这里的梅斯蒂索人比秘鲁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它的土地很肥沃，出产小麦和玉米，矿藏也很丰富。如果运费不是如此昂贵，我相信它能供应半个王国所需的粮食。"

这位非凡的总督托莱多的另一个成就，是在1574年委派路易斯·德·富恩特斯去建立圣贝尔纳多—德塔里哈。富恩特斯从拉巴斯和波托西招募了一批西班牙人，又得到一些克丘亚人的帮助，于1574年6月4日建成了这座城市。这些克丘亚人与土著的托马塔印第安人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凶悍的奇里瓜诺人，他们之间一直是在打仗的。奇里瓜诺人正确地认识到：这个新的殖民村落将来对他们不会是友好的，因此不停地袭击它。结果，托

莱多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的边界堡垒，这些堡垒最后发展成为托米纳边境的圣地亚哥、塔拉布科和比利亚尔等城市。

由于高原上生活艰苦，由于西班牙人极想赶快发财返回欧洲，加上印第安人造反和他们内部的纠纷，人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化活动。在文化生活方面，大部分的功劳要归于传教士，他们对兴办学校有强烈的愿望，甚至要办大学。例如，1624年，在王室和教皇的同意下，他们在查尔卡斯建立了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王室和教皇大学。早期兴办的大学，多数是效法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教授都是传教士，学生都是上层阶级的青年(他们已不必远渡重洋到欧洲去念书了)。大学授课用拉丁文。学校认为培养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记忆能力比教导学生独立思考更为重要。不强迫听课，因此出席情况不正常。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和是否升级或毕业，均由年终考试决定。

圣哈维尔大学是由胡安·德·弗里亚斯·埃尔安神甫很早以前创办起来的。它的创办，对于丘基萨卡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化中心，既是原因又是后果。以前耶稣会曾在这里为印第安人筹办

132

过一所学校。在卡洛斯三世时代，这所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了卡罗利娜学会，作为王室法庭的一个从属机构。这样命名为的是向卡洛斯国王表示敬意。它同其他卡罗利娜学会一样，是由一些开业的律师特别是印度事务部公布认可的律师所组成，目的是使他们在法律方面得到深造。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机构，它受到王室法庭里最有头脑的人们的重视。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它是玻利维亚独立的策源地，在玻利维亚历史上享有盛名。

在殖民地时代的初期，主要因为宗教法庭和禁书目录的限制，印刷品是罕见的。为了调查异教，1233年开始设立的宗教法庭，在1478年又被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这两位天主教徒狂热地复活起来。这时的宗教法庭受西班牙国王们的绝对控制，以致教皇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侵犯教会的权威。这两个国王把宗教法庭介绍到了美洲殖民地，并于1570年在利马设立了第一个宗教裁判所。它虽然从来没有象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那样粗暴，但是没有一个人，即便是印第安人，能够幸免不受迫害。它的检查政策，甚至把罗马教廷所许可的书都宣布为非法。列入禁书目录的任何书籍，都禁止阅

读，违者处死。结果，玻利维亚没能引进印刷机，直到独立战争开始，保皇军为了印刷传单才进口了这种机器。传教士们控制着一切早期的出版物。任何著述，除非是宗教性质的，都不得不送到国外去印刷。1640年，在马德里印刷的最重要的一部书，还是由波托西的传教士、长老会教友阿尔瓦罗·阿隆索·巴尔瓦写的。这部《冶金技术》得到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把当时的冶金技术革命化了。例如，它告诉工人如何利用热水银提炼出更多的白银。

在传教士具有如此重大影响的社会里，难怪那些有纪念性质的主要建筑物也都带有宗教的色133彩。最早来的欧洲人随身带来了西班牙的一种雕绘装饰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盛行于十六世纪，它的丰富多采来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夹杂了摩尔式花饰的遗风，并受了后期哥特式的影响。最初建筑的教堂，在设计和材料方面都是简单朴素的。在秘鲁，建筑一般都用木料和干坯。这种建筑在高原现在仍可见到，但在城市里，最终都被拆换成仿照卡斯提的教堂样式而建起的较为精致的建筑物了。在出现印第安人起义的危险时，教堂便成为堡垒，

四周围都筑起带枪眼的墙。在四个角上有印第安人使用的小教堂塔，叫做波萨①。在游行的时候，人们把圣像存放到那里，因而得到这个名称。最雄伟堂皇的教堂都是建筑在异教庙宇的基地上的，就象弗朗索瓦·卡利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因为教堂不单是为了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它也说明一种文明代替了另一种文明。

在殖民地，建筑物的结构通常是由西班牙的建筑师们设计的，譬如：胡安·米格尔·德·贝拉门迪在1570年就设计了苏克雷大教堂。1680年何塞·冈萨雷斯·梅尔克尔特设计了这个教堂的大门。他的设计仿照欧洲的古典式样，而在装潢纹饰方面则让当地的工匠去自由创造。门道、祭坛、大烛台、祭坛帏屏、祭坛十字架台，成为印第安人能发挥他们想象力的场所。这就是殖民地装饰奇特的建筑物中蔓藤纹饰之所以丰富多采的原因。根据卡利的记载，"只是在这些方面，当地居民才能对其装潢配饰的构思做出尽情发挥。这些构思都是由陶器工和纺织工在哥伦布来到以前，经

① 波萨(posa)的原意是"储存"。——译者

过漫长的世纪传下来的。在这个领域内，他可以把强加给他的艺术重新征服，而应用自己的传统的几何图案，特别是应用鳞片重叠、尾巴翘卷的蛇和爬行动物为主题的图案。

殖民地的建筑最早受摩尔式影响的典型例子，是丘基萨卡的圣弗朗西斯科天主教堂和波托西的圣马丁教堂。以后，文艺复兴带来了一种新的严肃朴实的风格。建筑物模仿那种来源于希腊—罗马的紧凑敦实的赫雷拉式样。第三种影响持续了一百年，约从1650到1750年。在这个时期，梅斯蒂索和丘里格雷斯克风格占优势。大多数的庙宇都带有奢华的装饰。最好的例子是波托西的圣洛伦索教堂。它是在1729到1744年之间修饰的一座印第安人教堂。它的正面全是太阳形象的雕刻、半人半鸟的妖怪和其他装饰物，都是本地雕刻家何塞·孔多里的作品。南美洲最受崇拜的教堂是在科帕卡瓦纳(Copacabana，意即“看见的的喀喀湖中神圣太阳岛的地方”)。在这里，圣母曾经在一个当地人面前出现过，因此奥古斯丁派的神甫于1580年决定在该地修建一所教堂。1618年该教堂重建，就是现在的教堂的一角。现在的教堂是弗朗

西斯科·希门尼斯·德·西古恩萨于1668到1678年间建造的。

十七世纪，是美好的高原艺术和绘画作品出现最多的时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耶稣会修士贝尔纳多·比蒂的影响。比蒂在1514年出生于意大利，十四岁跟罗马画家学徒。他于1575年到达卡亚俄。最初他在库斯科和波托西之间的朱利工作。在那里，耶稣会为那些长途跋涉去波托西服米达徭役的印第安人修了一所教堂。1591年，比蒂到苏克雷，为那里的耶稣会教堂制造祭坛十字架台。根据马丁·索里亚的记载，“那件东西做得如此华丽美观，以致苏克雷大教堂的牧师试图以三万五千杜卡特(ducat)的高价向耶稣会购买，但未能如愿。”索里亚说，比蒂从利马到库斯科、朱利、拉巴斯(当时印第安人称之为丘基阿布)、波托西、苏克雷，一路上都留下了门徒。受他影响的三个秘鲁人是阿莱西奥、梅多罗和贝唐。在玻利维亚画家中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梅尔乔·佩雷斯·奥尔古因。索里亚认为，奥尔古因是“洛珂珂时期（即1690到1750年间）南美洲造诣最深的画家。他发展得很全面，有创造，有个性，有气质，有表达力。” 135

土著文化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利马的第五个总督唐·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当他在1569年就职时，腓力二世曾命令他负责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改变整个总督辖区直到那时还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还奉命利用秘鲁的自然财富去发展工业。他在上秘鲁几乎度过十二年之久，所以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成就是不小的。

除了建立奥罗佩萨、科恰班巴和塔里哈几个城市以外，他还把波托西从仅仅是一个矿山营地发展成了城市。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皇家造币厂，修直并加宽了街道，开辟了雷戈西约广场。他第一次交给皇家的五分之一收益，就达到七千六百万美元的巨额。

托莱多就象印加帝国时那样组织了米达徭役。印加皇帝让印第安人为皇家工程服劳役每次不超过四个月，而西班牙人却把这种轮班制延长到几乎成为终身的奴役。1573年，托莱多订出了保证矿业主不受亏损的劳动定额。这样，一方面使矿业主能继续为皇室效忠，另一方面对印第安人的使役也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还扩大了米达徭役制度的实施范围，使更多的印第安人不得不参加

这种强迫劳动。为了增加生产，他在开矿操作方面又推广了水银法和水力机。

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驯顺地去服米达徭役。虽然塔里哈已经建成为抵御奇里瓜诺人的前方哨所，可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那个凶悍的部落还是威胁着巴拉圭河和皮科马约河之间的那片肥沃土地。一些西班牙最勇敢的指挥官都丧命在奇里瓜诺人手中。托莱多招募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队伍，开赴南方想要报复印第安人的入侵和他 136 们在新里奥哈和巴兰卡两城周围的抢劫暴行。他在行军中患了病。当奇里瓜诺人再次使用游击战术时，这次远征便陷于完全失败。他不得不撤退到拉普拉塔，但仍下令要修建其他前线哨所，以保卫在低地的肥沃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居民，并阻止奇里瓜诺人抢劫波托西和拉普拉塔。

也许是因为被奇里瓜诺部落打败而要采取报复行动，也许是害怕高原的印第安人可能组织类似的叛变，托莱多犯下了一桩万恶不赦的滔天罪行，污损了他个人的历史。1572年，他下令处决了图帕克·阿马鲁，并把整个印加皇族斩尽杀绝了。

图帕克·阿马鲁是印加皇帝芒科的最小的儿

子。他的一个哥哥为了换取自己的人身自由对西班牙人做了让步，因而遭到印第安人的舍弃，于是他便成了印加皇帝。他的另外一个哥哥蒂托·库西，曾同西班牙人签订一个停战协议，其中规定准许传教士到他们居住的地区去。后来，一个传教士被杀害了，托莱多便决定派一队武装人员去惩讨叛乱。这时蒂托·库西已经病故，托莱多的将官便把他的继承人图帕克·阿马鲁逮捕囚禁了起来。当时在库斯科的大多数重要的印第安酋长提出了抗议，说明图帕克·阿马鲁与暗杀事件毫无关联，但是西班牙人不予置理，还是把阿马鲁判罪杀死了。托莱多以残酷的行径告诫印第安人，他们一旦造反将会遭到何等下场。这种警诫在印第安人心中酝酿成一种憎恨。几年以后，这种憎恨便暴发成了流血的革命。

后来，托莱多回到西班牙于1581年死去。一个总督接任另一个总督，其中有些还不错，有些则一般。但总的来说，直到十六世纪末，他们在高原上推进了文明，并使高原得到了发展。1598年，腓力二世在马德里死去。从此西班牙帝国开始了一个衰落的世纪。腓力在宗教上是严肃不苟的，但随后

出现的却是全面衰退。其原因一部分是在于他的继承者有重用宠臣的弊习，另一个原因就是西班牙的大天主教主义。当时新教已传到北欧，在所有反对新教的战斗中，西班牙总是打前锋的。在1598至1700年的一百多年中，西班牙在陆地上同英国、荷兰、法国打仗，在海上又同荷兰、英国打仗。这期间，体弱多病的卡洛斯二世死去。因为他没有子嗣，新世纪一开始就发生了王位继承问题的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更为不祥的开端。 137

这种情况对各总督辖区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祖国内部事务繁忙，无暇妥善地经管各殖民地，总督们便自作主张组织符合当地条件的政府。殖民者们对这种政府当然比对别的形式的政府更满意。然而，十七世纪的特征是动乱与冒险，不是和平与富裕。在该世纪末叶，波托西的银矿枯竭了，大部分人离开了那里。从前是繁荣的市镇，现在罩上了经济萧条的黑幕。绿林侠客，如安东尼奥·加利亚多，领导了反抗殖民者的起义，他们以抢劫为动机，践踏了拉巴斯。领导着开发贝尼和查科地区的是传教士们。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如伟大的圣芳济会神甫贝纳迪诺·卡德纳斯，却同耶稣会争执

不和，破坏了宗教团体间的和谐。

在上秘鲁(Alto Peru)，下一世纪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也牵扯到耶稣会。在十六世纪末叶，耶稣会归化区的组织已传到巴拉圭。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在总督阿门达里斯统治期间(1724—1735年)，巴拉圭发生了起义，起义最后导致巴拉圭脱离秘鲁总督辖区获得独立。那时，何塞·德·安特克拉早已废除了亚松森[①]的都督，由他统治了十年。1732年，他怕耶稣会会员为了恢复皇家官员的职务，领导印第安人造他的反，便把这些人驱逐出境了。经过十四年两败俱伤的战争(1721—1735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调来军队才恢复了亚松森的和平。这批军队侵入巴拉圭，镇压了起义，让耶稣会会员重返原地。这次起义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影响超越了巴拉圭的边界，并波及到利马。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镇压反叛，这对所有的殖民者说明了该法庭的平庸无能。巴拉圭终于被划归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在巴拉圭的这场纠纷中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和利马的总督之间出现了利害

138

① 亚松森是巴拉圭的首都，最初属于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和设在利马的秘鲁总督共同管理。——译者

冲突，各自支持一方，从而引起了秘鲁两个统治集团的分裂。

大约与此同时，在科恰班巴也发生起义，但仅延续了两个月，它起因于修改纳税名单。有些印第安人为了逃税，曾冒充梅斯蒂索人。修改后的税单便把梅斯蒂索人也包括进去了。这样，一些梅斯蒂索人便不可避免地要缴纳课税。于是银匠阿莱霍·卡拉塔尤德，组织起一支三千人的小队伍去保卫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要求带有某种反西班牙的性质，因此起义的重要性要比历史上对它的评价更大些。由于卡拉塔尤德的士兵象一般流寇那样行迹无度，科恰班巴的人民不愿再支援他们了。不久，卡拉塔尤德便被一支优势的军队击败。他被俘后，受到绞刑。他的头颅被送到拉巴斯，用以警诫人们，叛乱者将会有什么下场。

五十年后，1781年，图帕克·阿马鲁的幽灵回到玻利维亚，出没各地。图帕克·阿马鲁是早已被总督托莱多杀害的印加皇帝。他的后裔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冒充他的名字，决心恢复印加旧业。他并不完全想做太阳神，而只是要做印加君王，取代西班牙皇室的权势。他很快就得到了有造

反精神的印第安人的支持。同时有些传教士支持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人的虐待，也给了他援助。他的战斗口号是废除米达徭役制，把土地还给它的合法主人——印第安人。

139　他的起义并非发生于旦夕之间。实际上，它酝酿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图帕克·阿马鲁把高原上的大多数酋长争取到手，甚至派了他一个兄弟到西班牙向皇廷倾诉冤屈。他自己并不是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他在1740年出生于库斯科附近，在那里就学于耶稣会，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享有西班牙贵族的头衔——奥罗佩萨侯爵。他身材瘦小，衣冠楚楚，常穿当时时兴的西班牙服装。他出入常有人扈从，甚至还有一个牧师不离身侧。

在支持他的印第安酋长之中，有一个当地的卡西克（cacique），名叫托马斯·卡塔里。他是波托西附近的查扬塔印第安人。他声称他的酋长大权被另一个印第安人所篡夺。他从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没有得到同情的反应，于是步行了几乎一千五百哩，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总督诉苦。这位总督是在1778年把利马总督对该地区的宗主权接管过来的。他认真地听取了卡塔里诉述的案情，并命令

查尔卡斯王室法庭认真研究办理。在此时期，查尔卡斯的贪赃枉法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在职长官(corregidor)竟对此事置若罔闻。阿洛斯是个常犯大错昏庸无能的官吏。以往，他每年要把印第安人聚拢在一起，呼头点数，然后让他们去服米达徭役。这种事常惹起印第安人的反感，就在一次呼头点数的时候，阿洛斯被印第安人伏兵擒获。因为卡塔里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后即被阿洛斯逮捕，印第安人就以换回卡塔里为条件，把阿洛斯释放了。由于阿洛斯违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的命令，不久便被撤职。阿洛斯的伙伴们又一次逮捕了卡塔里，并在一群印第安人完全能看到的地方，把他投下悬崖摔死。印第安人随即袭击西班牙人，为了报仇，杀掉许多人。

在托马斯·卡塔里被害以后一个月，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也遇难丧命。他是1780年11月4日开始造反的。当时英国船只威胁着秘鲁海岸，同时 140 发生了抗税起义，他就利用这种混乱情况动了手。

图帕克的造反开始是在库斯科伏击亨塔省都督。他缴获了这个都督所有的武器和金钱以后，就把掠获品都分给了那些受他劝诱跟随他的印第安

人，并把那个都督在中心广场绞死，然后宣布他自己为秘鲁的印加皇帝。在半年内，他一直胜利地击退了敌人的反扑。但是到了1781年3月，总督得到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调来的援军，派出一万七千名士兵攻打图帕克在亭塔的大本营，并把他擒获。他被拖往广场。在那里，他目睹他的妻小和其他亲属遭受酷刑的折磨。然后他被割掉舌头，并受了车裂的极刑。

西班牙人的惩罚越是恐怖，印第安人就越加复仇心切。被杀的印加皇帝有一个兄弟名叫迭戈·克里斯托瓦尔·图帕克·阿马鲁，他继续进行战斗。他表现了更大的才能。他同叛教的教堂司事胡利安·阿帕萨，把武装力量联合在一起。这位司事自称为秘鲁的总督，改用假名图帕克·卡塔里。

迭戈·克里斯托瓦尔·图帕克·阿马鲁，围攻在伊廉普山脚下的索拉塔城。他在这座城的上坡，修筑了一个水坝。他一打开水坝，这座城便顿成泽国，成了他这位卡西克垂手而得的战利品。图帕克·卡塔里这位被驱逐了的教堂司事，对拉巴斯也使用了同样的办法，但是他修的堤坝并没有维持很久，冲泻下来的水量也不足以使该城无法防守。

他围困拉巴斯达五个月之久。最后拉巴斯援军从拉普拉塔赶到，把他打败了。他和第一个图帕克·阿马鲁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也被车裂，他的头颅悬挂高竿，成为拉巴斯广场的点缀。他的妻子则仅受绞刑。

迭戈·克里斯托瓦尔·图帕克·阿马鲁现在孤军无援。后来他得到两位来自奥鲁罗的克里奥尔人——罗德里格斯兄弟的帮助。这两兄弟声称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长官改正其弊病。但是，很可能发展个人的野心才真是他们久怀的动机。印第安人和克里奥尔人在人民起义中结成联盟，141 这在秘鲁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在奥鲁罗城成功之后，造反者们就去科恰班巴。但是由于印第安人在那里行为不轨，以致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尔人联合起来，把他们赶出了城。不久，曾帮助拉巴斯解围的军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到了，擒获了迭戈·克里斯托瓦尔·图帕克·阿马鲁，并把他绞死。

不应该把这些起义中的任何一次，看作是下一世纪里发生的更大规模的独立战争的前奏。但是，这些起义表明了对西班牙当局的不满。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为了替他的前辈报仇而发动的斗

争，使秘鲁承受了一次最重大的牺牲。在受西班牙统治两个世纪以后，他这样的反抗看来是奇怪的。然而，这是旧恨加新仇。他为印第安人以前遭受的虐待复仇的愿望，由于卡塔里这样的人所受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而燃烧起来。教堂司事胡利安·阿帕萨，通常人们叫他图帕克·卡塔里，因为听了一个拉巴斯的梅斯蒂索人的劝说，而采取了特殊的立场。奥鲁罗的克里奥尔人造反是为了抗议半岛人在政府官职缺额时被优先录用。

流传广远的无政府主义，就象一阵烈风，从高原的一端吹到另一端。造成这种广泛流传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尚未减弱时，秘鲁南部也受到了影响，在阿根廷的圣非以及最北到巴拿马都有反应。由于发生了这些起义，各地的首要官员都被撤职。实际上，这样的后果主要是由他们的专横霸道和他们那些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的行径造成的。以后三十年里，再没有其他影响巨大的起义打乱和平的局面。但是，在1780年和1781年流血的岁月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独立运动的动力，并非来源于这些行为，但是后代的人们把它们看做是爱国主义传统的象征。

143

第 六 章

革命——独立的序幕

献身于革命的人，都要不避艰险，飘洋过海。

——西蒙·玻利瓦尔1830年4月27日给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将军的信

1781年，在秘鲁爆发了印第安人起义。血腥的大屠杀紧接而来，致使约有八万印第安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大屠杀并未能吓倒另外一些想要照样干下去的人(包括克里奥尔人)。当印第安人的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时候，在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当时的名称)，克里奥尔人揭竿而起反抗苛捐杂税。在智利，有一些当地生的西班牙人和两位法国人也策划独立。几年以后，在那位具有冒险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的领导下，加拉加斯的克里奥尔人也进行了一次争取自由的

斗争，但未获成功。

这些自发性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对母国的不满。不满的理由是不胜枚举的。较早的暴动，包括图帕克·阿马鲁的那次，都起因于当地人的愤懑不平，是由心怀不满的印第安人或野心勃勃的梅斯蒂索人领导的。然而，到十八世纪末，那些在殖民地社会中最有权势的、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看到英国殖民者在美洲和法国人在欧洲所树立的榜样而觉醒起来了，他们自己也开始搞改良，或者更好一些，搞独立运动。

144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殖民者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诚然，外在的原因也是有的，但主要还是内部问题，例如随意订出的课税、贸易的限制和不得人心的种姓制度，把克里奥尔人锤炼成了一支战斗力量。

到十八世纪末，重商主义在本半球成了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这种重商主义对殖民地在各个方面的垄断和剥削，它在南、北美洲所产生的后果必然是唤起殖民者的反对。的确，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商业限制远不如英国对它的殖民地那样灵活。

印度事务部力图贯彻一套死硬的侵略性的经济制度。但它是这样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每次它想要改进其行政效率，它就更加运转不灵。印度事务部曾试图把国家和教会的工作合并起来，而实际效果却弄巧成拙，使两种工作在西班牙所属的美洲都引起反感。这个官僚机构占用了大部分的国家岁入，并且擅自篡夺了许多特权。没有几个官员是受人欢迎和尊敬的。阿格达斯写道："克里奥尔人同西班牙人之间的恶感是由于西班牙人有绝对的优越感而产生的。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比所有的人都高明，而且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来。……一听说是个欧洲人（在秘鲁叫做查佩顿——chapeton），马上就被认为是克里奥尔人的敌人，而一个人只要是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就憎恨欧洲人，真是烦透了。"

欧洲来的暴发户占有高级职位，而克里奥尔人从事较低的贱职，这种惯例在教育方面也是一样。在克里奥尔人中，只有那些富裕户才供得起子弟上学，广大的人民则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因此，在西班牙所属的美洲，外国对其革命的影响，比起内部原因来，作用是不大的。在法国和美国已经普 145

及的新思想，对这里的广大群众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识字。另一方面，有充分时间进行学习的传教士，由于受到外国著作的影响，则往往走进了为独立而战的行列。

革命思想逐渐传到了大西洋彼岸，有一些是克里奥尔人的子弟到外国留学学来的，另外一些是由移居到殖民地的人带进来的。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向王权神授论提出了挑战。他说：国王的权力来自人民。他认为世俗的力量高于宗教力量，他以这种信念向教会的权威挑战。以后社会契约论里的一些政治原理就是来源于他的政治哲学。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反驳霍布斯的某些论点，这样反而为识字的人们提供了更为进步的思考题。约翰·洛克在他的《论政府的两篇论文》中确立了这样一种学说：原始社会是一个幸福而且合理的集体。在那里，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联结在一起并组成政府，以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在那个社会之外生活的人们的干扰。当人们合情合理地设法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和自由的时候，他们必须彼此合作。换句话说，为个人谋幸福的欲望和为公众谋福利的欲望

是两相吻合的。他相信政府应当受一种制衡制度的控制，当这种制度不起作用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革命。他这样的理论正是对勇敢的革命者们已有的热情火上加油。

甚至道德学家们也在本瑟姆的《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中找到了否认西班牙统治的论据。那就是书中提出的，管理机构和这些机构的行动，应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准则。

法国的政治哲学家们，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 146 和卢梭，也在美洲殖民者中间找到了有赏识能力的群众。孟德斯鸠把共和制的、君主制的和专制的三种政府加以比较，结论是政府的权力应当分开掌握，同时保持平衡。当然，这种学说影响了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以后也影响了撰写拉丁美洲国家宪法的人。伏尔泰在伦敦写的《哲学通讯》主张要更多地借助于艺术、科学和商业来改进社会。他向法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小资产阶级强烈呼吁，要避免沙文主义，要把文化和商业的发展置于政治和战争之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类似洛克的思想。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文明把它败坏了。人们为了公共的利益加入到社会

契约中去，组成一个民主的、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但是政府的权力必须授予整个社会，也就是要通过社会的共同意志表达出来。卢梭的这种有点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主权学说，深深地影响了他同时代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就连列夫·托尔斯泰据说也曾是他的门徒。因此，有教养的秘鲁人受到这些激励人心的新思想的哺育，开始研究他们的政府，并且致力于批判性的独立分析，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类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在北美殖民地早已传播开来。在卡塔里和图帕克·阿马鲁造反的时候，实际上美利坚合众国为独立而掀起的革命已经发展到极盛阶段了。不过，对美国的独立战争所产生的影响不应该过分强调。因为那里的战斗消息和胜利消息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到达南美洲，并且在战争爆发之初，大多数消息报道的当然是英国的胜利。在拉丁美洲，对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人们最重要的考虑是：法国和西班牙卷入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写进了十三州的独立宣言。洛克对革命的辩护是这样反映在宣言的序文里的：“……任何一个政体一旦对这些目标形成危害，人

147

民有权改变它或取消它，并设立新的政府。"而宣言中关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思想以及整个制衡制度，则是从孟德斯鸠的《法意》中衍化出来的。

法国、西班牙同美洲殖民地结成的反对大不列颠的联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后果，那就是使它们自己的殖民地相信今后它们也会同意殖民地独立的。西班牙同英国的争端始于亨利第八(1509—1547年)的时代。亨利第八为了同他的西班牙籍妻子离婚，与天主教决裂了。西班牙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宗教战争进行干预又加剧了这个争端，并给了英国一个借口去参预大陆上的事务。以后这两个强国之间的冲突日益扩展，以致满载着墨西哥和秘鲁的丰富矿产回国的西班牙舰队经常受到英国海盗船只的抢劫。然而，西班牙最感受辱的，是英国不肯承认那个把新世界瓜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教皇谕令。关于西班牙在北美领土的边界争执，则始终是这两国不断发生摩擦的起因，这同英国在安的列斯群岛的属地情况是一样的。

1781年图帕克·阿马鲁的造反遭到镇压，就在这一年英国军队在约克敦投降。西班牙夺回了

佛罗里达，但英国坚守着直布罗陀海峡。不久，这两个海上强国之间的仇恨进一步发展。随着拿破仑·波拿巴的登极，西班牙再度站在法国一边反对英国，结果，在1805年特拉法加战役中，西班牙舰队全部覆没，从而丧失了同它的殖民地之间最强有力的联系手段。

早先，法国革命树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它表明被奴役的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做些什么。但是，无意之中为南美洲开辟了革命道路的确实是拿破仑。英国现在是单独同法国作战了，它在七大洋里任意漫游，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进攻欧洲国家在新世界的殖民地。它想要同时推行两个基本政策。一个是同拉丁美洲通商，使拉丁美洲脱离西班牙，另一个则是在拉丁美洲人思想上培植独立的愿望。1797年，皮克顿船长占据了委内瑞拉近海的特立尼达岛，并主动提出给委内瑞拉“一切援助，包括军队武器和弹药”。但他的企图未能得逞。同年，英国军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卡塔赫纳登陆，也没得到更好的效果。那时，没有一个克里奥尔人愿意迎接一个欧洲君主去替换另一个欧洲君主。

148

事隔不到十年，1806年英国卷土重来袭击布宜诺斯艾利斯。该城在1776年已属于上秘鲁总督辖区。当时总督弃职潜逃。为西班牙工作的法国血统的克里奥尔人圣地亚哥·德·利涅尔斯，挺身而出，率领着由土生的阿根廷人匆忙凑成的一支军队，抗拒英军并迫使英军投了降。第二年，英国又以八千精锐陆军来犯，又被击退。这几次进犯，对殖民者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他们在保卫自己和使用武器方面取得了经验；由于击退了一个大国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代表西班牙政府的总督在紧急关头弃职潜逃，又使他们看出了西班牙政府的弱点。这种弱点，由于拿破仑对欧洲各宫廷政事的干预，暴露得更为明显，也更加难以容忍了。

1807年至1808年，拿破仑为了使葡萄牙放弃它同英国的联盟，为了对英国封闭伊比利亚各个港口（正象在北欧已经做过的那样），他卷入了伊比利亚半岛战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是个身体虚弱、庸碌无能的人。他决定在拿破仑到达马德里之前逃跑，并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1808年，拿破仑擒获并废黜了卡洛斯和斐迪 149

南，卡洛斯王朝从此终结。同年在马德里发生了支持斐迪南国王的起义，但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到6月15日，拿破仑宣布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人在全国各地拿起武器反对国王约瑟夫。在法国军队没能达到的地方——阿斯图里亚斯和塞维利亚，人民声明他们拥护斐迪南七世，并将此消息传告各殖民地区。但与此同时，国王约瑟夫和拿破仑也在竭力争取各殖民地的支持。使情况更加混乱的是，这位被囚禁的国王有个姊妹名叫因方塔·卡洛塔，她嫁给了葡萄牙王子，同葡萄牙王室一起逃到了巴西，如今成了另外一个争夺王位的人。

这种形势给殖民地谋求独立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经受着拿破仑战争和内战双重折磨的西班牙人，对殖民地的命运毫不关心，这对殖民地的独立更加有利。然而殖民者们并没有立刻想到政治解放的问题。只是因为他们的许多总督和督军都宁可屈从于拿破仑的命令而不愿放弃他们的高贵地位，这才激起了他们的政治解放的要求。拉丁美洲人憎恨法国的统治，事实上只要他们的总督接受约瑟夫的命令，他们就是被法国人统治着。当时

殖民者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者是进行游击战争反抗法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从而帮助斐迪南再登王位；或者是争取独立。

为反抗不孚众望的总督和其他代表约瑟夫一世的人物，连续发生了起义：1806年在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领导下，在委内瑞拉爆发了起义；1808年在新西班牙(墨西哥)，克里奥尔人反对法国和西班牙的特使；1809年在上秘鲁也有起义。执政当局的混乱助长了这些起义，也促成了保皇分子的分裂。在西班牙本土上，为了抵抗法国，成立了一些各据一方的洪达（junta），试图统治那些实际上拿破仑未能管辖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塞维利亚的中央洪达。它自称代表被囚禁的斐迪南国王。它的措施之一，就是鼓励殖民地建立类似的组织，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掌管一切。另一项措施，是派何塞·曼努埃尔·戈耶内切准将为特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见那位自立为该地总督的利涅尔斯。途中，戈耶内切在里约热内卢停脚，见到了斐迪南的姊妹因方塔·卡洛塔，并决定支持她继承王位的要求。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说服了利涅尔斯支持中央洪达和卡洛塔运动。 150

以后，戈耶内切带着同一使命前往利马，要求他们立即归顺洪达并无限忠于因方塔。路上，他在查尔卡斯——当时仍为上秘鲁王室法庭的首府——稍事逗留。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要求完全脱离西班牙洪达和国王统治的普遍呼吁。十八个月以前，上秘鲁王室法庭的庭长拉蒙·加西亚·皮萨罗曾重申过效忠西班牙国王的誓言，但以后他和大主教贝尼托·马里亚·莫克索都失掉了人民的支持。法庭的成员都反对皮萨罗的规章制度，传教士们则因大主教莫克索企图遏制他们中间风行的弊习甚为不满。因此，王室法庭否定了皮萨罗和莫克索关于支持洪达的协议，声言这两个领导人因为偏听偏信戈耶内切，所以袒护因方塔。这样的公开反抗，足以把那位洪达的特使撵走。这个自始至终制造麻烦的人是要回去了。

皮萨罗可以证实：苏达涅斯两兄弟是革命领袖，曾经领导人民反对过他的统治。1809年5月25日，他下令把他们逮捕了。深更半夜，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他们高声呼喊，这喊声成了起义的信号。丘基萨卡人（Chuquisaqueño）群起造反，把皮萨罗投入了监狱，同时还宣告他们效忠斐迪南。但

151

随着庭长的被捕和大主教的潜逃，这个王室法庭实际上已不知不觉地成了搞独立运动的一支力量。他们为争取自由所采取的行动，使1809年5月25日成了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第二天，一些革命者匆忙赶到波托西、科恰班巴和拉巴斯，把查尔卡斯发生的事告诉人们。这些革命者曾在查尔卡斯大学的卡罗利娜学会研究过卢梭和百科全书学派的学说，他们的思想在那里已经形成。在拉巴斯，人们谋求独立的心情同样迫切，只是起因不同。在丘基萨卡，革命者都是王室法庭的成员和该城知识界的领导人；而在拉巴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则是一般老百姓、刚强的士兵、冒险者、探险家和流浪者。促使他们反抗各种压迫的，是他们的本性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受到这个消息煽动的拉巴斯人（Paceño）当中，有一个人叫佩德罗·多明戈·穆里略。他是传教士胡安·西里亚科·穆里略—萨拉萨尔和一个克里奥尔女人玛丽亚·阿森西亚·卡拉斯科的私生子。

1757年9月17日，他出生在拉巴斯，在库斯科学习法律。他知道由于他那暧昧的家庭背景，想要

获得一个重要职务，希望十分渺茫。因此，他放弃了完成学业的打算，在拉巴斯附近从事矿业工作。1781年革命时，他入伍任中尉。由于他有非凡的精力和智慧，很快被提升为罗塞古因将军的副官。然而，事变结束后他辞却了官职成为专门撰写小册子的人（papelista）。他的革命言论经常贴在城墙上。1805年，他加入了乌瓦尔德的军队。乌瓦尔德是阿里卡的本地人，当时为争取自由和独立在下秘鲁领导爱国斗争，但未能成功。乌瓦尔德被出卖了，1805年8月在库斯科被处死。和他同谋的人，许多被驱逐出秘鲁，另外一些，如穆里略，被投入了152 监狱。穆里略被释放后，继续他的宣传工作和革命工作。当他听到拉普拉塔的起义消息后，便和他的朋友们立刻准备采取行动。

在头几次斗争失败之后，造反者们定于1809年7月16日举行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他们计划利用纪念拉巴斯的保护神——圣母卡门的传统节日，把他们的支持者秘密带进城来。那天下午，人们抬着神像通过大街，印第安人用芦笛吹奏着悲哀的曲调，围着神像跳舞。当圣母像通过大街时，花朵和彩纸从两旁阳台上雨点似的纷纷下落，革

命者们便从各集中地点趁机走出，混入人群。他们在大广场会合，并在圣母像下为胜利祈祷。然后，他们在附近一家商店集合，等候进攻兵营的时刻。当晚七点半，他们向哨兵冲击，把几个没有参加欢庆节日的士兵缴了械，并搜劫了武器库。这样武装起来之后，他们囚禁了达维拉市长、拉桑塔主教和其他当权者，接着召开了一次市政大会（Cabildo abierto）。会上他们呼吁市民废除食品税，焚毁过去债务的官方账目，并呼吁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保卫国家的独立”。几天以后，组成了一个十五人的保卫委员会，由穆里略任主席。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很有反响的摆脱“马德里的怯懦政治”的独立宣言。这个宣言，被认为是以后所有号召人们武装起义的文件的原始典范。“现在，在这些不幸的殖民地上升起自由旗帜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占有殖民地，是完全非法的。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则靠的是专横和暴政。”

保卫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胜利的消息通知丘基萨卡。其次，是任命穆里略为上校，授权他招募军队，以抵御将来必然发生的反抗。穆里略是个天生的领袖，他同克里奥尔人、梅

153 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相处得一样好。他立即动手把拉巴斯人的三个派别——保皇派、革命派和中间派联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地的总督都在采取措施要镇压这次起义。

当时在库斯科任王室法庭庭长的戈耶内切准将，奉命自库斯科出兵。涅托将军受总督利涅尔斯之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丘基萨卡去。两位将军都是奉命去镇压起义的。当戈耶内切在库斯科、普诺和阿雷基帕三地招募并训练五千士兵的时候，拉巴斯市民对起义军的热情就大大冷却下来。戈耶内切的军队离城越近，保卫委员会的成员辞职的就越多。最后，几乎是只剩下穆里略孤独一人，他既要经管这个城市又要保卫这个城市。当他得知敌军的数目时，他便在1809年10月1日给戈耶内切写信倡议媾和。这封信落到罗德里格斯上尉手里，他怀疑穆里略要出卖他们，于是把信交给了穆里略武装力量的首领因达武鲁。因达武鲁是穆里略提拔的，尽管他们之间在1805年革命时期就产生了冤仇。那时候，因达武鲁是库斯科的市长，对逮捕和囚禁穆里略有不能推诿的责任。保卫委员会成立后，因达武鲁在军队和市政两方面的职位

都低于穆里略。也许是出于嫉妒，也许是惧怕戈耶内切的兵力，因达武鲁以这封信为借口，逮捕了穆里略。随后，他又把其他革命者诱骗到他家，当场把他们全部逮捕。最后，他释放了那些没有支持革命而遭囚禁的保皇分子。

许多为自由事业而应征的新兵，知道了因达武鲁的真实品质之后，都逃到查卡尔塔亚的山地去了。罗德里格斯上尉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要与戈耶内切血战到底。但是在一次战斗中，他本人被因达武鲁俘获，并被绞死在拉巴斯兵营里。他那约有二百五十名士兵的小队伍听到这个消息，便下了查卡尔塔亚山，攻进拉巴斯，杀掉因达武鲁，并 154 把所有的政治犯，除了穆里略，全部释放。他们谴责说，是他引起了爱国者当中的分裂。然后，为了避免与戈耶内切的军队直接遭遇，他们分散到永加斯，只留下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后卫队。

1809年10月25日，戈耶内切进驻拉巴斯城。第二天就开始对穆里略和其他造反领袖检举起诉。1810年1月29日，玻利维亚历史上著名的九位先驱烈士（Proto-Martyrs）在拉巴斯中心广场上被绞死，悬尸示众。他们是巴西略·卡塔科拉，梅尔

乔·希门尼斯,马里亚诺·格拉内罗斯,胡安·安东尼奥·菲格罗亚,阿波利纳尔·哈恩,格雷戈里奥·加西亚·兰萨,胡安·包斯蒂塔·萨加纳加,佩德罗·多明戈·穆里略。[①] 在走向绞刑架的时候,穆里略抖落了披在肩上的斗篷,用大家都能听到的清晰洪亮声音发出这样的预言:“谁也扑灭不了我点燃的火炬。”

几天以后,陆军元帅涅托到达丘基萨卡,恢复了西班牙保皇派对该市的统治,并以谋反叛国的罪名囚禁了王室法庭里的造反派。与此同时,拉巴斯血腥的“安抚者”戈耶内切已离开那个被征服的城市回到库斯科。然而,他所得到的和平并没能持续多久。1810年5月25日,正好是在查尔卡斯第一次发出自由呼声的一周年,又一次起义爆发了。这一次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同以前的起义极为相似,阿根廷人强迫当地政府任命一个由克里奥尔人控制的临时洪达,这个洪达以斐迪南国王的名义统治一切。这些年轻的克里奥尔人曾在科尔多瓦大学和丘基萨卡大学

① 原文仅有此八人姓名。——译者

读过书，或者曾在国外留过学。他们在学校里接受了法国革命的新思想，成了激进派。1807年打败英国人的战绩又给了他们信心。他们听到塞维利亚的中央洪达垮台的消息，便决心要掌握自己国家的统治权。把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拿到手，他们就联合国内的克里奥尔人，使总督辖区的其余地方都获得了独立。155

蒙得维的亚、巴拉圭、科尔多瓦和丘基萨卡的欧洲白人反对这个运动。他们责成利涅尔斯统率一支两千人的军队去镇压。由于戈耶内切的诡计丢了总督官衔的利涅尔斯，在这里的遭遇并不比他作总督的时候强多少。他企图阻挠革命的弗朗西斯科·奥尔蒂斯·德·奥坎波将军占领科尔多瓦，但战败被俘，判刑后被处死。奥坎波于是长驱北上到达上秘鲁。在那里他击败了保皇军，处决了新任命的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庭长、陆军元帅涅托。在库斯科，戈耶内切没有把握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打败奥坎波，便同他缔结了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在巴拉圭和乌拉圭，西班牙的保皇派也决心以战斗保住自己的地位。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一位四十一岁的布宜诺斯艾利

斯人，率领一支阿根廷的国民军反对他们。他在废黜了巴拉圭的省长贝拉斯科以后，率领八百名士兵，联合乌拉圭的何塞·阿提加斯，共同反对拉普拉塔总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埃利奥。沿途他又补充了兵力，因此他和阿提加斯有了足够的力量在1811年5月围攻蒙得维的亚。但是当这个抵抗的最后据点被围时，爱国者们自己便发生了内讧。

关于统治方法和政治主张方面的意见分歧，从洪达扩大到了军队。戈耶内切知道他们指挥者之间有了分裂，便于1811年7月背弃停战协定袭击迪亚斯·贝莱斯上校。迪亚斯·贝莱斯是上秘鲁三个主要的阿根廷兵团的司令官之一。由比亚蒙特上校和巴尔卡塞准将指挥的另外两个兵团，没有一个来援助他，所以迪亚斯·贝莱斯很快地就被击败。另外那两个兵团也不得不撤退到低地去。曾被人民选为丘基萨卡王室法庭庭长的胡安·马156丁·德·普埃雷东接受人们的要求，重新集结了迪亚斯·贝莱斯的败兵残部。他采用游击战术阻击戈耶内切，从而掩护了比亚蒙特和巴尔卡塞开到萨尔塔。戈耶内切使用残暴手段对付游击队，把

俘虏一律枪杀，同情游击队的人也统统绞死。

他的残暴惹起了整个高原对他更大的仇恨。由于他既不能赢得战争又不能结束战争，他的职务便由皮奥·特里斯坦将军接替了。特里斯坦在作战中比戈耶内切干得出色，他追踪反叛者直入阿根廷境内，在那里与贝尔格拉诺遭遇。这时贝尔格拉诺已接管了普埃雷东的士气不振的军队，他知道如何培养士兵的新的信心，如何鼓舞该地区的爱国者。图库曼的公民自己武装起来，同贝尔格拉诺的筋疲力竭的士兵并肩作战，使特里斯坦对这个阿根廷城市的进攻遭到惨败，损失了一千多名士兵和七门大炮。贝尔格拉诺派迪亚斯·贝莱斯追击逃窜的保皇军。1813年2月20日，贝莱斯在萨尔塔追上了他们，特里斯坦缴械投降。

这次胜利使波托西、查尔卡斯、查扬塔和科恰班巴都回到了爱国者的手中，但为时很短。贝尔格拉诺将军从萨尔塔北上到了波托西，企图把高原从戈耶内切和特里斯坦的继承者佩苏埃拉将军手中解放出来。在那里，保皇军占优势。在一系列的交战中，从波托西附近的比尔卡普希奥到查尔卡斯北部的阿约乌马，贝尔格拉诺连遭失败，使保皇

派得以再度统治整个上秘鲁、塔里哈和萨尔塔。

1814年1月，他把领导权交给了克里奥尔人何塞·德·圣马丁。就是这个人的雄谋胆识，使秘鲁在十年以后终于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而获得自由。圣马丁1778年生于科连特斯省① 的亚佩尤。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该地现已改名为圣马丁。他是一个西班牙要员的儿子，从八岁起就在西班牙的一所军事学院学习，七年后被任命为陆军少尉。到157 三十岁时，他获得陆军中校的军衔；在此期间，他曾在葡萄牙边境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北非抗拒过摩尔人。1812年，他辞去职务回到阿根廷，为阿根廷的新政府效力。几个月后，1813年2月，他在巴拉那河的圣洛伦索打败了保皇派的军队。为此，他被提升为将官。贝尔格拉诺毫无怨言地把军权交给了圣马丁，而自甘指挥一个团的兵力，这件事说明了他的崇高的品德。

圣马丁很快又招募了新兵，并抚慰贝尔格拉诺的士卒，使这些人重新成为一支战斗力量。他还组织游击队牵制西班牙人，特别是对西班牙的粮

① 阿根廷的一个省。——译者

秣辎重供应队，不断予以骚扰。他夺取了敌人的给养，迫使他们再度撤退到上秘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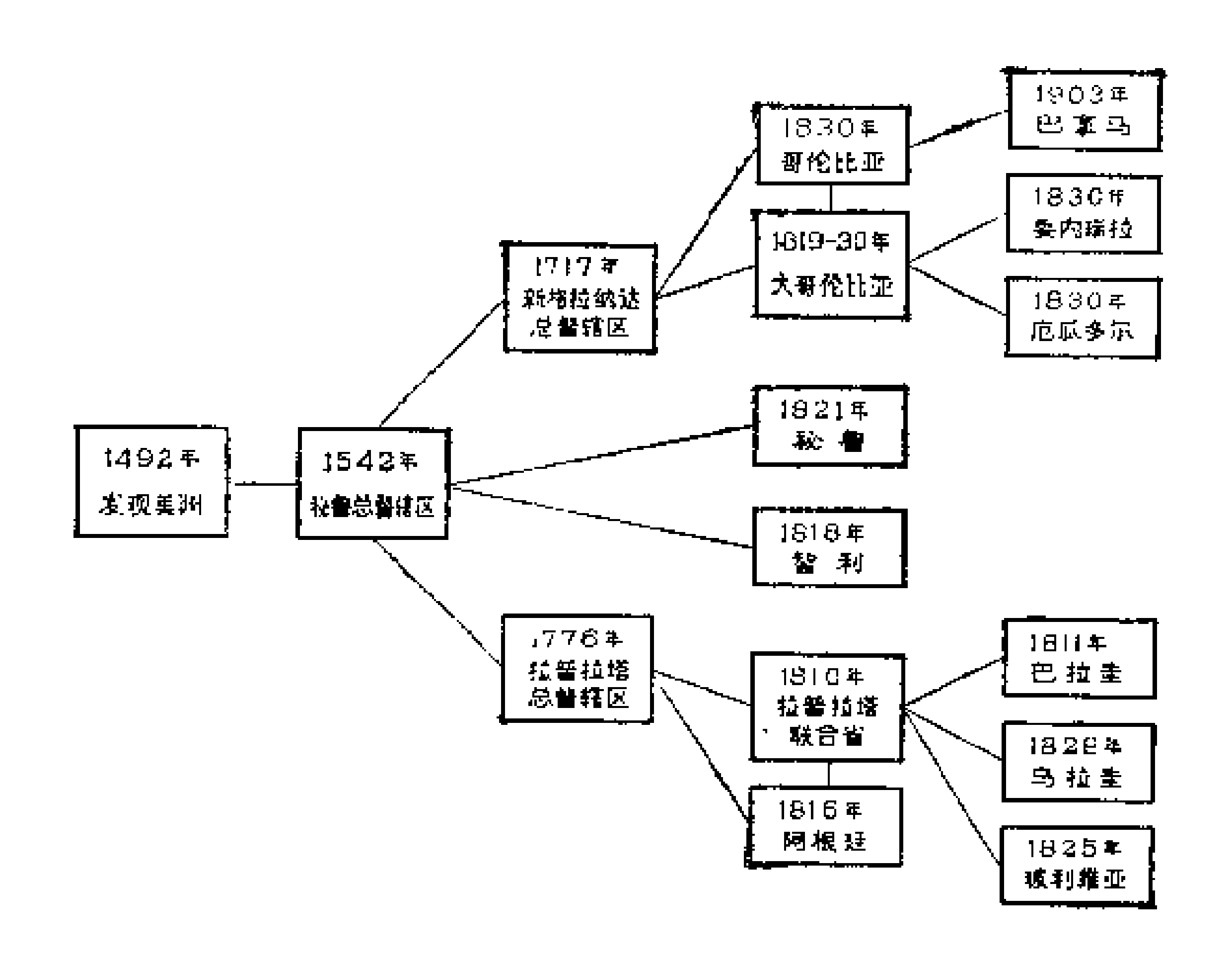
然而，拉普拉塔的爱国者们仍然内讧不息。他们互相争夺权力，争论新政府应该给予人民多大程度的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圣马丁辞去了他的职务。随后，他被指派为库约省的军事指挥官。何塞·龙德奥将军受命指挥上秘鲁军队。他打算占据高原，但他的前卫部队于1815年2月20日在特哈尔被击败，他的计划受到严重挫折。当时巴拉那河上的圣非城早已被乌拉圭的考迪罗（caudillo）何塞·阿提加斯（1764—1850年）占据，因此不能及时给他派去援军。佩苏埃拉将军觉察到，阿根廷军队想要重新夺取圣非必然把兵力分散，便在奥鲁罗和科恰班巴之间的西佩西佩进攻龙德奥，并于1815年11月29日把他全部歼灭。

佩苏埃拉又统治了上秘鲁，但实际上他所管辖的范围几乎仅限于他的军队驻扎的地方。称为共和军（Republiquetas）的游击队，使保皇派经常处于提心吊胆的警戒状态。这些共和军也是非正规的。他们组成了小分队，以祖国和自由的名义控制着上秘鲁的一部分地区。在他们当中，最著名的 158

考迪罗有：阿约帕亚山谷的何塞·米格尔·兰萨，塔里哈的拉蒙·罗哈斯，辛蒂的何塞·维森特·卡马戈，普纳的米格尔·贝坦索斯，山区圣克鲁斯市的伊格纳西奥·瓦尔内斯，和萨尔塔的马丁·格麦斯。

格麦斯和他的一伙高卓人组成的骑兵，进入深山和丘陵地带，设法利用这个地区的森林、干河道和峭壁等地形特点几乎是随心所欲地打击敌人。罗哈斯没有这样幸运，他在塔里哈被佩苏埃拉的部下佩德罗·安东尼奥·德·奥拉涅塔将军打败并处死。卡马戈和另外许多游击队员都被其他保皇派擒获杀害了。

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帕迪利亚和他的妻子胡安娜·阿苏杜赖，在一段长时间内，成功地阻击着大批的保皇军，使之不能出动。他们对一个名叫法尔孔的西班牙将军一直进行着一场消耗战。法尔孔最后派了一千人的大部队到拉拉古亚纳阻击他。帕迪利亚在各前哨阵地布置了精明强干的军官（包括他的妻子）去应战。他们击退了这次进攻，他那位斯巴达式的妻子荣幸地把她亲手缴获的一面西班牙军旗献给了她的长官。由于这项功绩，她本人被提升为陆军中校。但是帕迪利亚同他的一



南美各国独立的演变（根据马里奥·巴拉科·马莫尔为奥梅罗·马丁内斯·蒙特罗的文章《拉丁美洲演变史》所作的图表改制，原载1967年5月《美洲》杂志第19卷第5期）

千名士兵都战死在比利亚尔了。

保皇军用帕迪利亚的头发将其头颅高挂在拉拉古亚纳的广场上，这是要警告其他人：他们的命运也会是这样。但是另一位爱国者，经民众投票选为圣克鲁斯市长的伊格纳西奥·瓦尔内斯，却击败了一支约有一千人的保皇军队，并且几乎把他们全部消灭。当时，在上秘鲁到处都有围歼战。在一次最残酷的围歼战中，伊格纳西奥·瓦尔内斯终于被西班牙的阿吉莱拉将军杀害。三千人参加了在圣克鲁斯附近的这场战斗，生还的只有二百人。

共和军阻住了企图再次走下高原收复失地的160西班牙人，但在前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形势并不平静。1816年，拿破仑已经在滑铁卢战败，费尔南多国王[①]已复就王位。西班牙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都已被镇压下去。但在这个前总督辖区，无政府主义却依然盛行，阿提加斯和巴尔卡塞还在为争夺圣非进行战争，阿尔维亚尔、龙德奥、巴尔卡塞和普埃雷东正在争夺国家的政治领导权。最后，在1816年7月9日召开了图库曼会议，会议宣布拉普

① 此处显系错误，当时复位的应是斐迪南。——译者

拉塔联合省已决定“断绝同西班牙国王们的一切联系……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公正的、适合当前形势需要的政府。”

这个会议还任命普埃雷东将军为它的最高领导。普埃雷东雷厉风行地执行他的政务，恢复了贝尔格拉诺将军统率上秘鲁军队的大权。他派了更多的军队到与智利交界的前线，援助忙于保卫边防的圣马丁。

当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造反军队在智利的兰卡瓜被保皇军击溃时，圣马丁的军队已经得到了增援。奥希金斯是一个爱尔兰士兵的私生子。他的父亲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虽然是爱尔兰人，但是十分忠实地为西班牙国王效命，以致被提升当了秘鲁的总督。小奥希金斯本人在1788年也成了智利的督军。当他越过群山到达门多萨时，他发现圣马丁正考虑从海上进攻打败在利马的西班牙人，而没有象贝尔格拉诺所计划的那样穿过上秘鲁去进攻。1817年1月，圣马丁准备妥贴，率领了四千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士兵，横越安第斯山。事过不久，一个同时代的人用以下的文词颂扬了圣

马丁的成就。

> 他不得不率领一支携带着行装和大炮的军队横越崔巍的安第斯山。三百哩的征途都是崎岖不平几乎无法攀登的高峰和隘路；在那令人胆寒的悬崖上，沿着它那视之目晕的边缘仅能容两人并肩走过。悬崖上长年不消的冰霜毫不留情地覆盖着一切。率领一支军队越过这条世界最高的山脉，比起那举世闻名的汉尼巴尔越过阿尔卑斯山要更为大胆更为艰巨。在历史的篇章里也许没有能胜过它的了。……他们用十三天的时间，征服了这座冰天雪地的安第斯山，完成了登峰越岭的进军，但是损失了五千匹骡马和少许士兵。

161

能够征服安第斯山的人，要打败西班牙人是没有困难的。2月12日，他们在查卡布科突然袭击了西班牙人，并把他们一举歼灭。这一仗是圣马丁勇猛无畏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他随即又向圣地亚哥进军，西班牙人从城里匆忙撤退。一个市政大会

迅速召开了。智利人看到在1814年兰卡瓜战役后丧失的独立又得到恢复非常高兴，要求圣马丁做他们国家的首领。圣马丁知道需要他做的工作依然很多，谢绝了这项请求。于是那位随同他越过安第斯山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便被推选担当了这个职务。奥希金斯是个富于空想的人；他提倡的民主改革引起了智利贵族们的反对，于1823年被罢免。后来他采取自我流放的办法来到解放了的利马，1842年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也是积极活跃的。在他统率秘鲁军队后不久，他的老对手佩苏埃拉下了台，接替他的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赫赫有名的西班牙将军何塞·德·拉塞尔纳—伊诺霍萨。这位将军野心勃勃想重新夺回佩苏埃拉迫不得已放弃的地方。1817年初，他率领两千人马向胡胡伊和萨尔塔低地推进。格麦斯，这个考迪罗和他那一帮不畏艰难困苦的高卓人一再袭击他们。虽然拉塞尔纳最近从西班牙得到了一些装备最好的精锐士卒，可是他发觉他既不能接济他们粮秣也回避不了到处都有的马丁·格麦斯的高卓士兵。经过四、五个月的连续失败，他只好放 162

弃再次征服那些地方的计划，回上秘鲁去了。

贝尔格拉诺在格麦斯和埃斯特万·费尔南德斯那样一些游击队的帮助下，与保皇军交战三年之久。这些游击队在印加帝国所修的太阳公路上配合着他不断骚扰西班牙人。他也从格雷戈里奥·阿劳斯统率的阿根廷第四军和伟大的玻利维亚将军安德烈斯·圣克鲁斯那里得到帮助。然而，这些流血的小战斗没有能赢得上秘鲁的自由。他们的行动在这个地区却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圣马丁占领利马后才结出硕果。

圣马丁虽然平定了圣地亚哥，但抵抗的据点在智利仍然存在。此外，利马的总督也决定尽可能地把利马战役推进到智利国境里去打。正当圣马丁在为进攻准备舰队和训练陆军的时候，这位总督把五千人海运到了康塞普西翁的港口塔尔卡瓦诺。该地位于圣地亚哥南一百五十哩。他们的总指挥奥索里奥将军立即把军队开往首都，目的是在圣马丁的援军到达之前把奥希金斯阻截在那里。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他的队伍在去塔尔卡的路上一直遭受到圣马丁的非正规军的狙击。但是到了塔尔卡，奥索里奥发动了一次夜袭。圣马丁的

军队受到突然袭击被迫撤退。这位阿根廷将军忍痛回师退守圣地亚哥。在爱国者们的协助下，经过一番特别的努力，他在那里把军队重新组织起来再战奥索里奥。新战役发生在迈普平原，正是查卡布科战役胜利一周年的时候。1818年4月5日，在圣地亚哥附近，一场在整个革命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决定了爱国者们在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的全盘胜利。

因为在上秘鲁的大部分西班牙军队不是早已被击溃就是正同贝尔格拉诺作战，所以圣马丁能够完成他进占秘鲁的准备。指挥圣马丁的小型海军的，是托马斯·科克伦勋爵。他是个刚勇的、有献身精神的英国海军军官。由于股票投机问题，当 163 时他在国内名声不佳。除他之外，很多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失业的英国和美国军官也参加了圣马丁的队伍。1819年，科克伦已拥有七只战船准备去攻打秘鲁，其中一只船上竟装备着六十门大炮。他封锁总督的各个港口达一年之久。他炮轰卡亚俄，袭击瓜亚基尔，还俘获过停泊在那里的一个西班牙舰队。1820年8月18日，有将近五千名士兵在瓦尔帕来索登船。随船还带去了足够装备另外一万五

千人的武器和军装，因为圣马丁预计他的部队一登陆，就可能有这样多的秘鲁人来参加。圣马丁在启程前夜发布公告说："南美洲对世界其他各地的影响，应当同它的幅员、财富和位置相称。这次远征，将要决定发挥这种作用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

尽管是顺风，圣马丁还是用了几乎三个星期才到达利马以南约一百五十哩的皮斯科。西班牙的总督要求给一个星期的时间讨论和解的条件。由于到期没有回讯，圣马丁把军队向北开到安孔。在那里，他住了几乎一年，认真地帮助进行争取独立和建立南美联盟的宣传工作。

与此同时，科克伦勋爵把他的舰队停泊在利马的港口卡亚俄的外围。在港内，为了保卫利马免遭海上的任何侵略，除了卡亚俄要塞的重炮外，还有一艘装有四十门炮的快速战舰、两艘单桅战舰和十四艘炮艇。1820年11月5日夜晚，科克伦勋爵率领二百名志愿兵乘小船偷偷地登上了那只快速战舰。一掌握了这只战舰，他们便对西班牙舰队的其余船只有了压倒的优势。这一仗永远结束了皇家海军在太平洋的统治。

这惊险的海战功勋发生在距利马王室法庭如此之近的地点，致使该城大受震惊。人们开始云集到圣马丁的旗帜之下。原来派去攻打圣马丁的皇家军的一个团全部叛变，向圣马丁投降。圣马丁正想尽量地不损失一兵一卒，于是收纳了这些新兵作为他愿意同已当上总督的拉塞尔纳谈判的一种表示。和谈随即开始，但是拉塞尔纳总督仍然不同意完全独立。1821年7月，圣马丁离开安孔向利马进军。这位总督知道他抵挡不住圣马丁的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便鼓励市民躲到卡亚俄军营去或逃往山里。市民们逃跑的很多，以致当圣马丁来到时，利马几乎已成为一个空城。圣马丁并没有立即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城，而是停驻在这首都的郊区，同时派去使者，说明他将仅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城。他甚至提议由城里的官员们统率他手下的一部分人来保护财产维持治安。他这样的做法，再加上他进城时只由一个副官陪同，博得了很多恭维和称赞，因此1821年7月28日，人们献给了他“秘鲁的保护人”这个称号。

他为革除当地的恶俗弊习，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境遇和废除奴隶制度，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他组

织了一个在永久性宪法制定之前管理国家的临时政府。这时候，在拉塞尔纳领导下的保皇军正在内地进行训练，而圣马丁的军队由于闲散无事已丧失其战斗精神。他派出一个分队去侦察敌人的力量，竟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圣马丁预见到他单独不能打败拉塞尔纳，于是从利马乘船到瓜亚基尔，在那里，他于1822年7月26日同大哥伦比亚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会晤。

他们谈话的主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玻利瓦尔提出了用哥伦比亚军队帮助他最后赶走保皇军的建议；作为交换条件，圣马丁可能答应担任一个次要的职位。这位活泼潇洒、容光焕发、健谈善辩的玻利瓦尔将军，当时的荣誉正处在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似乎不会以附有条件的办法向别人提供援助。他和圣马丁都在165梦寐以求地渴望建立一个南美洲各共和国的大联邦。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如果这个大陆的心脏地区仍然控制在保皇军手里，他们的理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圣马丁那时搞得疲惫沮丧。他已是四十四岁。在那个时代，四十四岁是令人尊敬的年华，特

别是在他迫不得已做出了一番努力之后更是如此。但是，秘鲁的政局，他的追随者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使他有所醒悟。贵族和统治阶级放弃了他们的民主原则，甚至进而驳斥谋求独立的思想，这使他灰心丧气。因此他悄悄地又乘船回到利马。

不管这两位巨人为拉丁美洲的独立讨论了些什么，在那次会谈之后不久，哥伦比亚使开来了军队增援圣马丁。然而一个月后，在第一届秘鲁联邦省制宪大会上，这位保护人主动放弃了他的职权。他在辞职时说："我在一些国家作过战，我对这些国家所许下的诺言现在都实现了。我使他们获得了独立。现在我让他们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

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回到阿根廷。1824年他带着他唯一的女儿梅塞德斯从阿根廷到了法国，成了自愿流亡海外的人。1850年8月17日，他在滨海布洛涅逝世。他离开了他所解放的这些共和国，以避免政治分裂的灾难。但是他的伙伴玻利瓦尔却很快地被卷了进去。

圣马丁所留下的那个无领袖的政府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洪达接管。尽管西班牙人对这个国家仍然是个威胁，但人民对文官政府却越来越不安和

不满。最后洪达的主席解散了议会，混乱随即发生。西班牙人趁火打劫，于1823年6月卷土重来，又占领了利马。

在此期间，玻利瓦尔正忙于为哥伦比亚的独立进行最后的几场战斗。他认识到如果秘鲁再度陷入西班牙人手中，他自己的新共和国将要经常受到威胁。因此当秘鲁人向他求援时，他很快地派出了一支约有三千人的兵力。

166

保皇军退守到上秘鲁，但仍然控制着下秘鲁的大部分土地，玻利瓦尔不仅面临着在山区的一支顽强的敌人，而且要应付爱国者当中政治上的不和。前洪达主席实际上招募了足够的支持者反对玻利瓦尔和新成立的议会。但是他的反叛很快就被粉碎了。尽管如此，玻利瓦尔还是感到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有必要退到特鲁希略去。他离开之后，利马便形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保皇军又利用这次倾轧纷争重占了卡亚俄要塞。在遥远的特鲁希略，玻利瓦尔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招募训练了足够的人员去对付他们。在此期间，西班牙人之中发生了政治纠纷。

国王斐迪南七世下令中止议会，并擅自建立

了自已的绝对权势。这样他就分裂了秘鲁的保皇军。拉塞尔纳总督和他的两位主要将军站在宪法派一边。仍然统率着上秘鲁军队的佩德罗·安东尼奥·奥拉涅塔将军支持斐迪南国王，反对总督。拉塞尔纳总督于是派出五千人镇压这个叛逆的将军。由于分散使用了他的兵力，结果他丢掉了秘鲁。

此时玻利瓦尔的兵力几乎扩充到了九千人，1824年6月15日他命令他们沿着不同的道路越过安第斯山。这些道路是他那位最能干的部将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将军侦察过的，其中有一隘道高达一万六千五百呎。各路军队最后集合在海拔约一万四千四百呎的塞罗—德—帕斯科露营。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国际军队；其中有来自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的士兵，甚至还有一些来自英国的士兵。

他的敌手是西班牙的坎特拉克将军。这位将军把军队集结在胡宁附近的平原上，这也是个海拔一万四千呎的高地。坎特拉克命令他的大部分 167 军队留守在营地，他亲自领着骑兵去侦察玻利瓦尔在帕斯科的阵地。当他到达那里时，玻利瓦尔的

军队已经转移不见了。在匆匆返回的路途中，他发现玻利瓦尔的骑兵在距皇家军队约三哩的地方正沿着一条狭窄的隘道往坡下开去。他命令他的一千三百名骑兵在玻利瓦尔的九百名骑兵调整队形之前立即进攻。再过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但是，就在人们还能看到对方的这段短暂的时间之内，西班牙军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为玻利维亚独立而进行的这场最重要的战役中，自始至终都是白刃战，一枪未发。爱国者们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的枪骑兵（llanero）用的武器是十呎长的长矛，而西班牙人用的则只有七呎长。敌人损失二百四十五名士兵和十二名军官，伤者较多，临阵逃亡的则为数更众。玻利瓦尔方面仅有四十五人死亡，一百人负伤，不过，指挥骑兵的阿根廷将军内科切亚本人却受伤达七处之多。

1824年8月6日的辉煌胜利，由于坎特拉克临阵脱逃投奔了在库斯科的总督而更增声色。这正是重新夺回利马和卡亚俄的大好时机。玻利瓦尔命令沿海部队的指挥官，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人，包括住在医院里的病号，全部征集起来去围攻这些城市。他本人也回到海岸地区，于11月7日进驻利

马，并亲自指挥围攻卡亚俄。

另一方面，玻利瓦尔留下了苏克雷将军指挥秘鲁解放军。拉塞尔纳一直在扩军，甚至曾到遥远的波托西去招兵买马。到12月份，他已拥有一万一千多人去雪胡宁战役败北之耻。他的士兵几乎为苏克雷的两倍，因为苏克雷指挥的不到六千人。但是苏克雷的战略却比他高明得多。敌人在孔多库卡山的各个山坡上，面对着阿亚库乔高原安营扎寨。12月9日，两军相遇。苏克雷的战略是阻止西班牙把整个兵力组织起来。双方一交锋，苏克雷便将对方割整为零。不到两小时便打败了坎特拉克和拉塞尔纳的联军，获得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两位联军统帅连同另外十三名将军都被俘获。这是为南美洲独立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不过在奥拉涅塔将军指挥下的保皇军一直到1825年4月1日才被完全击溃。关于这次胜利，苏克雷写信给玻利瓦尔说："这次战役结束了。秘鲁的独立和美洲的和平已在这个战场上签了字，而且这次签字是一劳永逸的。"

168

下秘鲁解放后，苏克雷将军挥师直捣上秘鲁，攻打奥拉涅塔将军。1825年8月6日，玻利维亚人宣

告独立。其实，早在四个月以前击溃奥拉涅塔将军的时候，他们的独立就有了保障。玻利瓦尔被称为“上秘鲁之父”。为了对这位新共和国的解放者表示敬意，上秘鲁的拉巴斯、波托西、丘基萨卡、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五个省，于1825年 8 月25日联合一起命名为玻利维亚。第二年，遵照玻利瓦尔的计划制定了宪法，这个国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往往也是动乱的生活。

第 七 章

新 共 和 国

专制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组成一个巨大的气势逼人的海洋，包围着一个小小的自由之岛。这个小岛始终经受着狂飙巨浪的冲击，时刻都有淹没的危险。因此，要当心你们就要横渡的这个海洋，你们乘的是一只单薄的小船，舵楼上是一位如此缺乏经验的舵手……政府官员们的职责，在玻利维亚宪法上用最明确的语言作了规定。没有责任和约束，国家就要混乱一团。

——西蒙·玻利瓦尔1826年在制宪会议上的讲话

玻利维亚，它是第一个为争取自由拿起武器的南美国家，而获得自由却是最后一个。不过，那为独立而斗争的十五年苦难岁月，要和独立后组

织整顿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艰苦年代相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高原的游击战争破坏了城市的政权。许多爱国者迁往阿根廷，那里从1810年起就得到了独立，并有了一个象样的政府。另一些爱国者，经过多年战争已是意志消沉。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想无动于衷，只是自私地关注个人的生存，计较170他们自己在战争中长期经受的苦难应得的报酬。

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归属关系问题。上秘鲁从1776年起，就属于拉普拉塔总督管辖。在它1809年声明独立之后[1]，特别是在1810年阿根廷也宣布独立之后，秘鲁总督企图重新管辖它。佩尼亚洛萨指出：战争摧毁了上秘鲁同利马以及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两个首都的商业关系，从而造成了它的孤立。这种孤立又使它产生了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以致后来高原的人们不但和西班牙人、而且和阿根廷人、秘鲁人也断绝了关系。

阿根廷人在战争期间帮助过上秘鲁，因此一些上秘鲁人倾向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在胡宁和阿亚库乔赢得辉煌胜利之

① 参看第六章第200—203页。——译者

后，这个地区自然就交到了委内瑞拉的解放者手中。苏克雷接受了秘鲁议会授予的“阿亚库乔大元帅”的称号。玻利瓦尔曾指示他不要干预上秘鲁的内部事务，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两地的人民与他们的共和政府自由地决定他们应当怎么办。玻利瓦尔还提醒苏克雷说，他们的愿望必须由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议会审定批准。布宜诺斯艾利斯方面通知玻利瓦尔说，他们将尊重高原人们的愿望。身在阿雷基帕的玻利瓦尔觉得可以向他们保证，秘鲁议会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过他自己的心情是：上秘鲁和下秘鲁还是应当联合在一起。然而，苏克雷一到拉巴斯，就冒冒失失地宣布召开一个大会来决定这个地区的命运。

苏克雷在1825年2月9日发表布告说，在选出代表以前，这个地区将由解放军控制。它还提出，人民的代表应当考虑决定他们究竟是同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还是同利马联合，或者是独立。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这三种办法都有自己的热情的支持者，不过人数并不相等。

当推荐选举人的工作正在进行之际，1825年 171
4月1日苏克雷与佩德罗·奥拉涅塔将军的残

余部队，在图穆斯拉打起来了。在阿亚库乔战役之后，奥拉涅塔的军队由于打败仗和士兵逃亡已损失大半，但他仍顽强抵抗。在这次战斗中，他亲自出面阻止一批士兵临阵脱逃，被他自己的人杀害了。他的死，标志着西班牙政权在南美洲的结束，有效地保证了上秘鲁的独立。

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因，把原定在丘基萨卡召开的大会推迟到1825年7月10日才开成。讨论进行得热烈而且激动。大会开了将近一个月。代表们发泄了郁积在内心的感情。最后，在1825年8月6日，胡宁战役周年纪念日，大会主席何塞·马里亚诺·塞拉诺要求投票。赞成同阿根廷重新联合的只有一票，同秘鲁联合的有两票，其余的所有代表都投票赞成玻利维亚共和国完全独立。“二月布告”本来的目的达到了。

大会授予玻利瓦尔“国父、保护人、第一任总统”的头衔。只要他生活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共和国，就这样称呼他。他不在时，由苏克雷代行职务。此外，大会还要求玻利瓦尔协助起草宪法。

当时正在普诺休息的玻利瓦尔，知道了大会对他的请求和新授给他的荣誉。最初，他很犹豫，

不能决定是否接受。因为他仍然认为：这个新共和国如果不与两个有天然联系的海岸国家任何一个联合起来，它将不能存在。但玻利瓦尔一定是认识到，他自已没有能力使局面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取道拉巴斯、波托西到丘基萨卡去了。在拉巴斯，他往加拉加斯写信说："我受命保卫玻利维亚死而后已。我把它当作第二个哥伦比亚。我是哥伦比亚的父亲，玻利维亚的儿子。"在波托西，他登上了塞罗里科。当升起新共和国的国旗时，他向士兵们宣布说："我们已经把这面自由的旗帜，从奥里诺科的炽热沙漠胜利地带到这里，并把它插上了这座高耸的山顶。这是我们的光荣。这座山的白银宝藏是使整个宇宙惊愕和羡慕的财富，但我认为比起我们的光荣来，这些财富是一文不值的。"到了丘基萨卡，他耳闻目睹的是要求独立的普遍呼声，这也就是以前苏克雷所听到的那种呼声。这呼声一定对他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当他到达会场时，他已改变主意，赞成这个共和国的独立事业了。他一到达，就允诺要在1826年5月25日以前把宪法草案准备好。他说："那一天将成为玻利维亚诞生的日子。"

172

玻利瓦尔比他身边的大多数立法者都更清楚地认识到独立自治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组成全国人口的种族是复杂的；人民几乎完全是文盲；缺少真正的中间阶级；天主教已掺杂了迷信成分；克里奥尔人怕干活弄脏了手；政治上的偏激行径，受到那些在革命中涌现的狂热爱国者的宽恕；缺乏社会和公民的团结。还有一种社会趋势，那就是对民族英雄只是盲目崇拜，而在他当选就职之后，却不给予合作支持。

玻利瓦尔来到这个共和国之后不久，他本人就遇到一件讨厌的事。这件事就是上述最后一种问题的一个实例。阿根廷派了两位将军去问候玻利瓦尔，并告诉他说，拉普拉塔联合省承认他的共和国。不过，他们要求把塔里哈省划给他们。他们认为，从文化和地理两方面来看，这个省同萨尔塔[1] 比同上秘鲁更为接近。他们还要求军事援助，以抵御巴西。因为巴西正威胁着要夺取那时仍然属于联合省的乌拉圭。玻利瓦尔拒绝了第二个要求，同意了第一个。他下令让塔里哈归属联合省。

---

[1] 萨尔塔是阿根廷北部的一个省。——译者

他相信新共和国没有能力管辖这样遥远的一个省份。他这两项决定都不怎么高明。巴西人得知对攻打他们的提议曾经予以考虑，大为震惊。阿根廷人也不满意，因为他们毕竟是对独立战争作过贡献的，现在他们的要求只兑现了一半。玻利维亚人则对这个未满周岁的共和国的分裂深感焦虑。塔里哈人群起反对，国民议会谴责了他的行动。国民议会对玻利瓦尔这一决定的否决，极其自然地破坏了玻利维亚同阿根廷日后的关系。以后，两国的边界问题始终是他们争执的焦点，一直到1889年签订了条约才得到解决。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玻利瓦尔的决定则是比较明智。在呆在这个国家的短暂时间里，他对有关这个国家前途的一切重大事情，几乎都颁布了命令。他禁止以任何方式强制雇佣印第安人。他禁止军队把印第安人当作农奴使用。他也禁止传教士为筹集宗教节日开支向印第安人敲诈勒索。他制定法律，以保证矿工和农民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他创建学校，命令对国家的河流进行研究，看它们是否能用于灌溉。他还提倡植树造林，建立印刷厂，并尽一切力量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甚至同英

国的资本家们磋商关于开发和出售波托西矿藏的事情。这些矿在战争年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波托西的人口，已从最高十六万下降到可能只有六千了。他访问过这座一度富裕的城市，认识到这个城市需要新的投资和技术。在他同苏克雷一起工作的时期，他任命了国务部和财政部的部长，并建立了地方法庭。他把在殖民地时期王室法庭所管的民事行政从地方法庭分了出去。他还将玻利维亚各地划分成省，省下又设区和县。

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也反映了玻利瓦尔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玻利瓦尔对美国十分174钦佩。有一次他赞扬美国是“如此崇高，以致适合于作为圣徒的共和国”。但他警告人们，不要以为把美国宪法译成西班牙文就可以在拉丁美洲各国应用。他常说，西班牙人没有给他们的殖民地留下成立联邦政府的现成条件。他认为，仁慈的家长制度或温和的专政制度，比民主政治和联邦制度更为合适。不幸的是，在他所解放的那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成立了坚强的、有秩序的专制政府，从而使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制宪会议对玻利瓦尔的宪法草案所作的唯一

修改，是添加了第六条。这一条规定天主教为国教，并排斥所有其他宗教。除了这一点外，这个宪法把他的政治主张都写进去了，其中规定要成立一个有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总统任职终身。这位被反对宪法的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rey sin corona）的总统，将挑选他自己的副总统和各部部长。国家权力不再是分成三部分，而是分成行政、司法、立法、选举四部分。这最后一部分是来源于卢梭的著作。人民获得权利每一百人中选出一名选举人。选举人任期四年，他们投票选举国会议员，并提名法官和其他重要政府官员。

立法机关由三个院组成，每院有二十个护民官、议员和监察官。护民官每四年选举一次，议员八年，监察官任职终身。立法部门所通过的法律，由行政部门执行，监察官有权评定行政部门是否贯彻了法律的本旨。

宪法也对个人权利提供了保证。玻利瓦尔写道："公民自由是一项真正的自由……财产权将由民法规定……对于法中之法——平等，我未加改动。忽视了它，一切权利和保障将都化为乌有。为了它，我们应当不惜一切牺牲，并把奴隶制度的不

光彩的丑恶的余孽抛在它的脚下。"尽管玻利瓦尔
175 的宪法充满了这些说教，充满了"自由""民主""新的政治体系"一类的词语，但他的这个高度理论性的文件，并没有产生神力。而存在于殖民地封建主义和现代民主之间的鸿沟，至少需要奇迹才能逾越。

到后来，玻利维亚的第一部宪法，被认为是玻利瓦尔的最大错误。因为它不切实际，人们不再尊重它。许多条文从未实现。在国际关系、民主和社会进步各个领域里，他的自由、宽厚的原则，一直没有被他的同代人所理解。几乎在他离开这个国家，回到利马，转往哥伦比亚之前，他的命令、法律和宪法就遭到了驳斥。

诚然，由于这个国家的状况和人民的态度，由于革命并没有使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有大的改变，玻利瓦尔的许多政治主张不可能顺利地实施。在1809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封建一殖民地制度，没有丝毫变化，以致一直继续到现代。

发了财的士兵们准确地估计到，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源泉。因此，违法案件有增无已。他们声称，因为解放国家有功，

他们理当参与政府工作。于是，他们用分赃的方式，分据了各个要职，以建立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些军人政治家，通过给他们的支持者各种希奇古怪的许诺，以维持自己的总统、保护人或独裁者的职位。只有在他们陷入彼此争吵的时候，这些考迪罗们(对政治领袖们的称呼)才尝到政府被推翻的苦头。在共和国初期，选举对改换政党或改变政府体制很少有什么作用。控制政治舞台的，几乎总是某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过，有时候他们属于自由党，有时候属于保守党。

自由党吸引着商人和受到法国革命影响的知识界。他们拥护一个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联邦形式 176 的政府，反对外国和宗教对政府施加影响。

保守党则由传教士、庄园主和大农场主组成。他们所持的观点一直和自由党相反。他们自己就和外国结成联盟，并欢迎外国的投资。他们赞成有一个由国家津贴的强有力的教会和贵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但是普通群众对政治从来是不大明白的。一般说来，谁许诺的最多最好，他们就服从谁。那些考迪罗们装扮成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使玻利维

亚的无知群众在混乱不安之中度过了解放后的七十五年。从获得独立到该世纪末，政府受军事政变的威胁或因军事政变被推翻，达六十多次，并有六个总统在任职期中被杀害。

1826年5月26日，代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德·苏克雷(1826—1828年)成为玻利维亚第一个选举出来的国家领袖。他是按照玻利瓦尔那个规定总统任职终身的“终身宪法”(constitución vitalicia)由议会选出，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苏克雷出生在委内瑞拉，任总统时三十一岁。他那挺拔的军人姿态，使他的中等身材显得高了一些。又黑又长的络腮胡子，把他的高脑门和细鼻子陪衬得更为明显了。他比不上玻利瓦尔那样英俊。但是他那活泼的性格、轻松的风度、明智的见解，使他在所有和他交往的人们之中，一下子就能获得社交成功。

然而，从他任职开始(他拒绝任职终身)，他便受到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他的二百万美元的预算，远远超过了可以征收的税款。特别是大多数地方长官拒绝按规定把应该交纳的税款上缴中央，预算更无法保证。苏克雷深信，解放

者玻利瓦尔代表印第安人的利益颁布的社会和经济法令永远也不能付诸实施。因此，他完全丢开了那些法令。他最大的成就是作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社会调查。目的是要减少阿尔卡瓦拉（alcabala）和其他殖民课税。他还注意到建立学校和孤儿院，并鼓励向这个新共和国移民。 177

在政治方面，他面临着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问题。他是委内瑞拉人，却当选为玻利维亚的总统，这是因为玻利瓦尔帮了他的忙。但是，许多玻利维亚人都热切希望得到这个职位。他们心怀忌妒地暗中破坏他的权威。传教士也反对他，因为他用了以前属于教会的钱去资助国民教育事业。他的几个地方长官（prefect），如波托西的卡西米罗·奥拉涅塔、拉巴斯的圣克鲁斯将军和丘基萨卡的何塞·马里亚·佩雷斯·德乌尔蒂尼内亚，都有近似叛国的行为。特别是在到了交纳公共基金时，他们都有问题。四年前，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皮钦查战役中，圣克鲁斯将军是苏克雷的副司令，后被玻利瓦尔任命为苏克雷的继承人。然而在政治上，圣克鲁斯反对他的领导者。他积极为实现上秘鲁和下秘鲁的联合而努力。这是他终生确认

不移的理想。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认为他是玻利维亚最伟大的领袖。

1826年8月26日，当塔里哈的市民拿起武器反对阿根廷时，苏克雷在那里遇到了无法控制的国际纠纷。但更大的风波是由玻利瓦尔留在高原的二千名哥伦比亚士兵引起的。人们以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使哥伦比亚能控制这个新共和国。当下秘鲁[1]与哥伦比亚陷入一场剧烈的边界纠纷时，下秘鲁人要哥伦比亚士兵离开高原。因为他们怕哥伦比亚会命令这二千人从南方包围他们。

当时圣克鲁斯将军是秘鲁政府议会主席，很可能要利用他的影响，搞掉在上秘鲁的哥伦比亚人。于是一个哥伦比亚大队在1827年12月起义，但被政府的军队迅速镇压下去了。四个月后，在4月18日，另一支哥伦比亚大队又在丘基萨卡造反。苏克雷赶到那里，想控制住他们。但他右臂受了重178伤，并被造反的士兵扣押起来了。秘鲁方面为防备可能出现的哥伦比亚人的入侵，早就派了阿古斯丁·加马拉将军驻防在边界上。这时他听到苏克雷被扣的消息，就以营救苏克雷为借口，侵入了玻

① 即现在的秘鲁。——译者

利维亚。很可能这些人受了圣克鲁斯及其他人的鼓动，是想要把玻利维亚兼并到秘鲁去。在这些敌对分子的控制之下，苏克雷和加马拉议定了一个条约。苏克雷以一系列屈辱的条件，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辞职、哥伦比亚部队的撤退和宪法的重新修订，换得了秘鲁人的撤退。苏克雷不但身体受伤，并且由于那些他曾为之工作多年的人民如此忘恩负义，心灵上也感到十分痛苦，他从瓜亚基尔写信给玻利瓦尔说："我带着断残的右臂回到了哥伦比亚。这是一场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是在秘鲁人煽动下，加上某些玻利维亚人的协助而爆发的。"

过了不久，苏克雷挽回了他的声誉。西蒙·玻利瓦尔派他担任大哥伦比亚南部三个省的民政和军事长官。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厄瓜多尔共和国。玻利瓦尔指示他，要同秘鲁和解。但加马拉将军和拉马尔将军看不出跟玻利维亚和解有什么好处。他们以几乎两倍的优势兵力发动了进攻。1829年2月27日，苏克雷就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在塔尔基应战。经过仅仅两个小时的战斗，加马拉的八千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损失了一半。苏克雷，这位胜利者，仅有不到四百人的伤亡。他向秘鲁提

出的条件是宽厚的。他只是命令他们离开这个国家。

玻利瓦尔听到秘鲁进攻的消息，从波哥大匆忙赶到基多，又从基多赶到瓜亚基尔，在那里，他患了霍乱。当他能行动时，他便立即折回波哥大。在波哥大，他得知曾在皮钦查同苏克雷并肩作过战的何塞·科尔多瓦将军已经背叛了他，便派奥利里将军前去镇压。他刚把人派出去，就听说委内瑞拉各省已经决定退出大哥伦比亚。苏克雷当时任哥伦比亚议会主席。玻利瓦尔敦促他到加拉加斯去把委内瑞拉人劝回来。苏克雷劝说无效。他在波哥大向议会汇报了谈判失败的情况，接着又去基多。1830年6月4日，当他骑马穿过帕斯托附近贝鲁埃科斯山的森林时，被一个有忌妒心的考迪罗伏兵杀害。

179

玻利瓦尔本人，在一年前曾遭受桑坦德将军策划的一次暗杀袭击，并未丧命。而这次，他心爱的部将被谋害的消息却加速了他的死亡。当时他患霍乱病后身体仍然虚弱，朋友们的背叛使他气愤痛心，南美联邦的宏大计划未能实现，使他深感自疚。在这种心情中，正在卡塔赫纳附近休养的玻

利瓦尔得到消息：苏克雷已经死了。当晚他整夜徘徊于海滨。疲乏、沮丧、受寒夜过度的潮气所袭，他得了感冒。以后委内瑞拉的新议会又使他在屈辱和愤懑之中度过了五个月。这个新议会表示，只要玻利瓦尔还呆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就不同哥伦比亚谈判。此外，厄瓜多尔脱离哥伦比亚的独立声明，以及最后在波哥大的武装起义，都使他灰心气馁。他因精神忧郁身体十分虚弱。当他被召回波哥大，恢复他领导全国的职务时，人们不得不抬着他上船。12月1日，他到达圣玛尔塔，然后被送到了三哩外的一个名叫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农庄。在病危的时候，他口述了他的不平凡的遗嘱：

哥伦比亚的公民们：

你们已亲眼见到，在这一度为暴政统治的地方，我曾为争取自由而努力奋斗。我大公无私地刻苦工作，牺牲了我的财产和我内心的平静。当我确信你们怀疑我的动机时，我辞去了领导职务。敌人利用人们的轻信，摧毁了在我看来是最神圣的东西——我的声誉和我对自由的热爱。对我横

180

加迫害的人们把我带到了坟墓的边缘，我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但是，我宽恕他们——除了热切期望哥伦比亚得到巩固之外，我不追求任何其他荣誉。

1830年12月10日于圣玛尔塔

十天之后，他死于肺病，终年47岁。他的死，宣告了大哥伦比亚的终结。然而这位打败了西班牙人的胜利者，给拉丁美洲留下了五个国家，其中一个仍然骄傲地用着他的名字。

苏克雷离开玻利维亚之后，议会选出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为临时总统（1829—1835年）。当时他正巧在智利执行一项外交使命。在他就任总统之前，他的临时副总统已被免职，他的继任人已被暗杀，局势一片混乱。

这位新总统于1792年11月30日[①]出生在拉巴斯附近，母亲是印第安人，父亲是克里奥尔人，他在戈耶内切的军队里做过副官，到1817年已被提

① 他在1792年12月5日受洗礼，命名为安德烈斯·圣克鲁斯—比利亚维森西奥—卡拉乌马纳，可能他就是生在这一天。

升到陆军上校的地位。由于军士长包蒂斯塔·拉瓦列的劝告，他相信在圣马丁将军的部队中服务，能为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圣马丁接受了他的申请，让他在解放军的一个部队担任领导工作。1823年，在塞皮塔，他首次获得了重大胜利。在胡宁战役中，他因有战功晋升到旅长级；阿亚库乔一役，他又升到了师长级。1825年1月22日，玻利瓦尔为了表彰他的战功，授予他“塞皮塔大元帅”的称号。在何塞·拉马尔当选总统以前，他一直是秘鲁的代总统。以后，他被任命为秘鲁驻智利的全权公使，直到被召回做玻利维亚总统的时候。

他上任后不久就使政府恢复了秩序。然后他开始进行改组政府和革新财政的运动。1831年，他致书议会，极力主张国家必需做到自给自足。他建立了贸易学校、艺术学校、拉巴斯大学和科恰班巴大学。圣安德烈斯大学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还组织了军队和国家警卫队。1831年，他召开第二届制宪会议，修订玻利瓦尔原先的宪法。新宪法保存了政府的共和体制。它把三权分立缩减为两权，基本上是保守的。它完全取消了第四种权力机构——选举院。它对总统职权做了限制；总

181

统由终身任职改为任职四年，但是可以再次当选。在国务会议和最高法院的同意下，总统有权解散立法院。这第二部宪法使圣克鲁斯可以把职权牢牢掌握在手，尽管面临各种困难，还能治理这个国家。三年以后，他又对宪法略加修改，允许总统有权决定同其他国家成立联盟或联邦。以后这部宪法只实行了两年，因为秘鲁—玻利维亚联邦一组成，圣克鲁斯就废除了它。

浪漫主义者们相信，他是从他母亲玛丽亚·卡拉乌马纳（印加皇帝后裔）身上继承了要重新统一上秘鲁和下秘鲁的理想；但更可能的是他受了玻利瓦尔的影响。1835年，实现他的理想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当时秘鲁的奥尔维戈索将军和苏克雷的老冤家加马拉将军，在谁应该统治秘鲁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费利佩·萨尔贝里将军趁他俩内讧的时机篡夺了政权。于是他俩都要求圣克鲁斯帮助他们反对萨尔贝里。那时萨尔贝里已自封为秘鲁的专政者。他年轻、聪明、勇敢。他治理国家无论同加马拉，或者同奥尔维戈索相比，都毫无逊色。然而，他同智利签订的关税协定，惹出了一些图谋推翻他的强敌。圣克鲁斯应奥尔维戈索之请进军

秘鲁，轻而易举地在索卡巴亚击败了萨尔贝里，又在亚纳科查击败了加马拉。他把这个国家划分成南秘鲁和北秘鲁，并将这两个新省与玻利维亚合并成秘鲁—玻利维亚联邦，自任联邦“最高保护者”。1829年，当他到玻利维亚去就任总统时，曾给秘鲁军政部长留下一封信。信中所提的愿望现在实现了。他在信中写道：“我和秘鲁的情谊，使我把它的利益看成了玻利维亚的利益。在授予我荣誉的这次选举中，如果有什么能使我感到得意的事情，那就是：我能把我最热忱的愿望予以实现——以同样的精力同时为这两个国家的事业工作。” 182

毫无疑问，许多人热情地祝贺这个新的联邦，特别是一直处于政治动乱之中的秘鲁，更是如此。可是另外一些人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到智利去避难的人，后来成了1839年推翻圣克鲁斯的核心力量。玻利维亚人并不是全心全意赞成这种联合的。他们的议会代表们，发觉在议会中秘鲁的代表比他们多一倍。由于彼此打仗多年，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互相憎恶的感情已是越来越深。在玻利维亚人看来，圣克鲁斯颁布的每个法令都是袒护秘鲁人的。

在任命圣克鲁斯为总统时，就任副总统的是马里亚诺·E·卡尔沃博士。这时，圣克鲁斯叫卡尔沃在丘基萨卡召开一次议会，批准他的新联邦。卡尔沃意识到反对这种联盟的派别已经形成，劝他撤销原议。圣克鲁斯却采取了镇压反对派的行动。他关闭了大学，并且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批准，对议会施以恐吓威胁。

玻利维亚的邻国对这个联邦的抵制，甚至比玻利维亚人更为激烈。阿根廷的暴君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对塔里哈事件盛怒未息。现在北方存在着一个组织良好、蛮悍、富裕的邻国。他对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后果十分惊恐。于是他采取攻势，以遏制圣克鲁斯的野心。智利当时的实际领导者，是一个以瓦尔帕来索的实业家面目出现的、势力特别强大的幕后人物。1836年11月，智利向这个联邦宣战。军政部长迭戈·波塔莱斯宣布了全国戒严令。波塔莱斯本来可以当智利的总统，但他宁愿在管理国家的事务中占据一个不那么显赫的位置，因此成了普列托总统的军政部长。人民对他忿恨万分，最后他被叛变的士兵暗杀了。智利人把他的死归罪于圣克鲁斯，终于群起支持这场战

183

争。1837年，阿根廷和智利联合作战，一个从图库曼出发，陆路进军，另一个则用海军进攻卡亚俄。圣克鲁斯坚守达两年之久，但消耗战削弱了他的兵力。玻利维亚议会主席何塞·马里亚诺·塞拉诺又拒绝给圣克鲁斯再派援军。1838年，北秘鲁地区的主席奥尔维戈索变节背叛。此后不久，他从前的两位战友何塞·米格尔·德·贝拉斯科和何塞·巴利维安宣布反对联邦。1839年1月20日，智利人在永加伊包围了圣克鲁斯。经过五个小时的撕杀，两位将军和二千四百名士兵葬身疆场，其余两千人都成了俘虏。圣克鲁斯险遭俘获，幸得生还，但不得不引咎辞职。2月20日，他正式卸任，联邦亦随之瓦解。

1841年，圣克鲁斯图谋恢复权位未遂，1843年再度尝试，被智利人逮捕入狱。两年后获释，被派往欧洲执行几桩外交任务，并得到了足以维持生活的一笔养老金。此后，他同玻利瓦尔和苏克雷一样，从未回到本国。1865年，这位塞皮塔大元帅孤独、痛苦、失望地死在法国的圣纳泽尔。他统治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和低地达十年之久。正象他的外貌那样，他在执政中表现了贵族气派，他的法制是

进步的，他的理想是乌托邦的。在这十年里，他给玻利维亚带来了统一、方向和繁荣。他一倒台，这个国家和他的联邦也就统统完了。他下台之后，1839年在议会开会时，谴责他为"国家的叛逆"，"玻利维亚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①，"可恶的怪物，罪人，无耻之徒，刑事犯，小爬虫。"直到一百年之后，他的国家才认识到他的真正价值。圣安德烈斯大学的特奥多西奥·伊马纳·卡斯特罗博士，对他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他写道："毫无疑问，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元帅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以非凡的眼力清楚地看到了国家的命运。时间证明秘鲁—玻利维亚联邦是正确的。如果这个联邦当时能够坚持下来，它就可以保障大陆上的平衡；有了它，太平洋战争就绝不会爆发。"

184

联邦解体时，在利马召开了议会，废除了圣克鲁斯的大多数法案，并选出了苏克雷的宿敌阿古斯丁·加马拉将军为秘鲁的下届总统。圣克鲁斯的副总统、联邦时期的玻利维亚总统何塞·米格尔·德·贝拉斯科，召开了另外一个制宪大会。这位野心勃勃、浮躁不安、而且总是宽容不咎的圣克鲁斯的门徒，曾和何塞·巴利维安联合反对过圣

克鲁斯。这次他专断地搞成了第四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同它以前的和以后的一样，基本上是保守的。他把他的新政府称为复兴政府(La Restauración)。在这个新政府的议会开会期间，为了纪念这位阿亚库乔元帅，丘基萨卡改名为苏克雷，并宣布苏克雷将成为国家的首都。同时，议会宣布贝拉斯科为总统，这并不完全是无用的马后炮。

何塞·巴利维安将军反对这个决议。他于1805年生在拉巴斯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同贝拉斯科不一样。贝拉斯科原先是同保皇派一道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以后才和圣马丁共同作战的。而他是一直为独立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作为圣克鲁斯的一名军官，他逐步升迁，达到了将军级。1826年，“终身宪法”签字之后，他卷入了那场导致苏克雷辞职引退的内战。1835年，他曾指挥圣克鲁斯的一个团进入秘鲁，但1838年他又反过来反对圣克鲁斯，并和贝拉斯科一起组织了复兴政府。

据说，贝拉斯科曾祝贺过智利人在永加伊的胜利，这件事震动了许多玻利维亚的爱国者。1839年，巴利维安以此为借口企图推翻他，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不得不去塔克纳避难。在塔克纳，他与

183

加马拉总统合谋要除掉贝拉斯科。加马拉看到这是可以把玻利维亚抓到手的机会，准备入侵这个国家。与此同时，在科恰班巴，圣克鲁斯的支持者们囚禁了贝拉斯科，并把他流放到阿根廷去了。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维新"政府，支持圣克鲁斯。在苏克雷，议会主席何塞·马里亚诺·塞拉诺，接替贝拉斯科当了总统。随着政府被推翻，巴利维安也回到了拉巴斯。所以，到加马拉决定侵略玻利维亚时，这个国家存在着三个成为统治中心的城市。但这些对立不和的集团，都团结在巴利维安周围保卫祖国。事实上，巴利维安曾劝他的老伙伴加马拉不要再进入玻利维亚。但加马拉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他用了六千训练有素的秘鲁军队一举攻占了拉巴斯。一直到贝拉斯科的一千二百多名骑兵赶来增援，局势才扭转过来。1841年11月18日，在比亚查附近的因加维平原上，经过一场历时仅十五分钟的残酷战斗，加马拉战败身亡。因加维战役标志着来自秘鲁的威胁从此结束。

因加维战役胜利结束后，军队立即宣布何塞·巴利维安将军为玻利维亚总统（1841—1847年）。巴利维安原来准备一直打到秘鲁去，但因害怕圣

克鲁斯的追随者与秘鲁勾结共谋，他转而与秘鲁进行谈判，并在1842年6月签订了一个条件宽大的和平协议。1843年6月17日，第六部宪法公布了。第五部宪法只是对贝拉斯科的1839年5月1日的版本稍稍作了一些修改。巴利维安为了使他的地位合法化，并能提出他的新政治主张，便按照玻利维亚的惯例改写了宪法。他对宪法的贡献是加强了总统的职权。但是在他退位后不久，这部宪法就于1848年停止使用，而恢复了1839年的宪法，一直到1851年第七部宪法问世。从第一部宪法到1880年10月写出的第十二部宪法，基本上都是保守的。它 186 们都维护寡头独裁者们享有的经济和社会特权，并且都把罗马天主教确定为国教。

巴利维安是个雄心勃勃，自我教育出来的军人。他下定决心要改善这个国家的状况。由于他的成就，他享有盛名，被认为是玻利维亚最好的总统之一。他鼓励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鼓励改进教育制度和社会服务事业。他建立了银行，并聘请外国技术人员以增加矿业生产。为了减少对阿里卡港的依赖，他还试图开放皮科马约河通行货船。正好在巴利维安就职一周年的时候，沿着玻利维亚最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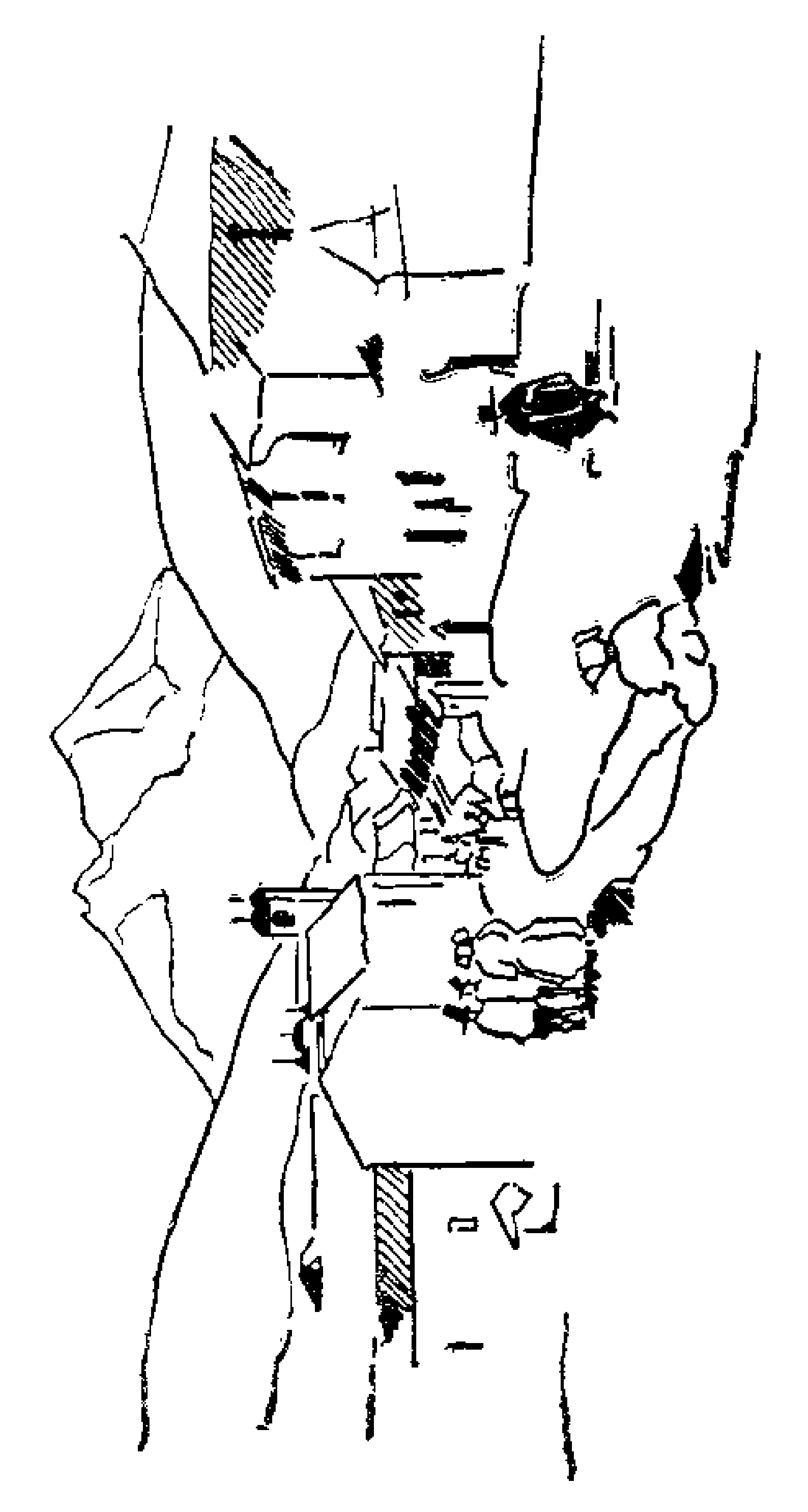
部的海岸，发现了值得开发的大量鸟粪石（guano）。智利声言，他们对这个省有所有权，并把它命名为阿塔卡马。巴利维安抗议说，这片土地属于他们国家。但是玻利维亚，在刚与秘鲁交战之后国力衰弱，没有能力为此进行斗争。因此，一直到187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地区始终是不断发生摩擦的根源。

由于巴利维安意愿良好、工作诚实努力，1846年经过按照宪法程序的选举，他当了总统。尽管他颇得众望，他还是经常受到叛乱事变的烦扰。其中有些是圣克鲁斯煽动的，有些是贝拉斯科怂恿的。最后，他对玩弄阴谋诡计和南来北往镇压军事叛乱感到厌倦，于是辞职引退。他相信，只有一个未卷入政治斗争的军官，才能使国家恢复秩序。然而他选择的继任人欧塞维奥·吉拉尔特，仅仅维持了十天，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二个任期最短的总统。1847年12月23日，巴利维安离开这个国家，一去不返。1852年10月15日，他死在里约热内卢。去世之前，他曾几次企图卷土重来，终未成功。

何塞·米格尔·德·贝拉斯科第五次又接任总统职务。他曾在1828年继乌尔蒂尼内亚任总统；

佩德罗·布兰科就职第五天就被暗杀，是他接替的；圣克鲁斯辞职后，由他继任；当塞拉诺的篡权行动被巴利维安镇压之后，也是他去接任的；最后一次就是接替吉拉尔特。根据他的推荐，曼努埃尔·伊西多罗·贝尔苏将军当了国务部长。这个 187 人曾领导过一次造反，反对巴利维安。不久之后，他又领导了一次反对贝拉斯科本人的叛乱。在八月份照例召开的新议会上，贝尔苏没有被任命为总统，他深感失望。在他的支持下，拉巴斯和科恰班巴的警卫队叛乱了。贝尔苏要求派他到北方去制服叛军，并保证对贝拉斯科无限忠诚。但是贝拉斯科早已怀疑他有二心，拒绝了他。贝尔苏一怒之下索性辞职，并暗自离开苏克雷去掌握那些闹事的部队。在亚姆帕拉艾斯，这个考迪罗制服了政府军队。第二天，1848年12月6日，贝尔苏就任总统。贝拉斯科只好回到老家圣克鲁斯去，于1859年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贝尔苏(1848—1855年)生于1808年，比巴利维安小三岁。他是圣芳济会抚养长大的，直到十三岁那年，他才从寺院逃出来参加了军队。他个子高，皮肤黑，高脑门，黑鹞眼，有浓黑的胡须和长长



1848—1855年贝尔苏总统执政期间的拉巴斯圣塞瓦斯蒂安广场

的鹰钩鼻子。他的容貌威风凛凛，令人生畏。他最大的骄傲是能直觉地洞察别人。他能察觉别人最秘密的思想。他对自己的这种洞察力颇为自负，就象对他那儿套了不起的军装和那些生气勃勃的战马感到得意一样。他同安德鲁·杰克逊一样，也是平民出身。在他就任总统之前，政府一直是由资产阶级分子、矿业主和大农场主管理的。这些人都站在巴利维安一边，谁也不愿同这个暴发户合作。贝尔苏憎恨他们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广大群众和印第安人的潜在力量。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归还了他们的村社土地，重建了城市的政府。不过，对改善他们的命运，他没有做出什么别的贡献。他发表的讲话和报纸上的公开言论，都是针对下层阶级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可以说它们是社会主义的。然而，同许多蛊惑人心的考迪罗一样，他本人也是轻视人民的。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党派，把他的暴政称为贝尔西斯莫(belcismo)。他们的对策是向巴利维安靠拢。在因加维的时候，贝尔苏和巴利维安曾经是战友。但贝尔苏说，他发觉他的朋友和他妻子有通奸行为。这件事破坏了贝尔苏的婚姻，并引起了一次决斗。他 189

们之间的憎恶持续了好几代人，他们的子孙和政治继承人都互相敌视。巴利维安当总统时，他把贝尔苏将军降级为一个普通士兵，并把他调到了一个遥远的南方部队里。贝尔苏的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所受的侮辱非常忿恨，情绪之大，和贝尔苏本人一样。因此在一次反对巴利维安的叛乱中，他们都支持贝尔苏。那一次，巴利维安总统从宫廷窗户跳出去，才摆脱了叛乱的士兵。然后，他指挥他自己的队伍平息了叛乱。

巴利维安在智利和秘鲁从事反对贝尔苏的密谋活动。但仅仅招引到一小伙心情相同的前爱国者的支持，他就死在国外了。这些人组织成“红党”(Partido Rojo)，以后成为支持利纳雷斯的一支力量。

1849年，军事叛乱不断发生。贝尔苏表现出了他的真正性格。恐怖统治随之而来。反对党派遭杀戮、受酷刑，或被流放到遥远的密林村舍，在那里，他们可能因为疾病或厌烦无聊而死去。巴利维安的家属和朋友，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贝尔苏甚至用狂言乱语煽动群众和印第安人，以致引起抢劫有钱人家的事。难怪人们常把他比作

阿根廷的罗萨斯、委内瑞拉的莫纳加斯和墨西哥的圣安娜 1850年他险遭暗杀，并且对大的颠覆活动不得不采取镇压手段达四十二次之多。

在他恐怖统治的八年中，他曾试图改进农业、工业和商业。但国内始终不稳的政局和玻利维亚流亡者在国外的阴谋活动，使他无法取得很大成绩。巴利维安在国外的多次阴谋活动，确实使他产生了仇外情绪。这便引起了这样一个完全不足为信的故事，说伊丽莎白女王① 把玻利维亚从她的世界地图上抹掉了。

有一个厄瓜多尔人，被发现参与了巴利维安反对贝尔苏的活动，被处决了。此后，所有外国人都受到严密监视。女王的领事J·A·劳埃德，190 是个不大谨慎并欠机敏的家伙。他请求释放一个在1853年大搜捕中被捕的美国人，未获允准。他同贝尔苏交换过几封徒劳无益、刻薄讥讽的信件。以后，他决定退居塔克纳，在那里等待他的政府指示。据这个不足为信的故事说，贝尔苏让他倒

① 根据贝尔苏执政的年代（1848—1855年）来看，当时英国女王应该是维多利亚（1819—1901年）而不是伊丽莎白（1558—1603年）。此处原文显然有错误。 译者

骑驴背出城，以表示催促他赶快离去。维多利亚女王听说她的使节受到如此侮辱，便下令舰队炮击玻利维亚。这个故事接着说，有人向女王说明不能这样做的原因之后，她便从她的地球仪上抹掉了玻利维亚的名字。

尽管这个故事是幻想虚构的，它确实表明了贝尔苏的性格和他的一般名声。作为一个鼓动家，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是有才能的；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却是失败的。虽然巴利维安已于1852年因黄热病死在里约热内卢，但另外一些人又接替了他，继续反对暴政。曾在1843年当过议会主席的何塞·马里亚·利纳雷斯博士领导了一伙人造反；波托西的何塞·马里亚·德·阿查将军领导了另外一伙。后者被贝尔苏的女婿科尔多瓦将军镇压下去了。在这样的骚乱动荡中，1855年贝尔苏宣布说他要辞职了。这使议会大为惊异。他首先提名他的女婿为继任人。他所申述的理由是：这个国家需要新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他操纵选举，保证了他的家庭世袭政权。科尔多瓦同利纳雷斯竞选获得九千票，而利纳雷斯仅得四千。1855年8月15日，议会在苏克雷开会之前，这位在玻

利维亚历史上第一次任职期满的总统，把政府移交给了一个由公众选举出来的继任人。

贝尔苏离开玻利维亚到欧洲去。临行前，他喃喃自语地说出了一句对这个国家著名的告别辞：“玻利维亚是完全无法治理的。”当他的继任者们赞叹这种说法何等正确的时候，他又卷入了一个旨在重夺总统职位的政治阴谋。1865年，他领导一群同谋者反对梅尔加雷霍总统。在梅尔加雷霍 191 总统的办公室里，他被这位总统，也许是总统的卫士枪杀了。临死之前，他只来得及吐出三个字“证明人”，这个词是带有预言性质的。

豪尔赫·科尔多瓦将军(1855—1857年)是一个厚道的、笨拙无能的浪漫主义者。他不能把贝尔苏的工农阵线继续保持下去。除了他作为贝尔苏的女婿从而招人厌恶之外，利纳雷斯等人还扬言他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发动了三十三次反对他的起义。1857年9月8日，利纳雷斯终于把他撵下了台。这时他就职刚刚两年多一点。他逃亡到秘鲁。当时秘鲁是下了台的玻利维亚领袖们永久的安全避难所。1861年，他又回来密谋反对阿查。他被捕后，在1861年10月23日恐怖的大屠杀

中，同另外七十个贝尔苏分子一起被枪杀了。

何塞·马里亚·利纳雷斯博士（1857—1861年）把他的党命名为“九月党人”。这是根据他掌政的月份叫起来的。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文职总统，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他是一个有钱的贵族，不到五十岁，有聪明才智，好沉思冥想。1808年他出生在波托西，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玻利维亚人。他的道德比人们想象的要高一些。人们那样想象是由于他为了夺取高级官职曾玩弄过多次阴谋。在政治上，他代表那些反对乔洛人和印第安人的上层阶级和大学生。而乔洛人和印第安人过去是受贝尔苏偏爱的。他以“专政者”的身份，着手改善国家的状况。他先削减了自己的薪金，然后削减他的部长以及其他政府雇员的薪金。他为征收税款制定了一套比较公平完整的制度，并督促进行对于联邦基金处理不当的调查。就象克伦威尔一样，严峻的道德结合着稍带霸道的性格，使他很快就失掉了许多人对他的支持。他把军队从六千削减到一千二百，并且坚决主张军队对政府要忠诚、士兵与老百姓交易要诚实。这一切，在军营中引起了颠覆性的怨言。其

中有一个跳出来闹事的是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 192 上校，以后他成了玻利维亚的总统。1858年8月10日，拉巴斯的军事指挥部造反，支持那位早已后悔辞职的贝尔苏。有一位将军，长得很象利纳雷斯，被当成利纳雷斯误杀了。而这位“专政者”却幸免于难，并迅速镇压了这次叛乱。被捕的叛军领袖中有一个行伍出身的人，他曾做过传教士。利纳雷斯违背了主教的意见，也不顾人民的抗议，把这个人判了叛国罪，杀掉了。尽管他的事业是正当的，但他很快就发现他自己是一个没有政党的总统。这时，他已疲惫不堪，又生了病，想要召开一次普选大会。他最亲密的顾问们，他的义子鲁佩尔托·费尔南德斯，他的军政部长何塞·马里亚·阿查和拉巴斯的长官安东尼奥·桑切斯，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执意孤行，终于，他们在1861年1月造了他的反，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golpe de estado)，结束了他的任期。利纳雷斯离开这个国家前往智利的时候，病魔缠身，囊空如洗。当初他为争夺权位用光了他的钱财，得权之后，又未能捞到什么东西。为了糊口，他在瓦尔帕来索当了家庭教师。1861年10月6日，这位

玻利维亚最忠诚的总统在该地逝世。

三个政变首领(golpista)组织成洪达，维持了一百天。他们宣布何塞·马里亚·德·阿查将军为总统(1861—1865年)。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召开一次制宪会议，以便通过第八部宪法。这个宪法，在很多方面是自由主义性质的。它恢复到一院立法制，并且首次把“戒严”这个概念引进宪法，作为维持公共秩序的一个手段。然而，只有一个宪法条例是不够的。在利马，贝尔苏和科尔多瓦急不可待地寻找返回玻利维亚的机会；在国内，利纳雷斯分子在阿古斯丁·莫拉莱斯的领导下，伺机而动。推翻利纳雷斯时曾与阿查同谋的费尔南德斯，现在也领导另外一些人谋反，但被阿查在波托西毫不费力地收拾了。为了保护他自己不被这些阴谋家暗害，阿查任命普拉西多·亚涅斯上校为拉巴斯的军事统帅。亚涅斯是何塞·巴利维安的私生子，也是贝尔苏的死敌。他在贝尔苏193手下受过九年的迫害，总想报复。他要以一种压迫行为在人性中可能唤起的最残酷的方式进行报复。一个同时代的人把他描写成这样一个人：没有智慧，过分倔强，对上级无限忠诚，“只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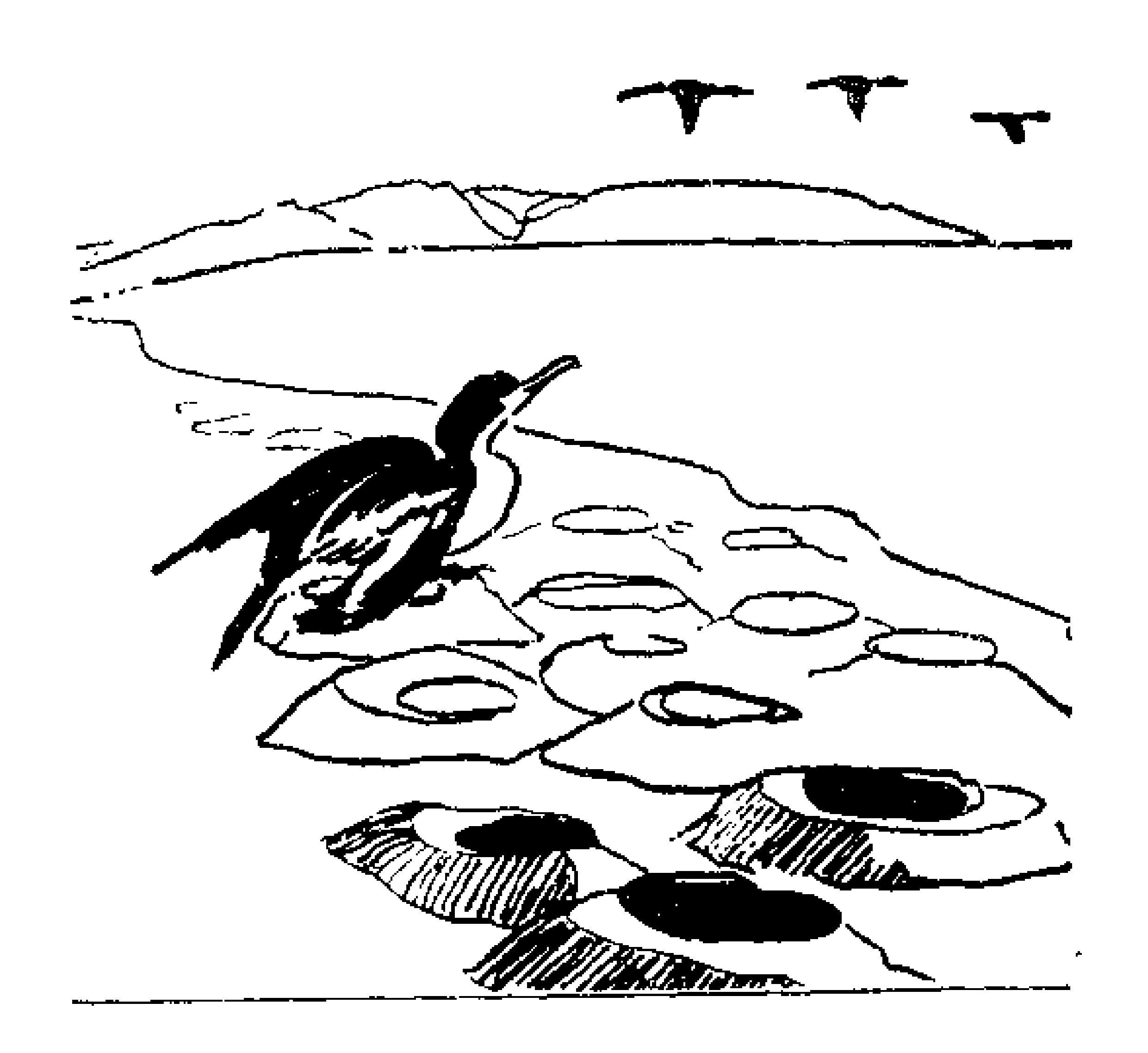
命令，他就能吃掉亲生的儿子。”1861年10月，他费了很大力气抓到了前总统科尔多瓦和许多知名的贝尔苏分子。为了找一个处决他们的借口，他假造了一个监狱暴动事件。科尔多瓦听到嘈杂之声，以为是他的人来营救他了。他可能命令了看守人员释放他，也可能威胁了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干，就要采取强制手段。亚涅斯利用科尔多瓦的这句话，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把他击毙在牢房里了。这次屠杀之后，他又把闪禁在洛雷托女修道院里的另外七十个人枪杀了。大屠杀在拉巴斯市民的心里引起了恐怖和惊惧；然而阿查置之不顾，对亚涅斯未给任何惩罚。于是人民自己动手设法报仇。一个月以后，他们利用一次司空见惯的武装起义的机会，攻打亚涅斯的大本营。亚涅斯企图从屋顶上逃跑，但是他被一粒枪弹击中，跌落下来，掉在隔壁的院子里。人们拖着他的尸体穿过大街，这时，他们才感到复仇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在阿查任职期内，最重要的事发生在1863年。那一年，在玻利维亚的干燥的荒芜海岸又发现了新的硝石和鸟粪石。玻利维亚过去很少往这片贫瘠的沙漠地带移民，只把它当作一个有潜力的出

海通路。但随着硝石的发现，这个地区忽然有了极大的商业重要性。智利早就对阿塔卡马地区提出过主权要求。当它想要接管这些边远的、盛产鸟粪石的岛屿时，阿查召开议会，要向智利宣战。但他同时又同智利进行谈判，以求和平解决这一争端。因为他知道，实际上，玻利维亚国力衰弱，不能进行战争。虽然没有多大希望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但谈判仍在进行。

194 梅尔加雷霍将军于1864年12月28日发动了政变，打断了阿查的战争准备和政府的工作。阿查被迫退隐在科恰班巴郊外，弃官为民，三年之后，死于该地。

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将军(1865—1870年)的性格中，有着严重的醉汉恶习和冷酷无情的野心。因此，用“魔鬼”这个不时兴的词来描绘他，或者是最恰当的。一个玻利维亚作家称他是“天生的罪犯。”他的肖像很多，这证明了他的自负，可是把这副畸形的面孔贴出来，倒也使人相信这样的叙述：稀疏的头发下面是一个很高的前额，接着是在猿猴动物中更为常见的那种突出的眉毛，这两绺眉毛把前额显衬得更为突出了。由于嗜酒



鸟粪似乎不可能是战争的原因，它是一种肥料，含有大约9%的氮，6%的磷和2%的钾

过度，他两眼血红；深陷的双颊盖着黑毡似的胡须。结合他那别扭的脾气，他的相貌甚至使最勇敢的人见了也要害怕。害怕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对待敌人的办法是：宁愿全部杀光，而不愿将他们监禁。

1820年的复活节——4月18日，他出生在科恰班巴省的塔拉塔。因为他母亲不能确定谁是他的父亲，他就用了他母亲的姓。他很早就参加了军队。因为在那时候，军队是被遗弃者的避难之所。他大胆卤莽，很不驯顺。1840年，在他还不过是个军曹时，他便带头造反，反对贝拉斯科。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国外。后来回国，在因加维同巴利维安一起作战，但在1849年和1853年又造起了反。贝尔苏想把他处死。可是科恰班巴人为之求情。似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后来，这个惯于变节背叛的人，用诈骗和凶杀报答了这个城市的市民。

古铁雷斯写道："要在一个已经懂得爱好政治自由的国家里散布恐怖，梅尔加雷霍就不得不干出有史以来最残忍最野蛮的行径。"尽管他沉湎于酒色，他还是个胆大包天、气力过人的家伙。传说，

前总统贝尔苏可能就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同时，他自己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血泊中挣扎出来的。关于他的残暴和专横记载很多，但有两件事几乎肯定是不真实的。一件事是：他命令他的一个班的宫廷卫兵从二楼的窗户齐步走出去，以此 196 自豪地显示，军队在他领导下保持着铁一般的纪律。又据说，有一次他喝醉了酒，一听说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就派出军队去帮助法国。在酒醒之后，他才撤销这次“攻击”。阿尔维托·古铁雷斯还讲了另外一件事，说，他决定把复活节定为他的生日，“因为这最能满足他自负的需要……这位十二月英雄(Hero of December)对于全国各城镇所举行的游行大为高兴；对这个有着幼稚的虚荣心、经常庸俗地夸耀自己是多么伟大的人，没有比这种事更能使他感到得意的了。”

在内政方面，用武力统治的后果就是工业停工，学校和大学关门，国库枯竭，正义败坏以及铸币的成色降低。不够标准重量的银币，后来就被称为“梅尔加雷霍”(melgarejo)。为了他的利益，印第安人的公有土地和村社土地被公开拍卖。这就意味着印第安人要过比以前更为贫困的生活。

1868年，他重新修订了宪法，对行政部门赋予了更大的权力，以使他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制宪会议批准了他同智利签订的1866年条约，以及他同巴西签订的1867年条约。根据后一个条约，玻利维亚把十万平方公里富产橡胶的土地转让给巴西，换到了把船只开进亚马孙河或其他巴西河流里去的权利。但它不能进入巴拉圭河，不能在亚马孙盆地要求大片土地。巴伦西亚认为，在梅尔加雷霍身边的寡头独裁者们从这个条约得到的好处，要比他本人得到的多。博特略写道，“这个条约给梅尔加雷霍这个暴君带来了帝国的巨大苦难（Gran Cruz del Imperio）和他的同胞的咒骂。”但是，他的外交部长马里亚诺·多纳托·穆尼奥斯却为此感到自豪。他认为巴西人在逐步侵占他们的土地而没有遭到玻利维亚人的任何反对。这个条约正是给继续侵占这片土地作了限制。甚至巴西的科特基普伯爵对议会说，“根据现行的占领197 地保有主义（uti possidetis），两国间的分界线，除了象条约第二项所规定那样，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划分办法。而第二项的规定，同玻利维亚在1863年所提的倡议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一个条约的签订，注定了玻利维亚要成为一个经常同邻国发生冲突的内陆国家。1864年，西班牙占领了秘鲁盛产硝石的钦查群岛，并向卡亚俄开炮。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这几个安第斯山系的国家结成了四国联盟，挡住了西班牙人。参与联盟的这三个共和国的爱国热情，打动了梅尔加雷霍的浪漫主义性格，他立即废除了阿查的1863年议会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如果关于硝石矿藏的和平调解不能成功，玻利维亚就要同智利交战）。为了表示感激，智利的贝尔加拉·阿尔瓦诺部长把智利军队的将军头衔授予梅尔加雷霍。这位暴君完全受了狡猾的智利人的欺骗，在1866年条约上签了字。根据阿格达斯的记载，这个条约“规定了一条含糊不清的界限，并且规定，凡是在南纬23°和25°之间的地区发现和开采的物产，将为两国共有。所以另外一个智利外交家正确地评论说，这个条约是‘荒谬绝伦的’。”

梅尔加雷霍在国际事务和国内经济中的拙劣无能，给玻利维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比他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严重。但是使他垮台的还是他的暴政。他签订的国际条约所产生的长

远后果，人们在当时还不能作出适当的估计，而他为他的情妇胡安娜·桑切斯任意挥霍钱财，却使国家预算完全破了产。正如他的同时代的辩护人胡安·巴勃罗·戈麦斯所记述的那样："国库几次达到最严重、最危急的枯竭地步，其原因总是来自这个人的家庭。他的情妇甚至有权指挥军队。而军队，把梅尔加雷霍当作偶像来崇拜，同时，也是他维持政府存在的唯一支柱。"随着他的高压政策日益加剧，叛变接连不断地出现。杀害了贝尔苏之后，他又对贝尔苏的同伙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当科198 恰班巴、苏克雷和波托西都造反时，他对这些地方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掠夺。最后，利纳雷斯分子阿古斯丁·莫拉莱斯，又领导拉巴斯反抗暴君。1871年1月15日有一千三百多人战死在拉巴斯大街上，梅尔加雷霍被迫逃亡。在他逃往秘鲁的路上，在德萨瓜德罗河附近，他和他的一伙随从人员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这些印第安人因为土地被无偿征用而异常愤怒。他们这一伙，除了五个人之外都被杀死，而梅尔加雷霍还是到了利马。就在这里，他得到了报应。他的有名的爱妾胡安娜·桑切斯的哥哥认为，梅尔加雷霍逃跑时，一定从国库和胡安娜的

首饰箱中带走了相当大的一笔财产，于是跟踪追赶，并于1871年11月23日把他杀死在他的寓所里。这位被阿尔卡萨称之为“灾祸飓风”的风云人物，在他五十二岁时离开了人世。甚至在戈麦斯所写的《对略传的辩解》中，对他的行为所作的辩解也仅仅是：“独裁者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既成事实后被接受的。专制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专制主义是在经历了毁灭它的狂潮热浪之后，发生在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反作用。”

他的继任者阿古斯丁·莫拉莱斯将军（1871—1872年）比他好不了多少。阿格达斯把他们俩都同样叫做“野蛮的考迪罗”（caudillo bárbaro）。莫拉莱斯曾企图暗杀贝尔苏，以后也沉湎于类似的政治上的胡作非为。他公开的政治纲领是“多一些自由，少一些管束”，但是不久，他就按照他的前任们制定的陈规办事了。他动辄大发雷霆，他刚愎自用，轻视他的部长们的忠告。这样，他在推翻梅尔加雷霍的过程中所赢得的声望，很快就变成了人们对他的憎恨。在一种癫痫症发作的情况下，他激恼了他的亲侄陆军中校费德里科·拉法耶。这位中校向总统连开了七枪，事后法律认为他是出于

自卫而无罪。

莫拉莱斯的死，正好发生在梅尔加雷霍被枪杀后一年零四天。继任他的是阿道弗·巴利维安将军(1873—1874年)。他于1831年出生在拉巴斯，199 是因加维英雄的儿子。当时，以著名的政治家托马斯·弗里亚斯为首的临时政府组织了选举。参加竞选的是梅尔加雷霍分子金廷·克维多，当地的考迪罗卡西米罗·科拉尔和正在欧洲的利纳雷斯分子巴利维安等三人。1873年巴利维安就任总统。在很短时间内，政府又恢复了诚实、宽容和崇尚自由的作风。巴利维安曾在国外受过教育，自认为是个诗人和音乐家而不是军人。然而他念完了军事学校，并且一级一级晋升到陆军中校的地位。他甚至还跟着他父亲在比提奇作过战。但在某些方面，他是个弱者，是个文艺爱好者。在当选前不久，他曾在欧洲请医生检查是否有肺病或肾炎。他未经治疗，旋即回国。门多萨引述他的话说："这个国家焦急地期待着回来一个人，而我给它带来的却是一具尸体。"

他尽最大努力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办事。他准许出版自由，采用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对文职人

员给予政治独立，并遏制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力。他最有远见的行动，是在1873年同秘鲁订立了秘密联盟。在秘鲁，经过十年的动乱之后，正好是曼努埃尔·帕尔多就任总统。象巴利维安一样，他重新组织了一个立宪政府，减少了军队对政事的影响，也改进了教育制度。或许这两位总统发现了某种互相容忍、共同并存的一致性，所以他们签订了这个条约。但是，这个条约使玻利维亚在不出六年的时间，就卷入了太平洋战争。

第二年，他同智利签订了新条约，确定第24°线为两国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条约使玻利维亚收回了两度多的土地。因为在此以前，智利曾提出，向北伸展到21°的整个阿塔卡马沙漠都属于它的版图。这个条约还允许两国平分在23°到24°线之间所发现的矿藏，同时智利放弃了她对24°线以北的矿产品的要求，这些都有利于玻利维亚。为了对智利的让步表示感谢，玻利维亚只得同意对智利在这两度线之间开发的矿产不征收课税，对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公司和在该地区以北的其他智利公司也不征收所得税。 200

巴利维安特别想要保护他的祖国不受两个邻

国的侵略。他知道，他几乎不可能期望在同一时期同两个邻国都保持睦邻关系。于是他决心打通出海的道路，重整国家军备，并且制造军舰以保护玻利维亚的海岸。他的政敌联合起来破坏这些计划。一方面是议会反对，另一方面他的国防部长伊拉里翁·达萨将军在搞新的军国主义，巴利维安在双方夹攻之下，忧愤成疾，病入膏肓。1874年1月31日，他把职位让给玻利维亚的元老托马斯·弗里亚斯。两周以后，他病死在苏克雷郊外的别墅（quinta）里。后来，卡洛斯·梅迪纳塞利写道："如果1873年巴利维安从欧洲回到这个国家时，他的精力充沛、身体健壮……那么毫无疑问，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就会有所不同……玻利维亚在与智利对抗时所遭受的苦难，要比它在伊拉里翁·达萨的那个混乱多变的政府统治下，会少一些。

第 八 章

201

太平洋战争和发展时期

在我统率下的九千名玻利维亚士兵，衣着简陋、武器低劣，但却热情饱满，斗志昂扬，随时准备接受您的命令。

——玻利维亚总统达萨致秘鲁总统普拉多的电报

巴利维安象他父亲一样，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牺牲，在国势衰微之际，与世长辞了。托马斯·弗里亚斯(1874—1876年)发现他自己面临着已故前任总统所遇到的同样严重问题——缺少资金。各省、市都不愿把他们该交纳的赋税全盘上缴中央政府。七十高龄的弗里亚斯，有长期的政府工作经验。他是一位正直的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1804年生于波托西，并在那里长大。他曾任议员、何塞·巴利维安政府的国务部长、外交官、临

时政府的总统。尽管他有显赫的个人历史，但在任职期间却没有表现出什么政治策略。他决定完成巴利维安的任期，使他的朋友们大为惊讶。但他解202释说，这是他的责任。他正直、刚勇、谦逊，兼备着堪称为一个护国公的素质。

象他的前任们一样，弗里亚斯发现保权比得权更难。他曾试图恢复宪法上规定的自由；这种自由，正如巴斯克斯·马奇卡多所说，“在玻利维亚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也许是有点过分。”任职第一年，他就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同智利签订了1874年条约。条约确立了玻一智边界，即智利北部和东部的界限，同时，玻利维亚方面保证在二十五年内不提高现行税率。如果不是那两个同阿道弗·巴利维安竞选的人，开始阴谋篡夺总统宝座的话，他也许能做出更大成就。弗里亚斯要求他的军政部长伊拉里翁·达萨将军予以支持。达萨派了他引以为骄傲的第一步兵营（通常称为科洛拉多斯——Colorados），轻而易举地平息了科恰班巴的暴乱，并乘胜接管了政府。

伊拉里翁·达萨将军（1876—1879年）成为玻利维亚掌权的政治领袖时，年仅三十六岁。他的父

亲格罗索尔，是意大利耍木偶戏的艺人，而他用了他母亲的名字。他最初在他的出生地苏克雷的街头长大，后来在军营里生活。这使他养成了象梅尔加雷霍一样的性格，敢作敢为，同时蔑视不如他胆壮的人。他迅速地升为军曹，并参加了反对阿真的暴动。不久之后，梅尔加雷霍为了对他奖赏，把他提升为陆军少校。然而就象通常发生的那样，他背叛了他的恩人——自称为“十二月英雄”的梅尔加雷霍。他在1870年11月24日发动兵变，推翻了这位暴君。从这次兵变中，达萨发现他自己能够夺取弗里亚斯的总统宝座。

达萨具有残暴虚荣、贪吃好色、言行肆无忌惮、待人好记冤仇的天性。他刚许下的诺言，马上就作废了。他在就职演说中对议会说：“你们提交给我的、并由我刚才宣誓保证遵守的宪法，将成为公众和个人自由的保障。”然而，几乎是在第二天，203 就开始了独裁统治的迫害。弗里亚斯和他的部长们备受折磨。无党派的新闻记者们受到审查。内阁集体辞职。起义受到残酷镇压。当圣克鲁斯省在安德烈斯·伊瓦涅斯领导下造反时，达萨的部队一路追踪这个造反领袖直到巴西边界，并把他枪杀

在那里。

达萨和梅尔加雷霍一样残暴而无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继承了这位暴君的许多阴谋诡计。当阿根廷和智利陷入麦哲伦海峡之争时，达萨于1878年废除了梅尔加雷霍给予智利的特许权和1874年条约。趁此变动之机，他要对每一百磅硝石强行征税十美分。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和运输联合公司拒绝付税；玻利维亚便把它没收了。以前该公司全部为英国所有，后来为了获得1874年条约所规定的免税权，曾卖了一部分股票给智利人和玻利维亚人。此时该公司便向智利要求保护。1879年2月14日，智利接受了它的要求，并以此为借口，占领了安托法加斯塔。阿尔维托·古铁雷斯在1920年所著《1879年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其实有没有这一事件，结果都会是一样的。因为智利政府已经找到了多年来一直追求的良机，而且这个机会，是理应受国民蔑视的玻利维亚政府，以其愚蠢的行动极妙地送上门来的。"同年3月，智利人向内地的卡拉马推进。爱德华多·阿瓦罗亚就在这里光荣殉国。

根据玻利维亚和秘鲁签订的1873年防御条

约，一旦玻利维亚遭到智利攻击，秘鲁应予以援助。然而从签订条约到安托法加斯塔被侵占期间，由于德国发明了人造肥料，秘鲁的一种主要出口物资——鸟粪石价格大跌，致使它几乎濒于破产。曼努埃尔·帕尔多总统曾试图裁减军队及文职雇 204 员以节省开支。他的继任者马里亚诺·普拉多将军，对行政管理缺乏经验，使财政状况更为恶化。然而，他承认秘鲁没有能力进行一场沙漠战争，这一点他还是明智的。他的解决办法是，调解两个邻邦间的纠纷。智利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要求秘鲁放弃同玻利维亚的联盟。因为智利认为，该联盟直接威胁着它的商业和安全。秘鲁的声誉受到挑战，普拉多总统拒绝了这种要求。1879年4月5日，智利便向两国宣战。

玻利维亚对战争的准备，并不比秘鲁强多少。它既没有与阿塔卡马沙漠的交通和电讯联系，又没有在因缺水而使正常运输受到阻碍的不利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内战早已耗尽国库。共和国没有现代化武器，巴利维安和弗里亚斯两人又削减了常备军。更为严重的是，虽然智利人口只有两个同盟国的一半，它却拥有训练良好的一万三千人组成

的陆军，还有一支两倍于他们联合舰队的海军。

爱德华多·阿瓦罗亚在圣佩德罗—德—卡拉马的英勇牺牲，显示出交战双方力量的悬殊。卡拉马是阿塔卡马沙漠上距太平洋岸数哩的一个小绿洲。阿瓦罗亚大约在战争爆发前四十年生于该村。他谦虚谨慎，不愿做官，但也曾被任命为那里的市政官员。他一听到智利占领安托法加斯塔的消息，就又重新和拉迪斯劳·卡夫雷拉一起担当了领导职务。他们相当容易地招募了一支一百三十五人的队伍，抵抗着智利的一千多人的大军。不幸的是，村子里英雄多于武器。他们以仅有的八十五支来福枪英勇地进行抵抗。甚至在周围已遍布终生相处的同胞的尸体时，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投降。205 战斗从清晨七点开始，到八点半，阿瓦罗亚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临终前的誓言成了跟随他一起苦战的玻利维亚人的鼓舞力量。他说："我是玻利维亚人，我保卫的是玻利维亚国土。我宁愿战死，决不临阵脱逃。"

卡拉马的战讯传到拉巴斯，七千爱国者志愿跟随达萨和科洛拉多斯营向海岸进军。他们毫无准备地于4月30日到达塔克纳。达萨打电报给他

的同盟者——在利马的普拉多总统说：虽然他们衣着简陋，武器低劣，但这九千人热情饱满，斗志昂扬，随时准备接受普拉多的指挥投入战斗。达萨甘愿屈从普拉多将军，似乎令人费解，实际上他自己确实缺乏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战术训练。达萨将军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不管军衔多高，大多是由于在内战时期见风转舵地对一个一个的首领表示忠诚而获得的犒赏。在那种情况下，有少量的军队控制王宫就足能使政变成功。

达萨在塔克纳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训练和装备他的军队，但由于海边沙漠的酷热、干燥和生活无聊，士气大落。逃跑和生病代替了热情和斗志。

对于进行沙漠战争，虽然智利的装备也不是很好，但他们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及两艘全新的无畏战舰。秘鲁只有一艘以海军上将米格尔·格劳为舰长的瓦斯卡尔号小炮舰。格劳在从瓦尔帕来索到安托法加斯塔一带狙击了智利舰队达六个月之久，因而闻名于世。他象一支牛虻紧紧叮住智利的沿海船舶和陆上设施。但是在保卫梅希略内斯的战斗中，瓦斯卡尔号被击沉了。从此以后，智利控制了这个地区，可以自由地沿着海岸运送军队，

不再受长途沙漠行军的酷热和危险。

他们就是这样把一万二千名士兵运到阿里卡和伊基克之间卡马罗内斯河的皮萨瓜港，全歼了大约一千名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守备部队，摧毁了等待装运硝石的货船。达萨在塔克纳拖延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决定派三千人去保卫皮萨瓜。显然，他是期望在进攻之前和伊基克的秘鲁军队会师。但是，他的军队既无行军路线图又无粮秣供应，达萨的轻举妄动遭到了指责，说他至少是领导无方。到达卡马罗内斯河以后，他又下令回师。尽管科洛拉多斯营指挥官恳求他慎重考虑，达萨却坚持己见，说智利人即将进攻莫罗—德萨马，他必须率兵保卫。达萨在拉巴斯的敌人，就利用这件事和几个月后他在圣弗朗西斯科的第二次失败，诽谤他为“河虾英雄”(El héroe de los Camarones)。

大约就在这时，达萨正秘密地同智利进行停火谈判。他曾要求侨居圣地亚哥的一位有声望的玻利维亚知识分子——加夫列尔·雷内·莫雷诺向智利暗示，玻利维亚想寻求和平。莫雷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成功。于是达萨用欧斯塔基奥·谢拉的假名与智利直接进行通信联系。他在信中

提出，以得到足够的个人报酬为条件，同意放弃与秘鲁的联盟，并交出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海岸。

如果谈判为公众所知，毫无疑问，他会被私处死刑。其实，他的军队及群众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根据他的特性，他走上了一条离弃军队，逃亡欧洲的道路。这是合乎逻辑的。依靠从玻利维亚国库盗取的公款，他穷奢极欲地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由于肆意挥霍，他不久就用尽了这笔钱财。1894年他决定回国，以增加他的银行存款，在玻利维亚他遭到了暗杀。

纳西索·坎佩罗将军（1880—1884年）接替达萨任总统兼联军司令。1813年他生于塔里哈（现在的阿根廷）的托霍，曾经在欧洲的军事学院学习，207
1837年在丘基萨卡取得法学学位。同年，他进入军界，并以上尉身份参加了因加维战役。战后，作为对他的奖赏，共和国曾派他执行各种外交使命。回国后，他进入政界，支持利纳雷斯派。1861年贝尔苏驱逐利纳雷斯后，他回家隐居了三年。之后，他又参加了梅尔加雷霍反对贝尔苏的斗争，但由于不能容忍梅尔加雷霍的暴虐，他再次离开祖国。在阿根廷，他协助了国内推翻暴君的工作。1872年，

他任过短期的军政部长。他以六十六岁高龄自愿出任招募并训练了一个新师，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不完全因为他是达萨的同僚。

1月19日，他就任临时总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组织他现在统率的军队。不幸的是，不论玻利维亚人还是秘鲁人，在同外国人战斗时，都没有表现出他们打内战时的那种技巧和热情（秘鲁总统普拉多在达萨逃亡后不久，就不体面地被罢黜）。1880年5月26日，在塔克纳，坎佩罗统率的联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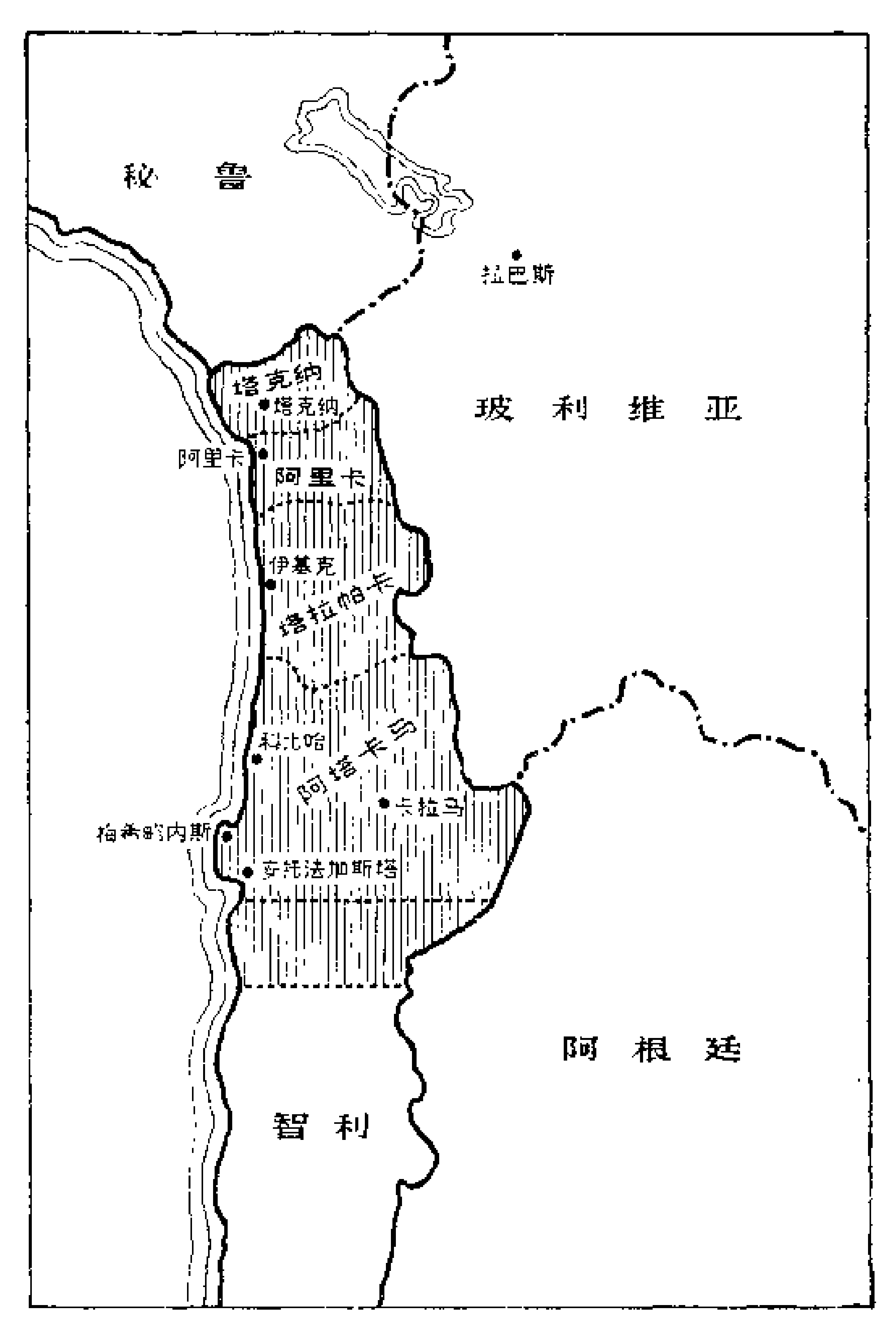
阿连萨高原（Alto de la Alianza）战役，起因于秘鲁的巡罗队在塔克纳附近捕获一辆智利的运水车。坎佩罗当时宿营在塔克纳，他从情报获悉，在附近的智利军队约有二万二千人。他自己的还不到一万人，据阿格达斯说，“其中还包括了病号”。他自己深信采用突然夜袭的办法，可以弥补军事上的劣势。于是他分兵两路，从左右两翼去围歼敌军。子夜时分，他们刚刚出发，秋雾便从海上袭来，遮蔽了向导赖以识路的所有标记。军队完全迷失了方向，可能根本没有接触到在两路部队中间正酣睡着的敌人。坎佩罗别无他路，只好命令军

队返回营房。一路人马好不容易才顺原道撤回，另一路却未能如此幸运。智利哨兵发现了他们，向他 208 们开枪。随后，全部炮兵投入战斗。八点三十分射击停止。在一个多小时内，使人窒息的沉静笼罩着整个沙漠。玻利维亚人偶尔可以看到刺刀在阳光下闪亮。智利人隐蔽在沙丘后面，充分地做好了准备，在酷热的中午才发起攻击。玻利维亚人经过徒劳的夜行军和吉凶难测的等待，已是筋疲力尽。他们尽他们的人员和弹药之所能，坚持战斗。黄昏之前，战斗结束了，死亡五千人，伤者无数，在被俘人员中有一些是玻利维亚最优秀的指挥官，其中包括胡安·何塞·佩雷斯将军和埃利奥多罗·卡马乔将军。

布尔戈斯对这次战争作了充满热情的记述。他是这样总结这最后一次失败的意义的：

> 智利侵占托科皮利亚、安托法加斯塔、科比哈和梅希略内斯等地，从中获得三万五千居民和十五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银、金、硼砂、硫磺、铜、硝石、盐等矿物。到1907年，它从这里获得

了二亿英镑的巨额收益。因此，把1879年的战争称为硝石战争是有道理的。



太平洋战争

阿连萨高原战役的失败，宣告了硝石战争的结束．不过秘鲁又坚持了两年时断时续的战斗。加菲尔德总统[①] 的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出面调停。他是第一个对拉丁美洲感兴趣的国务卿。他之所以如此也并非偶然，主要是从改变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的愿望出发的。美国每年要从拉丁美洲购买一百万美元的原料，而拉美国家却把这笔收益用来进口欧洲的制成品。贝利指出："由于有利的经济关系不能存在于武装冲突之中，美国愿意为结束拉丁美洲战争从中斡旋。"

1880年10月，在阿里卡，在美国拉卡瓦纳号军舰上举行了会议。布莱恩反对在拉丁美洲割让领土。当然，他得到了强烈谴责这场"不义战争"的玻利维亚的大力支持。智利实际仍占领着这一地区，它采取的态度，也就是几年以后其外交部长所表白的："智利的权利得自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最高法律。" 210

玻利维亚和秘鲁拒绝接受"强权出公理"的事实，并退出了布莱恩的会议。三个月后，在1881年1

① 美国的第二十届总统。——译者

月17日，智利军队就攻占了利马。他们的野蛮破坏和劫夺激怒了秘鲁人民，以致安孔条约拖延了两年多，到1883年10月20日才签字。甚至到那时候，坎佩罗还施加他的一切影响阻止签订条约，他自己也不代表玻利维亚签字。然而，当时在自己的家乡受外国军队占领之苦的毕竟不是拉巴斯。

安孔条约规定，秘鲁把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允许智利占领塔克纳省和阿里卡省十年。十年期满，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己决定两省的归属问题。公民投票获胜国应付给对方一千万银比索作为补偿。智利觊觎该地区不仅是为了矿产资源，也是为了把它作为自己和秘鲁之间的缓冲地。智利继续进行使该地区尽可能智利化的工作，并拖延举行公民投票。“太平洋问题”（Question of the Pacific）直到1929年才完全解决。

玻利维亚拒绝在安孔条约上签字，而另外安排了一个“不定期的休战”。按安孔条约规定，智利军队所占领的玻利维亚土地全部让给智利，并赔偿胜利者——智利所蒙受的财产损失。阿夫东·萨维德拉在《海岸权的收回》一书中写道：那些条件是不能容忍的。“智利已在我们脖子上套上了

名为和平条约的枷锁，取消了我们的海关，强迫我们免税进口他们的产品，一句话，就是把玻利维亚变为智利的工厂。” 211

这种不公正的要求只能制造恶感。在阿尔塞总统执政期间，当智利—阿根廷的关系因边界纠纷再度紧张时，玻利维亚请求阿根廷，帮它商定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办法。报酬是玻利维亚将考虑同阿根廷联合。智利因此稍有收敛，并于四年之后，即1895年，签订了一个较为和解的条约。它同意以获得阿塔卡马为交换条件，归还一个原属玻利维亚的港口，并在两年之内给予一条通向该港口的走廊地带。然而它并未履行其义务，因此直到1904年才算签订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和平友好条约。

这次智利保证从拉巴斯到阿里卡修一条铁路，以换取阿塔卡马省。十五年后，在玻利维亚境内那段铁路将成为玻利维亚的财产。此外，智利还得补偿玻利维亚公民由于失去硝石产地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根据安康条约强加于玻利维亚的债务。智利基本上履行了这些许诺，铁路亦于1912年修成，但争端仍悬而未决。

1920年，玻利维亚以它被迫签订1904年条约

为理由，要求国际联盟重新商议该条约。伍德罗·威尔逊[1]支持玻利维亚的要求。他声言："所有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自由出海口。"遗憾的是美国当时还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国际联盟拒绝复审该案。后来，当美国卷入解决"太平洋问题"时，玻利维亚在它的支持下再次进行尝试。塔克纳和阿里卡的公民投票从未举行，玻利维亚希望能说服秘鲁和智利将那块领土移交给它。两国都不同意，此事一直拖到1929年才得到解决。塔克纳归还秘鲁，智利得到阿里卡，条件是智利应付给秘鲁六百万美元，212 在阿里卡和安托法加斯塔修建自由港，并允许玻利维亚使用该港。另一条规定是，如果未经事先商定，两国皆不得向第三国（玻利维亚）割让任何领土。至此，玻利维亚不仅仍是内陆国，而且争取获得出海口的问题也弄成僵局。

无休止的谈判在玻利维亚引起了许多麻烦。坎佩罗总统任职期满，退隐于苏克雷郊外他的故乡，十二年以后，1896年死于该地。在他当政期间，国内未出现军事阴谋叛乱，但对付智利的巨大威胁却费尽了他的心血。

---

(1) 美国的第二十八届总统。——译者

坎佩罗的副总统阿尼塞托·阿尔塞，制造了一个大麻烦。他是个矿业主、百万富翁，战争初期他就公开赞成和平，甚至不惜抛弃盟友秘鲁。由于这种背叛行径，坎佩罗于1881年把他流放到阿根廷。两年后，当秘鲁签订安孔条约时，阿尔塞就成了赞成玻利维亚签字的那种舆论界的当然领袖。他应这个保守派集团的邀请，回了国。在1884年总统选举时，他同另一个名叫格雷戈里奥·帕切科的百万富翁竞选。

埃利奥多罗·卡马乔将军（他是在美国拉卡瓦纳号军舰会谈后，从智利战俘营里释放出来的），是另一个新政党——自由党的领袖。据菲诺特说，“在积极支持民主施政、反对卡西克统治（cacifuism）的原则基础上组成政党，这还是第一次尝试。”自由党的基本方针建立在法律、秩序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内政方面，他们主张只给教会少许的特权，而强烈支持私人的积极性。党的领袖们宣称，他们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头号公敌”。在外交上，他们采取毫不妥协的反对智利的立场。卡马乔要求在太平洋岸要有一个港口，并且说，国家应该“尽快地扩大和加强国防力量，以阻止任何敌人的 213

侵略”。

格雷戈里奥·帕切科(1884—1888年)在议会主持的一次决胜竞选中获得胜利。他是靠民主党的选票当选的,但实质上却是个保守派。他的党所持的立场是“保卫信仰”,反对自由党,并主张结束战争。

帕切科是在波托西长大的。他于1823年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他早年就显示出非凡的刻苦和勤奋精神,因而积蓄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慷慨地把这笔财产施舍给许多慈善机关。在此过程中,他就以一个好心的爱国者而闻名全国。从他执政起,开始了一个为期十五年的所谓“白银时代”,因为他和随后的三任总统都从开采银矿发了财。

在他的四年任期内,政治稳定,选举程序有所改进,玻利维亚的经济开始有了真正的进步。他修通了从苏克雷到巴拉圭河的公路,并推进了巴拉圭河的航运,从而打开了通往东南地区的道路。他亲眼看到帕切科港开港,看到了通往圣克鲁斯的公路和通往普诺的电报线路。他用自己的总统薪俸在首都修建了精神病院。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同智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对于这样一个颇为棘手

和不得人心的问题，两国都从地理和经济情况出发，通过停战协定暂时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从而给玻利维亚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条件。

阿尼塞托·阿尔塞（1888—1892年）合法地继任了总统职位，这是因为在1884年的大选中他曾同意不与帕切科竞选。他比帕切科仅小一岁。同帕切科一样，他也喜爱刻苦工作和随之而来的权势。他从开发当时最富的乌安查卡银矿中发了财。随着财产的增多，他的政治野心更大，专横作风也更 214 严重了。他的极端保守主义激怒了自由党。他就职几乎不到一个月，自由党就于1888年9月8日煽动他的卫兵造了他的反。

阿尔塞当时正在苏克雷大教堂，他化装成修道士才得以逃脱出城。他到达科恰班巴，组织了自卫力量，随后追赶反叛者直到波托西。他在卡里卡里把他们击败，并因为他们的背叛给予了无情的枪杀或严惩。这样一来便惹起了更大的骚乱，并且在阿尔塞以后的任期内充满了阴谋与反阴谋，造反与镇压，控告与审查。

尽管阿尔塞一直需要提防反对党，但在他当政的四年里，他仍然想方设法实现他的最大愿望

——把安托法加斯塔到卡拉马的铁路延伸到奥鲁罗。第一段伸延的铁路从南海岸到阿瓦罗亚的故乡，已由安托法加斯塔硝石公司在1878年修成了。虽然它归私人所有，但苏克雷和拉巴斯两者都认为，它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害怕智利利用它侵略这个国家，因此都不允许在其境内继续延伸。自由党谴责说，阿尔塞总统修建这条铁路，只是为了便于他的乌安查卡矿山的矿砂出口。1892年5月15日，当机车冒着蒸汽开进站台，他锤击金道钉表示可以通车的时候，人们听到他喃喃自语："那么现在你们可以杀掉我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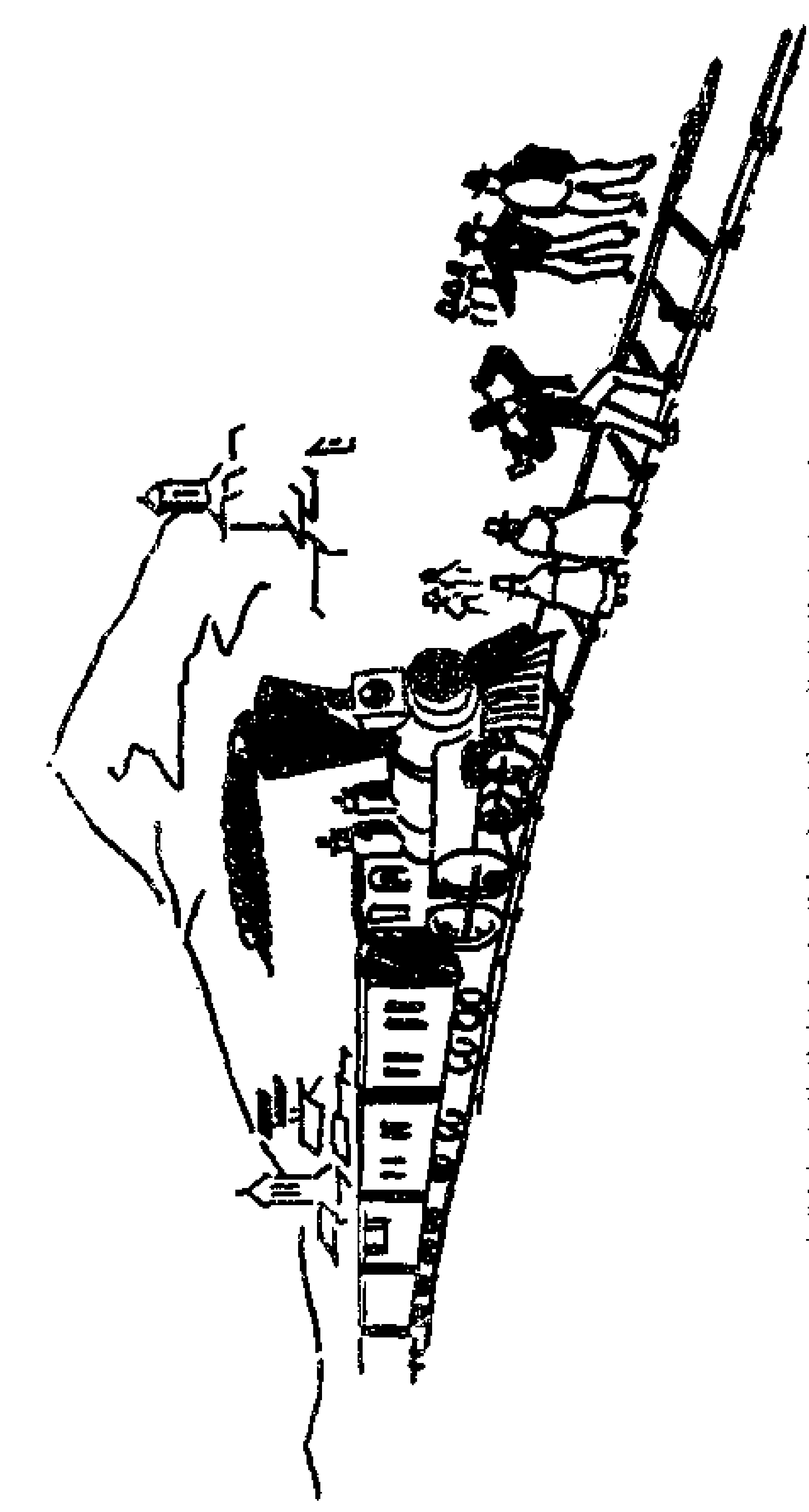
另外一些引起人们对他怀念的工程，是从波托西到苏克雷、再从苏克雷到科恰班巴的公路，以及这条公路横跨皮科马约河和格兰德河的令人惊叹的大桥。他为学校和他所建的军事学院从欧洲引进修女、教授和工程师。他对军事制度的又一改进，是制订了兵役法草案。是他，最先想同智利重新协商一个不定期停战协议。也是他，通过对阿根廷施展外交手腕，使阿根廷说服智利签订了1895年条约。这个条约对玻利维亚较为有利。之后，智利毁约，但阿根廷却得到了它在这场交易中的份

215

额。它以放弃对塔里哈领土的要求，换到了在皮科马约河和贝尔梅霍河之间的中查科那块无人居住的处女地。该条约签订于1889年，从此结束了由1825年玻利瓦尔的决定所引起的关于南部边界的争执。

阿尔塞支持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作接替他的总统候选人。巴普蒂斯塔对国际事务的主张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愿望和他自己是并行不悖的。然而，即便有阿尔塞的支持，巴普蒂斯塔只不过赢得了胜过联合的自由党一民主党反对派的微弱多数。更糟的是，二十一个自由党人在议院中取得了席位。阿尔塞以他特有的果断立即行动。因为不愿让巴普蒂斯塔在不稳的总统宝座上对付强有力的反对党，他宣布全国戒严，并把自由党的议员押送到内地遥远的偏僻村庄，同时监禁了他们的领袖卡马乔将军。阿尔塞离职前的这最后一着，损害了他的声誉。阿格达斯说他这个行动是专横的、无耻的，是他最大的政治错误。阿尔塞为自己辩护说："自由党给我一个九月八日①，我回敬他们一个八

① 参看第214页。——译者



当阿尔塞总统锤击金道钉表示他那修筑铁路翻越安第斯山的梦想已实现时，人们听到他喃喃自语：“那么现在他们可以杀掉我了。”

月五日。"

任职期满后，他退隐过着清贫的生活。玻利维亚在失掉硝石的收益后，唯一真正的赚钱货是白银，而此时白银价格已急剧跌落。他用尽他的钱财维护保守党。他于1906年死于苏克雷，终年八十二岁。

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1892—1896年)由于他卓越的雄辩才能和对宗教的虔诚，成了保守党内的知名人物。他于1832年生在科恰班巴郊外，以优等成绩毕业于苏克雷大学，甚至未成年时即被选入议会。他曾和利纳雷斯合作，在梅尔加雷霍执政期间，他不得不逃亡国外。回国以后，他支持弗里亚斯、巴利维安、帕切科和阿尔塞的各届政府。217 在任总统以前，他所做的，实际上都是为反对专制政治、拥护立宪政府而斗争。然而，阿尔塞那次宣布戒严、反倒将他置于篡权者的地位了。他在执政期间几乎一直在与公开反对他的自由党作斗争。当时，自由党颇为有理地声称，他取得政权时，就已经放弃了他的原则。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巴普蒂斯塔这样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也不可能满足国家对他的期望。最

后，他决定：流放的自由党议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出国。同时，他还准许恢复出版自由。但是好心不得好报，《大公》杂志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与攻击。他对公共教育制度稍有改进，然而一般说来，这只能有利于那些富有阶级。城市下层社会仅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印第安人在整个白银时代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使玻利维亚利润很低的矿山和农业得以维持。巴普蒂斯塔令人最难忘怀的，是他与智利签订了1895年条约。这个条约比以前及其后的任何条约都更有利于玻利维亚，而当智利和阿根廷弥合了他们的分歧以后，智利便立即把它废除了。

巴普蒂斯塔在历史上的声誉，由于达萨在他任期内被暗杀而受到污损。1893年，伊拉里翁·达萨从欧洲给总统写信说，他愿意回苏克雷为议会控告他侵吞公款一事进行辩护。实际上他已把十四年前带到欧洲的那笔巨款，挥霍殆尽，回国的目的是要自荐为总统候选人。巴普蒂斯塔允许他回国。当他到达安托法加斯塔时巴普蒂斯塔写信通知他，在智—玻边界将有一个护兵陪同他入境。在乌尤尼，有一个护兵迎接了他，但谁也不知道此人

是否由官方派来的。达萨应邀到车站拐角处，几个身份不明的军官在该处将他击毙。由于他的敌人是如此之多，据阿斯卡伦斯所述，“包括了每一个玻利维亚人”，所以，究竟谁应对此事负责，从来没有人判定过。当然，政府就得首当其冲受到非难。218 达萨遇刺，又给八月五日加了一层耻辱，这就更进一步削弱了保守党对政府的控制。

巴普蒂斯塔支持他的内阁部长塞维罗·费尔南德斯·阿隆索为他的继任候选人。阿隆索仅以微弱的多数票取胜，以致自由党马上就说这次选举是个骗局。其实，对于阿隆索的胜利，巴普蒂斯塔的支持，可能还不如自由党的分裂给的帮助大。自由党由于党内矛盾而分成两派，卡马乔将军为一派，另一派是一些青年。保守党内核心的集团也帮了阿隆索的忙，所以许多人相信自由党的谴责是有一定道理的。

塞维罗·费尔南德斯·阿隆索（1896—1899年）一上台，就面临着随时都可能爆发叛乱的局面。他自从在苏克雷放弃对神学的研究转学法律之后，当过几个矿业公司的律师，积攒了一大笔财产。起初，阿隆索以善意与和解的态度试图同自由党人

交朋友，但他自己的党羽背弃了他。他们欺负他性情温和，领导软弱，于是恣意妄为，作奸犯科，这就势必导致另一次内战的惨祸。

内战持续时间不长。这次冲突起始于议会中丘基萨卡代表团的一项提案。该代表团提出并强行通过的议案强迫总统必须住在苏克雷。以往许多立法长官和总统宁愿住在拉巴斯而不住在首都。当玻利瓦尔决定定都于苏克雷时，拉巴斯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地方，而丘基萨卡则紧靠波托西[1]。到该世纪末，拉巴斯人口增多，在商业上也变得更重要了。拉巴斯代表团深为丘基萨卡代表团的行为所激怒，退出议会。当他们回家时，拉巴斯的自由党人向他们狂呼喝采。拉巴斯代表在短时间内，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其中要求把拉巴斯变成特区。219阿隆索派军队镇压叛乱。反对派在何塞·曼努埃尔·潘多将军率领下，在克鲁塞罗—德帕里亚击败了阿隆索的军队。阿隆索甘拜下风，变成一个流亡者。过了几年，局势平稳以后，他回国重新担任了议会和外交方面的职务。

---

① 苏克雷是丘基萨卡省的省会，以前叫丘基萨卡，该城离银矿产地波托西甚近。——译者

何塞·曼努埃尔·潘多将军（1899—1904年），作为自由党的代表，补上了离职总统的缺。从他开始，以后二十年都是自由党执政。然而，他是一个军官，与保守党相比，在施政上，没有什么改变。自由党一掌权，就抛掉了曾用以团结其党羽进行斗争的联邦主义的旗帜。自由党曾声称，由首都掌握的集权制政府阻碍了发展地理上的和政治上的统一。他们认为联邦主义可以改变这种形势。但在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却因为这个问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他们没有提出新宪法，而只是投票决定恢复1880年宪法。除了设两个副总统的规定以外，该宪法与1878年宪法一模一样。自由党关于使政教进一步分离的愿望，被拖延了六年之久。把拉巴斯变成特区的问题，也无声无息地搁置下来。拉巴斯成了实际的首都，而苏克雷仍是法定首都和司法中心。

P·H·福西特上校对这个时期的拉巴斯有过一段描述。为了避免发生"有关领土归属问题的大规模战争"，他曾以一个公正的测量员身份到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的橡胶产区划定国界。他说：

拉巴斯有市内电车、广场、白杨树林荫道（alameda）和咖啡馆，实质上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云集在大街上。然而，人们还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离荒野之处并不太远。在城里人的大礼服和高礼帽中间，你可以看到探矿者破旧的大边毡帽和灰色的劳动服；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双双捆起来的成堆的土鞋，和时髦女士们的高跟舞鞋摆在一起，看上去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矿工和探矿者每日可见，因为采矿是玻利维亚山区唯一的行业。你还时时刻刻可以看见面黄饥瘦的人，他们是新近从山里来的——来自那广阔的荒野下面雾气蒙蒙的人间地狱。

220

潘多将军从另外一些方面对国民福利做出了贡献。他修通了瓜基——拉巴斯铁路，联上了的的喀喀湖的水运新航线，这样就同在普诺的秘鲁铁路终点衔接起来了。他进行了人口普查，普查表明全国人口近二百万。更重要的是，冶金工业又恢复了生气。矿业为政府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

为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当银价下跌时，似乎玻利维亚要经受巨大的艰难困苦。然而，在该世纪末对锡的需要增加了。十年之内，炼制的锡砂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不过，锡矿从来没有对国民福利做出它应做的贡献。大量出口促进了铁路线的延伸，然而规模巨大的矿业公司为少数人所有，甚至有时为外国所控制。自由党的不干涉态度和他们特别热心于帮助他们的政治支持者的做法，使那些为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席尔德所有并由他们经营的庞大的锡矿康采恩更得到了发展。在以后几十年中，锡大王变得更强大了，他们通过纳税给政府增加了收入，同时也对政府实行政治控制，两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

如果不是因为梅尔加雷霍所留下的烂摊子使潘多将军也受到咒骂的话，他的成就可能会更大些。梅尔加雷霍这个暴君在1867年同巴西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巴西得到了马托格罗索和阿克里的一部分土地，共十万平方公里，还得到了出入拉普拉塔河的权利，交换条件是玻利维亚可以在巴西的河流上航行。因为巴西人已经开始在那里进行橡胶树的开发工作，玻利维亚人才知

道这块土地的潜在价值。人们对梅尔加雷霍把国土割给巴西十分忿怒，这便促成了他的垮台。

巴西对西北地区部分土地的占有，并没有满足其橡胶猎取者对剩下那部分土地非法占用的野心。玻利维亚自卫军企图把他们赶出去，致使两国关系日益紧张。1899年，玻利维亚建立了阿隆索港，对大量外运的橡胶征收关税，这更激怒了巴西人。居住在玻利维亚的巴西商人，以此为借口在本地人中煽动分裂。玻利维亚副总统佩雷斯·贝拉斯科率领一支远征队镇压了分裂主义者，粉碎了他们想建立独立的阿克里共和国的企图。接着，玻利维亚把全区租给一个名叫玻利维亚辛迪加的国际公司，以便先行制止另一次叛乱。巴西人知道以后，就在股票市场上购买了该公司的控制股。另一次起义爆发了，这是由马瑙斯[1]的首脑唆使而引起的。虽然阿克里和马瑙斯之间的距离比阿克里距拉巴斯远得多，但马瑙斯拥有拉巴斯高原所没有的水路交通。博特略写道，拉马略州长组织了由奥尔兰多·科雷亚·洛佩斯率领的另一次“解放远征”。玻利维亚橡胶大王尼古拉斯·苏亚雷斯，鉴

① 马瑙斯是巴西亚马孙州的首府。——译者

于拉巴斯政府正遭受高原上土著人造反的冲击，奋起保卫这块土地。

无畏的维尔加(Temible Willka)在高原上领导的起义，也是由以前梅尔加雷霍做的事引起的。他在当政时，夺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自由党使印第安人相信土地还会还给他们。当自由党未能履行其诺言时，他们便揭竿而起，但后来被镇压了。

在阿克里，战斗以一种典型的热带森林的作战方式散漫地拖延着。玻利维亚既无能力支持苏 222 亚雷斯，又选不出一位使节能够对付能干而诡计多端的巴西外交部长——巴龙·德·里奥·布兰科，只好于1903年签订了皮特罗普利斯条约。玻利维亚只得到了一千万美元，而把另一块六万平方哩、长满橡胶树的特别富裕的地区割给了它的好邻居(bom vizinho)巴西。同时，巴西同意沿马代腊河急流区域修建一条铁路，以便建立起同马莫雷河的货物联运。这条铁路修成后，玻利维亚就又有了一条水路可通亚马孙河，并由此通往大西洋。这一千万美元使用得甚有成效，它被用来新建了一条从高原到太平洋岸的铁路，从而给开发新高原区打开了方便之门。

潘多将军挑选他的军政部长伊斯梅尔·蒙特斯(1904—1909年)继任总统。蒙特斯1861年生于拉巴斯,他以律师为职业挣得了相当数量的财产。在阿连萨高原的战斗及同副总统一起在阿克里进行的战斗,已经使他在国内获得名气。在丛林袭击之后,副总统野心毕露,潘多驱逐了他,这就为蒙特斯留出了空位。

蒙特斯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同智利签订了1904年条约。该条约不利于玻利维亚,不过他对此不负主要责任。不管怎样,由于恢复了较好的关系,阿里卡——拉巴斯铁路的修建才有了可能。蒙特斯还设法使立法机构通过了自由党对宪法中有关宗教条款的改革。1906年8月修改的条文是这样的:“国家承认并支持天主教的信仰,不论是罗马派还是教皇派,并保证公众信仰宗教的自由。”

他开设了苏克雷师范学校,并采取了很多办法,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的不谦逊损害了他作为历史人物的形象。他感到他的继任者尽管也是自由党人,但没有足够的才干担任高级职务。蒙特斯准备采取武力拒绝交权,正好这时他的由合法选举出来的继任者费尔南多·

瓜查利亚死了。蒙特斯以此为借口，继续留任一 223
年。

下一任总统埃利奥多罗·比利亚松（1909—1913年），也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他1848年生于科恰班巴，并在该地长大。同蒙特斯一样，在他任职期间，玻利维亚的经济也达到了最富有的程度。他很明智地利用国库资财继续修筑铁路和发展其他交通事业。按照自由党的政策，他使议会通过了一个颇有争论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只有按世俗方式结婚才算合法。在国际上，他恢复了玻利维亚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这是在阿根廷调解玻—秘之间边界争端时中断的。比利亚松承认了对玻—秘争端的那种解决办法，并把阿克里同马德雷—德迪奥斯河之间一小块西北国土割让给秘鲁。虽然玻利维亚割让这块荒无人烟的土地没有获得任何代价，但至少没有引起战争。

伊斯梅尔·蒙特斯再次当选总统（1913—1917年）。他的第二次任期笼罩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这次大战使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因为缺少资金，他仅能建立一所拉巴斯师范学校，完成铁路修建和有限的几项

公共工程。1933年，蒙特斯在视察查科战场时死去。

何塞·古铁雷斯·格拉(1917—1920年)接替了蒙特斯。他没有什么处理行政工作的才能，而把精力集中于改进国家的教育制度。他于1869年生在苏克雷，在苏克雷和英国受过教育。他的政治经历是有限的。任总统之前，他只在蒙特斯政府中当过短时间的财政部长。由于曼努埃尔·潘多在拉巴斯郊外高原上被暗杀，格拉的就职典礼遭到了破坏。新近组成的共和党谴责说这次暗杀是格拉在报纸上发表的蛊惑性评论煽动的。这个新政党基本上是由前保守党成员组成，它得到某些厌恶224自由党长期操纵行政大权和不满现状的矿主们的支持。

支持者中居首位的是西蒙·帕蒂尼奥。他也生于科恰班巴，大约比古铁雷斯年长七岁，不过出身却低下得多。早年他是在别人手下干活的。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得到了一个锡矿，这成了他发财致富的源泉。他用获得的利润再去购买其他矿山，其中包括全世界最大的卡塔维矿，从而积累了大量财产，成为全世界的大富翁之一。自由党

靠着来自他的矿山和其他矿山的税收扩建铁路、加强军队并维护私人企业。但自由党因税收问题对他提起诉讼，他就利用他的财力对自由党进行破坏。议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已经无法工作。古铁雷斯·格拉在他任职期满前六个月，突然辞职，逃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后来从那里又逃到安托法加斯塔，九年之后死于该地。

一个洪达接管了政权。他们利用格拉辞职后的这段时间，拿战后已贬值的欧洲货币，有利地清偿了玻利维亚的许多外债。洪达在下届总统的人选问题上曾发生过分裂，最后选定了包蒂斯塔·萨维德拉。

包蒂斯塔·萨维德拉(1920—1925年)对促使格拉垮台曾起过作用，他自己作为共和党第一任总统，在任期内也深受政治斗争之害。在当律师、外交家、部长和政治家的过程中，他的才干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由于自由党与共和党在分赃时都想得到最大的一份儿，所以他面临着同其前任一样混乱的政府。一次铁路工人罢工宣告了他执政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他未能招来贤明人士就任内阁各职。自由和共和两党都拒绝参加他的内阁，于

是他转向劳动人民，寻求他所需要的支持。被激怒的军队起来反对他。他就职后几个月，一个拉巴斯军团叛乱了。军事学院也阴谋反对政府，他不得不将其关闭。翁西亚矿工罢工，许多人被杀掉。城市居民也起来反对联邦控制，政府不得不进行镇压。

225

虽然受到严重的阻碍，他还是通过了玻利维亚第一个有利于各劳动阶级的法律。如同承认八小时工作制一样，也承认了罢工的权利。他以宽阔的林荫道和平坦的大街装饰了拉巴斯市。他曾试图让国际联盟重新审议1904年条约。美孚石油公司于1922年进入这个国家。他估计不至于由于自己不在国内而发生另一次政变，便冒着风险参加了阿亚库乔战役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从而改善了与秘鲁的关系。而当玻利维亚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正在准备离职卸任。

继任人的选举，也具有同他任职时一样的暴力特色。最终，费利佩·古斯曼（1925—1926年）算是临时当选了。五个月以后，由于陆军总司令汉斯·库恩特将军的支持，埃尔南多·西莱斯（1926—1930年）在一次和平选举中获胜，接任总统。他对反对党采取和解态度，并要求他的支持者

们也这样做。

西莱斯在1881年生于苏克雷，并在那里开业做过律师。他先后当过圣哈维尔大学校长，驻墨西哥和秘鲁的大使，国务部长和议会议员。尽管他有如此的经历，但这位共和党的最后一任总统还是犯了两个大的政治错误。他想让各党的领袖都参加内阁，但没有足够的职位安排这么多人。为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他轮换任用各党领袖。结果，他既削弱了他自己的行政权力，又得罪了那些不得不解职的人。同样异乎寻常的是，他决定组成一个他自己的党——民族同盟。该党系由各党的死硬派组成，是查科战争后成立的社会民族党的先驱。为了再次当选，西莱斯决定在任职期剩下六个月的时候辞去职务。这是他垮台的直接原因。在幕后 225 还有其他原因。共和党人要获得他们贪污和挥霍所需要的款项，必须向国外大量借债。这些贷款很多是来自美国，都是以国家的岁入为担保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人认为有必要派遣一个驻节使团到玻利维亚来索取债款。

1928年12月巴拉圭攻进了玻利维亚的一个哨所，从而制造了另一次危机。愤怒的玻利维亚人准

备投入战斗，但西莱斯聪明地把这件事件提交给仲裁法庭来解决。他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然而却为查科战争埋下了祸根。面对国家这种悲惨的经济状况，西莱斯要求商业银行给共和国贷款。渴望削弱他的总统地位的某些势力雄厚的财团反对他这样做。他追求再次当选的举动倒是帮了他们的忙。后来，部长会议判定，他辞职是违反宪法的。于是叛乱再次爆发。西莱斯把青年人和大学生们牢固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尽管他们不一定拥护他的民族同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走上街头，但军队很快就把他们镇压下去了。1930年6月以卡洛斯·布兰科·加林多将军为首的洪达接管了政府。他打破了军人的传统，立即把共和党1915年政纲的一些条款付诸实施。实行了人身保护法令。戒严受到限制。为了使政府更符合人民的需要，他把联邦行政工作改为分权管理。为赢得大学生的支持，他还允许大学自治。

西莱斯的晚年大部分是在国外度过的。他后来当过驻智利和秘鲁的大使。1942年，当他执行最后一次使命，飞行于利马和阿雷基帕之间时，因心脏病发作，死于飞机上。

洪达号召各党派调和他们的分歧，以使决定一个共同满意的总统候选人。他们选定丹尼尔·萨拉曼卡为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他巧妙地争取到了两位前总统蒙特斯和萨维德拉的支持，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本来已经和他逐渐分道扬镳了。一个名叫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的自由党人，当选为副总统。 227

丹尼尔·萨拉曼卡(1931—1934年)，1863年生于科恰班巴。他是玻利维亚年龄最大的总统之一。据说帕蒂尼奥曾支持他，但总的来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受到了高度的尊敬。即便有这些条件，他却没有经验领导一个面临三十年代的经济衰退的国家。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并禁止兑换比索。

同巴拉圭的一次边界冲突，后来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后果。萨拉曼卡虽有爱国精神并且正直诚实，但他和他的部长们却没有远见和经验以防止查科战争的爆发。丘基萨卡湖的边界纠纷，也促成了萨拉曼卡的中途垮台。1934年11月27日当他企图撤换正在查科作战的陆军总司令时，他被粗暴地推到一边，他的副总统取代了他。

229

第九章

查科战争及其后果

一场战争不会无缘无故地爆发，也绝不是某人的个人意愿所产生的结果，不管他的能力有多大．战争是由当时许多难解难分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引起的．

——菲利维托·奥索里奥将军：

《查科战争》（1944年）

查科战争应当被看成是玻利维亚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它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查科战争加速了锡时代的终结。靠锡矿暴发横财的独裁总统们，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现在他们被军人取代了。这些年轻而激进的军人和自1825年以来摧残这个国家的考迪罗们大不一样。他们主张社会革命、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虽然他们要求群众支持时，其呼吁常常是煽动性的，

但是他们并不单纯是贝尔苏和梅尔加雷霍的化身。他们受外国的思潮影响极大，先是法西斯主义，继而是国家社会主义。他们以此为指导方针，230 把沙文主义和改革措施结合起来，掀起了迄今为止对南美洲旧秩序的最大冲击。

其次，战争在玻利维亚人的心灵里重新唤起了他们对祖国命运的新意识。由于他们崇奉改革运动，就产生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在这个经济遭到破坏、军事一蹶不振、丧权辱国的国家里，涌现了一种被唤醒的生命力。在人民中间，灾难燃起新的激情。虽然这种激情难免给社会带来某些严重的弊病，但从这里却产生了新的玻利维亚精神。这种精神在1952年空前高涨地爆发出来了。最终，它导致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工人和印第安人结成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纯一的政治实体。

查科战争还引起了近三十年的反美反帝的社会主义。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变革。矿业主的实力被削弱，最后，他们永远丧失了自己的财富。大土地所有者眼看着把他们的土地分给了昔日的佃户。印第安人在政治上占据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

因为他们的先驱者之中有一个代号为“农民”(campesino) 的瓦尔特·格瓦拉而更显得威严高贵。美孚石油公司的开发权被取消，它的投资被征用。而主张这些改革并期望有更大变化的左翼党派则纷纷成立和壮大起来。

这些不可抗拒的社会动荡都是查科战争带来的。造成深重灾难的查科战争，起因于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查尔卡斯王室法庭的辖区一直达到皮科马约河。这条河流向东南，在快到亚松森的地方与巴拉圭河汇合。1809年玻利维亚开始要求独立时，玻利维亚人就已经居住在这个地区了。虽然人数稀少，但是根据占领地保有主义的国际法，要求对这个地方有所属权，理由还是充分的。但是巴拉圭人断言他们的祖先来到皮科马约河的时候，皮萨罗尚未到达太平洋海岸。巴拉圭人还说，原居该地的凶悍的印第安人部落是他们的祖先征服的，他们应该有优先权。

231 查科 (Chaco) 在美洲大陆南部的中心，面积大约二十五万平方哩，略小于得克萨斯州。它的地理位置：东起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向西一直到塔里哈省和圣克鲁斯省境内的安第斯山麓；北界南

纬18°左右的亚马孙盆地；南邻阿根廷的萨拉多河和潘帕斯。有争议的地区是靠安第斯山的北查科。北查科虽然被河流环绕，但人烟稀少，只是一个贫瘠的牧区。

有两件大事使北查科对玻利维亚有了新的重要意义。一件大事是，1879年后玻利维亚失掉了太平洋岸的出海口，因而内河航运就更为重要了。巴拉圭河可供吃水量相当大的船只行驶，而在亚松森与它汇合的皮科马约河只能在其湖沼里航行吃水量浅的平底船和木排。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大事，是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进入了玻利维亚。在查科的西部发现石油以后，这一大片半沙漠地带马上增添了新的经济价值。人们多次指责美国的石油公司，说他们挑唆了这场战争，但是这些指控一直没有什么证据。阿夫东·S·萨维德拉谴责智利暗地里唆使巴拉圭进入查科，他写道：“每当太平洋沿岸因为塔克纳和阿里卡的问题陷入混乱的时候，巴拉圭在智利的鼓动下总是威胁我们在查科的领土。其目的是阻止我们和秘鲁采取联合行动。”

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十九世

纪。在纳西索·坎佩罗当选总统以前，他曾极力促使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归还梅尔加雷霍在1867年条约中割让的土地。同时坎佩罗和巴拉圭磋商了边界条约。该条约在1879年签字，从而确定了两国的边界。但因当时巴拉圭正处于独裁者频繁更迭的困境，所以条约一直未经批准。由于玻利维亚越来越急于获得通向大西洋的道路，1887年又签订了一个有利于巴拉圭的条约。第二年巴拉圭占领了新建的帕切科港。此后二十余年间，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892年，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当选总统。他命令塔里哈省司令官在查科建立堡垒。他认为，当他在前一年作为玻利维亚的使节到亚松森时，巴拉圭外交部长拒绝讨论他所提出的领土要求，是对他的污辱。

到1904年，"太平洋问题"接近尾声，巴拉圭正在从二十年前那场使它损失了三分之二人口的三国同盟战争中得到恢复。新世纪开始时，这两个国家都眈眈注目于那块被作家们描写为毫无价值的领土。巴拉圭开始在巴拉圭河以西沿着北线修筑碉堡，并沿着皮科马约河从东往西也修筑起一些碉堡。巴拉圭为了运输制革用的坚木，还把铁路修

到了北查科。玻利维亚为了阻止巴拉圭继续挺进，也沿皮科马约河一带修起了碉堡。阿根廷外交部长埃斯塔尼斯劳·塞瓦略斯在双方军队还没有正面接触的时候，便把蒙特斯总统的克劳迪奥·皮尼利亚总理和巴拉圭外交部长阿道弗·L·索莱尔请到一起进行调解。吉列尔莫·阿尔沃塔认为，玻利维亚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签订1907年皮尼利亚—索莱尔议定书。蒙特斯总统之所以同意阿根廷出面仲裁，是因为他确信玻利维亚的要求一定会得到认可。玻利维亚主张按殖民时代初期的情况划分疆界。事与愿违，阿根廷却让玻利维亚另给巴拉圭若干平方哩的土地，其根据是巴拉圭已占据着这些地方。议定书第七条还这样写道："在此协定有效期间，签约各方同意，从今以后对本签字日所确定的领土现状不得提出更改或有更多的要求。" 233

1923年，萨维德拉总统得知巴拉圭人又在向西移动，便废除了协议，修建了更多的要塞城砦。所以萨维德拉的传记作者戴维·阿尔维斯特吉断言，玻利维亚的三个政党都确定无疑地卷入了这场历史上不可能避免的战争；具体地说，就是保守党的巴普蒂斯塔，自由党的蒙特斯和共和党的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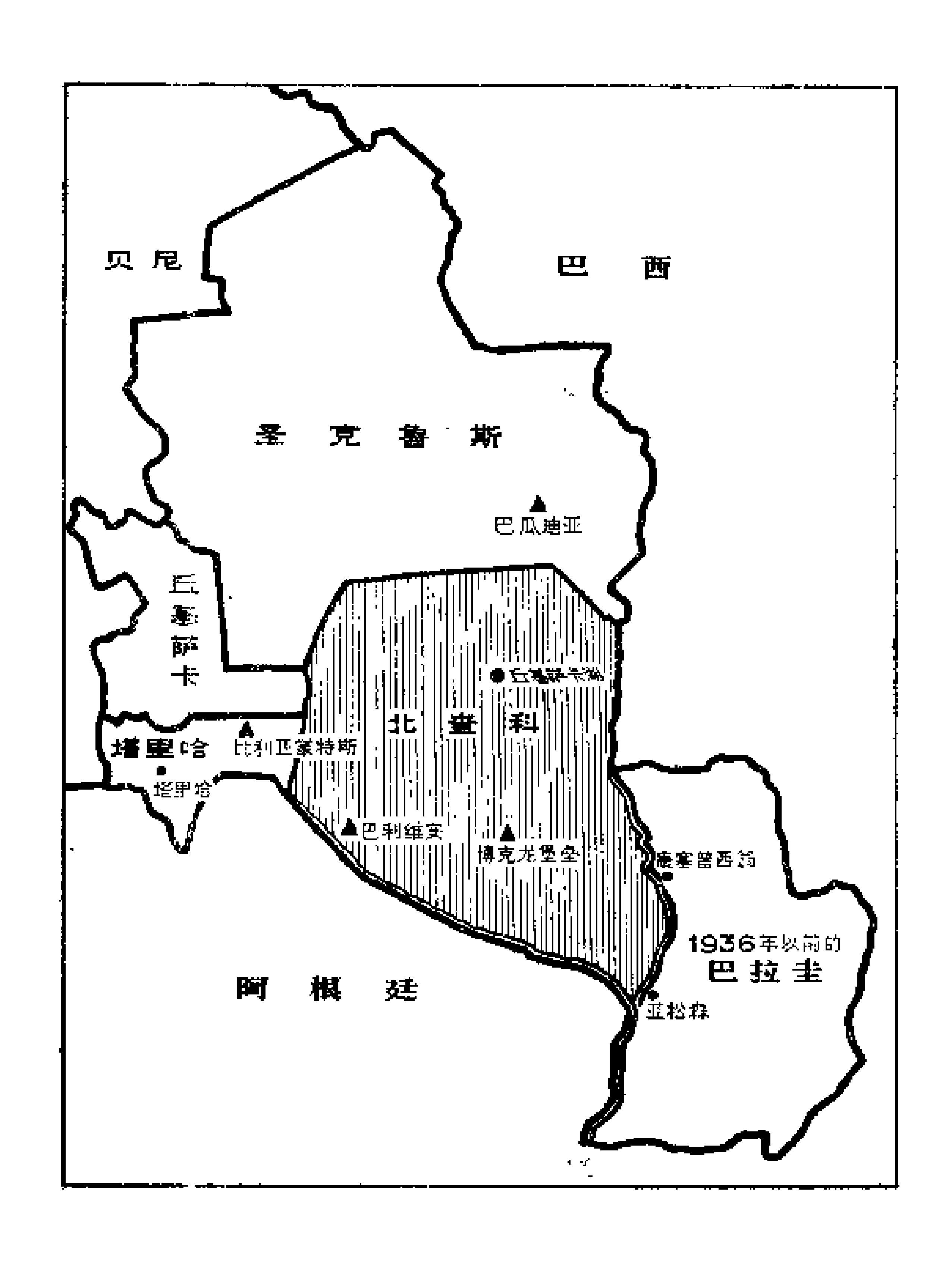
维德拉。阿尔沃塔说：不幸的是，每个总统都把要塞修建得太小了，以致在被围时不能解决自己的饮食问题，而要进攻时，又因彼此距离太远，不能互相支援。

1927年埃尔南多·西莱斯总统发现了再次卷入一场冲突的危险。他又谋求阿根廷给予调解。但是巴拉圭坚持不让玻利维亚在巴拉圭河可通航地区得到一个港口。在巴拉圭河流域发现石油的希望与日俱增，这种情况给查科的每一平方哩都增添了价值。而查科又正是玻利维亚可以提出主权要求的地方。因此，西莱斯总统继续修建要塞，总共修建了九个。其中，靠近皮科马约河的巴瓜迪亚堡垒于一年后遭到了袭击。据报道说，“三百名巴拉圭士兵突然袭击在巴瓜迪亚堡垒的仅有二十五名玻利维亚官兵的小小守备队。……要塞被焚，夷为平地。……多人死亡，各级官兵被俘。”西莱斯明知玻利维亚没有条件进行这场战争，但还是命令驻守罗博雷的军队夺回堡垒。当他们为洪水所阻被迫撤回时，西莱斯又改变命令要他们夺取巴拉圭的博克龙要塞。与此同时，他召集内阁彻夜开会进行讨论。外交部长托马斯·曼努埃尔·埃利奥

提醒大家说，从伦敦订购的武器尚在途中；而且，智利已公开谴责玻利维亚的进攻，一旦交战，智利可能支持巴拉圭。因此他主张和解。他的意见得到 234 了内阁的同意。192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仲裁与调解泛美会议宣告巴拉圭犯了侵略的罪行。阿尔沃塔说这是"玻利维亚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唯一胜利。"但是双方都是愤愤不满地离开会议桌的。因为玻利维亚想在巴拉圭河上得到一个港口的要求没有实现。而巴拉圭认为，要它为玻利维亚重建巴瓜迪亚堡垒，但玻利维亚却不把博克龙要塞修复到战前状态，这是不公平的。

此后两年期间局势一直是紧张的。玻利维亚由于经济危机不得不削减军事预算，而巴拉圭仍继续从意大利得到援助。当巴拉圭的两只炮艇开始在上巴拉圭河巡弋时，玻利维亚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中立国家出面调解，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他们将不承认用武力霸占领土的行为。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从中斡旋，两国还是在1932年 6 月不宣而战了。

据罗伯托·克雷哈苏在《马沙马克雷伊》一


贝尼
巴 西
圣 克 鲁 斯
巴瓜迪亚
丘基萨卡
北 查 科
塔里哈
比利亚蒙特斯
塔里哈
巴利维安
博克龙堡垒
康塞普西翁
1936年以前的
巴拉圭
亚松森
阿 根 廷

查科战争

书中的记述，奥斯卡·莫斯科索少校在飞行视察查科时，看到这片沙漠中间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虽然两国都沿皮科马约河从南向北修建了一连串的碉堡，但是谁也没有占据沙漠心腹地区的这片湖水要地。不久，莫斯科索从拉巴斯的陆军总司令菲利维托·奥索里奥将军那里接到了占领它的命令。虽然萨拉曼卡总统曾告诫奥索里奥“无论如何，千万不要惹起冲突”，但是他打给莫斯科索的电报却只是：“最后协议正在华盛顿磋商。中立国迫使双方尽快签字。竭力扩展在查科的阵地。按所提方案，急速占领大湖。”

莫斯科索率领三名中尉和二十五名士兵，经过三个星期的艰苦行军才到达湖边。使他非常懊恼的是，他的侦察兵发现巴拉圭的一个小哨所刚刚在那里设立完毕。玻利维亚人看到守卫者仅有十人，掏出手枪冲了上去。巴拉圭士兵全部逃走，236 无一伤亡。但是，早已处于千钧一发状态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

萨拉曼卡总统察觉到局势的严重，便命令奥索里奥将军立即放弃阵地。但是，据参加过1928年和平谈判的阿尔维斯特吉说，奥索里奥暗地里并

没有服从命令，因此才爆发了这场战争。可是，奥索里奥本人在他的《查科战争》一书中却写道："在7月25日，当时还是有时间可以制止这场战争的，我坚持主张总统应当首先采取外交措施，然后再采取军事行动。但他的回答却是'他必须遵循玻利维亚荣誉的道路'，那就意味着总统命令我们进行一场盲目的、毫无准备的战争。"

战争一旦爆发，双方的军人荣誉感和沙文主义就使其难以停止下来。巴拉圭方面很快就夺回了玻利维亚人现在称之为丘基萨卡咸水湖的阵地。巴拉圭所忧虑的危险确实存在。如果玻利维亚人控制了上巴拉圭河，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它来袭击亚松森。所以克雷哈苏评论说，对玻利维亚人说来，这场战争更多的还是个"荣誉问题，是一种殖民性质的战争。战地远离首都二千公里，根本不会发生敌人侵入心腹地带的丝毫危险。"

战地距离巴拉圭首都仅二百公里，这对它很有好处。它的四千名参战士兵在战争的头一年中，得到补给是异常方便的。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它又招募了一万二千名新兵。而在拉巴斯，萨拉曼卡总统只下了部分动员令，招募了五千名士兵。

查科的矮橡树丛和灌木丛林，对依靠游击战术的巴拉圭军颇为有利。气候也有利于巴拉圭方面，因为它的瓜拉尼士兵对查科地区的热带性气候是很适应的。相反地，来自玻利维亚高原地带的印第安人则不行。天气的炎热使他们疾病缠身，昏昏欲睡；蛇咬虫螫使他们疼痛难忍，不得安宁。此外，还得克服对地势高度的突然变化不能适应的困难。237 由于玻利维亚既无铁路又无公路通到那个地区，后勤部门的供应工作乱七八糟。再加上心理上的因素，那就是萨拉曼卡总统并不积极致力于战争。由德国人给他训练的武装部队很明显地愿意参加战斗。他们依仗着训练有素，人口众多，物资丰富，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击败瓜拉尼士兵，从而打开通向大西洋的道路，用以代替被智利占领的港口。但是，萨拉曼卡总统并没有被这些将军们的热情所打动。1932年8月，在占领了科拉莱斯、托莱多和博克龙堡垒之后，他命令玻利维亚军队停止前进。他独自打着如意算盘，期待中立国和国际联盟设法解决，以免局部的小冲突演变成全面的战争。但是，巴拉圭坚持要收回它失去的三个堡垒，否则就决不罢休。萨拉曼卡总统怕引起拉巴斯方面在政

治上的攻击，又不能归还这三个堡垒。因而战争就这样继续残酷地进行着。

结果，玻利维亚在初期取得的胜利迅速地丧失了。巴拉圭在自然条件方面的优越性，帮助它夺回了博克龙。拉巴斯各政党要求重新夺回博克龙的呼声非常强烈，以致总统府门前一片混乱。萨拉曼卡总统把这场灾祸归咎于奥索里奥将军，于是把他撤职，换上了兰萨将军。这个决定遭到了一些高级指挥官的反对，金塔尼利亚将军的参谋长戴维·托罗中校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萨拉曼卡执意坚持。战火在查科的大片土地上蔓延，虽然参战人数从来不多，但却逐渐消耗着玻利维亚的后备力量。象穆拉—缪尔特营地和斯特伦赫斯特山谷这样一些陌生的地名，往往一夜之间闻名全国。玻利维亚取得的胜利不多，斯特伦赫斯特山谷就是因为玻利维亚的一次胜利而出名的，在那次战斗中，由于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和贝纳迪诺·比尔瓦奥·里奥哈将军的得力指挥，有七十八名巴拉圭军官和一千五百名士兵在这里向玻利维亚人投降了。

1933年5月10日，也就是在丘基萨卡咸水湖的第一枪打响之后过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双方才正

式宣战。到这时候，巴拉圭已深入查科地区，它感 238 到已经确有某些值得夸耀的成果了。双方都考虑到国际联盟最近为防止战争而提出的禁运武器案可能付诸实施，因而把战事停顿下来。为荣誉而产生的复仇之心既已得到满足，战争可能就这样结束了。

1933年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泛美联盟第七届拉丁美洲会议上广泛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团团长科德尔·赫尔强烈要求尽快结束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对这一类交战的小国来说，是整个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 蒙得维的亚在地理上距战争地点很近，战争对我们正在谋求建立的和平机构又有直接影响，因此所有其他美洲国家有必要联合施加压力制止它。但是，我感到这些问题在会议议程上没有占据适当的位置，我对大会说，国际联盟委员会在这场冲突中是唯一有托管权的权威机构。联盟盟约是唯一的和平公约，而巴拉圭和玻利维

> 亚双方都是盟约的签字国。……大会的小组委员会遵循这条解决争执的途径……四天以后(1933年12月19日)，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签订了停战协议。委员会继续努力以求得战争的彻底解决。在停战开始后仅仅两小时，巴拉圭军队明目张胆地占领一个要害据点，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了这个协议是多么脆弱。

停战只持续了两个星期。1934年1月7日战争重新开始。玻利维亚一直从智利得到军需援助，而阿根廷则通过各种方式资助巴拉圭。到1934年年底，玻利维亚全线溃败。皮科马约河上游的巴利维安要塞陷落。靠近塔里哈省的比利亚蒙特斯只是由于比尔瓦奥·里奥哈的英勇抗击才得以保全。萨拉曼卡总统认为军队绝不可以搞奉承吹捧一类的事，早已免去兰萨的职务，换上了一个原德国军事顾问。在他撤换奥索里奥将军时，议会和军队就曾建议他从德国召回汉斯·库恩特将军。萨拉曼卡的契友、玻利维亚文坛上的红人弗兰斯·塔马约，在当时创造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我们将

以萨拉曼卡的头脑和库恩特的宝剑战胜一切敌人。”但是库恩特接连失败，萨拉曼卡对他逐渐不满，于是换上了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因为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听任比利亚蒙特斯被围，萨拉曼卡又想要撤换他。高级军官们对这位年老体衰的总统失去了耐性。于是，在一次他视察前线时，佩尼亚兰达和布施少校将他扣押，使他不得不辞职。他的副总统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在1934年11月27日担当了全军的指挥任务。萨拉曼卡回到他的出生地科恰班巴，一年后离开了人间。

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1934—1936年），是自由党人，1884年生于拉巴斯，在那里读完小学后曾到英国和法国学习。他对军队的事情不加遏制，但他倾向于停火。到此时，玻利维亚军队已被赶回到安第斯山脚下。血腥的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双方都感到筋疲力尽，困顿不堪。巴拉圭扩展的过大，以致于在1935年年中陷入了困境。6月14日，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和美国的坚持下，两个交战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和平谈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拖延了三年，到1938

年7月才签字。巴拉圭获得了它实际占领的绝大部分土地。玻利维亚得到了经由科仑巴伸进巴西的一条走廊地带横越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的权利。四万名巴拉圭人死亡，五万名玻利维亚人被杀戮。玻利维亚由于从中央银行借款二亿二千八百万美元，造成了物价上涨25%的后果。价值一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被巴拉圭缴获。维克托·圣克鲁斯认为，实际结果是“交战双方都没达到各自的目的。玻利维亚没有达到它的主要愿望，未能重获它在巴拉圭河上的港口。巴拉圭也没能占据吸引它的那块宝地——玻利维亚的石油产区。”

240

早在萨拉曼卡被迫辞职之前，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公众情绪就已不断增长。当玻利维亚人发觉通过和平谈判将一无所获时，便把失败的怨气发泄到曾协助安排停战的那些中立国身上。在托罗上校领导下的一些较年轻的军官，加入了国家社会党。顾名思义，国家社会党既有强烈的近于仇外的民族主义，又有对政府进行改革的愿望。

托罗在战争中的升迁极快。在靠近圣克鲁斯省边缘的皮奎巴，他所统率的一个骑兵队几乎全部覆灭，但他却未受到任何责难。在战争临近结束

时，他率领一个骑兵旅佯称护送佩尼亚兰达上校，开进了拉巴斯。一到拉巴斯，托罗便和萨维德拉的共和党残余分子一起策划推翻特哈达·索尔萨诺。1936年5月，两党共同煽动起一次总罢工。格尔曼·布施少校调动军队占据了市内的战略据点，然后来到总统府告诉特哈达·索尔萨诺，托罗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新总统。特哈达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在处理军队问题上过于软弱。他退隐到阿里卡。1938年死在那里。

戴维·托罗·鲁伊洛瓦上校(1936—1937年)执政仅一年多一点。当他第一次坐在总统办公桌前时，年仅三十八岁。他是一个老练的政客，支持过埃尔南多·西莱斯。西莱斯倒台后，他曾被流放。他一就职就对他的同胞们宣布，他是“在军队的一致同意下”来接管政府的，“军队的思想和政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凡对军队有利的，就对国家有利。” 241

可能是这样的。社会革命是他的目的。一个以庞大的五十三点纲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他的一大创造。在哲学上，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政府在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也还呼吁群众的支

持。为了迎合青年人、下层社会和印第安人的心意，他答应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的政府。他的改革包括为了穷人的利益而向富人征收赋税。他创立了矿业银行以资助中小型矿山企业。他增加了工人工资，并对新建的劳工部进行改革，以便能设法改善劳动条件。公众舆论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孚石油公司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挑动起来的。为附和这种呼声，托罗把该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同时成立了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YPFB）。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和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使玻利维亚诺[①]膨胀600%。这给托罗总统带来了难以应付的麻烦。矿山主反对他在他们领地内的干涉。人民不能确保安乐。最后，1937年7月，他遭到了来自军队的他的老战友格尔曼·布施所给予的最后一击，使他从执政的烦恼中解脱了出来。

格尔曼·布施·贝塞拉上校（1937—1939年）生于圣克鲁斯的平原地带，接任总统时仅有三十三岁。他的浅褐色的卷曲头发象他父亲的一样。他父亲是个德国医生，娶了一个玻利维亚女人。约翰·

① 玻利维亚币名。——译者

冈瑟是这样描述他的：

> 布施身体健壮，若没有那几颗明晃晃的金牙的话，是很漂亮的。他有着闪亮的蓝眼睛和浅褐色的头发。他是一个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凶暴而又幼稚的人。在他接近成年时，他到圣克鲁斯去，才第一次见到城市。他以为拉巴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医生们都说他患有抑郁性的癫狂症。有时候他那亮得出奇的眼睛几乎要从眼窝里迸出来。他有着旺盛的精力，强烈的失败感和近乎狂人的脾气。

242

布施在贝尼的热带地区长大。他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这使他在查科战争中成了参战部队中的第一流指挥官。他的声望已到了名不副实的程度。比他仅大六岁的托罗爱他如同自己的兄弟。尽管如此，由于政见不同，他还是毫无悔恨地把托罗赶下了台①。

---

① 在托罗的写字台上有一张布施的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父亲戴维。

按照惯例，他召集了制宪会议，以便确认他的总统职权和他的社会主义目标。例如，在玻利维亚历史上工人的代表第一次出席了制宪会议。巴伦西亚·维加在分析1938年新宪法时说，它编入了"一系列条款来宣告和安排在'社会立宪主义'的名目下被集中起来的国家权利。"它授予政府对地下资源的一切所有权。地下资源此后将是为政府的利益去开采，而不再是为私人的利益了。它允许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命脉，主要是贸易和工业，有干预的权利。它答应保护工人的家庭。总之，同以前所有宪法的不干涉主义完全不同，它把国家置于保障社会繁荣的前哨。

然而，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仍在继续，它在玻利维亚引起的后果就是灾难。1939年3月，布施已经无法挽救玻利维亚在立宪道路上的破产，他宣布他自己为"极权统治者"。他在做好准备之后，继续实行国家社会党的改革。他建立了新的公共卫生部，抑制垄断资本，提倡妇女有选举权和受教育权。1939年6月7日颁布的法令规定，所有的大矿山主出口锡砂所得外汇必须百分之百地交给政府，243然后从政府换得玻利维亚诺。在执政期间，他和巴

拉圭签署了最后的和平条约，其后又谋求和其他邻国建立较为和睦的关系。例如，他和巴西签订了合同以健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两国的铁路设施。关于锡砂出口税的规定，并没有顺利地被国内的保守党领导人所接受。他早就表现出他和帕蒂尼奥、毛里西奥·霍赫席尔德的宿怨。毛里希奥·霍赫席尔德是个阿根廷籍的德国人。他在发展矿业上非常顺手，控制了玻利维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他们和其他一些有钱的矿主结成了“神圣同盟”，公开和秘密地反对布施。布施对霍赫席尔德采取了报复行动，逮捕了他，甚至要枪毙他。布施总统在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萧条和“神圣同盟”财团的双重压力之下大受挫折。布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他脾气急躁。1939年8月23日，由于对事业的失望和癫狂病的发作，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卡洛斯·金塔尼利亚将军为首的老资格的军官们组成的洪达，无视副总统恩里克·巴尔迪维索的继任权，总揽了行政职权。拉巴斯和苏克雷的大学生们分别在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和米格尔·博尼法斯的领导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军人篡权。尽管一些人流血牺牲，玻利维亚的社

会主义政权还是湮没无闻达五年之久。在布施自杀后一个月，他那根本没有实行的6月7日的法令便被一笔勾销了。

军队中的因袭守旧分子和庞大的矿业财团勾结在一起，支持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为下一届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这位查科战争中人人皆知的原总司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获得竞选胜利的。但是，为确保他的胜利，他的支持者们还是对那位据守比利亚蒙特斯的英雄比尔瓦奥·里奥哈将军进行刁难，迫使他退出了竞选。

244 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德尔·卡斯蒂略(1940—1943年)于1940年4月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一个不太著名的左翼竞选人。他于1892年在拉巴斯的索拉塔出生。他的大半生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对行政工作没有什么经验。面对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引起的新的世界性危机，他废除了布施的一切改革措施，并设法在同盟国和轴心国相互角逐之中寻求一条狭窄的出路。经济危机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新的失业。这是因为战争使玻利维亚失去了欧洲的市场，也不可能进行海上航运。当犹太难民大量来到玻利维亚时，社会舆论迫使

佩尼亚兰达下令禁止继续移民。到那个时候，玻利维亚是西半球上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国家。纳粹的间谍，竭力利用政府中的军人气质，掀起一场反对犹太移民的运动。同时，纳粹分子还扶植在托罗和布施执政时发展起来的反美主义。美国反而也帮了他们的忙。在日本切断了美国的来自马来亚和印度支那的原料供应之后，美国急需购买玻利维亚的锡和橡胶。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坚持若不偿还美孚石油公司被没收的财产，就不签订固定的合同。住在拉巴斯的有极大影响的八千多德国侨民，与纳粹的和意大利的航空使团一起，鼓吹阿根廷是玻利维亚的最好邻邦。他们宣称，当时站在轴心国一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为玻利维亚的石油勘探和铁路建设提供贷款。

然而，佩尼亚兰达却越来越倾向于同盟国，并开始对纳粹的活动加以限制。1941年，他没收了德国的玻利维亚罗意德航空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对维修他们的容克飞机和对事故保险赔偿问题不负责任。据约翰·冈瑟记述，一个名叫艾伦·W·杜勒斯的纽约律师乘飞机到拉巴斯，答应给佩尼亚兰达提供新式美国飞机、信用贷款和汽油。纳粹从巴

西到秘鲁的横贯大陆的空中航线从而中断。这段中断了的航线后由格雷斯泛美航空公司包揽了。

珍珠港事件后一个月，佩尼亚兰达和轴心国断交。1943年4月玻利维亚向轴心国宣战。佩尼亚兰达还和美孚石油公司达成了赔款二百万美元的协议（虽然美孚石油公司声称它在勘探和钻井上曾投资了一千七百万美元，但对协定还是表示满意）。作为交换条件，玻利维亚从进出口银行得到贷款，用来发展橡胶生产、锡矿冶炼、石油加工、公路修建和钨矿开采。美国保证每年购买玻利维亚开采的全部钨矿（约值二千五百万美元）和一万八千吨锡砂，以帮助它偿还贷款。

公众舆论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安排是为了玻利维亚的最大利益。在托罗和布施执政时期，由于不同派别而发展成不同政党的左翼分子，把对美孚石油公司的协定称之为“卑鄙的出卖”。德国第五纵队的人员，纳粹分子和其他一些因违反同盟国利益而被列入“黑名单”的厂商，继续在阴谋推翻政府。他们说，为偿还美国贷款卖出的橡胶、锡和钨价格太贱了。没有为印第安人提供任何社会福利。矿工们又得在悲惨条件下挣扎，因为



从圣费利佩教堂屋顶上俯瞰苏克雷

锡大王们想要捞回在经济萧条时期所受的损失。1942年末，在卡塔维，由于帕蒂尼奥拒绝矿工们的要求，七千名矿工罢了工。政府因急需从出售锡砂得到收益，便派军队去进行镇压。矿工们由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前面引路，组成三个纵队向军队逼近。在相距一千码时，他们被喝令停止前进，但他们毫不理睬。于是机枪在他们头上打响了。他们向前逼得更近了，士兵们战战兢兢地把机枪瞄准了他们。这次，机枪一响，十九名妇女、小孩和矿工死亡，三十名受伤。“卡塔维大屠杀”变成了一面战旗，各反对党都团结在它的周围。左翼革命党（PIR）的领导人里卡多·安纳亚和新成立的叫做 247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MNR）的领导人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在议会抨击政府。此后他们和一些军官们一起废黜了佩尼亚兰达总统。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是1940年由一些大学的知识分子创立的。为首的是曾充任过布施总统顾问的经济学教授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前总统西莱斯的儿子埃尔南·西莱斯，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和卡洛斯·蒙特内格罗。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坚信，必须有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现它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是：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民”这个词是他们对以前所有的政党从未放在心上的二百万印第安人的委婉称呼）；矿山国有化；让每一个人都有选举权从而缩小寡头政治的影响。

许多其他政党也在查科战争的令人失望的恶果中相继诞生。左翼革命党于1940年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创立。与他合作的有里卡多·安纳亚，阿图罗·乌尔基迪和米格尔·博尼法斯。在1940年选举总统的时候，只有阿尔塞一个人和佩尼亚兰达总统竞选。他仅仅获得了一万五千张选票，而佩尼亚兰达却获得了七万张。在此时期，他因拒绝入伍参加查科战争正受监禁。高喊反帝的左翼革命党一直坚持它的口号：“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它组织劳工联盟，争取农民的支持，主张矿山国有化并促进国家工业化。

在此之前，以奥斯卡·温萨加·德拉维加为首的大学生，于1937年建立了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长枪党（FSB）。由于受西班牙长枪党的影响，它最初主张建立独裁政府，但后来转向民主和左倾。开 248

始时它拥护比利亚罗埃尔政府，但是1946年它又联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帮助推翻比利亚罗埃尔。

1935年[1]，共和党的保守分子的一个联合组织和一些社会主义党派，联合组成了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PURS)。比利亚罗埃尔倒台后，它就能够抵制国有化，并恢复它和自由党都非常赞成的那种执行不干涉政策的政府。十九世纪末期的自由党已是更加趋于保守，在战后便极大地失去了它的影响。另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党是革命工人党(POR)。它在1920年成立时，把托洛茨基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革命工人党激烈地反对美国，反对帝国主义，它向其追随者宣布，用激进的方法进行土地、社会和经济改革。它还主张裁减军队，由民兵来代替。

由于帕斯·埃斯登索罗和安纳亚在国会中对佩尼亚兰达内阁进行的令其难堪的质问，使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矿工中极有声望。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目标和一些高级军官们的目标恰好偶合。这些军官们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有时叫做圣克

① 原文如此，显系错误。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成立于1946年，参看第351页。——译者

鲁斯元帅共济会，有时依其口号而称之为国家事业共济会(Logia Razón de Patria)，缩写为 RADEPA。它那类似德国人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当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所提倡的一模一样。这些军官们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能采取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佩尼亚兰达。以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少校为首的一个洪达接管了国家。只有阿根廷愿意承认这个政权，许多人怀疑阿根廷帮助发动了这场政变。美国对于在接管政权的示威游行中有人向美国大使馆扔石头，以及这个政府明显的法西斯性质，倾向轴心国深表不满。科德尔·赫尔后 249 来写道："有充分的迹象证明，这次革命是以阿根廷为基地，用德国的经费由纳粹和阿根廷的间谍操纵的。"

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1943—1946年)，在1908年生于科恰班巴，并在那里长大。在他刚刚庆祝完自己三十五岁生日时，他得到了机会，把按庇隆上校的观点形成的思想传进了玻利维亚。他曾经是德国公使埃内斯特·文德勒的较早的门徒。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那一年佩尼亚兰达驱逐了这个外交官，因为他曾企图组织纳粹叛

乱推翻玻利维亚政府。比利亚罗埃尔采用纳粹的手段维持其政权并恢复1936年至1939年间的社会改革。他使用暴力和欺诈相结合的办法打击所有的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他邀请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三位领导人进入内阁。接着又要求胡安·莱钦把他的左翼工人运动纳入联合政府的轨道。不久，左翼革命党也加入了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刚一加入，左翼革命党的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险遭暗杀。其他一些著名的政治领袖则有的被暗杀，有的被绑架。1944年，奥鲁罗发生罢工，十一名领导者被枪杀，罢工遭到了镇压。社会舆论一致谴责比利亚罗埃尔的恐怖政策。大学生们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他们的血泊中，政府变得更加独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部长或自动辞职或免职罢官。剩下的只是比利亚罗埃尔的军人内阁了。1946年7月21日浴满鲜血的暴动在穆里略广场达到了高潮。暴动的人们袭击了军械库，拿着夺来的武器冲进了总统府。对比利亚罗埃尔的铁腕政策已感到厌烦的高级军官们，命令军队呆在营房里。由于没有防备，比利亚罗埃尔和他的两名亲信被击毙在总统府。他们的带着子弹的尸体被抛到街

头，又悬挂在电灯杆上。在四天的混战中，有二百五十多人死亡，街上简直是血流成河。

对比利亚罗埃尔政权的估价至今仍有很大争议。许多人因他增进了工人阶级的福利而推崇他，说他具有无私的爱国主义和高尚的理想情操。他们指出，他为他们的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些理想都 250 在他的1945年宪法中表达出来了。这部宪法给了工会更多的自由，恢复了1938年宪法中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条文。比利亚罗埃尔还为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这个民族石油工业制定了新的格局。

另外一些人，他们虽然赞同他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不能宽恕他的法西斯手段和警宪暴政，也不能宽恕他把政府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相脱离的做法。巴斯克斯·马奇卡多用这样几句话概述了一种公道的看法："他的政府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而在施政方面又非常廉洁正直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它是值得后代敬仰的。"今天科洛拉多营的士兵们穿着检阅时的军服在悬挂过他的尸体的电灯杆下站岗，向他致敬。

比利亚罗埃尔的大部分合作者，包括帕斯·

埃斯登索罗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在内，都逃到关系友好的大使馆并从那里流亡到国外去了。他们直到1952年才回国。一个由最高法院法官内斯托尔·纪廉负责的洪达临时接管了政府，并在1947年举行了选举。保守党的竞选人，仅以不到一千张选票的多数赢得胜利。

恩里克·埃尔佐格博士(1947—1949年)在对政治发生兴趣之前行医。当他发现有机会可以控制潘多、萨拉曼卡和萨维德拉的老共和党并以新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使之现代化时，他参与了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的活动。他的计划是：只要私人企业能进一步适应人民的需要，就任其自由发展。在几个主要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支持下，他放弃了那些前任总统们独裁统治的排场。但是，矿业财团和工人们都要求他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他的政府在政治上处于困境，束手无策。

埃尔佐格在执政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曾是萨维德拉总统的年轻的宠儿。萨维德拉总统曾派他到欧洲当研究生。在三十二岁时，他被任命为拉251巴斯省省长。而1931年，当他只有三十一岁时，已是内政部长了。在查科战争期间，他任国防部长。

其他时间他还当过教育部长和公共卫生部长。当佩尼亚兰达总统垮台时，他说："既然几小时之前我还在总统府里陪伴着佩尼亚兰达总统，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在瓜奈政治犯监狱中，他受到酷刑折磨。1945年，他竞选胜利成了代表拉巴斯的参议员。不过他不仅没有被允许去就任，反而又被监禁起来。1946年在共和社会党的瓦尔多·贝尔蒙特和社会党的弗朗西斯科·拉斯卡诺·索鲁科的配合下，他组织了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

他施政的成就达到了人们对于一个既正直又爱国的人所能期望的那种程度。在他执政期间，锡的年产量提高到三万二千吨。他还创立了社会安全制度、工人储蓄银行和医院。在城市兴建了许多学校，在农村推进了教育的发展。苏克雷在地震以后也得以重建。尽管如此，由于战后锡价的调整带来了更多的罢工威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密谋，并导致了在1949年8月发生的蔓延甚广的内战。内战的导火线，是由于逮捕了著名的工人领袖、参议员胡安·莱钦。在卡塔维爆发了同情罢工。罢工中有两名美国工程师被害。军队以其惯有的粗暴手段进行镇压，但罢工却得到了除拉

巴斯之外所有大城市人民的支持。在军队镇压了起义之后，埃尔佐格由于精神沮丧和身体多病在十月辞职了。

埃尔佐格的副总统马梅尔托·乌里奥拉戈伊蒂亚(1949—1951年)接任了这个不值得羡慕的职务。他也是一个保守党人，竭力保护霍赫席尔德、阿拉马约和帕蒂尼奥的矿业财团。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博尼法斯所说，“他把这个政权变成了一个公开的警察国家。”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政府中没有公开起什么作用，但在暗地里组织了几次罢工，反对埃尔佐格政府和乌里奥拉戈伊蒂亚的反动政策。在组织罢工中，它得到了托派的革命工人党（POR）、新建的玻利维亚共产党（PCB）和莱钦的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FSTMB）的支持。尽管如此，一些中央集权主义的党派，还是决定着手进行1951年5月的竞选。每一派都有自己拥护的竞选人。

当时仍在阿根廷流亡的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是左翼党派的唯一候选人。他赢得了所有选票的43%，其余选票由各反对党分得。根据1947年宪法规定，议会应负责从得票最多的前三名竞

选人中选举总统。但是，乌里奥拉戈伊蒂亚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他借口说他发现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共产党密谋发动内战，于是他把政府交给了一个军人洪达接管。

以总司令乌戈·巴利维安将军为首的洪达，决定不让帕斯就任总统。为此，他们禁止罢工、示威游行，也禁止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为了避免招致警察国家的污名，洪达允许流亡在外的人员回国。它还第一次从联合国得到了系统的技术援助，并和华盛顿商洽提高了锡价。巴利维安极为重视改善和邻国的关系，并设法进口更多的粮食，以解决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不足。然而，这个洪达掌权的时间越长，它的威信就越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利用政治大赦这个大好时机争取了警察部队并开始武装工人。就连内政部长安东尼奥·塞莱梅也被鼓动参加了1952年4月9日开始的反对政府的暴动。

奥鲁罗的工人、矿工与警察部队站在一起，同政府军进行了三天的肉搏战。这和以前通常的宫廷政变截然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了。当时正值复活节，对游击队员们说来，耶稣受难日这个日期使他

253 们的事业成为神圣的十字军运动了。为了保卫洪达，军队从圣豪尔赫兵营向市区进攻。他们用高射炮、迫击炮和飞机射击和轰炸街市上的战斗员。起初他们好象是赢得了胜利。塞莱梅将军吓的跑到智利大使馆避难去了。尽管没有他的领导，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游击队员还是继续战斗。他们情绪激昂的攻势，压倒了那些毫无经验的新兵。武器弹药库的守军投降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民兵取出武器装备了自己。贫民窟市场上卖东西的印第安妇女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缴了那些头脑简单的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的印第安士兵的枪支。

在耶稣受难日那天，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占领了总统府。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站在俯瞰着穆里略广场的阳台上宣布它的胜利。此时，帕斯·埃斯登索罗还在一千四百哩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他表示，他将回去就任他在一年前的大选中合法取得的总统职位。这次起义中有一个小笑话说，如果塞莱梅将军对人民决心在1952年革命中取得胜利稍有信心的话，那么，他本人就可能当上总统了。

第　十　章

从1952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执政到1967年

玻利维亚：严峻的现实，伟大的希望。

——费尔南多·迭斯·德·梅迪纳

一周之后，戴着眼镜，面色温和的前经济学教授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回到了高原机场，受到兴高采烈的人群的欢迎。这意味着，他就要接管这个有三百二十万人口的国家（其中只有十三万人有选举权）。数千名无投票权的市民，从拉巴斯爬了七哩多山路到高原机场去欢迎其救星的归来。当晚，有五万多人擎着大旗涌集到穆里略广场向他致意问候。他们高呼："欢迎您，卑贱者的父亲！"帕斯致答词时表现的坚定态度，给群众以极大的期望和鼓舞。他说："我们要把矿山的财富用于我们民族的利益。"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

256 的纲领具有重要意义。矿山国有化是他竞选演说中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副总统埃尔南·西莱斯和随即被他任命为矿业和石油部长的胡安·莱钦的完全支持。

当然，帕斯首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解散了一万二千名军队，把他们的武器交给矿山和工厂的工人。就连边防军也减少到很小的数目。那些曾经支持洪达的军官和人员受到了监禁或流放。而象空军上尉雷内·巴里恩托斯这样的人，后来则受到嘉奖。就是他，驾驶着总统座机，把帕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回来的。对于一个自1825年独立后，其政府曾受政变威胁达一百七十九次的国家来说，长达十二年之久没有来自军队的威胁可谓是一种幸运。不过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还是存在的。在帕斯执政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发生了六次暴动。每一次他都借助于人民的武装平息下去了。

自卫军给新政府带来了一堆难题。在四月革命之后仍然充满杀气的一小股游击队，竭力想捉住从智利大使馆逃到高原机场的巴利维安将军。当这位原洪达主席已设法安全起飞时，十几个情

绪激昂的游击队员袭击了控制塔并命令飞机返航。只是由于帕斯及时打来电话，解除了返航命令，才使巴利维安免遭比利亚罗埃尔的命运。

白卫军对矿山国有化进展缓慢也表示了不耐烦的情绪。1952年，玻利维亚是锡产量占世界第三位的国家。出口锡砂所得，占全部外汇收入的67%。玻利维亚80%的锡产量出自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席尔德三人的矿山企业。这些企业实际上并不是由这三个人，而是由美国、智利和瑞士的股票所控制。全部锡砂被送到英国或得克萨斯州的得克萨斯城去冶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货源被日本切断了。于是美国修建了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来冶炼象玻利维亚出产的这样等级低的锡砂。 257

本来，玻利维亚锡产量的80%是卖给美国的。玻利维亚革命后，美国停止购买了，三大公司却照旧生产。美国采取那样的行动并不是反对玻利维亚革命，而是由于朝鲜战争引起了国际锡价上涨。复兴基金会拒绝按每磅一点九美元这个上涨了的价格购买。于是三大公司把他们的矿砂囤积起来，等待着商定合适的价格。帕斯因为急需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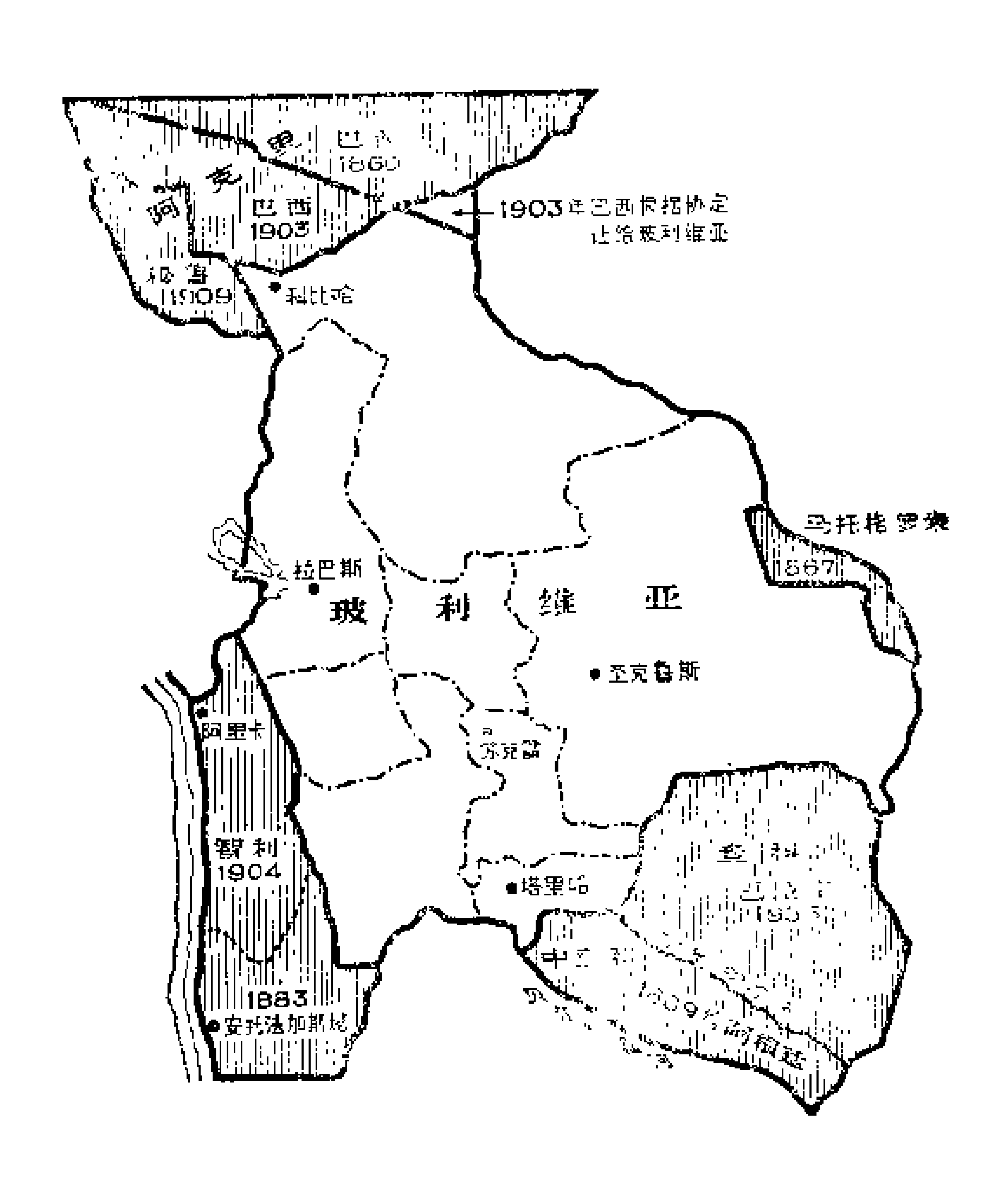
金，接受了复兴基金会提出的每磅一点二一美元的价格。这个价格曾为巴利维安的洪达所拒绝。胡安·莱钦的一万名武装的游击队员反对帕斯的这个决定。他们和已加入工会的四万名矿工一致要求立即实行国有化。1952年6月2日美国承认了新政权，就在第二天，执政已七周时，帕斯授予矿业银行以出口矿砂的专利权。按照他的这一命令，不经胡安·莱钦本人批准，三大公司就不能向国外汇兑美元，不能用美元支付外国技术人员的薪金，也不能用美元购买外国设备。

1953年，莱钦已三十八岁，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47年，当他被矿业财团选为参议员时，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他一度曾是国际足球明星。他有着修长的身材，洁白的牙齿，还有那被牙齿映照得格外漆黑的眼睛、头发和胡须。他的容貌使他在矿工中很惹人注意。他的父亲是个黎巴嫩商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们这位梅斯蒂索儿子在拉巴斯美洲学院学习到十六岁左右，后来由于缺钱而回到奥鲁罗，当了矿工。他不到二十岁就开始组织工会，同时还挤出时间参加足球运动。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在1947年至1952年期

间曾几次被驱逐出境，但他总是不愿离开祖国。即 258 使在卡塔维的其他工会领袖被判处死刑时，他都设法回来。

莱钦和他的支持者一样，急于实行矿山国有化。他认为帕斯根本没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发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报告的内容足足有三大册。报告指控三大公司在全国建立经济霸权和在政治上控制整个国家。委员会发现它们偷税，造假账，垄断市场，让矿工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制造1947年大屠杀以及其他一些罪行。委员会通知这些公司说，他们欠玻利维亚政府五亿二千万美元。其中一千五百万美元系偷税的金额，余者为其在海外销售和外汇折算上采用欺诈手段之非法所得。既然三大公司声称它们的全部财产总值约为六千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政府打算无偿地把矿山弄到手。莱钦正是这样主张的。

1952年10月31日，在卡塔维矿的两万名欢喜若狂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面前，帕斯·埃斯登索罗签署了国有化文件。当晚从高原到拉巴斯一片欢腾，枪声点缀着喜庆的舞蹈。这些枪支是七个月


阿克里
巴西
1860
巴西
1903
秘鲁
1909
利比哈
1903年巴西根据协定
让给玻利维亚
马托格罗索
1867
拉巴斯
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
苏克雷
阿里卡
智利
1904
1883
安托法加斯塔
塔里哈
阿根廷

玻利维亚所丧失的领土

前从军队手中接收过来的。这次国有化是帕斯·埃斯登索罗在执政期间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尽管土地改革法和给印第安人以选举权的法令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帕斯深知实行矿山国有化是绝对必要的。他以此作为他的政治纲领的基础。群众拥护他的原因也正在此。最后，矿山国有化还解除了三大公司在政治上的威胁。正如塞斯佩德斯所写的那样，三家公司控制着主要的报纸。他指出，《最后一点钟报》代表着霍赫席尔德的利益，《日报》代表了帕蒂尼奥，《理性报》代表了阿拉马约。莱钦采用了由庇隆最先传入本半球的手段，勒令这些报馆关闭。

帕斯把矿山交给一个政府的托拉斯，叫做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简称玻矿公司（COMIBOL）。不过，他还是答应给矿山主以赔偿。这是因为帕斯意识到他还需要外国的技术人员，更主要的是需要外国市场。所以他答应从锡矿那些每年收入中支付赔款。这样，到1961年年底，已付帕蒂尼奥财团赔款九百四十万美元，付给霍赫席尔德财团八百万美元，付给阿拉马约财团将近四百万美元，赔款总额已达二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美元。 260

由于玻矿公司已把它未来的收入作了抵押，所以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经营的。遗憾的是，主张国有化的那个委员会，没有考虑到如何推销这个新的国营企业的产品。原矿主又控制着国外的运输线和冶炼厂。略萨在他的著作中主张委员会应当在玻利维亚建立冶炼厂，以节约含锡量只有20%的大量矿砂的运输费和保险费。

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政府给矿工各种补贴达八百万美元，还分给矿工住房和土地。这是帕斯执政期间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开始，通货膨胀又造成了国家的贫穷衰弱。玻矿公司一直未能以优厚的薪金、良好的生活条件或其他诸如粮食供应和卫生措施等实际福利来抚慰它不断增多的工人大军。结果，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从1952年到1959年下降了60%，出口总值也由1952年的一亿四千一百万美元，降到1959年的六千五百万美元。

出口值的下降，一部分可归咎于朝鲜战争后锡价的下跌，而另外一些原因也是存在的。玻矿公司缺乏足够的资金使矿山现代化。矿山主在国有化之前已抽回了他们的资金，由于赔偿问题没有解决，连续五年没有从国外得到新的投资，因

此也就不能从国外得到新的机器设备。几乎所有的二百多名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被政治家们的碌碌无能的朋友所代替。因为缺乏适当的指导，新的矿脉未能勘探开采，而优质矿也就逐渐耗尽。政府命令没有收归国有的小型矿业必须将其外汇交给矿业银行，以换成玻利维亚诺。矿业银行同意他们在从国外购买设备时兑回美元。这样一来，矿业银行实质上就变成扼杀中小型矿业公司活动能力的毫无价值的官僚机构。许多公司因此而破产。

大多数人认为，国有化并未能完全解救这个国家。外国人为宣传所惑，认为它是共产党人策动的。但是对这件事的真相，德尔加迪略教授作了较为准确的阐述。他写道："矿山国有化不是某一个政党干的，它是极力谋求国家经济独立的玻利维亚人民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随着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继续执政，许多人觉得他们被出卖了。左翼革命党领导人米格尔·博尼法斯归纳了这么几点原因：（1）付给"锡大王"二千万美元的赔款，就等于在矿山现代化上少了这么些资金。（2）国家在谋求经济的全面变革时，注意了农业，忽视了矿业，

而矿业是它换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这种忽视使锡砂可用成分降低了30%。(3)玻矿公司未能修建自己的冶炼厂。(4)由于各式各样的政治家和工会组织在行政管理上的干扰，把好多问题复杂化了，诸如缺乏地质研究、运输能力不足、没有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机械设备不足等。(5)政府拒绝了玻利维亚共产党提出的从俄国获得发展矿业和冶炼的贷款。这个决定是“所犯的最大罪过之一”。(6)博尼法斯认为，以美国、西德和泛美开发银行提供资金的“三角计划”代替俄国贷款是很不幸的。他写道，矿工、大学生、技术人员、政治家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较正直的人士”都反对这个计划，他们说，只是因为古巴有个卡斯特罗，才给予玻利维亚这种隔靴搔痒的援助。

262

其实，美国从玻利维亚革命时期起，就每年投资约二千万美元来帮助它实现社会改革。到1966年末，美国投资总额已达一亿九千四百万美元。截至那个时期，在拉丁美洲各国中按人口平均计算，它是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官方在制定预算时，就是以这种援助为基础的。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执政十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预算赤字约达

30%，都是由美援弥补的。援款的大部分直接拨给玻矿公司。因为矿山一被接管，矿业生产在产量、产值以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显著下降了。矿业生产消费全国电量的40%，占用铁路货运能力的22%，因此，生产下降就要使这些企业受到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玻矿公司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福利机构。有时候，工人一天只干三个小时的活。玻矿公司也成了政治家们捞取政治资本的场所。它雇用的工人差不多等于国有化以前所需用的两倍。它用承担费用的办法，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全公司两万七千名工人供应粮食和其他必需品。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同时并存又互相矛盾的情况，那就是帕斯政府虽然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社会待遇，但终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如愿。

由于帕斯是得到矿工支持才得以继续执政的，他就不得不设法满足矿工的要求。实际上，国有化的矿业是控制在莱钦指挥的矿工手里，他们左右着矿山的生产。时间一久，他们的权势就扩展 263 到政府中去，使莱钦的左翼力量大大地加强了。

为求得另外一大部分人的支持，1953年8月2日在科恰班巴附近的乌库雷纳签署了全国土地

改革法。那里的一万二千名印第安佃农早已占据了七千英亩土地。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说克丘亚语的印第安人，名叫何塞·罗哈斯。他控制着一个从查科战争复员的印第安人所组成的辛迪加。他们希望提高生活水平，达到农村有权势的梅斯蒂索人那样。1936年这个辛迪加租用了乌库雷纳的地产，这样印第安人就可以不再服那些无偿的米达徭役了。地主们担心这个辛迪加将影响其他印第安人效法此举。于是便有五个地主把印第安人辛迪加的全部财产买了过来，取消了租约，并把印第安人赶走了。印第安人移居到别的地方。1952年，当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夺得政权时，他们要求归还他们原先占有的土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对此迟迟未予解决，他们便凭着一阵狂热把地主赶跑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便转而支持他们。在乌库雷纳，当着十五万印第安人的面，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印第安人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条件是在二十五年内要上缴20%的税。签字仪式结束后，人们开怀畅饮。服装绚丽多采的农民虔诚地洒了一些酒在地上，献给确保丰收的地母神帕查

玛玛。然后他们纵情歌舞，庆贺他们从农奴地位中解放出来。

他们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十多年了。帕斯、西莱斯和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在比利亚罗埃尔执政时期，曾向议会提出并敦促议会通过法案，限制富有的地主剥削印第安人。他们认为：有钱的地主 264 只占人口5%，却拥有全国可耕土地的70%，为这些人象农奴一样劳动是不合理的，实际上，自从殖民地时期以来，这些靠二千多英亩封建采邑在外地过着逍遥生活的地主们，对提高生产毫无裨益。另外，把贫瘠的大块土地分成过小的小块，也造成了经济贫困。由于从农村到市场没有便利的交通，缺少农业贷款，不能正确使用现代化方法（如化学肥料或循等高线作畦等），又没有令人满意的气象服务机构，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使玻利维亚农业成了大陆上最低产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印第安人生活在货币经济之外，根本不能有改善他们命运的资金。他们对国家的大部分政治问题一无所知，也不懂得如何利用政治上的压力去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只能在可怜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大麦、玉米、燕麦、马铃薯和基诺亚。几只山羊和瘦

牛爬上陡峭的山岩，在开垦了的台田之间啃嚼乱草棵子。尽管农民用了最大的努力，玻利维亚每年还得进口全部食品的35%，主要是食糖、小麦和大米。

印第安人获得了他们从前被夺走了的土地。但是类似俄国和墨西哥过去试行过的集体农庄并没有出现。印第安人希望有自己的一块地产，而法令规定只要他们能在两年之内进行合理的耕种，就允许他们据为己有。法令还设法防止随着土地改革法实行之后通常发生的减产现象，允许一些较大的农业单位继续存在。麦克约恩写道，这些大农业单位存在的条件是，“他们能在每一个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大量投资，能生产供市场上出售的农作物，能付给工人现钱，并允许工人们组织起来参加集体交易。”

帕斯在签署这个革命的文件之后采取的第一265个行动，就是建立农村工作部。该部后来组织了印第安人协会。在协会会议上，农民学习土地改革法和社会发展常识，认识开展教育的必要性。在不长的时间里，农村工作部就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通过持续不断的指导管理，这个部笼络了这

些农民，得到了他们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温和派的支持。这样它既可以和莱钦的有激进倾向的矿工较量，又可以和从来不曾掌握过五个以上农民协会的革命工人党相抗衡。

土地改革不仅废除了束缚印第安人的契约，没收了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而且农业信贷、合作社和技术援助也都受到了重视。但由于受印第安人的催促，政府在发表改革法之前没来得及作全面的、充分的推敲，在实施法令过程中，就不得不经常做临时的修改。农民协会从没有采用在经营得很好的私有土地上用过的优良技术措施。一些不会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故事，或者杀了纯种乳牛吃牛肉的笑话，并非奇闻。土改法对最多可以占有多少土地做了限制，但是对最少应当有多少则未做规定。把征用的六千块土地分得过于细小，其结果便是降低了产量。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科恰班巴和的的喀喀湖地区更是如此。这也注定了土地的新主人要过贫穷的生活。

土地改革法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领域内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作为农民，印第安人有了财产并独立自主地生活，这是自印加时代以

来前所未闻的事。农村工作部为农民的子女开设了学校。在过惯了咀嚼古柯叶这种恬淡生活的印第安人中开展扫盲运动，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他们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和穿戴象白种人（blanco）一样的衣着。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最初的法令之一，就是给印第安人以选举权。1952年7月21日在玻利维亚开始的普选，永远摧毁了罗斯加（rosca）266 的权势。罗斯加是对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和矿业老板们的统称。农民表现出相当高的政治敏感。各左翼政党都企图笼络他们，但是他们对共产党要从他们那里获得选票的企图一直不予理睬。辩证法的复杂性使他们实在难以理解。另外，他们也许是本能地意识到，马克思的理论将迫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去过他们不愿意过的那种公社生活。

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垮台的时候，土改法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赶上了它在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农业信贷机构扩大了，农业合作社也在增多。到1964年有二万五千个农民加入了三百多个合作社。土地分配后高原的生产降低了15%，现在已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在以前产量一直不高的低地，农业生产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样，全国总产量就

提高了33%。良好的供销和交通设施，使得象拉巴斯、甚至波托西这样的高原城市也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牛种的改良，使首都和科恰班巴有了新鲜牛奶和牛肉。由于采用了新的耕作方法和优良品种，并实行移民政策，过去必须进口的可可、大米和食糖，现在也自给有余，并且还可以出口。

向低地移民，对提高农业总产量贡献很大。不过，最初印第安人是不愿意离开高原的。因为他们对低地的疾病缺乏抵抗力，又不喜欢那里的湿热的气候，加之交通不便，缺乏公用事业和服务机构，更使他们不愿前往。只有少数的志愿者在低地安了家。为了减少瘠薄的高原上的过多人口和提高农业生产，政府原想每年动员五万名高原农民到低地去，可是迁移的人数只有十分之一。而且迁走的印第安人往往又很快地回到他们原住的村庄，使得政府的移民计划几乎完全失败。当然，如果土壤肥沃，交通方便，志愿移民计划是可能实现的。1954年9月，连接圣克鲁斯和科恰班巴的公路的竣工，吸引了移民在沿线定居下来。这段公路长达三百一十哩，并且可以全年通行。有一万二千名移民定居在从拉巴斯到卡拉纳维的东北公路沿线

267

的六十个村庄里。他们利用泛美农业组织所提供的贷款，组织了合作社，并且搞得很好。他们为拉巴斯生产了大量的热带水果。

最重要的移民地区是圣克鲁斯省。该省土地占全国土地面积三分之一强，约为九千一百万英亩。在那里，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热带气候使它的大米和糖的产量多到可以出口。为了推动移民工作，政府不仅把土地分给高原上来的印第安人和查科战争的退伍军人，也分给外国人，如冲绳人，日本人，巴拉圭和加拿大的孟诺派新教徒。冲绳人是最先到来的。1955年，在三个地区内给他们分配了十四万英亩土地，每户分到一百二十五英亩。在把自己溶合到玻利维亚社会方面，他们比其他外国人做得更成功一些。他们在三个移民区内都建立了说西班牙语的学校和教堂。大约有一千名日本人在圣胡安移民区种植水稻。他们和玻利维亚人几乎没有往来，并且仍然从本国政府得到财政援助。二百五十名孟诺派新教徒住在圣克鲁斯省离居民区较远的四个移民区，他们在那里得到约五千英亩的土地。

宗达格写道："美国在公路建设和土地平整

方面的技术援助和农业贷款，对圣克鲁斯地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的援助之多，在当时无疑是破惯例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参加 268 比利亚罗埃尔政府时曾提倡长枪党和庇隆的激进主义。那时候它在美国一直是毫无名气的。许多美国人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实行锡矿（其中有少数的美国股东）国有化和大量没收土地的做法，颇带有共产主义的风味。它越拖延赔偿的时间，美国人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此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为附和玻利维亚的沙文主义，还把国家大部分弊病归罪于“美帝国主义”。在夺取政权之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认识到，要把它早就宣布的纲领付诸实施，必须借助于外国的援助。既然只有美国才能提供最大数量的财政支援，于是，它便迅速改变了态度。

在艾森豪威尔掌权时，美国的政策是把注意的中心放在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上。正象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写的那样：“为了帮助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1953年到1960年之间，我们从出口最通常的东西——资金开始，做了许多工作。”谢尔曼·亚当

斯写道：艾森豪威尔确信，“作为防止共产主义侵略的间接武器，作为建立和平的一个坚实基础，援助不发达国家使其经济独立”是他的职责。因此，艾森豪威尔对现行的政策进行了三项戏剧性的改革。这就是：1959年美国同意其他美洲国家的意见，向泛美开发银行投资；1957年支持建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1958年美国支持从咖啡开始的商品价格稳定协议。此外，因为有了美国的影响，象世界银行一类的国际机构，变成了新成立的提供低利优惠贷款的组织。技术援助增加了，“价值约为五亿美元的剩余粮食和饲料”运到了拉丁美洲各国。罗伯特·亚历山大认为这使“胡安·莱钦能向追随他的矿工说：美国虽然敌视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危地马拉的阿文斯政权，但对玻利维亚土生269土长的革命政权还是援助的。因此许多玻利维亚人比其他邻国人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反对的是共产党的影响，而不是阿文斯的革命纲领。”

美国人相信，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政府的极左思想，采取缓和限制的手法，比直接反对它会更有成效。美国首先是派遣第一流的职业外交家为大使。他们本来就是影响艾森豪威尔的思想的人。

总统不愿意让别人把美国看成是站在军事独裁一边，而是希望把美国放到赞助进步和民主一边。他也不愿意在大陆的中部出现政治上的真空地带而使苏联可能插进脚来。为了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美国和玻利维亚在1953年11月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根据协定，按杜鲁门第四点计划已经开始的关于公共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将继续进行，此外还增加了公路建设和预算方面的支援。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修订了教育方面的规章制度，并把教育工作扩展到农民中去了。国家预算中的教育经费也由16%提高到25%。此外，还新建了几百所学校。在籍学生从1950年的十二万八千人增加到1964年的五十八万七千人。还特意为农村新培养了一批教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方针，是培养会工作的公民，而不是为大学准备优秀人材。为此，它创立了双轨制。印第安人在农村工作部管的学校学习，城市居民继续在教育部管的学校学习。尽管这种双轨制的优劣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它在当时却使城乡人民都受到了显著改进了的教育。 270

设在拉巴斯、苏克雷、科恰班巴、奥鲁罗、波托

西、圣克鲁斯和塔里哈的七所大学，没有受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执政十二年中所作的总的改革的影响。大学的“自治权”，允许它们脱离政府，完全独立。它们当然也从国家预算中得到一小部分经费，用于各项开支。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执政期间，共产党力图渗进各大学，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学生日益偏离正道。在大学内部，他们对校长和教授的任命，对课程设置和标准，以及对资金的使用，都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过，课程设置仍然沿袭旧的传统。因此，在毕业生中律师和其他挣工薪的雇员绰绰有余，而对国家需要的农艺师、兽医、水利学家和其他奇缺人才的培养几乎根本不予重视。同样严重的是，许多毕业生在玻利维亚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于是到国外去寻找能多赚钱的机会。

对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想要进行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大量工作说来，医生也是不足的。玻利维亚人的平均寿命为30—40岁。矿工则更短些。婴儿的死亡率估计为千分之一百五十。大约75%的人患有肺病、寄生虫病、斑疹伤寒、疟疾或其他疾病。营养不良是疾病的主要原因，因为食

物的通常摄入量一天很难达到一千八百卡。必要的维他命和蛋白质几乎总是不足的。70%的农村没有饮用水的供应设备和卫生设施，就连城市在内，不卫生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研究了这种情况，并在1956年12月制定了基本社会福利法。政府的补助金成了病、伤、老、残等一切情况的万灵药。雇员把工薪的7.5%交给国家社会安全基金会，雇主要交 271 工薪的30%。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执政结束时，有十三万雇员和三十五万家属享受了补助金。不过，交付基金总是拖拖拉拉。玻矿公司和其他许多工厂主，因通货膨胀席卷全国，付款总是迟误。基金会很快就不得不依靠借贷来维持。

为改善玻利维亚农民、矿工和工人状况而制定的这些以及其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使帕斯·埃斯登索罗再次感到资金不足。于是他采取了近于自相矛盾的办法来解救。1955年10月26日他签署了一项新的法令，允许外国石油公司钻探石油。早在1953年，他下令只允许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进行勘探与开采。1955年的法令放宽了条件，致使十六家公司愿意

承揽生意。他们必须交付纯利润的11%，并对租借的每一英亩土地付税。1956年4月，匹兹堡的海湾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个为期四十年的合同，得到在原美孚石油公司的租地上钻探和开采石油的权利。外国公司为进行钻探共占用了二千五百万英亩以上的土地，给玻利维亚国家的石油公司剩下的只有九百万英亩。这种做法几乎是马上就收到了效果。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开始执政时，石油产量是六十万桶左右，到1956年帕斯离任时已提高到三百万桶以上。但是左右两翼的极端分子都认为，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政策，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背叛。

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执政期间，极端分子一直给它制造麻烦。在帕斯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就平息了六次叛乱。其中一次正发生在美国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和通货委员会主席霍默·凯普哈特在拉巴斯访问期间。这次叛乱是右翼的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长枪党搞的。结果二十多人死亡，四十人受272伤。长枪党成立于1937年，是新法西斯分子奥斯卡·温萨加·德拉维加领着少数大学生创立的。1943年温萨加支持比利亚罗埃尔的政变，但是到

1946年他又反对他，并参与了推翻他的活动。1950年，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长枪党参加国家竞选活动，但是失败了。温萨加曾考虑要参加民族主义革命运动4月9日的起义，但是在最后的时刻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此后一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是帕斯的一个最主要的敌手。

4月9日革命后，军队曾被解散。但是由于极端分子不断威胁政府，帕斯到1953年年底又重建了军队。他清除了军队中的反对势力，认为可以指望军队对他的忠诚了。军队还教授很多印第安人学习西班牙语，学习文化和讲究卫生。到1956年军队已强大到足以保证进行自由选举。在帕斯掌权的四年时间里，“反叛者”不断地被逮捕、关押或流放。当选举日期临近时，温萨加·德拉维加指责有舞弊现象，退出了竞选。政府不得不把三千民兵调进拉巴斯，以保证选举的进行。这也同样引起了混乱。不过，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得到了绝对的胜利。帕斯支持的竞选人、他原来的副总统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当选。帕斯出任驻伦敦大使。当然，他确有把握地知道，他的同僚西莱斯在四年任期结束时将把职位还给他。

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1956—1960年)于1956年8月6日在下院接受了耀眼的绿、黄、红三色的总统绶带。三十年前，他的父亲曾在这同一个地方戴过它。虽然西莱斯是一个总统的儿子，但是在政治的征途上他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战斗。他个子不高，身材细小，眼睛近视，貌似温和，在查科战争中表现得很英勇，在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就受了伤。七年后他协助创立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其后十年间，他两次被流放，还有两次为避免被捕入狱不得不逃走。1951年，他指挥了帕斯·埃斯登索 273 罗的总统竞选运动，当时帕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洪达拒绝承认帕斯的胜利时，又是他唤起了工人们在1952年4月经过激烈的斗争推翻了洪达。

西莱斯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统治的最初四年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以后，紧接着就提供食品，技术援助和赠款。新的石油租让权不断地增加国家的税入。矿山已实行国有化，工人也组织起来。军队的势力被压下去了。印第安人得到了公民权和经济独立。但是，问题还是很多的。西莱斯知道蜜月已经结束。他不得不应付足以使稍欠刚勇的人垮台的现实。

他归纳了这些问题，提出要进行"抵制通货膨胀、提高矿业生产、扫除文盲和增进国家团结等四大战役。"在他的整个任期内，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折磨他。

扫除文盲是一个复杂的重大问题，人们预测它不会很快见效。因此尽管扫盲运动进展缓慢，但仍在继续进行。由于通货膨胀，四千多中等阶层的拉巴斯市民举行了反饥饿大罢工。西莱斯就职宣誓后不到四个月，他们就走上了拉巴斯的街头。在游行中，他们烧毁了政府的伊利马尼电台和《民族报》(早在1953年参议员凯普哈特所目睹的叛乱中，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支持者就烧毁过科恰班巴出版的反对派的报纸《时报》)。在和警察的凶残的搏斗中，有五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西莱斯心里明白，是长枪党在背后策划了这次叛乱，所以他立即把三百名该党的领导人监禁起来。在把一些人从圣克鲁斯押往拉巴斯的飞机上，有几个人击倒了机舱上监押他们的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逃跑事件。他们劫持飞机，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为消除通货膨胀这个产生暴乱的根本原因，西莱斯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甚至足以引起另

一次暴乱。在他开始执政时，通货膨胀已经引起了274食品的严重不足。到1956年年底，玻币达到一万兑一美元。生活费用以1948年为一百计算，已飞涨到近于八百。为解决政府面临的危急的经济问题，西莱斯在1956年12月草签了国家经济稳定计划。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美国寻求又一笔数量相当大的贷款。美国国库、国际合作署(ICA)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稳定基金的贷款。第二个解决办法，是取消人为的经济管制。

通货膨胀，产生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实行的经济和社会的广泛变革。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曾经以为，从国有化的锡矿得到的利润不仅可以支付提高了的矿工工薪，还可以保证教育经费和急需的改进社会福利方面的经费。改革家们认为，土地改革定能使农业自给。但实行起来，它却和矿业一样，使产量大约降低了40%。对潜藏的石油的开发也过于缓慢，不能填补国家的庞大开支。为应付各项债务，政府就依仗于印刷钞票，仅1955年一年，就进口了五十五吨新的纸币。结果，马路边上卖橘子的乔洛女人，在经营她那小买卖时，身边都堆满了钞票。在这种情况下，黑市自然兴隆起来。矿工

们把按救济价格买到的食品等以极高的价格再卖出去。美国的救济粮，也同样被用来换取其他物资，或以外国硬币出售。要想挽救这种局面，必须有一些富有戏剧性的大刀阔斧的措施。为使玻利维亚诺增值，西莱斯采纳了美国顾问乔治·J·埃德的建议。埃德的办法是：玻利维亚停止印制纸币；增加赋税以减少预算赤字；停止招雇新的矿工；取消对于一百九十玻利维亚诺兑一美元这样不切实际的比值的控制；停止物价控制和粮食出售价格补贴。这些强硬的抵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实行不到六个月就产生了作用。粮食库存重又丰足起来，而且粮价下降60%。长蛇阵不见了。农业生产也急骤上升。玻利维亚诺从一千三百[①]兑一美元回升到七千七百兑一美元。

275

西莱斯（和埃德）在这方面的成就，还比不上他在提高锡产量方面所进行的斗争。人浮于事的庞大的矿工队伍，是莱钦的矿工联合会的主要支柱。莱钦为保护这一特权竟然反对埃德的停止雇用过多矿工的方案。工人们因为在1952年革命时

① 根据第382页所述，1956年年底玻币已贬值为一万兑一美元。此处成为一千三百兑一，显系错误。——译者

出过力，总觉得政府欠了他们什么似的。他们和莱钦对这个苛刻的计划，包括确定工资最高数目，取消福利待遇和限定粮食供应非常不满。西莱斯采取了极端的立场，解散了左派控制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统治集团。接着在1957年又从内阁中开除了四名支持莱钦的成员。然后他解雇了过剩的矿工，但答应为他们另外安排新的工作。工人领袖们也同意调解争端不再举行就地罢工。在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西莱斯终于说服外国资本对锡矿现代化投资了一千万美元。

西莱斯对通货膨胀的抵制和他提高生产的强烈愿望，使帕斯—西莱斯—莱钦这三巨头原先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消失了。尽管有了一千万美元的贷款，也未能把生产提高到足以解决玻矿公司的亏损问题。到1959年，它每年亏损九百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它未能砍掉那些毫无用处的福利经济事业。粮食补贴没有取消。罢工继续，生产下降。作为圣诞节的奖金，矿工们多得一个月的工资。如276果玻矿公司出现盈余时，他们就再得到一个月工资的红利。工人罢工，工资照发。法律保障不能开除他们，也不能暂时解雇。

玻利维亚和外国的关系，对改进这种局面没有起任何作用。1957年，俄国在国际市场上倾销了九千吨锡，从而压低了锡价。第二年，伦敦的国际锡业理事会降低了玻利维亚锡的定额。同年，莱钦还猛烈攻击国家经济稳定计划，把它说成是美国的产物。其实，俄国倾销锡这件事，已使他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1959年美国参议院开始调查玻利维亚对国际合作署的援助使用情况。几乎50%用于预算。其余的被用来重新安置过剩的矿工，为粮食增产提供奖励，给小型矿业贷款，兴建工业公司和进口必需的食品。不过，参议院发现，国际合作署在执行这一援助计划中，竟然允许存在极大的浪费、管理不当和贪污腐化现象。《时代》杂志毫不客气地报道说："自1952年以来美国援助了一亿二千九百万美元，但美国没有做出一件可以夸耀的小事。"这个报道一发表，就引起了暴乱。大使馆挨了石头。西莱斯·苏亚索恳求暴乱者停止暴行，由于用词不当，反而更激怒了暴乱的人群。最后，他们捣毁了执行第四点计划的办事处和为公路建设买来的二十五辆汽车。最后的统计表明，两名玻利维亚人死

亡，大约四十名警察受伤。美国在拉巴斯、科恰班巴和奥鲁罗的办事机构受到七万美元的损失。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骤然停止了财政援助。过了六个月，他们在严格地审查了他们的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年度计划之后，才重新恢复援助。据《时代》杂志报道，他们曾雇用了“四千名玻利维亚人，维修了二万哩公路，并给数千人以农业援助。”

277 在任期终了的时候，西莱斯发现他的四大战役无一成功。他纠正通货膨胀的办法几乎和通货膨胀一样有害。那个苛刻的计划引起了新的罢工。仅1959年上半年，就发生了五百起。矿业收入降低了50%。1959年不得不签署提高工资20%的决定，这又引起了新的通货膨胀，玻利维亚诺继续贬值，到同年7月，它和美元的比值达到了一万二千二百比一。政策上的分歧导致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分裂，并进而破坏了国家的团结。在西莱斯执政的四年时间里，他从未得到过一刻政治上的安宁。1958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拉巴斯时，西莱斯指着挂在他办公室的布施和比利亚罗埃尔的肖像，苦着脸说：“我常想，我的命运将会如何。”那年年初，他曾粉碎军队的一次阴谋。5月，

在圣克鲁斯发生过一次叛乱。9月长枪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基督教民主运动党，并于10月谋反。1959年长枪党的几位领导人被囚禁，当他们在4月又一次谋反时，该党的创始人奥斯卡·温萨加·德拉维加被杀。上述事件所造成的混乱和政府财力的枯竭，使扫除文盲和改善印第安人社会处境的运动基本上都死于母腹之中。

帕斯·埃斯登索罗确信他自己是唯一能改变局势的人，便重新登场，自荐为1960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为弥合党内分歧，他挑选了胡安·莱钦为他的竞选伙伴。曾任过他的外交部长和西莱斯的内政部长的瓦尔特·格瓦拉反对他。在1959年的困难时刻，格瓦拉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已背叛了它的原则为理由，组织了一个叫做正统革命党(PRA)的新党。格瓦拉只从政府官员、中等阶层和科恰班巴拥护他的选民中，获得了为数不多的选票。帕斯和莱钦许下的诺言是，促进正统的"左派领袖"领导的革命，反对"右派竞选人"格瓦拉。278他们凭着这样的诺言，巧妙地获得了胜利。帕奇写道："1960年8月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标志着连续第三次把权力移交给民主选出来的总统。这是玻

利维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阶段。”

帕斯·埃斯登索罗(1960—1964年)第二次执政虽然也任满四年，但却一直经受着折磨过西莱斯的那种动乱之苦。1961年，新的制宪会议起草并通过了第十三部宪法。巴伦西亚·维加用这么几句话概括了这部新宪法的观点：“这次修订的根据就是它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不仅规定了每个人的权利，而且也有相应的义务。”宪法规定：二十七名参议员任期六年；七十六名众议员任期四年；十名最高法院法官终身任职，负责监督各级政府行使司法权。

帕斯·埃斯登索罗第二次执政，首先求宠于俄国。1959年俄国曾主动提供六千万美元贷款，帮助发展石油工业，但为西莱斯所拒绝，因为他意识到他需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尼基塔·赫鲁晓夫把对帕斯的援助增加为一亿五千万美元和一个炼锡厂。大约与此同时，美国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特使小阿瑟·施莱辛格来到拉巴斯。帕斯告诉他，“我们的国家太贫穷了。共产党人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工人和农民的正当要求的代言人。因此，如果我们不反对自己认为是合理的社会纲领，我

们就很难反对他们。”然后他告诉小施莱辛格，激进分子很可能象他们夺取古巴那样夺取玻利维亚。小施莱辛格离开拉巴斯后曾这样描述帕斯的态度，“它由下列几个份量相等的部分组成：对卡斯特罗的强烈的恐惧；热切希望美国能把卡斯特罗从本半球驱逐掉；可是除非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又非常不愿意参与反卡斯特罗的行动。”

此后不久，帕斯采取了反劳工的政策，囚禁了几个莱钦的工会领导人。帕斯决心要实现他的改革和诺言，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手段。当他提出改组矿山管理机构时，遭到了副总统莱钦的猛烈攻击。愤懑不满的胡安·莱钦放弃了徒有虚名的副总统职位，重新担当工会领导人的角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彻底分裂了。莱钦率领左翼势力组织了一个叫做左翼民族革命党（PRIN）的新党。它得到了工人、矿工、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不过，农民对他还是不信任的。

279

帕斯相信，只有他本人才能领导玻利维亚度过更为困难的时期，向前迈进。他篡改了宪法，以便使自己能连任总统。莱钦也决心要当1964年总统竞选人。于是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推选竞选人

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分裂公开化了。帕斯深知没有工会的支持，他就必须依赖军队。所以他主张由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或是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将军担任副总统。巴里恩托斯将军接受了这个职务。接着，帕斯就以周密的计谋，操纵了在1月份召开的推选总统竞选人的大会。莱钦被开除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而帕斯本人史无前例地第三次提名为总统竞选人。但是莱钦使了最后一招，终于巧妙地迫使帕斯接受费德里科·福尔顿·圣希内斯这个中立派议员做他的副手。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支持巴里恩托斯的保守势力，对此恼怒起来。左翼分子集结在莱钦的周围。莱钦还试图吸引共产党、正统革命党、甚至长枪党的支持者和他站在一起。不久以后，1964年2月25日，当巴里恩托斯在凌晨两点钟宴会结束后离开他姐姐家时，遭到伏击，中弹受伤。他胸前佩戴的美国空军徽章挡住了子弹，使他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当他在巴拿马治疗时，帕斯·埃斯登索罗建议福尔顿把副总统职务让给这位英雄。

巴里恩托斯的传记作者何塞·安东尼奥·略萨断定，是帕斯自己的政治控制队伏击了巴里恩

托斯。这个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已堕落 280
到何等腐朽的地步。恐怖政策是克劳迪奥·圣罗曼上校的拿手伎俩。他和帕斯一起领导着政治控制队。帕斯在第二次执政期间，利用腐蚀拉拢和恐怖手段牢牢地控制着玻利维亚。在此期间，反对派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他们的财产和个人的东西都被没收。街上开枪的事，天天发生。只有胆大的人或是为圣罗曼效劳的人，夜间才敢在外行走。

叛乱养育了弹压。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分裂削弱了帕斯的营垒。1963年，长枪党和正统革命党在玻利维亚人民联盟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帕斯。同年，玻矿公司的矿工举行了罢工。玻矿公司在前一年亏损了一千六百万美元。在肯尼迪政府成立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接替了国际合作署把玻矿公司作它的重点对象，但玻矿公司必须同意对其组织进行整顿。1963年12月，政府逮捕了三名反对临时解雇矿工以及其他改革的左翼工会领袖。为了报复，矿工们扣押了包括四名美国人在内的二十一人，作为人质。最后，经莱钦调解，人质才得获释，释放的条件是军队撤离矿区。

有一个人质是和平队的志愿人员。和平队是

在1962年到达玻利维亚的。同年，玻利维亚也向泛美开发委员会（CIAP）提交了一份发展经济的十年计划。这是南美国家中最早根据埃斯特角决议这样做的国家之一。该计划强调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要增进玻利维亚下层社会福利的愿望。这种愿望集中的表现，是要修建新的廉价住房，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和提供创建新工业的条件。他们企图把印第安人每天吃的食物含热量从大约一千八百卡至少提高到二千四百卡。这个计划指望国际开发署（AID）在这十年间，每年援助三千万美元，并使投资总额达十亿三百万美元。

281

该计划提交泛美开发委员会后不久，肯尼迪政府遇到了古巴的导弹危机。维克托·安德拉德大使站在美国方面，支持肯尼迪总统宣布的封锁令。由于当时共产党对帕斯的内阁甚有影响，政府被迫召回了安德拉德大使。

玻利维亚和智利历来是互不相容的，在1961年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坏了。从1939年以来，智利一直在谋求与玻利维亚协商利用劳卡河。该河发源于智利，而流入玻利维亚的科伊帕萨咸水湖。1953年智利开始建筑小型水坝，以灌溉阿萨帕谷地和

利用水力发电。直到八年后玻利维亚才正式注意到智利的企图。两国交换了外交照会。但是1962年4月，智利单方面宣布劳卡河要改变河道。玻利维亚将此案提交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组织部长理事会决议，它们两国应先恢复外交关系，然后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解决争端，是通过调解、仲裁还是判决。智利说，它要向国际法庭起诉。玻利维亚愿意调解，并提名五个国家为调解国。部长理事会不愿专断地作出决定，于是玻利维亚退出了美洲国家组织，企图以此引出道义上的劝解。在古巴危机中它回到美洲国家组织，参加了谈判。古巴危机平息后，它又退出了。

罗伯特·托马塞克在研究这场纠纷时提出这样的论断：

> 玻利维亚和智利签订的1904年条约规定，玻利维亚有权使用智利阿里卡港和安托法加斯塔港以及通向这两个港口的铁路设施。现在玻利维亚企图利用劳卡河争端为手段，进一步掌握1904年条约规定的这些权利。……智利官员曾多次指出，1962年

282

争端是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为缓和国内矛盾，企图从外部找个替罪羊的结果。

这种推断可能有些事实根据。帕斯·埃斯登索罗极力想使反对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团结起来，于是他邀请反对党给他的参加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的代表团提些建议。但是，长枪党根本不予理睬。他们指责说，总统早就专横地擅自决定了一切，事前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事后却想让他们陪着受责难。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本身，已经分裂成两派即格瓦拉·阿尔塞派和莱钦派。帕斯站在中间。他的高压手段日益失去人心。最后，帕斯·埃斯登索罗为了不间断地连任总统而对宪法进行的篡改，使他的地位更为衰弱了。

1964年5月31日，左翼党派间的严重的派别斗争问题终于解决了。五十六岁的帕斯·埃斯登索罗在他的竞选伙伴雷内·巴里恩托斯的陪伴下，第三次当选。前副总统莱钦曾以发动内战来威胁，但是，连他手下的矿工也支持帕斯和巴里恩托斯，因此这两个人还是当选了。由于许多反对党退出竞选，所以他们在九十万张选票中几乎获得了七

十万张。弃权票只占总票数的20%。即使把弃权票也算作对莱钦的支持的话，也为数有限。莱钦和西莱斯两人实际上已经被驱逐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他们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做民族主义革命党的新党，反对帕斯·埃斯登索罗。莱钦被帕斯·埃斯登索罗的一小伙支持者戏弄得恼怒起来。9月，当局宣布戒严。四名矿业工程师被矿工们作为人质绑架。西莱斯和莱钦被捕，西莱斯后来被流放。正值戴高乐将军按预定计划要代表法国政府到玻利维亚作礼节性的访问时，在圣克鲁斯地区出现了游击队，这使政府大伤脑筋。戴高乐将军离去后不到一个月，1964年10月8日，武装部队也表明它不受约束了。巴里恩托斯公开谴责帕斯总统宣布的一个新的严厉的计划，说它既伤害矿工，283 也伤害农民。1964年11月4日，军队中的一个主力部队发动了为时两天的暴乱。奥万多将军为营救帕斯，用军用飞机把他送到了利马。帕斯现仍侨居那里。由于奥万多将军机智果断地控制了整个局势，才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否则的话，由于帕斯的暴虐使他树敌过多，他被推翻时，其下场会比1946年下台的人更糟。总共只有二十左右的人死亡，约

二百人受伤。有五百多名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外国大使馆去避难。

副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1964—)在两天后宣誓就任军事洪达的主席。他于1919年5月30日生于科恰班巴附近，1945年毕业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伦道夫—菲尔德的美国空军飞行学校。当那位深为他敬仰的布施将军执政时，他已是军官学校一个很出名的学生。他在玻利维亚空军中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并曾两次作为空军武官出使国外，一次在伦敦，一次在华盛顿。

巴里恩托斯总统坚定地信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早期的宗旨。1952年他把帕斯·埃斯登索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回来以后，由于一贯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地位上和职权上都晋升很快。他曾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这样解释他和帕斯·埃斯登索罗关系的恶化：

> 机构瘫痪了，办公大楼成了蛊惑宣传和无政府状态的牺牲品，工会被瓦解，人们被那些早已背离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宗旨的行为弄得混乱和沮丧。这一切使玻利维

> 亚濒于崩溃。自由和法律已被官吏们的虐政和任性所代替。这些官吏为保持其权势，对反对他们的人或发表意见反对他们的方法与计划的人进行残暴专横的镇压。……著名的专家和普通的公民被折磨，受迫害，致使许多人不得不到外国去谋生。没有一个人，就连那些掌权的人物在内，对玻利维亚的前途好象还存有一线希望。

284

他列举了许多在十一月革命之前私下到他那里劝他发动政变的各政党领袖的名字，以证实他的论点。前副总统西莱斯·苏亚索从流放中回来曾陪他一起到科恰班巴，他们两个人得到保证，那里的驻军将支持他们的起义。胡安·莱钦·奥肯多与他谈过打算采取行动，反对这个“反民族主义的、搞阴谋的、反工人阶级的政府”，因为他认为没有提他为总统竞选人是对他的出卖。巴里恩托斯总统还说，正统革命党的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和社会主义长枪党的贡萨洛·罗梅罗要求他推翻帕斯·埃斯登索罗。那些决心拿起武器反对暴政的工会领袖和大学生也这样要求他。巴里恩托

斯将军提到，早在1961年他就要求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清除他的政府中的腐败作风，使革命朝着符合国家和人民要求的目标前进，那些目标曾是那个政府的鼓舞力量。作为副总统，他坚持沿着这条路线多做一些事情，于是这两个最高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加恶化了。当帕斯谴责巴里恩托斯和胡安·莱钦一起密谋反叛时，这种关系恶化到了顶点。帕斯谴责莱钦，说他从卡斯特罗那里得到颠覆政府的资金。

巴里恩托斯将军和奥万多将军联合主持的洪达，立即解除了全国戒严命令。政治犯被释放，流放在外的回来了。被侵占和被没收的财产归还了原主。工会领袖可以和他们的会员交往，不再受政府的干扰。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保证实现1952年革命的目标。他们将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和矿山国有化，并使国家发展和工业化。他们要改进基层社会，改善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要保护外国投资，并设法建设新的炼油厂和炼锡厂。他们还要为小矿主、农民和牧主提供银行信贷。这样，美国很快就承认了新政府，并恢复了政变时中止的经济援助。

285

洪达组成后不久，巴里恩托斯就宣布要举行自由选举。一年以后，1965年12月，巴里恩托斯说，他本人将要作竞选人，因此辞掉了洪达的两主席之一的职务，让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将军(1965--1966年)做唯一的统治者。奥万多将军1917年生于潘多省。他投身于军界，是一个沉默的严肃的人。1957年他当上了参谋长，1960年任陆军司令，1961年成了武装部队的司令。他曾访问过美国，并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他早期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坚定的信仰者，但是讨厌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这正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搞起来的。

1965年1月25日，乌戈·博索、奥斯卡·奥尔蒂斯·阿瓦罗马、弗兰斯·翁达萨和其他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支持巴里恩托斯的新党，叫做人民基督教运动(MPC)。人民基督教运动立意要巩固左派核心，以对抗极右的和极左的党派。人民基督教运动的领导人相信，这些党派也将参加竞选。在"基督教玻利维亚主义"的口号下，他们把1952年革命的理想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该党既反对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又反对用共产主义的办法来

解决玻利维亚问题。但是他们承认需要继续同美国政府以及争取进步联盟密切合作。人民基督教运动主张制定长远的计划，并主张通过变革和勤奋使国家得到发展。

1966年3月初，巴里恩托斯将军把五个性质全异的党组成了联合的玻利维亚革命阵线（FRB），这一行动显示了他的相当可观的政治才能。这个286阵线包括人民基督教运动、正统革命党、左翼革命党、查科战争退伍军人联盟和社会民主党（PSD）。社会民主党是1945年由包括路易斯·阿道弗·西莱斯·萨利纳斯、阿尔维托·克雷斯波·古铁雷斯和罗兰多·肯普夫·梅尔卡多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巴里恩托斯还寻求农民联盟（Confederación de Campesinos）的支持。但是农民联盟不愿意正式和"阵线"结盟，所以，巴里恩托斯依靠人民基督教运动去争取农村的选票。

1966年5月3日发布大赦令，允许一切政党参加竞选和投票，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支持帕斯·埃斯登索罗的势力除外。十四个登记的党派中有六个党提出了自己的竞选人。"阵线"挑选了社会民主党的路易斯·阿道弗·西莱斯·萨利纳斯作

为巴里恩托斯将军的副总统竞选人。由社会主义长枪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联盟推选了查科战争的英雄贝纳迪诺·比尔瓦奥·里奥哈将军和贡萨洛·罗梅罗为他们的竞选人。一个采用国际开发署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和徽章的新近组成的党，推选前总统恩里克·埃尔佐格和自由党的领袖爱德华多·蒙特斯—蒙特斯为他们的竞选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提名前大使维克托·安德拉德和拉斐尔·奥塔索为竞选人。拉斐尔·奥塔索曾参与创立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但后来因和帕斯·埃斯登索罗不和而被流放。民族解放阵线（FLIN）是1964年大选时唯一反对帕斯的组织，它提出了费利佩·伊尼格斯和马里奥·米兰达为竞选人。最后，就连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支持帕斯的派系也以帕斯·埃斯登索罗革命运动这个新党的名称提名马里奥·迭斯·德·梅迪纳和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古穆西奥（巴普蒂斯塔总统的孙子）参加竞选。奥万多将军禁止武装部队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他本人也不公开支持任何竞选人。

1952年选举法在1960年7月3日选举日仍然基本有效。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玻利维亚人都要

登记。会写字的选举人在登记簿上签字，不识字的则按上指印。选举人挑出他支持的那个党的选票纸，把它装进信封。然后投入选举箱内。在这次被287外国观察家称之为和平而公正的选举中，巴里恩托斯总统和玻利维亚革命阵线获得 61% 的选票。长枪党联盟得12%，其余党派分得余下的选票。

巴里恩托斯总统和副总统路易斯·阿道弗·西莱斯·萨利纳斯的任期到1970年结束。在执政的第一年中，总统一面继续逼迫智利给予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一面加强和各邻国的关系。被洪达解散了的议会又重新召开，并重新制定了宪法。玻利维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总额超过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赠款和技术援助的协定。这笔钱将用于六个方面。第一用于使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现代化。第二用于继续复兴玻矿公司和资助矿业银行扩大对私人矿业的贷款。第三用于促进玻利维亚的公路、机场和设备维修等交通系统的发展。第四个目标是农村的发展，包括对农民和大农场主的低息贷款。也为移民计划、村镇发展和改进毛纺工业提供资金。第五是实施一个增加劳动力的综合计划，其中包括改善教育设施和医疗卫生，加强人口控

制和建立劳动指导机构。最后一项是为私人的和公共的工业发展提供信贷资本。

玻利维亚保证充分致力于各项发展计划。在多数情况下，美国的援助是以贷款的形式，而不是捐赠。玻利维亚是在预计各项计划将提高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设想下接受这些贷款的。这就是说，到一定的时候，这些债务应该是自行清偿。玻利维亚也参与对各项计划的指导。在巴里恩托斯执政一周年时，他宣布玻利维亚增加了出口，对外贸易的顺差达一千二百万美元，按人口平均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3%。 288

玻利维亚要继续取得这样的进步，关键在于维持政治上的稳定，继续促进工业化，改进整个基层社会和发展它的农业生产。随着1967年3月根除了卡斯特罗支持的游击队，看来第一点是可能做到的。切·格瓦拉之死，至少在几个月内（如果不是几年的话），又消除了从那方面再来一次攻击的威胁。同时，政府还表示要继续和平地进行社会革命。要使它全部开花结果，还需要一些年代。这就超越了巴里恩托斯总统和随后的几个继任者执政的期限了。

附录一　安第斯和秘鲁文化编年表

年代	时期	特征	地点
公元前10000—2400年	旧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猎人，挖掘地下茎为食；后期培植棉花、胡椒、南瓜之类的植物。有一些纺织业。先古陶器。	维斯卡查尼奇卡马 瓦卡—普里埃塔
公元前1200—400年	新石器时代	地下房屋，金字塔，囚袭的艺术；农业方面有了谷物和马铃薯；驯养羊驼。	察温 奇里帕 普卡拉
公元前400年—公元400年	实验期	分布较广的纺织业，水利及肥料的利用。以庙宇为中心建筑的城市，神权政体，铜的使用，沿海岸发展了较高的艺术。	帕拉卡斯—卡维尔纳斯 萨利纳尔 蒂亚瓦纳科Ⅰ期和Ⅱ期，蒂亚瓦纳科原始期
公元400—1000年	古典时代	先进的海岸文化。最好的陶器、纺织品、金属加工制品、石刻等艺术品。巨大的庙宇、宫殿和多层建筑物。商业、城邦国家和	摩契卡 雷库艾 纳兹卡 帕拉卡斯古墓

年代	时期	特　征	地点
		政治上的统一。	蒂亚瓦纳科古典期
公元800—1200年	蒂亚瓦纳科扩张时期	极权主义的宗教，常备军队，扩张的帝国及其商业。青铜、铅的使用，华丽的宫殿，贵族。	蒂亚瓦纳科，东玻利维亚，北智利。 秘鲁，蒂亚瓦纳科。
公元1300—1438年	蒂亚瓦纳科衰落时期	区域性的文化再度出现；设有堡垒的城市。颓废的艺术形式。印加丘基芒库王世袭的"太阳皇帝"。	伊卡 昌卡伊 契姆 初期的印加
公元1438—1532年	印加时代	科拉帝国的结束。公元1440年中央集权的印加政府；道路和驿站信使。剩余农产品的储备制度。	库斯科盆地（北纬1°到南纬35°，沿海3250哩，往东到巴拉圭河）
公元1532年	西班牙统治时代	抢夺印加政权。引进欧洲的植物、动物、工具和冶金技术。矿藏的开发。	从巴拿马到火地岛。

附录二　印加帝国历任统治者一览表

芒科·卡帕克—玛玛·奥柳	十三世纪
辛奇·罗卡—玛玛·科卡	十三世纪
略克·尤潘基—玛玛·卡瓦	十三世纪
梅塔·卡帕克—玛玛·坦卡拉伊	十三世纪
卡帕克·尤潘基—玛玛·科里·维尔帕伊	十三世纪
印加·罗卡—玛玛·米卡伊	十四世纪
耶瓦尔·瓦卡克—玛玛·奇克拉	十四世纪
比拉科查·印加—玛玛·龙图·卡亚	十四到十五世纪
帕查库提—玛玛·安娜瓦尔克	1438—1471年
图帕克·尤潘基—玛玛·奥柳	1471—1493年
瓦伊纳·卡帕克—玛玛·库西·雷梅	1493—1527年
瓦伊纳·卡帕克—玛玛·拉瓦·奥柳	
瓦斯卡—丘基·维帕	1527—1532年
阿塔瓦尔帕	1527—1533年
托帕·瓦尔帕	1533年
芒科·印加	1533—1545年
图帕克·阿马鲁	1545—1572年

附录三 玻利维亚历届总统一览表

姓名	出生地	生年—卒年	任职期(年)
西蒙·玻利瓦尔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1783—1830	1825—26
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	委内瑞拉,库马纳	1795—1830	1826—28
何塞·M·佩雷斯·德·乌尔蒂尼内亚	拉巴斯	1782—1865	1828—28
何塞·米格尔·德·贝拉斯科	圣克鲁斯	1795—1859	1828—28
佩德罗·布兰科	科恰班巴	1795—1828	1828—28
何塞·M·德·贝拉斯科	—	—	1828—28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	拉巴斯,瓦里纳	1792—1865	1829—39
何塞·M·德·贝拉斯科	—	—	1839—41
何塞·马里亚诺·塞拉诺	苏克雷	1788—1851	1839—39
何塞·M·德·贝拉斯科	—	—	1839—41
何塞·巴利维安	拉巴斯	1805—1852	1841—47
欧塞维奥·吉拉尔特	拉巴斯	1799—1849	1847—48
曼努埃尔·伊西多罗·贝尔苏	拉巴斯	1808—65	1848—55
豪尔赫·科尔多瓦	拉巴斯	1822—61	1855—57
何塞·马里亚·利纳雷斯	波托西,蒂卡拉	1810—61	1857—61

姓名	出生地	生年—卒年	任职期(年)
何塞·M·德·阿查	科恰班巴	1810—68	1861—64
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	科恰班巴,塔拉塔	1820—71	1864—71
阿古斯丁·莫拉莱斯	拉巴斯	1808—72	1871—72
托马斯·弗里亚斯	波托西	1804—84	1872—73
阿道弗·巴利维安	拉巴斯	1831—74	1873—74
托马斯·弗里亚斯	—	—	1874—76
伊拉里翁·达萨	苏克雷	1840—94	1876—79
纳西索·坎佩罗	塔里哈,托霍	1813—96	1880—84
格雷戈里奥·帕切科	波托西	1823—94	1884—88
阿尼塞托·阿尔塞	塔里哈	1824—1906	1888—92
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	科恰班巴	1832—1907	1892—96
塞维罗·费尔南德斯·阿隆索	苏克雷	1849—1925	1896—99
塞拉皮奥·雷耶斯·奥尔蒂斯	拉巴斯	1823—1900	1899—99
何塞·曼努埃尔·潘多	拉巴斯,阿拉卡	1849—1917	1899—1904
伊斯梅尔·蒙特斯	拉巴斯	1861—1934	1904—09
埃利奥多罗·比利亚松	科恰班巴	1848—1939	1909—13
伊斯梅尔·蒙特斯	—	—	1913—17
何塞·古铁雷斯·格拉	苏克雷	1860—1929	1917—20
包蒂斯塔·萨维德拉	拉巴斯	1870—1939	1920—25
费利佩·古斯曼	拉巴斯	1879—1932	1925—26
埃尔南多·西莱斯	苏克雷	1881—1942	1926—30
卡洛斯·布兰科·加林多	科恰班巴	1882—1943	1930—31
丹尼尔·萨拉曼卡	科恰班巴	1868—1935	1931—34
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	拉巴斯	1882—1938	1934—36

姓　　名	出生地	生年—卒年	任职期(年)
萨诺			
何塞·戴维·托罗	苏克雷	1898—	1936—37
格尔曼·布施·贝塞拉	贝尼，圣哈维尔	1904—1939	1937—39
卡洛斯·金塔尼利亚	科恰班巴	1888—1964	1939—40
恩里克·佩尼亚兰达	拉巴斯	1891—	1940—43
瓜尔维托·比利亚罗埃尔	科恰班巴，普纳塔	1908—1946	1943—46
托马斯·蒙赫·古铁雷斯	拉巴斯	1884—1954	1946—47
恩里克·埃尔佐格	拉巴斯	1896—	1947—49
马梅尔托·乌里奥拉戈伊蒂亚	苏克雷	1894—	1949—51
乌戈·巴利维安	拉巴斯	1901—	1951—52
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	塔里哈	1907—	1952—56
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	拉巴斯	1914—	1956—60
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	—	—	1960—64
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	科恰班巴，塔拉塔	1919—	1964—65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	潘多	1917—	1965—66
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	—	—	1966—

附录四　玻利维亚历史年表

1438年　印加帝国扩张的开始。

1493年　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世界中划分疆界的教皇谕令。

1524年　葡萄牙人从巴西到达印加帝国边界。

1529年　查理五世签订议定书赐予皮萨罗对秘鲁的所有权。

1533年　8月29日阿塔瓦尔帕被皮萨罗处决，库斯科于11月陷落。

1538年　丘基萨卡建立被命名为拉普拉塔。

1542年　保护印第安人的新法引入新世界。

1545年　发现了波托西的塞罗里科。

1546年　查理五世下令命名波托西帝国之镇。

1548年　为纪念秘鲁新近恢复的和平，10月20日建立拉巴斯圣母新镇。

1562年　在波托西建立造币厂。

1570年　建立科恰班巴。

1574年　路易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建立塔里哈。

1580年　奥古斯丁派的神甫修建科帕卡瓦纳的第一座教堂。

1601年　建立奥鲁罗。

1624年　在苏克雷创建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大学。

1776年　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划归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府的拉普拉塔总督辖区。

1780年 11月4日图帕克·阿马鲁造反。

1809年 苏达涅斯兄弟在丘基萨卡被捕，在南美洲第一次爆发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

1809年 7月16日穆里略在拉巴斯起义。

1810年 包括穆里略在内的九位先驱烈士于1月29日被绞死。

1816年 图库曼会议在7月9日宣布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

1821年 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

1824年 8月6日苏克雷在胡宁打败西班牙坎特拉克将军。

1824年 12月9日的阿亚库乔战役确保了秘鲁的独立。

1825年 8月6日玻利维亚宣告独立。8月25日以保护人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新国家。

1830年 拉巴斯大学创建，并以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的名字命名。1832年4月2日举行阿亚库乔拉巴斯的圣安德烈斯大学落成典礼。

1831年 新宪法废除奴隶制。

1837年 圣克鲁斯将军组成玻利维亚——秘鲁联邦。

1839年 第四次制宪会议于7月12日以苏克雷的名字命名首都。

1841年 何塞·巴利维安将军在因加维打败秘鲁的加马拉将军，从而确保了玻利维亚的独立。

1842年 11月18日贝尼省成立。

1863年 同秘鲁签订友好条约。

1866年 梅尔加雷霍同智利签订条约：割让土地，并于南纬23°—25°线之间建立一个共同开发硝石的地区。

1867年 梅尔加雷霍同巴西签订条约，割让给巴西三十万平

方公里①土地，但在东边确立了明确的边界线。

1871年　阿古斯丁·莫拉莱斯推翻梅尔加雷霍，夺取了政权。

1873年　玻利维亚同秘鲁签订秘密联盟条约。

1874年　同智利签订条约，规定南纬24°线为两国边界，不过玻利维亚保证在二十五年内对于在该线以北开采硝石的智利公司不增加税收。

1878年　达萨总统说服议会通过一项对智利的硝石公司征税的议案。

1879年　2月14日智利占领安托法加斯塔，3月23日在卡拉马打败阿瓦罗亚，并于4月6日宣战。

1880年　5月26日在塔克纳（阿连萨高原），玻利维亚—秘鲁联军战败，对玻利维亚来说，实际上太平洋战争已告结束，但秘鲁仍在战斗。

1883年　秘鲁同智利签订和平条约。

1884年　玻利维亚同智利签订不定期停战协定，割让已被智利占领的土地。

1889年　同阿根廷签订条约，割让贝尔梅霍河和皮科马约河之间的查科地区。

1892年　通往奥鲁罗的铁路完工。

1895年　同智利签订条约，承认玻利维亚对太平洋岸一港口的权利。

1903年　皮特罗普利斯条约结束了同巴西的战争。以二百万英镑和马代腊河急流区修建一条铁路为交换条件，割让全部阿克里地区。

---

① 据正文第272页，割让给巴西的土地为十万平方公里。——译者

1905年 蒙特斯总统同智利签订条约，同意放弃沿海地区。

1909年 玻利维亚把乌卡亚利河西北地区割给秘鲁。

1917年 由于一艘载着玻利维亚部长去柏林的中立国船只被鱼雷炸坏，玻利维亚同德国断交。

1925年 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巴斯的铁路通车。

1928年 12月巴拉圭攻击玻利维亚在查科的巴瓜迪亚堡垒。

1932年 丘基萨卡湖的攻击导致查科战争。

1933年 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正式开战。

1937年 托罗总统将美孚石油公司租借地收归国有，并成立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

1938年 7月9日交战双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条约，划分巴拉圭同玻利维亚之间有争议的领土。

1939年 布施总统宣布锡大王必须向国家上交全部外汇收入，同时把中央银行收归国有。

1942年 1月玻利维亚同各轴心国断交，并于1943年4月宣战。

1943年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推翻佩尼亚兰达政府，并让比利亚罗埃尔将军执政。

1946年 卡塔维矿大屠杀导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阁辞职，比利亚罗埃尔在7月21日于穆里略广场被绞死。

1952年 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博士领导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发动政变；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任职为政府首脑四年。

10月31日矿山国有化，并建立玻矿公司。

1953年 按八月的改革法把大块土地分给印第安农民。

1956年 文盲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并选举埃尔南·西莱斯任总统四年。

1960年 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再次当选。

1964年 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同副总统巴里恩托斯当选。11月4日以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将军为首的洪达接管政府。

1966年 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将军当选为总统。

1967年 武装部队镇压了切·格瓦拉及其他古巴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队。10月8日格瓦拉被捕，10月10日死去。

1968年 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遭到谴责，说他把切·格瓦拉的日记转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引起了7月26日内阁危机，全国宣布戒严。

附录五　美国驻玻利维亚使节名单

(1848—1968年)

代办：

约翰·阿普尔顿	缅　　因	1848. 3.30.
亚历山大·K·麦克朗	密西西比	1849. 5.29.
霍勒斯·H·米勒	密西西比	1852. 2.10.
约翰·W·达纳	缅　　因	1853. 8.26.

驻节公使：

约翰·W·达纳	缅　　因	1854. 6.29.
约翰·科顿·史密斯	康涅狄格	1858. 6.14.
戴维·K·卡特	俄亥俄	1861. 3.27.
艾伦·A·霍尔	田纳西	1863. 4.21.
约翰·W·考德威尔	俄亥俄	1868. 6.18.
利奥波德·马克布赖特	俄亥俄	1869. 4.16.
约翰·T·克罗克斯顿	肯塔基	1872. 12.20.
罗伯特·M·雷诺兹	亚拉巴马	1874. 6.17.

驻节公使和总领事：

S·牛顿·佩蒂斯	宾夕法尼亚	1878. 9. 4.
查尔斯·亚当斯	科罗拉多	1880. 4. 6.

特派公使：

威廉·亨利·特雷斯科特	南卡罗来纳	1881. 11.28.

驻节公使和总领事：

乔治·梅尼　田　纳　西　1882. 4.17.
理查德·吉布斯　纽　　约　1883. 6.18.
威廉·D·布洛克斯哈姆　佛罗里达　1885. 4.18.
S·S·卡莱尔　路易斯安那　1887. 8.31.
托马斯·H·安德森　俄　亥　俄　1889. 9. 3.

特命全权公使：

托马斯·H·安德森　俄　亥　俄　1890. 7.30.
弗雷德里克·J·格兰特　华　盛　顿　1892.12.22.
托马斯·穆恩莱特　堪　萨　斯　1894. 2. 2.
乔治·H·布里奇曼　新　泽　西　1897. 10.7.
威廉·B·索斯比　密西西比　1902. 7.11.
詹姆斯·F·斯塔特斯曼　印第安纳　1908. 6. 5.
霍勒斯·G·诺尔斯　特　拉　华　1910. 6.24.
约翰·D·奥里尔　密　苏　里　1913. 6.26.
S·艾博特·马金尼斯　犹　　他　1919. 9.23.
杰西·S·科特雷尔　田　纳　西　1921.10.19.
戴维·E·考夫曼　宾夕法尼亚　1928. 3. 7.
爱德华·F·菲利　哥伦比亚区　1930. 6. 4.
费伊·A·德斯·波特斯　南卡罗来纳　1933. 8.19.
R·亨利·诺韦布　俄　亥　俄　1936. 4.25.
罗伯特·格兰维尔·考德威尔　得克萨斯　1937. 5. 4.
道格拉斯·詹金斯　南卡罗来纳　1939. 6.22.

特命全权大使：

皮埃尔·德·L·博尔　宾夕法尼亚　1942. 3. 5.
沃尔特·瑟斯顿　亚利桑那　1944. 9.21.
约瑟夫·弗拉克　宾夕法尼亚　1946. 4.27.
欧文·弗洛曼　纽　　约　1949.11.19.

爱德华·J·斯帕克斯	纽约	1951.12.14.
杰拉尔德·A·德鲁	加利福尼亚	1951.10.11.
菲利普·W·邦斯尔	哥伦比亚区	1957. 3.28.
卡尔·W·斯特罗姆		1959. 4. 8.
本·S·斯蒂芬斯基		1961. 6.14.
道格拉斯·亨德森		1963. 12. 3.
劳尔·H·卡斯特罗		1968. 8. 12.

（摘自1957年华盛顿国务院人事登记册）

附录六 玻利维亚的节日

（及其庆祝的内容）

奥鲁罗节	2月10日	1781年2月10日塞瓦斯蒂安·帕加多尔和哈辛托·罗德里格斯起义，反对西班牙人。
阿瓦罗亚节	3月23日	1879年3月23日爱德华多·阿瓦罗亚在卡拉马抵抗智利，为保卫玻利维亚国土而牺牲。卢汉所雕刻的刻有阿瓦罗亚名字的塑像树立在拉巴斯广场。
塔里哈节	4月15日	纪念1817年在拉塔布拉达进行的战斗。玻利维亚游击队在“莫托”·门德斯和乌里翁多的领导下，联合阿根廷第四军打败保皇分子。
劳动节	5月1日	玻利维亚纪念各劳工组织自1889年以来庆祝的国际节日。
丘基萨卡节	5月25日	1809年5月25日在苏克雷首次发出了要求自由的呼声。
拉巴斯节	7月16日	1809年7月16日在拉巴斯爆发了南美洲为独立而进行的第一个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佩德罗·多明戈·穆里略和先驱烈士们领导的。
独立节	8月5,6,7日	1825年在胡宁胜利一周年时，在苏克

		雷自由宫签订独立法。
科恰班巴节	9月14日	纪念由埃斯特万·阿尔塞领导的1810年革命。西班牙人在阿罗马战役中第一次被击败。
圣克鲁斯节	9月24日	1810年9月24日圣克鲁斯参加独立战争。
泛 美 节	10月12日	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波托西节	11月10日	1810年爱国者佩德罗·科斯塔斯领导起义反对总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斯，并把他处死。
贝 尼 节	11月18日	1842年因加维战役一周年时，何塞·巴利维安总统设立贝尼省。
潘 多 节	9月24日	1938年布施总统设立潘多省。

其他玻利维亚宗教性的节日是：1月1日，狂欢节的星期一和星期二，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四和星期五、基督圣体节，11月2日（万灵节），圣诞节。

民　族　英　雄

姓　　名	出生地点和时　　间		卒年
西蒙·玻利瓦尔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1783年7月24日	1830年12月17日
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	委内瑞拉，库马纳	1795年2月3日	1830年6月4日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	拉巴斯，瓦里纳	1792年12月5日	1865年9月25日
何塞·巴利维安	拉巴斯	1805年11月30日	1852年10月16日

国　　旗

三色平行的条旗：上条红色，中条金色，下条绿色，按国花坎图塔（Kantuta）的同样顺序排列。

国　　徽

一只鹰站在护旗盾牌上面。盾牌上写着玻利维亚，还有一个灿烂的太阳，照耀着波托西的塞罗里科，山脚下是一只羊驼和一棵棕榈树，表示国家有多种多样的物产。盾牌下部边缘上

有九颗星，代表拉巴斯、波托西、科恰班巴、丘基萨卡、圣克鲁斯、奥鲁罗、塔里哈、贝尼和潘多等九省。



词汇注释

A

AID 国际开发署(国外通常称作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

Alameda 白杨树林荫道。

Alcabala (阿尔卡瓦拉) 西班牙政府对殖民者征收的一种税。

Altiplano 西班牙文是高原的意思，指殖民地时期整个上秘鲁。

Alto de la Alianza (阿连萨高原) 太平洋战争时在塔克纳的“联军驻地”。

Alto Peru (上秘鲁) 旧总督辖区的高原部分；另一部分称下秘鲁(Bajo Peru)。

Anti 印加文是铜的意思，从它衍化出“安第斯山”一词。

Antisuyo (安蒂苏约) 包括安第斯科迪勒拉山的印加地区。

Audiencia (王室法庭) 原来是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庭，后来成了总督下面的基层行政管理工具。有时这个词也指总督所管辖的地区。

Ayampitenses (阿亚姆比丹人) 分布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一带的古代(公元前 10,000 年)猎人。

Ayllu (艾柳) 艾马拉时期的部落或家族的社会组织。

B

Balsa (巴尔萨) 在的的喀喀湖上使用的香蒲草做成的草船。

Belcismo (贝尔西斯莫) 贝尔苏的专制政府。

Blancos 白种人（指同印第安人相对的白人）。

Bom Vizinho 葡萄牙文，意思是“好邻居”，西班牙文是 Buen Vecino。

Borla 印加贵族使用的包头布。

C

Cabildo Abierto 解决政府问题的公开会议。

Cacique（卡西克）印第安人的首领。

Campesino 原意是农民，自从有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后，指高原上的印第安人。

Casa de Contratación 1503年在西班牙设立的贸易署，管理各殖民地的贸易和经济。

Casa de Moneda 1562年于波托西建立的皇家造币厂。

Cat-god（猫神） 从墨西哥到蒂亚瓦纳科一带发现的在石雕、纺织品、宝石上的猫的形象。

Caudillo（考迪罗） 政治首领，经常指有煽动力的独裁者。

Caudillo bárbaro（野蛮的考迪罗） 阿格达斯对十九世纪中叶的两个残暴的总统——梅尔加雷霍和莫拉莱斯的别称。

Cédula 皇家敕书或土地许可证。

Chaco（查科） 从玻利维亚东部一直延伸到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低地地区。

Charqui 一般指在高原区的羊驼肉干。

Chasqui 以接力办法奔跑于驿站之间的印加信使。

Chavin culture（察温文化） 公元前1,200—400年在秘鲁的文化。

Chicha 西班牙文指印第安妇女用磨碎的谷类经加热酿造出的

酒。印第安人称“阿卡”(acca)。

Chilliwa(奇利瓦草) 生长在高原上做羊驼饲料的矛形草。

Chinchona 一种常青树，树皮可制奎宁。

Cholo(乔洛) 玻利维亚的梅斯蒂索人，即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Chucasuyo① 包括北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印加地区。

Chusma(丘斯马) 两边缝到腋窝的印加人穿的长袍。

Chuquisaqueño 苏克雷城或丘基萨卡省的居民。

CIAP 泛美开发委员会的西班牙文缩写。

Coca (also cuca)(古柯) “神圣的灌木”，它有茶叶似的叶子，可提供古柯碱，植物学上称为红色素的古柯。自从哥伦布以前的时期起印第安人就咀嚼这种叶子，同时加一些莱姆，以便吸出汁液。

Colla (also Kolla)(科拉) 蒂亚瓦纳科后，早期的高原上的部落。

Collasuyu (also kollasuyu)② 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出现的操艾马拉语人的政治单位。该区包括拉巴斯、科恰班巴、普诺、阿雷基帕和奥鲁罗等省。

Colonos 佃户。

Colorados(科洛拉多斯) 第一步兵营。

COMIBOL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缩写。

Comunarios 由佃农组成的村庄。

Confederación de Campesinos 农民联盟。

---

① 正文第59页为 Chinchasuyo，故译为钦查苏约。——译者

② 正文第56页为 Collasuyo，故译为科拉苏约。——译者

Constitución Vitalicia（终身宪法）规定总统为终身职务的第一部宪法。

Contisuyo（孔蒂苏约）　包括沿海各地的印加地区。

Copacabana（科帕卡瓦纳）　哥伦布以前时期就存在于的的喀喀湖上的城市和宗教圣地。该词的意思是“看见的的喀喀湖中神圣太阳岛的地方”。

Corregidor　长官。

Coya　印加王后。

Criollos　克里奥尔人，生长在殖民地的纯血统的西班牙人。

E

Encomienda（大授田制）　西班牙土地授给制，包括役使原居住在所授土地内各村庄印第安人的权力。

Experimental Period（实验期）　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期间的海岸文化，也称为“后形成期”。

F

Finca　农场。

FLIN　民族解放阵线。

FRB　玻利维亚革命阵线。

FSB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长枪党。

FSTMB　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

G

Guano　在秘鲁海岸和钦查群岛的瓜尼亚佩和马卡比发现的鸟粪。有的地方积存厚达730呎，据计算每四个世纪增高十呎。

Golpe de estado　政变或推翻政府。

Golpista 政变首领。

H

"Hero of December"（十二月英雄） 指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将军。

Huaca 印加祖先的神龛或坟墓；现在多指在那里发现的各种宝物。

I

ICA 国际合作署，现称国际开发署。

Ichu（伊楚草） Stipa ychu 的本地名称，在高原上发现的一种粗糙的丛生草，可作饲料或苫房用。

Indias Orientales 远东，指印度和其他生长香料的地区。

J

Junta（洪塔） 一种西班牙议会，它经常以特殊方式集合起来管理政府。

K

Kapaj Raymi（卡帕—拉伊米） 祈求丰收的十二月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达到成年的印加青年得到公认。

L

La Paz（拉巴斯） 原来于 1548 年命名为拉巴斯圣母新镇，1825年为了纪念一年前为独立进行的阿亚库乔战役，重新命名为阿亚库乔拉巴斯。

La Restauración 在秘鲁—玻利维亚联邦解体、玻利维亚成为

独立国家后组成的政府。贝拉斯科称之为复兴政府。

Llama（羊驼） 学名 Lama huanacos glama，野原驼的一种小骆驼似的亚种。

Llaneros 枪骑兵。

Llanos（低地） 平原，指玻利维亚北部和东部的低地。

Lluchu 一种带帽耳的帽子。

Logia Razón de Patria国家事业共济会。

M

Marca（玛尔卡） 由艾柳或家族部落集合而成的村镇。

Melgarejos 铸有独裁者梅尔加雷霍的头像的银币。

Mestizos（梅斯蒂索人） 西班牙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裔。

Minifundio 把大片耕地分成过分零碎的小块。

Mita（米达） 印第安人定期为印加王族、公共工程及太阳神服劳役。后来征服者们也采用米达这种办法来为他们采矿或耕地。

Mitimac（移民法） 由帕查库提有计划地把被征服的印第安部落迁移到不发达地区。

MNR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

MPC 人民基督教运动。

N

Nueva Castilla 新卡斯提，即秘鲁。

Nueva España 新西班牙，即墨西哥。

Nueva Granada 新格拉纳达，即哥伦比亚。

New Laws （新法） 印度事务部为了阻止征服者对印第安人

的剥削而发布的条令。

O

OAS　美洲国家组织。

Oca　高原上的酢浆草属月下香的土名，其根茎可供食用。

Orejones　大耳朵。印加贵族戴耳饰拉长耳朵，西班牙人就这样称呼他们。印加文是Hatunrincriyoc。

P

Paceño　拉巴斯城的居民。

Pachacamac（帕查卡马克）　土地神。

Pachamama（帕查玛玛）　地母。

Papelista　写小册子的作者。

Partido Rojo（红党）　在智利的玻利维亚爱国者，后来支持利纳雷斯。

PCB　玻利维亚共产党。

Peninsulares（半岛人）　西班牙人，通常都是贵族，他们被任命为殖民地的各级长官。

PIR　左翼革命党。

Pirua（皮鲁阿）　克丘亚语是谷仓。原来意思是创造物的仓库。皮鲁阿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是皮鲁阿·帕卡里·芒科。现在秘鲁这一词就是从这个名字转讹而来的。

Pollera　裙子。

POR　革命工人党。

Posa（波萨）　在教堂庭院四角处的小教堂，印第安人就以此为正教堂。

PRA 正统革命党。

Prefect 地方长官。

PRIN 左翼民族革命党。

Procurador general 殖民时期，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吏； 现在为国家的总检察长。

Proto-Mártires （先驱烈士） 1810年 1 月29日为了国家独立在拉巴斯被绞死的九位玻利维亚战士。最著名的是穆里略。他们的名字详见第六章。

PSD 社会民主党。

Pucara 印加时代的山顶堡垒。

PURS 社会主义共和联盟党。

Q

Question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问题） 为决定阿里卡和塔克纳港归智利或归秘鲁而举行的公民投票。

Quinta 别墅。

Quinua （基诺亚） 学名 Cheonopodium quinoa，安第斯山生长的一年生植物， 其籽实有营养， 嫩叶似菠菜可食用。它很象北美洲的藜草 (C. albums)。

Quipu （基普） 用绳结来记数， 有时也记录通信或故事的一种记事法。

R

RADEPA 圣克鲁斯元帅共济会口号的缩写，其口号是“为了祖国事业”。

Rancherio 一簇小农场，特别指在科恰班巴地区的小农场。

Reducciones（归化区） 引导印第安人皈依天主的教区。来自拉丁语 re-ducere（再引回）。

Repartimiento （劳役分配制） 西班牙人役使印第安人为他们耕种土地的一种制度。原来是受命引导印第安人皈依天主的制度。

Republiquetas（共和军） 在上秘鲁进行游击活动反对保皇分子的非正规军。

Residencia（检审会议） 王室法庭对总督在任职期中工作的一种审查。

Rey sin corona “无冕之王”。玻利瓦尔根据第一部宪法被选为终身总统时，人们给他的称呼。

Rosca（罗斯加） 特权阶级或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从 1952 年以来用于贬意。

S

Sari（萨里） 印加烟草。

Suyo（苏约） 一个印加文的词尾，意思是地理区域或省。

T

Tahuantinsuyo（塔瓦廷苏约） 印加帝国，字义是世界的四方。

Tampu 印加驿站，相隔约十五哩，有信使奔跑其间。

Taquia 羊驼粪便，用作燃料。

Taypicala 艾马拉语，意思是“中心之石”或宇宙中心，蒂亚瓦纳科这一名字也可能起源于此。

Tiahuanaco（蒂亚瓦纳科） 一个起源不明的古代遗迹的现代

名称。据推测是由梅塔·卡帕克命名的。他把一个迅速的信使比作他所知道的最快的动物原驼（huanacu）。当信使在那里把信递给他时，他说："Tia huanacu"，意即"坐下，原驼"。

Tiahuanaco Primitive（蒂亚瓦纳科原始期） 最早的文化时代，贝内特认为是在公元300—700年，庞塞·桑西内斯认为是公元0—300年期间。

Tola（树胶草） 含树胶质的灌木，学名Bacharis Incarum。在高原地带用作燃料。

Totora（芦苇） 一种的的喀喀湖芦苇，用来做筏子、席子和苫屋顶。

Titicaca（的的喀喀） 可能原来是"因的喀喀"，"因的"（Inti）意思是给人温暖的太阳，被一个早期的西班牙牧师抄写错了。

Túmulos 印加王朝前和印加王朝时代的坟墓。

U

Uros（乌罗人） 大约公元前8,000年居住在波波湖附近的玻利维亚原始渔民。

Uti Possidetis（占领地保有主义） 在国际法上，把争议地区的所有权归属于实际占领和控制该地区的国家的原则。

V

Valle（谷地） 山谷或盆地，尤指在科恰班巴、苏克雷和塔里哈等地的盆地。

Viceroy（总督） 殖民地的最高长官。

Viracocha（比拉科查） 印加太阳神。

Viscachanenses（维斯卡查尼人） 在8,000年前和13,000年前之间居住在锡卡西卡附近的玻利维亚旧石器时代的猎人。

W

Wamani 印加的省份。

Y

Yareta（亚雷塔） 可作燃料的一种树胶质的灌木。

YPFB 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储藏公司。

Yungas（永加斯） 印第安词，指高原东北坡上的雨林地区。

Z

Zampoña（芦笙） 象笛子的长管乐器。

参 考 书 目

书名后所标页码系指本书引用该参考书之页码。

ACOSTA, R. Hilarión— "La Encomienda y la Mita a Traves de la Historiografía Moderna." Khana, Año VII, Vol. 1, Nos. 33 & 34. La Paz, July, 1959. Chapter V. pages 69—80.

R·伊拉里翁·阿科斯塔：《从现代史学看大授田制和米达徭役制》，《汗那》第7年第1卷33—34期，拉巴斯，1959年7月，第5章第69—80页

ADAMS, Sherman—First Hand Report, Harper & Brothers, N. Y., 1961. Chapter X, page 381.

谢尔曼·亚当斯：《第一手的报道》，哈珀兄弟公司，纽约，1961年，第10章第381页

ALBORTA Velasco, G.—"Las Responsabilidades sobre la Guerra del Chaco, Siles—Salamanca." Presencia, La Paz, March 3, 1968,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IX, page 2.

G·阿尔沃塔·贝拉斯科：《关于查科战争的责任：西莱斯——萨拉曼卡》，《存在》，拉巴斯，1968年3月3日，文学增刊，第9章第2页

ALCAZAR, Moisés—Drama y Comedia en el Congreso,

2d. ed., Talleres Gráficos Bolivianos, La Paz, 1957. Chapter VII, pages9—59. Chapter VIII, pages 60—76. Chapter IX, pages 178—215.

莫伊塞斯·阿尔卡萨：《国会中的话剧与喜剧》，第二版，玻利维亚出版社，拉巴斯，1957年，第7章第9—59页，第8章第60—76页，第9章第178—215页

ALEXANDER, Robert Jr.—The Bolivian National Revolu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N. J., 1958. Chapter X, pages 3—280.

小罗伯特·亚历山大：《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新布伦斯威克，新泽西，1958年，第10章第3—280页

ALVESTEGUI, David—"Las Responsabilidades de la Guerra del Chaco," El Diario, La Paz, Jan. 14, 1968,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Ⅸ, page 1.

戴维·阿尔维斯特吉：《查科战争的责任》，《日报》，拉巴斯，1968年1月14日，文学增刊，第9章第1页

ARGUEDAS, Alcides—Historia General de Bolivia, Arno Hnos., La Paz, 1922. Chapter II, pages 2—40. Chapter VII, pages 61—329. Chapter VIII, pages 333—388.

—Los Caudillos Bárbaros, Editorial V. de Luis Tasso, Barcelona, 1929. Chapter VII, pages 11—233.

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玻利维亚通史》，阿尔诺兄弟出版公司，拉巴斯，1922年，第2章第2—40页，第7章第61—329页，第8章第333—388页。

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残暴的首领们》，V·德·路易斯·塔索出版社，巴塞罗那，1929年，第7章第11—233页

ARMENTIA, Nicolás—Limites de Bolivia con el Perú, Talleres J. M. Gamarra, La Paz, 1905. Chapter VIII, pages 61—127.

尼古拉斯·阿门蒂亚：《玻利维亚同秘鲁的边界》，J·M·加马拉印刷公司，拉巴斯，1905年，第8章第61—127页

ARNADE, Charles W.—The Emergence of the Republic of Bolivia,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Gainesville, 1957. Chapter IV, pages 11—20. Chapter V, pages 1—23.

查尔斯·W·阿纳德：《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出现》，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盖恩斯维尔，1957年，第4章第11—20页，第5章第1—23页

ASCARRUNZ, Moisés—Hombres Célebres de Bolivia, Gonzáles y Medina, La Paz, 1920. Chapter VI, pages 1—71. Chapter VII, pages 61—122.

莫伊塞斯·阿斯卡伦斯：《玻利维亚名人传》，冈萨雷斯—梅迪纳公司，拉巴斯，1920年，第6章第1—71页，第7章第61—122页

AYALA Mercado, Ernesto —¿Qué es la Revolución Boliviana?, Burillo, La Paz, 1956. Chapter X, pages 33—83.

埃内斯托·阿亚拉·梅尔卡多：《玻利维亚革命是怎么回事？》布里略公司，拉巴斯，1956年，第10章第33—83页

BAILEY, Thomas A.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 S. Crofts & Co., N. Y., 1944. Chapter VIII, pages 433—436, 729.

托马斯·A·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F·S·克罗夫茨公司，纽约，1944年，第8章第433—436，第729页

BARRIENTOS, René—Mensaje a la Nación, Editorial Novedades, La Paz, 1966. Chapter X, pages 7—107.

—"La Revolución está en Marcha," El Diario, La Paz, April 9. 1967. Chapter X.

—"Hace Revelaciones sobre la Revolución de 1964," El Diario, November 5, 1967. Chapter X.

雷内·巴里恩托斯：《国情咨文》，新闻社，拉巴斯，1966年，第10章第7—107页

雷内·巴里恩托斯：《革命在前进》，《日报》，拉巴斯，1967年4月9日，第10章

雷内·巴里恩托斯：《揭开1964年革命的秘密》，《日报》，1967年11月5日，第10章

BARBA, Alvaro Alonso—Arte de los Metales, edited by Armando Alba, Editorial Potosi, 1967. Chapter V, pages xix—xlviii

阿尔瓦罗·阿隆索·巴尔瓦：《冶金技术》，阿曼多·阿尔瓦刊行，波托西出版社，1967年，第5章第19—48页

BASCON C., Federico—Siete Capitulos en la Vida del Gran Mariscal Andrés Santa Cruz. Imprenta Nacional, La Paz, 1965. Chapter VII, Pages 11—37.

费德里科·巴斯孔·C·：《安德烈斯·圣克鲁斯大元帅生活中的七个片断》，国家印刷局，拉巴斯，1965年，第7章第11—37页

BEDREGAL, Guillermo — Revolución y Contrarevolución en Bolivia, Burillo, La Paz, 1964. Chapter X, pages 13—62.

—La Revolución Boliviana y las Tareas del 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o, 1965. Chapter X, pages 62—71.

吉列尔莫·贝德雷加尔：《玻利维亚的革命与反革命》，布里略公司，拉巴斯，1964年，第10章第13—62页

吉列尔莫·贝德雷加尔：《玻利维亚革命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任务》，1965年，第10章第62—71页

BENNETT, Wendell C. — Ancient Arts of the Andes, Museum of Modern Art, N.Y. Chapter I, pages 6—92.

—Excavaciones en Tiahuanaco, Translated by Dr. Manuel Liendo Lazarte, Biblioteca Paceña, La Paz, 1956. Chapter I, pages 13—195.

温德尔·C·贝内特：《安第斯地区的古代艺术》，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第1章第6—92页

温德尔·C·贝内特：《蒂亚瓦纳科考古发掘》，曼努埃尔·连多·拉萨尔特博士译，拉巴斯图书馆，拉巴斯，1956年，第1章第13—195页

BERLE, Adolf A.—Latin America, Diplomacy and Reality, Harper Row,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 Y., 1962. Chapter X, pages 12—116.

阿道夫·A·伯利：《拉丁美洲：外交和现实》，哈珀·罗，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纽约，1962年，第10章第12—116页

BINGHAM, Hiram — Lost Cities of the Incas, Phoenix House. Ltd., London, 1951. Chapter II, pages 15—41. Chapter III, pages 50—81.

海勒姆·宾厄姆：《消失的印加城市》，菲尼克斯有限公司，伦敦，1951年，第2章第15—41页，第3章第50—81页

BONIFAZ, Miguel — Bolivia, Frustración y Destin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Sucre, 1965. Chapter VIII, pages 95—123. Chapter IX, pages 126—182. Chapter X, pages 201—267.

米格尔·博尼法斯：《玻利维亚：挫折与命运》，大学印刷所，苏克雷，1965年，第8章第95—123页，第9章第126—182页，第10章第201—267页

BOTELHO Gosálvez, Raúl — Proceso del Imperialismo del Brazil, Cia. Impresora Argentina, S. A., Buenos Aires, 1960. Chapter VII, pages 128—130. Chapter VIII, pages 128—134.

— "Murillo y el Paceñismo," El Diario, Jan. 29, 1967, La Paz,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VI, page 4.

劳尔·博特略·戈萨尔维斯：《巴西的帝国主义过程》，阿根廷印刷股份公司，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第7章第128—130页，第8章128—134页

劳尔·博特略·戈萨尔维斯：《穆里略与拉巴斯主义》，《日报》，1967年1月29日，拉巴斯，文学增刊，第6章第4页

BURNS, E. Bradford — "Tradition and Variation in Brazil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Vol. IX, No. 2, Univ. of Miami, Fla.,

April, 1967. Cha pter VIII, pages 195—212.
E·布雷德福·伯恩斯：《巴西外交政策的传统及变化》，美洲研究期刊，第9卷第2期，佛罗里达，迈阿密大学，1967年4月，第8章第195—212页
BURGOS O., Eduardo — Bolivia y su Derecho al Mar,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Potosí, 1966. Chapter VIII, pages 61—93.
爱德华多·布尔戈斯·O·：《玻利维亚及其海洋权》，大学出版社，波托西，1966年，第8章第61—93页
CALI, Francois — The Spanish Arts of Latin America,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60. Chapter V, pages 15—39 and 185—221.
弗朗索瓦·卡利：《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艺术》，瓦伊金出版社，纽约，1960年，第5章第15—39页，185—221页
CAMPERO, Narciso — Conducta del Ciudadano Narciso Campero en la Revolución contra Melgarejo, Tipografía del Progreso, Potosí, 1871. Chapter VIII, pages 1—24.
纳西索·坎佩罗：《公民纳西索·坎佩罗在反对梅尔加雷霍的革命中的作为》，进步印刷所，波托西，1871年，第8章第1—24页
CAPDEVILLA, Arturo — "Las Ruinas de Tiahuanacu," Boletín de la Sociedad Geográfica de La Paz, Año XXX, La Paz, June, 1922. Chapter I, pages 58—91.
阿图罗·卡德维利亚：《蒂亚瓦纳科遗迹》，拉巴斯地理学会简报，第30年，拉巴斯，1922年6月，第1章第58—91页

CESPEDES, Augusto — El Dictador Suicida,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S. A., Santiago de Chile, 1956. Chapter IX, pages 121—254.

— El Presidente Colgado, Editorial Jorge Alvarez, S. A., Buenos Aires, 1966. Chapter IX, pages 11—252.

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自杀的独裁者》，大学出版社股份公司，智利，圣地亚哥，1956年，第9章 第121—254页

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悬起的总统》，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出版股份公司；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第9章第11—252页

CIEZA DE LEON, Pedro de—Travels of Pedro de Cieza de Leon, translated by Harriet de Onis, editor, V. W. Von Hage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Oklahoma, 1957. Chapter II, pages 56—138.

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游记》，哈里特·德·奥尼斯译，V·W·冯哈根主编，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诺曼.俄克拉何马，1957年，第2章第56—138页

CONDARCO M., Ramiro — Zárate, El "Temible Willka," Gráficos Bolivianos, La Paz, 1966. Chapter VII, pages 42—46. Chapter VIII, pages 85—186.

拉米罗·孔达尔科·M·：《无畏的维尔加》，玻利维亚出版社，拉巴斯，1966年，第7章第42—46页，第8章第85—186页

CORRAL, Casimiro — "La Memoria a la Asamblea Constituyente de Bolivia en 1871," Imprenta El Progreso, Tacna, 1871. Chapter VII, pages 1—75.

卡西米罗·科拉尔：《玻利维亚1871年制宪会议记事》，进步印刷局，塔克纳，1871年，第7章第1—75页

CORREAS, Edmundo — "El Congreso de Tucumán," Américas, Vol. 18, No. 12, Pan American Union, Wash., Dec., 1966. Chapter VI, pages 1—10.

埃德孟多·科雷亚斯：《图库曼会议》，《美洲》杂志，第18卷第12期，泛美联盟，华盛顿，1966年12月，第6章第1—10页

COTTRELL, Leonard — Lost Cities, Pan Books, Ltd., London, 1959. Chapter III, pages 177—191.

伦纳德·科特雷尔：《消失的城市》，万书有限公司，伦敦，1959年，第3章第177—191页

CRESPO R., Alberto — Historia de la Ciudad de La Paz, Industrial Gráfica, S.A., Lima, 1961. Chapter III, pages 11—12.

阿尔维托·克雷斯波·R·：《拉巴斯市的历史》，图书印刷股份公司，利马，1961年，第3章第11—12页

CRESPO, Luis S. — "Monografía de la Ciudad de La Paz," Khana, Año VII, Vol. I, No. 33—34, La Paz, July, 1959. Chapter IV, pages 135—136.

路易斯·S·克雷斯波：《拉巴斯市的专题研究》，《汗那》第7年，第1卷第33—34期，拉巴斯，1959年7月，第4章第135—136页

CRIST, Raymond E. — "Politics and Geography: Andean Americ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Lancaster, Pa., October, 1966. Chapter IV, pages 135—136.

雷蒙德·E·克里斯特：《安第斯美洲的政治及地理》，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杂志，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1966年10月，第4章第135—136页

DAIREUX, Max — Melgarejo, Un Tyran Romantique, Calmann-Levy, Editeurs, Paris, 1945. Chapter VII, pages 176—259.

马克斯·代鲁斯：《梅尔加雷霍，传奇的暴君》，卡尔曼-勒维出版社，巴黎，1945年，第7章第176—259页

DECUNA, Vicente —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 Creación de Bolivia, Litografía del Comercio, Caracas, 1924. Chapter VII, pages 83—319.

维森特·德库纳：《关于玻利维亚创建的参考文件》，商业印书局，加拉加斯，1924年，第7章第83—319页

DEL RIO, Daniel — Simón Bolívar, A Sketch of His Life. The Bolivarian Society of the U. S. Inc., N. Y., 1965. Chapter VI, pages 96—115. Chapter VII, pages 116—146.

丹尼尔·德尔里奥：《西蒙·玻利瓦尔传略》，美国联合公司玻利瓦尔社，纽约，1965年，第6章第96—115页，第7章第116—146页

DELGADILLO R., Eddy — COMIBOL y las Bocaminas del Cerro de Potosí, Imprenta Universitaria, Potosí, 1966. Chapter X, pages 1—7.

埃迪·德尔加迪略·R·：《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及波托西山矿井》，大学印刷所，波托西，1966年，第10章第1—7页

DE VACANO, Máximo J. — Bolivia, Su Desarrollo y Progreso, Dietrich Reimer Ernest Vohsen, Berlin,

1925. Chapter IV, pages 103—161. Chapter VII, pages 57—67, Chapter VIII, 67—82.

马克西莫·J·德·巴卡诺：《玻利维亚的发展及进步》，迪特里希·赖默尔·埃内斯特·福森，柏林，1925年，第4章第103—161页，第7章第57—67页，第8章第67—82页

DIAZ ARGUEDAS, Julio — "Espionaje antes de la Guerra con el Paraguay," El Diario, La Paz, Jan. 28, 1968.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IX, page 2.

胡利奥·迪亚斯·阿格达斯：《同巴拉圭交战前的谍报活动》，《日报》，拉巴斯，1968年1月28日，文学增刊，第9章第2页

DIAZ MACHICAO, Porfirio — Veinte Lecciones sobre Santa Cruz. Empresa Editora Novedades, La Paz, 1965. Chapter VII, pages 14—61.

波菲里奥·迪亚斯·马奇卡奥：《关于圣克鲁斯的二十个教训》，新闻出版社，拉巴斯，1965年，第7章第14—61页

DIEZ DE MEDINA, Lucio — La Vida Heroica del Libertador, Vol. II, La Paz, 1954. Chapter VI, pages 321—520.

卢西奥·迭斯·德·梅迪纳：《解放者的勋绩》，第2卷，拉巴斯，1954年，第6章第321—520页

EISENHOWER, Dwight D. — Waging Peace, Doubleday & Co., Garden City, N. Y., 1965. Chapter X, pages 514—539.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摆弄和平》，道布尔戴公司，花园城，纽约，1965年，第10章第514—539页

ELLIOT, J. H. —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Mentor, New American Library. N. Y., 1966. Chapter III, pages 61—74.

J·H·埃利奥特：《1469—1716年的西班牙帝国》，门特，新美国图书社，纽约，1966年，第3章第61—74页

ESPADA, Joaquín—"Salamanca y la Guerra del Chaco," El Diario, La Paz, Dec. 17, 1967.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IX, page 1.

华金·埃斯帕达：《萨拉曼卡与查科战争》，《日报》，拉巴斯，1967年12月17日，文学增刊，第9章第1页

FAWCETT, P. H. — Exploration Fawcett, edited by Brian Fawcett,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1924. Chapter VIII, pages 40—55.

P·H·福西特：《福西特探险记》，布赖恩·福西特主编，铁锚印刷有限公司，蒂普特里，埃塞克斯，1924年，第8章第40—55页

FELIMAN V., José — Los Imperios Andinos, Editorial Don Bosco, La Paz, 1961. Chapter I, pages 11—26.

何塞·费利曼·V·：《安第斯帝国》，唐·博斯科出版社，拉巴斯，1961年，第1章第11—26页

FEYLES, H. Gabriel — Actas Capitulares de la Ciudad de La Paz, 1548—1562,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 y Culturales de La Paz, 1965. Vol. I. Chapter III, pages 11—56.

H·加夫列尔·费莱斯：《1548—1562年拉巴斯市的议事记录》，拉巴斯历史与文化研究会，1965年，第1卷第3章第11—56页

FINOT, Alfonso—Así Cayó Villarroel, Ed. Novedades, La Paz, 1966. Chapter IX, pages 27—80.

阿方索·菲诺特：《比利亚罗埃尔的垮台》，新闻出版社，拉巴斯，1966年，第9章第27—80页

FINOT, Enrique—Nueva Historia de Bolivia, 3d. ed., Gisbert y Cía., La Paz, 1964. Chapter II, pages 33—51. III, pages 52—74. V, pages 75—130. VI, pages 131—174. VII, pages 192—288. VIII, pages 284—375.

恩里克·菲诺特：《玻利维亚新史》，第三版，希斯维尔特公司，拉巴斯，1964年，第2章第33—51页，第3章第52—74页，第5章第75—130页，第6章第131—174页，第7章第192—288页，第8章第284—375页

FITZGIBBON, Russell H. —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48. Chapter VII, pages 32—57.

拉塞尔·H·菲茨吉本：《美洲国家宪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48年，第7章第32—57页

FLORES, Domingo — "Murillo y la Revolución de Julio," Khana, Año X, Vol. II, No. 39. November, 1967. Chapter VI, pages 103—109.

多明戈·弗洛雷斯：《穆里略及七月革命》，《汗那》第10年，第2卷第39期，1967年11月，第6章第103—109页

FRONTAURA A., Manuel — El Litoral de Bolivia, Artes Gráficas Burillo, La Paz, 1968. Chapter VIII, pages 213—278.

曼努埃尔·弗朗陶拉·A·：《玻利维亚的海岸》，布里略印刷局，拉巴斯，1968年，第8章第213—278页

GARCILASO DE LA VEGA—The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Inca, translated by Maria Jolas, edited by Alain Gheerbrant, Avon Library, N. Y., 1964. Chapter II, pages 42—311. Chapter III, pages 364—430.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关于印加人的皇家评论》，玛丽亚·乔拉斯译，阿兰·吉尔布兰特主编，艾文图书社，纽约，1964年，第 2 章第42—311页，第 3 章第364—430页

GERASSI, John—The Great Fear in Latin America, 2nd. ed. Collier Books, N. Y., 1966. Chapter X, pages 219—223.

约翰·杰拉西：《拉丁美洲的大患》，第二版，科利尔书局，纽约，1966年，第10章第219—223页

GOMEZ, Juan Pablo — Apuntes Biográficos del General Melgarejo, Imprenta El Comercio, Lima, 1872. Chapter VII, pages 1—55.

胡安·巴勃罗·戈麦斯：《梅尔加雷霍将军略传》，商业印刷所，利马，1872年，第 7 章第1—55页

GONZALES, Antonio E. — "Desconocida Colaboración del Pueblo Paraguayo a la Rebelión de Tupac Amaru," Khana, Año X, Vol. 1, No. 38, La Paz, March, 1967. Chapter V, pages 89—100

安东尼奥·E·冈萨雷斯：《巴拉圭人民支持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秘史》，《汗 那》第10年，第 1 卷第38期，拉巴斯，1967年 3 月，第 5 章第89—100页

GROSSO, Alfredo B. — Curso de Historia Nacional, Buenos Aires, Gráficos F. Rossi e Hijo, Buenos Aires, 1936. Chapter VI, pages 207—343.

阿尔弗雷多·B·格罗索：《国史教程》，布宜诺斯艾利斯，F·罗西父子印刷公司，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年，第6章第207—343页

GUNTHER, John — Inside Latin America, Harper & Bros., N. Y., 1941. Chapter IX, pages 219—233.

—Inside South America, 3rd. ed., Harper & Row, N.Y., 1966. Chapter IV, pages 411—416. Chapter X, pages 389—416.

约翰·冈瑟：《拉丁美洲内幕》，哈珀兄弟公司，纽约，1941年，第9章第219—233页

约翰·冈瑟：《南美内幕》，第3版，哈珀—罗公司，纽约，1966年，第4章第411—416页，第10章第389—416页

GUTIERREZ, Alberto — La Guerra de 1879, Bouret, Paris, 1920. Chapter VIII.

— El Melgarejismo, Gonzael y Medina, La Paz, 1918. Chapter VII, pages 210—215, 289 and Appendix.

阿尔维托·古铁雷斯：《1879年战争》，布雷，巴黎，1920年，第8章

阿尔维托·古铁雷斯：《梅尔加雷霍主义》，贡萨埃尔—梅迪纳公司，拉巴斯，1918年，第7章第210—215页、第289页和附录

GUTIERREZ, José R. — "La Cuestión de Límites entre Bolivia y el Brasil," Imprenta Paceña, 1868. Chapter VII, pages 1—79.

何塞·R·古铁雷斯：《玻利维亚与巴西边界问题》，拉巴斯印书局，1868年，第7章第1—79页

HANKE, Lewis — The Imperial City of Potosi, Marti-

nus Nijhoff, The Hague, 1956. Chapter III, pages 1—3.

刘易斯·汉克：《皇城波托西》，马蒂纳斯·尼乔夫，海牙，1956年，第3章第1—3页

H. D. (anonymous) — Curso de Historia Patria, 11th. ed. Casa A. Barreiro y Ramos S. A. Montevideo, 1946. Chapter VI, pages 193—270.

H·D·（作者名字不详）：《本国历史教程》，第11版，卡萨·A·巴雷罗—拉莫斯股份公司，蒙得维的亚，1946年，第6章第193—270页

HEATH. Dwight B. — "Bolivia Under Barrientos," Current History, Vol. 53 No. 315 Wilton, Conn., 1967, Chapter X, pages 275—282.

德怀特·B·希思：《巴里恩托斯统治下的玻利维亚》，现代史，第53卷第315期，威尔顿，康涅狄格，1967年，第10章第275--282页

HINOJOSA, Mario and Michael — "Private Investment in Bolivia; Organizing to do Business,"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Vol. 6, No. 2, N. Y., July-December, 1964. Chapter X, pages 265—287.

马里奥·伊诺霍萨、迈克尔·伊诺霍萨：《在玻利维亚的私人投资；企业经营》，《美洲法律评论》第6卷第2期，纽约，1964年7—12月，第10章第265—287页

HULL, Cordell — Memoirs, Vol. I & II. MacMillan Co., N. Y., 1948. Chapter IX, pages 322—347.

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1卷及第2卷，麦克米伦公司，纽约，1948年，第9章第322—347页

HUTCHINSON, Cary B. — U. S. Army Area Handbook for Bolivia, Foreign Areas Studies Division.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1963. Chapter VI, pages 43—66 and 455—492. Chapter VII, pages 29 and 316.

卡里·B·哈钦森：《美国陆军玻利维亚地区手册》，外国区域研究部，美洲大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63年，第4章第43—66页、第455—492页，第7章第29页和316页

IBARRA GRASSO, Dick E. — Prehistoria, de Bolivia, Amigos de Libro, La Paz, 1965. Chapter I, pages 11—148. Chapter II, pages 283—306.

— La Escritura Indígena Andina, Biblioteca Paceña. La Paz, 1953. Chapter I, pages 99—115.

— "prehistoria General Americana y Boliviana," Khana, Año VII, Vol. I, No. 33—34, La Paz, July, 1959. Chapter I, pages 5—37.

— "Un Nuevo Panorama de la Arqueología Boliviana," Arqueologia Boliviana, edited by Carlos Ponce Sanginés, Biblioteca Paceña, La Paz, 1957. Chapter I, pages 235—285.

迪克·E·伊瓦拉·格拉索：《玻利维亚史前史》，书友公司，拉巴斯，1965年，第1章第11—148页，第2章283—306页

迪克·E·伊瓦拉·格拉索：《安第斯山区的土著文字》，拉巴斯图书馆，拉巴斯，1953年，第1章第99—115页

迪克·E·伊瓦拉·格拉索：《美洲和玻利维亚史前史概论》，《汗那》第7年，第1卷第33—34期，拉巴斯，1959年7月，第1章第5—37页

迪克·E·伊瓦拉·格拉索：《玻利维亚考古学的新貌》，玻利维亚考古学，卡洛斯·庞塞·桑西内斯主编，拉巴斯图书馆，拉巴斯，1957年，第1章第235—285页

IMAÑA C., Teodosio—"16 Presidentes Paceños Gobernaron Nuestro País," Presencia, La Paz, July, 1967. Chapter VII, page 5.

特奥多西奥·伊马纳·C·：《治理我国的十六位拉巴斯人总统》，《存在》，拉巴斯，1967年7月，第7章第5页

IMBELLONI, José — "La Astronomía de Tiahuanaco," Khana, Año V, Vol. III & VI, No. 27—28, La Paz, Oct., 1957. Chapter I, pages 33—38.

— "Antiguedad y Cronologia de Tiwanacu," Arqueologia Boliviana, edited by Carlos Ponce Sanginés, Biblioteca Paceña, La Paz, 1957. Chapter I, pages 405—447.

何塞·因贝略尼：《蒂亚瓦纳科的天文学》，《汗那》第5年，第3—4卷第27—28期，拉巴斯，1957年10月，第1章第33—38页

何塞·因贝略尼：《蒂亚瓦纳科的古物和纪年》，玻利维亚考古学，卡洛斯·庞塞·桑西内斯主编，拉巴斯图书馆，拉巴斯，1957年，第1章第405—447页

JAMES, Preston E. — Latin America, Odyssey Press, N. Y., 1959. Chapter IV, pages 204—232.

普雷斯顿·E·詹姆斯：《拉丁美洲》，奥德赛出版社，纽约，1959年，第4章第204—232页

JOHNSON, William W. — The Andean Republics, Bolivia, Chile, Ecuador, Peru, Life World Library,

Time, Inc., N. Y., 1965. Chapter III, pages 43—49. Chapter VI, pages 60—64. Chapter VII, pages 102—103

威廉·W·约翰逊：《安第斯地区的共和国：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生活世界图书社，时代有限公司，纽约，1965年，第 3 章第43—49页，第 6 章第60—64页，第 7 章第102—103页

KEMPFF Mercado, Manfredo — Historia de la Filosofía en Latino América, Empresa Editorial Zig-Zag, Santiago, Chile, 1958, Chapter VI, pages 91—96.

曼弗雷多·肯普夫·梅尔卡多：《拉丁美洲哲学史》，曲折出版社，圣地亚哥、智利，1958年，第 6 章第 91—96页

LANNING, Edward & pATTERSON, Thomas — "Early Man in South America,"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17, No.5, N.Y., Nov. 1967. Chapter I, pages 44—50.

爱德华·兰宁、托马斯·帕特森：《南美洲的早期人类》，美国科学杂志，第217卷第 5 期，纽约，1967年11月，第 1 章第44—50页

LECUNA, Vicente —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 Creacion de Bolivia, Litografía del Comercio, Caracas, 1924. Chapter VII, pages 94—320.

维森特·莱库纳：《关于玻利维亚创建的参考文件》，商业印书局，加拉加斯，1924年，第 7 章第94—320页

LEVI-STRAUSS, Claude — A World on the Wane, translated by John Russell, Criterion Books, N. Y., 1961. Chapter V., pages 67—70.

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衰微中的世界》，约翰·拉塞尔译，标准书局，纽约，1961年，第5章第67—70页

LIEUWEN, Edwin —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Frederic A. Praeger, Inc., fo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Y., 1960. Chapter IX, pages 17—80. Chapter X, pages 53—148.

埃德温·利厄温：《拉丁美洲的军事与政治》，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有限公司，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纽约，1960年，第9章第17—80页，第10章第53—148页

LOAYZA Beltrán, F.— Campos de Concentración en Bolivia, Editorial Novedades, La Paz, 1966. Chapter X.

F·洛艾萨·贝尔特兰：《玻利维亚的集中营》，新闻出版社，拉巴斯，1966年，第10章

LLANOS APARICIO, Luis — "Romances desconocidos en la Vida Colonial de La Paz," Khana, Año VII, Vol. I, Nos. 33—34, La Paz, July, 1959. Chapter V, pages 162—169.

路易斯·利亚诺斯·阿巴里西奥：《拉巴斯殖民时期的不太流行的历史歌谣》，《汗那》第7年，第1卷第33—34期，拉巴斯，1959年7月，第5章第162—169页

LLOSA, José Antonio—René Barrientos Ortuño, Paladín de la Bolivianidad, Editorial Novedades, La Paz, 1966. Chapter X, pages 135—291.

何塞·安东尼奥·略萨：《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玻利维亚的勇将》，新闻出版社，拉巴斯，1966年，第10章第135—291页

MAC EOIN, Gary — Latin America, The Eleventh Hour, P. J. Kenedy & Sons, N.Y., 1962. Chapter X, pages 87—97.

加里·麦克埃奥因：《拉丁美洲：第十一小时》，P·J·肯尼迪父子公司，纽约，1962年．第10章第87—97页

MARKHAM, Sir Clements R. — The Incas of Peru, Smith, Elder & Co., London, 1911. Chapter II, pages 1—94.

克莱门茨·R·马卡姆爵士：《秘鲁的印加人》，史密斯—埃尔德公司，伦敦，1911年，第2章第1—94页

MAROF, Tristan — Breve Biografía de Víctor Paz Estenssoro, Editorial Juventud, La Paz, 1965. Chapter X, pages 15—209.

特里斯坦·马罗夫：《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传略》，青年出版社，拉巴斯，1965年，第10章第15—209页

MASUR, Gerhard—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Mac Millan Co., N. Y., 1966. Chapter IX, pages 106—112. Chapter X, pages 106—122.

格哈特·梅苏尔：《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麦克米伦公司，纽约，1966年，第9章第106—112页，第10章第106—122页

MARTINEZ Montero, Homero — "Raíces Históricas de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Américas, Vol. 19, No. 5. Pan American Union, Washington, May, 1967. Chapter VI, pages 17—23.

奥梅罗·马丁内斯·蒙特罗：《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历史根源》，《美洲》杂志，第19卷第5期，泛美联盟，华盛顿，1967年5月，第6章第17—23页

MEDINACELI, Carlos — "Poeta, Músico y Aristócrata," El Diario, La Paz, April 9, 1967.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VII, page 2.

卡洛斯·梅迪纳塞利:《诗人、音乐家和贵族》,《日报》,拉巴斯,1967年4月9日,文学增刊,第7章第2页

MENDOZA, Jaime — El Lago Enigmático, Editorial Charcas. Sucre, 1936. Chapter IV, pages 1—12.

—El Macizo Boliviano,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La Paz, 1957. Chapter IV, pages 9—136.

—"La Muerte de Ballivián," El Diario, La Paz, April 9, 1967.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VII, page 2.

海梅·门多萨:《奇异的湖》,查尔卡斯出版社,苏克雷1936年,第4章第1—12页

海梅·门多萨:《坚强的玻利维亚人》,教育部,拉巴斯,1957年,第4章第9—136页

海梅·门多萨:《巴利维安之死》,《日报》,拉巴斯,1967年4月9日,文学增刊,第7章第2页

MESA, Teresa G. & José — Manual de Historia de Bolivia, Gisbert & Cía., La Paz, 1958. Chapter II, pages 26—64. Chapter III, pages 79—90.

特雷莎·G·梅萨、何塞·梅萨:《玻利维亚历史手册》,希斯维特公司,拉巴斯,1958年,第2章第26—64页,第3章第79—90页。

MILLARES REYES, Edgar — Las Guerrillas, Teoría y Práctica, Imprenta Universitaria, Sucre, 1968. Chapter X, pages 39—98.

埃德加·米利亚雷斯·雷耶斯：《游击队的理论和实践》，大学印刷局，苏克雷，1968年，第10章第39—98页

MOLINS, W. Jaime — La Ciudad Unica, Editorial Potosí. Potosí, 1961. Chapter III, pages 3—13. Chapter IV, pages 35—51.

W·海梅·莫林斯：《独一无二的城市》，波托西出版社，波托西，1961年，第3章第3—13页，第4章第35—51页

MONTENEGRO, Carlos — Nacionalismo y Coloniaje, Biblioteca Paceña, La Paz, 1953. Chapter VII, pages 93—159.

卡洛斯·蒙特内格罗：《民族主义与殖民制度》，拉巴斯图书馆，拉巴斯，1953年，第7章第93—159页

MUÑOZ, Mariano D. & LOPEZ-NETTO, Felipe — "Treaty of Friendship, Limits, Navegation, Commerce and Extradi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Bolivia and Empire of Brazil," Bolivian Foreign Office, March 27, 1866. Chapter VII, pages 1—31.

马里亚诺·D·穆尼奥斯、费利佩·洛佩斯—内托：《玻利维亚共和国和巴西帝国之间的友好、边界、通航、通商及引渡条约》，玻利维亚外交部，1866年3月27日，第7章第1—31页

MUÑOZ REYES, Jorge—Bosquejo de Geografía de Bolivia. Instituto Pan-Americano de Geografía e Historia, Gráficas Jornal de Brasil, Rio de Janeiro, 1956. Chapter I, pages 10—11, 60—73. Chapter IV, pages 73—88.

豪尔赫·穆尼奥斯·雷耶斯：《玻利维亚的地理概况》，泛美地

理与历史学会，巴西日报出版社，里约热内卢，1956年，第1章第10—11页、第60—73页，第4章第73—88页

NAVARRO y LAMARCA, Carlos —Compendio de la Historia General de América, Vol.2, Angel Estrada y Comp., Buenos Aires, 1913. Chapter VI, pages 539—575, and 612—795.

卡洛斯·纳瓦罗—拉马尔卡：《美洲通史概要》，第2卷，安赫尔·埃斯特拉达公司，布宜诺斯艾利斯，1913年，第6章第539—575页、第612—795页

NIELSEN REYES, Federico —"Un Chileno Fue el Primer Biógrafo de Abaroa," El Diario, La Paz, March 23, 1967. Chapter VIII.

费德里科·尼尔森·雷耶斯：《阿瓦罗亚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是智利人》，《日报》，拉巴斯，1967年3月23日，第8章

NIXON, Richard M. —Six Crises, Doubleday & Co., Garden City, N. Y., 1962. Chapter X, page 192.

理查德·M·尼克松：《六次危机》，道布尔戴公司，花园城，纽约，1962年，第10章第192页

NOEL, Eugenio—"Cerro Madre de América," and "Ante las Máquinas de la Casa de Moneda," Tríptico de Potosí, 2nd. ed., Colección de la Cultura Boliviana, Potosí, 1965.Chapter IV, pages 11—22.

欧亨尼奥·诺埃尔：《美洲的母亲山》和《在造币厂机器前》，《波托西三部曲》第2版，玻利维亚文化丛书，波托西，1965年，第4章第11—22页

OLMOS, J. Leonardo—El Chaco, Editorial América, La Paz, 1930. Chapter IX, pages 7—16, and 126—154.

九

④

J·莱昂纳多·奥尔莫斯：《查科》，美洲出版社，拉巴斯，1930年，第9章第7—16页、第126—154页

OSBORNE, Harold—Bolivia, A Land Divided, 2nd. e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1955. Chapter IV, pages 1—46.

—Indians of the Ande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52. Chapter I, pages 1—14. Chapter II, pages 80—156.

哈罗德·奥斯本：《玻利维亚——被分割的土地》，第2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伦敦，1955年，第4章第1—46页

哈罗德·奥斯本：《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劳特莱杰与基根·保罗有限公司，伦敦，1952年。第1章第1—14页，第2章第80—156页

OSORIO, Filiberto R.—La Campaña del Chaco, La Paz, 1944. Chapter IX, pages 1—118.

菲利维托·R·奥索里奥：《查科战役》，拉巴斯，1944年，第9章第1—118页

OSORIO, Juan A.—"Las Responsabilidades de la Guerra del Chaco," El Diario, La Paz, Jan. 28, 1968. Chapter IX.

胡安·A·奥索里奥：《查科战争的责任》，《日报》，拉巴斯，1968年1月28日，第9章

OVANDO Candia, Alfredo—Informe a la Nación, Editorial Novedades, La Paz, 1966. Chapter X, pages 7—15.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告全国书》，新闻出版社，1966年，第10章第7—15页

PAREDES, M. Rigoberto—La Fundación de Bolivia, Ediciones Isla, La Paz, 1964. Chapter VII, pages 30—47.

—Tiahuanacu y la Provincia de Ingavi, Ediciones Isla, La Paz, 1955. Chapter I, pages 33—135.

—Mitos, Supersticiones y Supervivencias Populares de Bolivia, Ediciones Isla, La Paz, 1963. Chapter II, pages 37—39.

—La Paz y la Provincia el Cercado, Editorial Centenario, La Paz, 1955. Chapter III, pages 7—14.

—"Ligeros datos sobre la Fundación de Bolivia," Khana, Año V—VI, Nos. 27—30, La Paz, March, 1958. Chapter VI, pages 75—87.

M·里戈维托·帕雷德斯：《玻利维亚的建立》，岛屿出版公司，拉巴斯，1964年，第7章第30—47页

M·里戈维托·帕雷德斯：《蒂亚瓦纳科与因加维省》，岛屿出版公司，拉巴斯，1955年，第1章第33—135页

M·里戈维托·帕雷德斯：《玻利维亚的迷信、神话和民间遗风》，岛屿出版公司，1963年，第2章第37—39页

M·里戈维托·帕雷德斯：《拉巴斯市及拉巴斯省》，世纪出版社，拉巴斯，1955年，第3章第7—14页

M·里戈维托·帕雷德斯：《关于玻利维亚建立的一些资料》，《汗那》，第5—6年，第27—30期，拉巴斯，1958年3月，第6章第75—87页

PATCH, Richard W.—"Bolivia: U. S. As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Setting,"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Harper & Bros., fo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 Y., 1960. Chapter IV, pages 112—128, and 151—176.

理查德·W·帕奇：《玻利维亚：革命环境下的美援》，今日拉丁美洲的社会变革，哈珀兄弟公司，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纽约，1960年，第4章第112—128页、第151—176页

"PAULOVICH"—"Apariencia de Enrique Hertzog G.," Presencia, La Paz, 1967.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IX, page 4.

保罗维奇：《恩里克·埃尔佐格·G·的外表》，《存在》，拉巴斯，1967年，文学增刊，第9章第4页

PAZ, Luis—La Corte Suprema de Justicia de Bolivia, Imprenta Bolivar de M. Pizarro, Sucre, 1910. Chapter VIII, Chapters 14—22.

路易斯·帕斯：《玻利维亚的最高法院》，玻利瓦尔·德·M·皮萨罗印刷局，苏克雷，1910年，第8章第14—22章

PAZ ESTENSSORO, Victor—Discursos Parlamentarios, Editorial Canata, La Paz. Chapter X, pages 297—324.

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议会演说集》，卡纳塔出版社，拉巴斯，第10章第297—324页

PEÑALOZA, Luis—Historia Económica de Bolivia, Talleres Gráficos Bolivianos, La Paz, 1953. Chapter III, pages 43—56. Chapter V, pages 56—250. Chapter VI, pages 250—259. Chapter VII, pages 346—357.

路易斯·佩尼亚洛萨：《玻利维亚经济史》，玻利维亚印刷所，拉巴斯，1953年，第3章第43—56页，第5章第56—250

页，第6章第250—259页，第7章第346—357页

PEREYRA, Carlos — Historia de la América Española, Perú y Bolivia, Editorial Saturnino Calleja, S.A., Madrid, 1925. Chapter III, pages 23—322.

卡洛斯·佩雷拉：《西班牙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历史》，土星街出版股份公司，马德里，1925年，第3章第23—322页

PEREZ Bustamante, C. — Síntesis de Historia de España, 9th. ed., Aldus, S.A., Madrid, 1953. Chapter VI, pages 196—222.

C·佩雷斯·布斯塔曼特：《西班牙历史总论》，第9版，阿尔杜斯出版股份公司，马德里，1953年，第6章第196—222页

PICON-SALAS, Mariano — A Cultural History of Spanish America from Conquest to Independence, translated by Irving A. Leon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66. Chapter III, pages 27—41.

马里亚诺·皮康—萨拉斯：《从征服到独立时期西班牙美洲的文化史》，欧文·A·伦纳德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66年，第3章第27—41页

PINILLA G., Claudio — "Sobre las Responsabilidades de la Guerra del Chaco," Presencia, La Paz, March 10, 1968.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IX, page 4.

克劳迪奥·皮尼利亚·G·：《查科战争的责任》，《存在》，拉巴斯，1968年3月10日，文学增刊，第9章第4页

PINTO, Manuel M. — La Revolución de la Intendencia de La Paz, 2nd. ed., Editorial Universo, La Paz,

1912. Chapter VI, pages 1—207.

曼努埃尔·M·平托—《拉巴斯郡的革命》，第2版，通用出版社，拉巴斯，1942年，第6章第1—207页

PONCE SANGINES, Carlos — Arqueología Boliviana, Editor, Biblioteca Paceña, La Paz, 1957. Chapter I, pages 15—32.

卡洛斯·庞塞·桑西内斯：《玻利维亚考古学》，拉巴斯图书馆编，拉巴斯，1957年，第1章第15—32页

PONCE SANGINES, C. & GARCIA, A. — 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de 1809, Biblioteca Paceña, Alcaldía Municipal La Paz, 1953. Chapter VI, pages 1—207.

C·庞塞·桑西内斯、A·加西亚：《1809年革命史有关文献》，拉巴斯图书馆，市政厅，拉巴斯，1953年，第6章第1—207页

POSNANSKY, Arthur—Tihuanacu, The Cradle of American M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 Paz, 1957. Chapter I, pages 1—8.

—"¿Quiénes Eran los Incas?"—Boletín de la Sociedad Geográfica, Año XXX, La Paz, June, 1922. Chapter II, pages 122—206.

阿瑟·波斯南斯基：《蒂亚瓦纳科 —美洲人的发源地》，教育部，拉巴斯，1957年，第1章第1—8页

阿瑟·波斯南斯基：《谁是印加人?》地理学会简报，第30年，拉巴斯，1922年6月，第2章第122—206页

PRATT, Julius W.—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2nd. ed.,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e, N.J., 1965. Chapter VIII, page 184.

朱利叶斯·W·普拉特：《美国外交政策史》，第2版，普伦蒂斯—霍尔有限公司，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新泽西，1965年，第8章第184页

PRESCOTT, William H.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he Catholic, Vol. II. Lippincott & Co., Philadelphia, 1870. Chapter V, pages 486—498.

—The Conquest of Peru, Book I. Richard Bentley, London, 1850. Chapter II, pages 2—159. Book II. Chapter III, pages 3—431.

威廉·H·普雷斯科特：《天主教徒——斐迪南和伊萨贝拉》，第2卷，利平科特公司，费城，1870年，第5章第486—498页

威廉·H·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1册，理查德·本特利，伦敦，1850年，第2章第2—159页，第2册第3章第3—431页

QUEREJAZU Calvo, R. —Masamaclay, Gráfica E. Burillo, La Paz, 1965. Chapter IX, pages 11—485.

R·克雷哈苏·卡尔沃：《马沙马克雷伊》，布里略印刷局，拉巴斯，1965年，第9章第11—485页

RAMOS, Demetrio —"La Creación de Bolivia y el Origen del Decreto de La Paz del 9 de febrero de 1825." Khana, Año X, Vol. II, No. 39. Chapter VII, pages 122—147.

德梅特里奥·拉莫斯：《玻利维亚的创建及1825年2月9日和平法令的起因》，《汗那》，第10年，第2卷第39期，第7章第122—147页

RAND, Christopher — "Letter from La Paz," The New Yorker, N.Y., Dec. 3, 1966. Chapter X, pages 35—56.

克里斯托弗·兰德：《拉巴斯的来信》，纽约人，纽约，1966年12月3日，第10章第35—56页

REPAREZ, Gonzalo de —Perú, Ediciones de Arte Rep., Lima, 1960. Chapter I, pages 23—29.

贡萨洛·德·雷帕雷斯：《秘鲁》，艺术出版社，利马，1960年，第1章第23—29页

RIOS Reinaga, David —Civiles y Militares en la Revolución Boliviana, Editorial Difusión, La Paz, 1967. Chapter X, pages 13—191.

戴维·里奥斯·雷纳加：《玻利维亚革命时期的居民和军人》，传播出版社，拉巴斯，1967年，第10章第13—191页

RIVERA Sotomayor, Ana —Murillo en América, Empresa Gráfica Burillo, La Paz, 1963. Chapter VI, pages 19—103.

安娜·里维拉·索托马约尔：《美洲的穆里略》，布里略印刷公司，拉巴斯，1963年，第6章第19—103页

RODRIGUEZ-Castellano, Juan —Introducción a la Historia de Espa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 Y., 1956. Chapter III, pages 111—123.

胡安·罗德里格斯—加斯特利亚诺：《西班牙历史导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6年，第3章第111—123页

ROLON Anaya, Mario—Politica y Partidos en Bolivia, Libreria Juventud, La Paz, 1966. Chapter VIII, pages 126—138 and 191—210; Chapter IX, pages

140—180 and 219—486.

马里奥·罗隆·安纳亚：《玻利维亚的政治和政党》，青年书店，拉巴斯，1966年，第 8 章 第 126—138 页，第 191—210页，第 9 章第140—180页，第219—486页

ROUMA, Georges —Quitchouas et Aymaras, Extract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Royal Belgia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Bruxelle, 1933. Chapter IV, pages 11—20.

乔治·鲁马：《克丘亚人与艾马拉人》，摘自比利时皇家人类学学会的公报，布鲁塞尔，1933年，第 4 章第11—20页

ROWE, John—"Inca Culture at the Time of the Conquest,"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Vol. 3, Washington, 1946. Chapter II, pages 185—210.

约翰·罗：《征服时期的印加文化》，南美洲印第安人手册，第 3 卷，华盛顿，1946年，第 2 章第185—210页

RUIZ Gonzáles, René—La COMIBOL, Una Esperanza Frustrada,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Potosí, 1965. Chapter X, pages 1—22.

雷内·鲁伊斯·冈萨雷斯：《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希望的落空》，大学出版社，波托西，1965年，第10章第 1 —22页

SAAVEDRA, Abdón S.—Reivindicación Marítima, Gráficos Bolivianos, La Paz, 1966. Chapter VIII, pages 85—176; Chapter IX, pages 177—189.

阿夫东·S·萨维德拉：《海洋权的收回》，玻利维亚印刷局，拉巴斯，1966年，第 8 章第85—176页，第 9 章 第 177—189页

SAAVEDRA, Carlos G. de—Murillo, el Héroe de la

Pesadumbre, Imprenta de la Universidad Mayor de San Andrés, 1966. Chapter VI, pages 23—31.

卡洛斯·G·德·萨维德拉:《穆里略 苦难的英雄》,圣安德烈斯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6章第23—31页

SALINAS, José María —Historia de la Universidad Mayor de San Andres, Imprenta Universitaria, La Paz, 1967. Chapter VII, pages 45—73. Chapter IX, pages 511—526.

何塞·马里亚·萨利纳斯:《圣安德烈斯大学的历史》,大学印刷局,拉巴斯,1967年,第7章第45—73页,第9章第511—526页

SANABRIA, Hernando —Ñuflo de Chaves, El Caballero Andante de la Selva, Edit. Don Bosco, La Paz, 1960. Chapter V, pages 16—311.

埃尔南多·萨纳夫里亚:《努夫洛·德·查维斯——大森林的游侠骑士》,唐·博斯科出版,拉巴斯,1960年,第5章第16—311页

SANTA CRUZ, Andrés de —"El Gran Mariscal Santa Cruz, Su Política con Chile y la Confederación Perú-Boliviana." Khana, Años V & VI, Nos. 27—30, La Paz, March 1958. Chapter VII, pages 160—190.

—"El Alto Perú y la Independencia Americana," Khana, Año X, Vol. II, No. 39, La Paz, Nov., 1967. Chapter VI, pages 110—113.

—"Las responsabilidades de la Guerra del Chaco," El Diario, La Paz, Feb. 18, 1968.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IX, page 2.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圣克鲁斯大元帅及其对智利和玻利维亚—秘鲁联邦的政策》，《汗那》，第5—6年，第27—30期，拉巴斯，1958年3月，第7章第160—190页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上秘鲁及美洲的独立》，《汗那》，第10年，第2卷第39期，拉巴斯，1967年11月，第6章第110—113页

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查科战争的责任》，《日报》，拉巴斯，1968年2月18日，文学增刊，第9章第2页

SANTA CRUZ, Victor —Historia Colonial de La Paz, Editorial Renacimiento, La Paz, 1942. Chapter V, pages 67—131. Chapter VI, pages 191—324.

维克托·圣克鲁斯：《拉巴斯的殖民史》，复兴出版社，拉巴斯，1942年，第5章第67—131页，第6章第191—324页

SCHURZ, William L. —This New World, E. P. Dutton & Co. N. Y., 1964. Chapter II, pages 36—131. Chapter III, pages 109—159.

威廉·L·舒尔茨：《这个新世界》，E·P·达顿公司，纽约，1964年，第2章第36—131页，第3章第109—159页

SILES GUEVARA, Juan—Ensayo Crítico sobre: "Chile y Bolivia. Esquema de un Proceso Diplomático." de Jaime Eyzaguirre. Imprenta de la Universidad de San Andrés, La Paz, 1967. Chapter X, pages 59—60.

胡安·西莱斯·格瓦拉：《评海梅·埃萨吉雷所著〈智利与玻利维亚，一次外交活动的简况〉》，圣安德烈斯大学出版，拉巴斯，1967年，第10章第59—60页

SILES SALINAS, Jorge. —"Hernando Siles o la Vocación del Derecho," El Diario, La Paz, Dec. 17, 1967,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VIII, page 1.

豪尔赫·西莱斯·萨利纳斯:《埃尔南多·西莱斯或法律的天赋》,《日报》,拉巴斯,1967年12月17日。文学增刊,第 8 章第1页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A Thousand Days,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65. Chapter X, pages 165—205.

小阿瑟 · M · 施莱辛格:《一千日》,霍顿·米夫林公司,波士顿,1965年,第10章第165—205页

SHERWELL, Guillermo A —Simón Bolivar, Patriot, Warrior, Statesman, Father of Five Nations, Sun Book Inc., Baltimore, Md., 1930. Chapter VI, pages 163—174. Chapter VII, pages 175—233.

吉列尔莫·A·舍韦尔:《西蒙 · 玻利瓦尔 — 爱国者、战士,政治家、五国之父》,太阳书局有限公司,巴尔的摩,马里兰州,1930年,第 6 章第163—174页、第 7 章第175—233页

SORIA, Martín S. — "La Pintura en Bolivia en el Siglo XVI. El Hermano Bernardo Bitti, S. J., Pintor." Khana, Año VII, Vol. 1, No. 33—34. La Paz, July, 1959. Chapter V, pages 273—299.

马丁 · S · 索里亚:《十六世纪玻利维亚的绘画,教友贝尔纳多 · 比蒂,S·J·,画家》,《汗那》,第 7 年,第 1 卷第33—34期,拉巴斯,1959年 7 月,第 5 章第273—299页

STOCKMAN, Karen S. — Pre-Colonial Highways in Bolivia, La Paz—Yungas via Palca, Part I.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La Paz, 1967. Chapter

II, pages 11—12.

卡雷恩·S·斯托克曼：《殖民地以前时期的玻利维亚公路：从拉巴斯经帕尔卡到永加斯》，第一部分，国家科学院，拉巴斯，1967年，第2章第11—12页

SZULC, Tad — Latin America, Atheneum, N.Y., 1966. Chapter IV, pages 49—57.

— The Winds of Revolution, Frederick A. Praeger, N.Y., 1964. Chapter X, pages 16—244.

塔德·肖尔茨：《拉丁美洲》，文艺协会，纽约，1966年，第4章第49—57页

塔德·肖尔茨：《革命之风》，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纽约，1964年，第10章第16—244页

THAJMARA — Habla Melgarejo, Gonzales y Medina, La Paz, 1914. Chapter VII, page 17.

塔赫马拉：《梅尔加雷霍的讲话》，冈萨雷斯—梅迪纳公司，拉巴斯，1914年，第7章第17页

TOMASEK, Robert D. — "The Chilean-Bolivian Lauca River Dispute and the OA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Vol. IV, No.3,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Florida, July, 1967. Chapters IV and X, pages 351—366.

罗伯特·D·托马塞克：《智利和玻利维亚的劳卡河纠纷及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研究杂志》第4卷第3期，佛罗里达，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67年7月，第4章和第10章第351—366页

URBANSKI, Edmund S. — "Tres Revoluciones de Hispano-América: México, Bolivia y Cuba,"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Vol. VIII, No.3, Coral Gables, Florida, July, 1966. Chapter X, pages 419—430.

埃德蒙·S·厄本斯基：《西班牙美洲的三个革命：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古巴》，《美洲研究杂志》第8卷第3期，科拉尔一加布尔斯公司，佛罗里达州，1966年7月，第10章第419—430页

URIOSTE, Ovidio — Mi Historia Anecdótica de Bolivia, Artes Foto Gráficas América, Sucre, 1951. Chapter VII, pages 47—66, 73—92, 115—116 and 150—155.

奥维迪奥·乌里奥斯特：《玻利维亚轶史》，美洲印刷局，苏克雷，1951年，第7章第47—66页、第73—92页、第115—116页、第150—155页

VALDOVINOS, Carlos — "Miranda: El Embajador Olvidado de América," Americanas, Vol. 19, No.4, Pan American Union, Washington, D.C., April, 1967. Chapter VI, pages 28—30.

卡洛斯·巴尔多维诺斯：《米兰达：被人遗忘的美洲大使》，《美洲人》第19卷第4期，泛美联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67年4月，第6章第28—30页

VALENCIA Vega, Alipio — El Indio en la Independencia, Imp. El Progreso, La Paz, 1962. Chapter VI. pages 177—276.

— Manual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 Editorial Juventud, La Paz, 1964. Chapter VII, pages 148—167. Chapter VIII, pages 168—170. Chapter IX, pages 169—171. Chapter X, pages 175—185.

—Radiografía de la Revolución Paceña de 1809, Editorial Juventud, La Paz, 1967. Chapter VI, pages 13-89.
—"Las Ideas Políticas en la Revolución de Julio de 1809," Khana. Año IX, Vol. 1, Nos. 36—37, La Paz, Sept., 1962. Chapter VI, pages 5—15.
阿利皮奥·巴伦西亚·维加：《独立运动中的印第安人》，进步出版社，拉巴斯，1962年，第6章第177—276页
阿利皮奥·巴伦西亚·维加：《宪法手册》，青年出版社，拉巴斯，1964年，第7章第148—167页，第8章第168—170页，第9章第169—171页，第10章第175—185页
阿利皮奥·巴伦西亚·维加：《1809年拉巴斯革命透视》，青年出版社，拉巴斯，1967年，第6章第13—89页
阿利皮奥·巴伦西亚·维加：《1809年7月革命的政治思想》，《汗那》，第9年，第1卷第36—37期，拉巴斯，1962年9月，第6章第5—15页
VAN LOON, Hendrick W.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mon Bolivar, Dodd, Mead & Co., N.Y., 1943. Chapter VI, pages 109—129.
亨德里克·W·范隆：《西蒙·玻利瓦尔的生活和时代》，多德·米德公司，纽约，1943年，第6章第109—129页
VAZQUEZ MACHICADO, MESA & GISBERT—Manuel de Historia de Bolivia, Gisbert & Cía., La Paz, 1958. Chapter V, pages 97—271. Chapter VI, pages 275—299. Chapter VII, pages 301—372. Chapter VIII, pages 376—432. Chapter IX, pages 434—444.
梅萨·巴斯克斯·马奇卡多、希斯维尔特·巴斯克斯·马奇卡多：《玻利维亚历史手册》，希斯维尔特公司，拉巴斯，

1958 年，第 5 章第 97—271 页，第 6 章第 275—299 页，第 7 章第301—372页，第 8 章第 376—432 页，第 9 章第 434—444页

VIDAL, E. E.—Picturesque Illustrations of Buenos Aires and Montevideo, R. Ackerman, London, 1820. Chapter VI, pages xix-xxviii.

E·E·比达尔：《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图册集》，R·阿克曼，伦敦，1820年，第 6 章第19—28页

VIDART, Daniel D. —"Fábula y Realidad de Tiwanaku," Khana, Año IX, Vol. I, No. 36—37, La Paz, Sept., 1962. Chapter I, pages 116—126.

丹尼尔·D·比达尔特：《蒂亚瓦纳科的神话和现实》，《汗那》，第 9 年，第 1 卷第36—37期，拉巴斯，1962年 9 月，第 1 章第116—126页

VILELA, Arturo — "Trasfondo y Realidad del Problema Portuario de Bolivia," El Diario, La Paz, September 10, 1967. Literary Supplement. Chapter VIII, page 4.

阿图罗·比莱拉：《玻利维亚港口问题的背景与现实》，《日报》，拉巴斯，1967年 9 月10日，文学增刊，第 8 章第 4 页

VILLAMOR, Germán G. — Gramática del Kechua y del Aymara, Editorial Popular, La Paz, 1942. Chapter I, pages 27—28.

赫尔曼·G·比利亚莫尔：《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语法》，大众出版社，拉巴斯，1942年，第 1 章第27—28页

VILLALPANDO R., Abelardo — El Problema del Indio y la Reforma Agraria, Imprenta Universitaria, Po-

tosi, 1960. Chapter II, page 7—12. Chapter X, pages 123—160.

阿维拉多·比利亚尔潘多·R·：《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改革》，大学印刷局，波托西，1960年，第2章第7—12页，第10章第123—160页

VISCARRA Monje, Humberto — Las Calles de La Paz, Editorial UMSA, La Paz, 1966. Chapter VII, page 238—243. Chapter VIII, pages 176—198. Chapter IX, pages 204—205.

温贝托·比斯卡拉·蒙赫：《拉巴斯的街道》，大学缩微影片出版股份公司，拉巴斯，1966年，第7章第238—243页，第8章第176—198页，第9章第204—205页

VON HAGEN, Victor W. — Realm of the Incas, Mentor Books, N.Y., 1957. Chapter I, pages 11—42. Chapter II, pages 38—40.

维克托·W·冯哈根：《印加的疆域》，门特书局，纽约，1957年，第1章第11—42页，第2章第38—40页

WELLS, Henry.—Bolivian Election Factbook, Research, Inc., Operation & Policy, Washington, 1966. Chapter IX, pages 6—27.

亨利·韦尔斯：《玻利维亚选举实况》，研究公司行动政策，华盛顿，1966年，第9章第6—27页

WILDE M., Fernando — Historia Militar de Bolivia, La Paz, 1963. Chapter VIII, pages 171—190. Chapter IX, pages 191—246.

费尔南多·维尔德·M·：《玻利维亚军事史》，拉巴斯，1963年，第8章第171—190页，第9章第191—246页

WILGUS, A. C. & D'ECA, R. — Outlin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arnes & Noble, Inc., N.Y., 1939. Chapter VI, pages 120—129.

A·C·威尔格斯、R·德卡：《拉丁美洲史纲》，巴恩斯与诺布尔有限公司，纽约，1939年，第6章第120—129页

WILLIAMS, BARTLETT & MILLER — 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 4th.ed., Ginn & Co., Boston, 1955. Chapter V, pages 149—244. Chapter VI, pages 287—323. Chapter VII, pages 586—590. Chapter VIII, pages 590—596.

巴特利特·威廉斯、米勒·威廉斯：《拉丁美洲的人民及政治》，第4版，吉恩公司，波士顿，1955年，第5章第149—244页，第6章第287—323页，第7章第586—590页，第8章第590—5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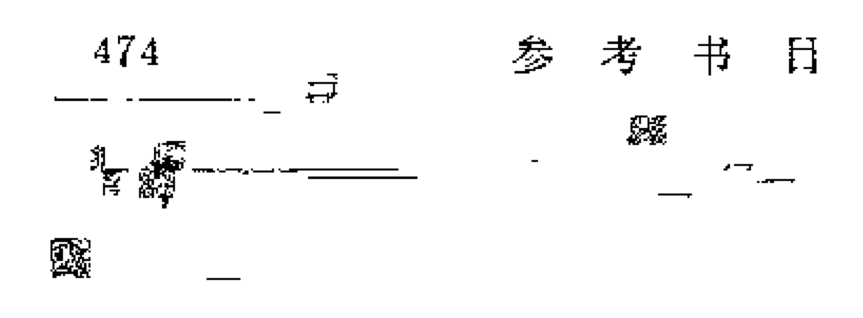
ZAVALETA M., René — La Revolución Boliviana y la Cuestión del Poder, Burillo, La Paz, 1964. Chapter X, pages 7—57.

雷内·萨瓦莱塔·M·：《玻利维亚革命及政权问题》，布里略公司，拉巴斯，1964年，第10章第7—57页

ZONDAG, Cornelius H. — The Bolivian Economy 1952—65, Praeger, N.Y., 1966. Chapter X, pages 80—240.

科尼利厄斯·H·宗达格：《玻利维亚经济1952—65年》，普拉格，纽约，1966年，第10章第80—240页

Anonymous—"Bolivia y el Comercio Exterior," Economía Boliviana, La Paz, April, 1967. Chapter IV, page 13.



索　　引

（所附数字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附于正文页边）

—A—

—C—

① 哥伦布的西班牙名字。——译者

—E—

—F—

—G—

— I —

—J—

—K—

—L—

—N—

—O—

—P—

—T—

—U—

—V—

—W—

—Y—

—Z—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玻利维亚简史
作者＝
页数＝５３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